

日本近代史

〔日〕井上清 鈴木正四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日本近代史

上册

〔日〕井上清 铃木正四著

杨 辉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年·北京

2 030 1102 5

日本近代史

下 册

〔日〕井上清 铃木正四著

杨 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年·北京

本书根据 1957 年日本合同出版社出版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译出。

内部读物

日本近代史

(上、下册)

[日]井上清 铃木正四著

杨 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 字数 345 千字

1959 年 12 月初版 1972 年 11 月重排第 2 次印刷

印数, 4,601—56,6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85 定价, 2.10 元

62785/7

1

15

出版说明

《日本近代史》是日本井上清等五人写的。井上清(1913—)是日本进步的史学家，现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日本历史(“国史”批判)》、《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及《日本的军国主义》等书。战后他长期参加民主运动，曾多次来我国访问。

本书包括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历史。全书分明治维新、资本主义的形成、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总危机和日本天皇制政府的投降五个阶段叙述。作者在本书中，用大量史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日本人民，疯狂侵略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罪行；指出日本在近代史上从亚洲最早的一个独立国家，战后变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独立后就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书中对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作了历史的叙

述。

关于日本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日本史学界还有争论。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中译本曾于 1959 年 12 月出版，出版前译者根据旧版翻译，并经校者根据修订版校订。这次重印，经天津市《日本近代史》中译本审读小组的同志协助，我们改正了一部分原译文中明显的错误，文字、标点符号也有一些小的改动。

1972 年 10 月

目 录

前言	11
第一篇 明治维新	19
第一章 推翻幕府制度	20
第一节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20
维新前社会的特征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町	
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农村的阶	
级分化	
第二节 农民起义和群众暴动的发展	34
人民生活的破坏 起义和群众暴动的发展	
思想的变动 天保改革	
第三节 尊王攘夷和半殖民地化的危机	45
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侵略 开港和幕府	
独裁的破绽 尊王攘夷 封建经济的解	
体 为攘夷而讨幕 半殖民地化的危机	
第四节 倒幕	57
反幕势力的统一和英法的态度 庆应年间	
的大暴动和起义 王政复古 江戸城的	
投降和倒幕 倒幕和对外关系	
第二章 统一国家的形成和走向资本主义	68
第一节 统一国家的形成	68
内乱 奉还版籍 收回民族权利 国	
内市场的发展和各藩的衰落 土地革命的	

萌芽 走向绝对主义 废藩置县	
第二节 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	82
官僚制 征兵和建立常备军 整顿身分	
制和整理俸禄 宣扬大教和义务教育	
第三节 收回国权和军国主义	91
收回国权的努力 对欧美的屈从 对朝	
鲜、中国的侵略政策 武力吞并琉球 军	
国主义	
第四节 改革地稅和扶植资本主义	101
改革地稅的必然性 改革地稅的两面性	
圈占国有地 扶植寄生地主制和原始积累	
扶植资本主义工业 军事性质的工业	
大商业资本和政府的勾结	
第二篇 资本主义的发展	117
第三章 自由民权和天皇制	118
第一节 农民斗争和自由民权	118
废藩后的人民起义 建议设立民选议院	
上流社会的民权说 士族叛乱和反对地稅	
改革的起义 人民斗争的抬头	
第二节 自由党的成立	132
第一次胜利 设立国会的诏书 自由党	
与改进党的成立 革命思想	
第三节 原始积累的强制推行和自由党的分化	143
自由党员的革命化 福岛事件 干部的	
机会主义和战线的分裂 原始积累的强制	
推行 阶级分化和走向寄生地主制	
第四节 自由党的解散和起义	153

群马事件和加波山事件	自由党的解散
秩父事件 饭田事件	名古屋事件和静
冈事件 各事件的意义	
第五节 天皇制的完成	166
天皇制机构的整各	民族意识的成长
井上外相改订条约的谈判和压迫朝鲜	爱
国民主势力的重新高涨	天皇制的完成
第四章 日本资本主义的确立	180
第一节 最初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	180
社会不安和工人状况	最初的经济危机
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	
第二节 改订条约和中日甲午战争	188
政党和政府的对立	改订条约和“强硬外
交”	日英条约的改订 中日甲午战争
第三节 机械工业的发展	199
“臥薪尝胆”	机械工业的发展 纺织与
缫丝业的发展	国营军需工业的意义
铁路与航运	贸易和金本位制 工人状
况	
第四节 寄生地主制的扩大	210
资本主义渗入农业	寄生地主制的扩大
农民状况	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
第五节 工农阶级的成长	219
工会的成立	全体农民的斗争和足尾矿毒
事件	贫农、佃农的斗争 社会主义的萌
芽和普选运动	国际主义和工农联盟思想
的萌芽	日本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及其意义

第六节 地主资产阶级的天皇制	232
资产阶级参预政治 地主资产阶级的天皇制 走向帝国主义	
第五章 帝国主义的形成	243
第一节 日俄战争	243
侵入朝鲜 帝国主义阶段 列强瓜分远东的竞争 镇压义和团和日本 日英同盟 对俄宣战 反战运动 俄国第一次革命和日俄战争的结束 朴茨茅斯和约	
第二节 垄断财阀的成长和寄生地主制的统治	262
人民的牺牲和统治阶级巨利 产业的发展 财阀进行垄断 资本输出的开始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米粮商品化 官僚和地主的勾结 寄生地主制的完成	
第三节 吞并朝鲜,掠夺殖民地	278
吞并朝鲜 统治南满洲 剝削台湾和库页岛	
第四节 日本社会党和幸德事件	289
火烧东京警察机关 劳资纠纷的扩大和暴动 农民斗争 日本社会党的成立 向国际主义前进 幸德事件 友爱会	
第五节 大正政变	300
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立 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反抗 中产阶级和近代文化 大正政变	
第三篇 总危机	317
第六章 总危机的开始	318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扩张	318
第一次大战和日本的执政者 参加大战	
占领山东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第四次	
日俄协约 寺内内閣和宪政会 美国和	
中国的参战、石井蓝辛协定 产业的飞跃	
发展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输出	
和西原借款	
第二节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影响	345
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外国对苏联武装	
干涉的开始 大战结束和凡尔赛体制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 俄国革命的意义	
第三节 米粮暴动——经济危机的开始	363
大战中的城市工人 大战中的农业与农民	
工农运动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者重新展开	
活动和民本主义 俄国革命的影响 出	
兵西伯利亚 米粮暴动的开始 全国的	
蜂起 日本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第四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	399
原敬内閣 工人运动质的发展 战后的	
经济危机 工人、学生和普选运动 社	
会主义同盟、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	
对立 日本农会的成立 全国水平社的	
成立 妇女运动的发展 日本共产党的	
成立 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 朝鲜	
民族的独立革命 同化政策 台湾人民	
的斗争 中国的五四运动 华盛顿会议	
西伯利亚干涉战争的惨败	

第五节 议会政治和劳动阶级	445
超政党内阁的再起与裁军 山本内阁和大	
地震灾害下的白色恐怖 护宪三派和资产	
阶级地主的天皇制 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	
持法 裁军和垄断资本 相对的稳定和	
币原外交 共产党的解散决议和重建	
工人战线的分裂 日本工会评议会 日	
本农会的战斗化和分裂 身分斗争和阶级	
斗争的结合 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 无	
产政党的结成和分裂	
第七章 经济危机	479
第一节 金融危机和中国革命	479
金融危机的爆发 田中内阁的成立和中国	
革命的发展 处理危机与财阀 出兵山东	
和东方会议 炸死张作霖	
第二节 工农运动的发展	494
劳资纠纷和工会 农民运动和水平社及其	
他运动 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 反对干	
涉中国的斗争和共产党的发展 普选的实施	
施 三·一五镇压 劳农党的重建问题	
和四·一六镇压	
第三节 经济危机	511
滨口内阁和协调外交 紧缩和合理化以及	
黄金出口解禁 世界经济危机 日本的	
经济危机 经济军事化的方向和地主制的	
变化	
第四节 总危机的加深	530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化	纳粹独裁的建立	美国的新政和渥太华会议	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	
第八章	中日战争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542
第一节	侵略中国东北				542
劳资纠纷和共产党	农民斗争	市民、学生、文化运动	殖民地的民族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心目中的中国东北	
备战和右翼	占领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	“满洲国”和对苏关系			
第二节	争取生存、和平和民主的斗争				562
五·一五政变	经济军事化的进展	反战斗争	一九三二年纲领	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	
迫害自由主义					
第三节	侵入华北和二·二六事件				575
中国的抗日运动	侵入华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	二·二六政变	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法西斯主义和人民阵线	日本的人民阵线的斗争				
第四节	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596
全面战争的开始	战争的扩大和各国的态度	战争的长期化	迫害和抵抗	国家总动员	
近卫内阁全体辞职					
第四篇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				611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				612
第一节	欧洲战争的爆发				612

苏联的和平政策	慕尼黑协定	英法对德宣战	世界大战	
第二节	三国同盟和新体制			619
三国同盟的谈判和进攻苏联	长期战下的各种矛盾	南进政策	第二次近卫内阁和三国同盟	新体制
第三节	苏德开战和日美开战			632
日美谈判和日苏中立条约	德国侵略苏联	苏德战争和日本	日美开战	
第十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			642
第一节	战局的转变			642
初战的胜利	中途岛和瓜达康纳尔岛的战败	大陆战场	斯大林格勒之战——世界战局的转变	意大利投降
共产国际的解散和开罗宣言	改变战略及其失败	东南亚各民族的抗日民族斗争		
第二节	战争经济和人民生活			655
军需生产的总动员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垄断资本的巨大利润	军事监狱中的奴隶	农业的衰落	饥饿的人民
第三节	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671
马利亚纳群岛的失陷	东条内阁的垮台	全线败退	战争经济的崩溃	本土遭到空袭
厌战和反战	反战同盟			
第四节	投降			685
雅尔塔会议和德国投降	投降前的酝酿			

两个战争目的	波茨坦公告	投降	大
战的损失			
结语			704
第二次大战的后果	占领体制下的日本		
日本近代史的分期	日本近代史的特征		
结语			
新版后记			725
年表			729



前 言

(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现在,我们日本人民,为了完成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为了创造新的民族历史,正在奋斗着。我们日本人民,为了恢复被剥夺的祖国的独立,但不是恢复过去那样的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国家,而是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正在团结全民族的一切力量。我们日本人民,为了反对祖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而使它改造成为永久和平的堡垒,正在奋不顾身地斗争着。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603页。

为了胜利完成独立与和平的斗争，为了胜利完成创造民族未来历史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对于过去我国历史所提供给我们的形势，有正确的科学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念。

拙著《日本近代史》就是指望对创造从今天到明天的民族历史斗争有所贡献而撰写的。作者们企图在本书内阐明下列问题：

十九世纪后半期，我国经过明治维新，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取得了发展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独立国家的荣誉。然而，同时也很快地变成军国主义国家，侵略邻国，不断地扩张，结果陷入今天的悲惨境地。我们为什么原因，怎样才陷入这种地步的呢？对于这点作科学的、正确的研究，阐明日本社会从近代到现代发展的规律，这是作者们的中心任务。作者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彻底研究日本近代史上基本矛盾的变化和明确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方面，曾经作了最大的努力。

其次，我们日本人民，为了解放祖国、争取独立、建立和平、民主和安定的生活，历来究竟已经尽了多大的力量？我国人民的进步传统有多少？是

怎样形成的？作者们对此曾经努力地描绘其争取进步斗争的活生生的事迹，冷静地研究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作者们认为有两点是极重要的。第一点，我国过去的史书大多数是有意或无意地隐瞒或抹杀日本人民的民主传统和革命运动，特别是最近的反动势力，更致力于这一点。我们要揭穿这种卑鄙企图，阐明民族的优良传统，今天要把它继承下来，并予以发扬光大。

第二点，就是有些进步的学者，也往往用极其片面而狭隘的观点去对待和评价我们先人的斗争。他们认为只有站在最前列的、最勇敢的人和党派，或抽象化了的、偶像化了的“人民”或“工人农民”才是进步的，往往把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也努力加以美化。至于对我国进步发展有过贡献的其他无数的人或力量，则采取抹杀或轻视的态度。这不是阐明历史真相的方法。我个人也有过这种错误的倾向，但是现在决心彻底地把它纠正过来。

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尽可能严密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因为，愈深入学习，愈确信只

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最正确、最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并不采取割裂史实，仅仅引用几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巧妙地套上去的手法；恰恰相反，我们贯彻了根据史实追求真理的态度，认为拼凑空论或现成概念的编写方法，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作者们对客观事实，根据正确的史料，广泛而深入地反复钻研，阐明这些事实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们对于这本书既没有把历史从纵的方面割裂开来，单考察其中一部分，如经济史、政治史或文化史（当然写这些专史也是重要的）来进行编写；也不是把这些部门拼凑起来进行编写，而是把历史看作是和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融合了的整体，统一地写出来的。日本近代史尤其和世界史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不只限于叙述日本跟外国的交涉史，或单纯地把世界史作为日本历史的背景，或者是拿日本跟外国对比，而是努力阐明二者的内在联系。

我们的意图和努力，实际上在拙著里实现了多少呢？这有待于读者的判断。我们自己也认为

我们的意图不会一下子完全实现。只是在有关日本近代史的综合性的概论还没有出现的今天，这本书如能多少有点贡献，那我们就引以为荣幸了。我们以此为出发点，继续努力，特别希望在读者们的指教下，早日写出一本完善的日本近代史。

(二)

本书各篇、章的划分，是以日本近代史的时期为基础；而我们划分日本近代史的时期，则是根据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正确的分期和本书的篇、章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作者们认为从幕府末期^①到1945年8月15日止，分为以下五个时期，比较妥当。

第一个时期，明治维新时期——1830 年起到

^① 日本仿中国古制称将军处理军务的衙门为幕府，但自将军掌握全国统治实权后，幕府就变为他的政厅。源氏设幕府于镰仓，称为镰仓幕府，计一百五十年。足利氏设幕府于京都的室町，称为室町幕府，计二百三十六年。德川氏设幕府于江户（即今东京），称为江户幕府，计二百六十八年。这里所说的幕府末期，即德川时代的末期。——校者

1873年地税改革为止。相当于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

第二个时期，资本主义形成期——从前一时期末尾开始，经中日（甲午）战争到1900年为止。即本书的第二篇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三个时期，日本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时期——从1900年起到1918年为止。第二篇第五章相当于这个时期。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史实放在第六章。同时把第三个时期全部放在第三篇里，因而将现在的第三、四篇改作第四、五篇，在理论上前后是一贯的；但是由于篇幅关系，都放在第二篇里去了。

第四个时期，日本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一同陷入总危机并更深刻化的时期——从俄国革命和米粮暴动的1917—1918年起，到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为止。相当于第三篇第六、七、八章。

第五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期——1937年起到1945年8月战败为止。即本书第四篇第九章和第十章。

各个时期中，有分为两章的，意味着这一时期中的小分期。至于这一时代分期的意义，当在本

书结语那一章中，作为日本近代史的特征，加以说明。

(三)

本书直接执笔者有井上清、铃木正四、藤井松一、藤原彰、藤田省三等五人。以井上为中心拟定提纲后，五人充分商讨，互相交换史料和有关知识，见解统一后，各人就自己分担的部分分别执笔，最后由井上统一整理，再经五人集体讨论，并请很多朋友审阅，加以必要的修正。本书直到完稿曾蒙很多友人给予直接帮助，但关于内容方面仍由直接执笔的五人，特别是井上负责。

本书承合同出版社的热忱支援，使作者们的意见很快地统一起来，并迅速地执笔，不胜感激。

作者代表 井上清

1955年11月15日

本书叙述体例

(一)关于年月，在1873年1月1日采用阳历以前，

正确的写法，月日也应当都换算为阳历。但本书除特殊情形外，没有这样做。年用公历，月日仍旧使用阴历。例如1853年6月，正确地说是嘉永6年6月或1853年7月。阴历的12月一般是阳历第二年的1月，但本书都写为当年的12月。至于外国的事情，月日也采用了阳历。

(二)关于人名，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字的，本书始终使用其中最为一般人所熟悉的名字，必要时加上括弧注明。

(三)关于地名，都写成现在用的文字，例如“函馆”，维新前正确的写法是“箱馆”，本书都写为“函馆”。又旧日的国名^①，认为读者大概知道的都用旧名，例如长州、萨摩^②等。认为不易理解的则都加注。

(四)引用的史料，原则上都改成现代文，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曾适当地加以删节或补充。

^① 明治维新前行政区划之一，管辖郡、乡。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公元643年)划全国为畿内、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西海等一畿七道和五十八个大小不同的国。嗣后略有增减。明治维新后仍沿用国为行政区划，废藩置县后即撤销。——校者

^② 长州在今山口县，萨摩在今鹿儿岛县。——校者

第一篇 明治维新

第一章 推翻幕府制度

第一节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维新前社会的特征 “农民都不知道利害，没有长远打算，秋天一收割米粮，便毫不珍惜地让老婆孩子们吃掉了。这种糊涂事是万万不应该的。如果常常记住饥馑的事，那么，随便将萝卜叶、豇豆叶、大豆叶等扔掉，就太浪费了。这些东西掺上些杂粮煮着吃，味道是很鲜美的。

“农民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早晨早起，晚上，尽可能劳动到深夜。经常记着，别拖欠年贡，只要交清年贡，有谁能象农民那样轻松！即使是美貌的媳妇，如果她欢喜饮茶闲谈，朝山进香，也要把她休掉。同时，贫穷而又子女多的人，尤其容易拖欠年贡，不如尽早把孩子送给别人，能减少个把人的口粮也是好的。”

这是德川三代将军家光(1604—1651)时，即

1649年（庆安2年）幕府发到各农村中的告示的一节。明治维新前的社会，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全国人口80%是农民。农民在幕府和大名^①、武士^②的统治下，正如告示中所说的，一直被迫做到死，生产出来的东西，缴了年贡剩下的还不够一家吃。武士与统治者公然说：“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

这个时代，土地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全部被大小封建领主们占据作为领地了。领主中最大的就是德川家。德川家的领地，约占日本全国土地四分之一，包括江户、大阪、长崎及其他当时日本商业上、交通上、军事上最重要的地区。德川家的家长，代代拥有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政治上是日本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将军的政厅就是幕府。

幕府领地以外的全部土地，分封给二百六十

① 日本王朝时代称田地多的人为大名，德川时代则称有封地万石以上的诸侯或幕臣为大名。——校者

② 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德川时代的武士大多数仅有百石以下的俸禄，经济生活并不富裕，但较平民除有政治上的特权外，还有任意杀害下士与平民、冠姓（平民无姓）、带佩刀等特权。言语、服饰、房屋、坟墓等也与平民不同。——校者

余个大名做领地(藩)。大名从将军处取得领地的领有权；同时，向将军效忠，负担军事及其他方面的一定义务，但对自己领地的人民和家臣，却是独裁专制的君主。大名中有两种：一种是在德川氏未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以前一向就是他的家臣，称为“直系大名”；其余的称为“旁系大名”。在将军之下执管幕府政务的有数名“老中”^①，有时在老中之上置“大老”^②一人，和辅助老中的“若年寄”^③，都是从直系大名中任命。将军和大名，将他们的领地或从领地中征收来的年贡米(藏米)作为禄(俸禄或家禄)，分赐给家臣(一般家臣)^④。

日本全国就这样被将军、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即封建领主阶级所占有、所统治。这些约占全国人口10%的领主、武士阶级，将他们的领地交给农民耕种，大部分征收实物地租，一部分旱田作物则征收现款作为年贡，或替领主服各种劳役。

① 老中是德川时代幕府最高级的执政官。——校者

② 大老是非常时特设的最高级官职，位于老中之上。——

校者

③ 若年寄是德川时代较老中次一级的执政官。——校者

④ 将军的家臣，赐给领地的为上级武士，叫做“旗本”，只领藏米(禄米)的为下级武士，叫做“御家人”。

农民被剥削到不死不活，这就是维新前社会的基本形态。

幕府与各藩^①为了继续进行剥削，用种种方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自由。例如：迁移的自由、转业的自由、与职业身分不同的人结婚的自由，以及买卖或处理耕地的自由等。甚至于连农民想在土地上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的作物的自由，也被剥夺了。领主们强迫农民生产米粮及其他便于作为年贡进行剥削的物资和维持农民最低生活的物资。当时的村，相当于现在的“大字”^②地区，村作为一个统一体，对领主负有缴纳年贡及其他义务。村内如有一人拖欠年贡，全体村民必须共同负责。更将村中近邻的五户左右组织为“五人组”，五人组不但对拖欠年贡，连组员犯罪也要负连带责任。

农民对这样的剥削和压迫，曾不断进行反抗。

① 藩原来是诸侯管理的领地，作为朝廷屏藩的意思，到德川时代称大名的领地为藩，大名为藩主。到了幕府末年专用藩来区别大名。明治初年仍沿用为地方行政区划，1871年（明治4年）始废藩置县。——校者

② 实施町村制后，将村的范围予以合并扩大；村以下再划分为大字、小字两级。——校者

武士、领主和全体农民的对立，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的阶级对立。

幕府、各藩制定了所谓士（贵族）、农、工、商（平民）、秽多、非人（贱民）^① 等严格的身分制度。这种制度的主干是领主、武士，即使他们是傻子、疯子，子孙代代照样是领主，农民却永远是农民，隶属于领主。各种身分内部又细分为几等，规定身分家世。任何人生下来就被身分所束缚。农村中就有三种不同的身分，即：头等是充当“名主”、“庄屋”和“百姓代”^② 等的村吏阶级；二等是一般农民；三等是无地的“小前”、“水吞”^③ 等。“小前”、

① 秽多被视为先天的贱民，不得改为平民；非人则除贱民外，多因犯罪而罚作贱民，遇特赦或经呈请批准，可以恢复为平民。前者只许从事制皮革、制笋壳草履、屠宰等职业，是生产者；后者靠卖艺、讨饭度日，是非生产者。二者都被视为最下贱的贱民，受着残酷的压迫。不论在都市或农村，只能住在指定地点，不得与平民杂居或通婚。他们不负担租税，可以担任刽子手、看守牢监、更夫等公役。1872年废除贱民制，将秽多、非人编入民籍，秽多村改称特殊部落。当时有秽多二十八万人，非人两万三千人，其他贱业者七万九千人。然而事实上仍受社会上的严重歧视。水平社运动就是他们要求解放的斗争。——校者

② 名主、庄屋、百姓代即德川时代的村长，由村民推选地主担任。——校者

③ 小前、水吞是最贫苦的农民。——校者

“水吞”连参加村内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没有。

支持幕府与各藩剥削人民、统治人民的精神上的最高权威就是天皇。十九世纪初叶，天皇是一个拥有约十二万石左右领地的封建领主，包括公卿以下臣属的全部领地在内，但是这些领地主要是幕府给他的，领地的支配权，是由幕府的官吏掌握。天皇只不过是从领地上取得收益而已。天皇在政治上完全受幕府节制。天皇只被认为是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具有日本唯一最高君主的家世，拥有给予德川氏征夷大将军称号的权能，作为封建秩序精神上的最高峰而已。天皇扮演着类似中世纪欧洲罗马教皇所扮演过的角色。

在这样的体制下，工业和农业尚未充分分工，农业占社会生产中的主要地位。农民占生产人口80%，他们的生活，以自给自足为前提，不但生产粮食，举凡有关衣住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几乎都是自己制造的。当时除制造农具、工业用品、丝织品以及其他奢侈品外，大部分工业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直到十八世纪初，所有的生产，多数是为了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专以出售为目的而生产的東西很少。农业和工业的技术也很

落后，生产发展得很慢。

既然农民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基础，各藩的经济也都是以其领内的自给自足为原则。因此日本全国也过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由于闭关制度，对外贸易只以荷兰、中国和朝鲜为对象，并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进行。闭关制度是以实物经济为前提；相反，它对实物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却起阻碍作用。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町人^① 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生产者的不断劳动和智慧为基础的，任何专制权力也不能阻止生产力的发展。这时的将军、大名、武士们与镰仓时代的小领主不同，他们集居在江户城或各藩的城市（城下町）^②，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之所以能过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意味着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农民生

① 德川时代称工商业者为町人。幕府末期随工商业的发达，经济权完全操在町人手里，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者；以经济力量侵蚀封建制度，为日本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校者

② 日本称市街为町，以诸侯所居的城堡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市街则称为“城下町”，与我国的城市意义相同，所以译为城市。——校者

产的东西除自用和供给武士们直接消费外，还有剩余。这些剩余物资作为商品出卖，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农民生产的东西愈多，商品化的物资也就愈多，从而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发达。十八世纪中叶，不仅将军、大名征集来的年贡品商品化了，连农民自己的剩余农产物也商品化了，商业性农业及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村家庭手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桑、棉、菜籽、蓝(植物染料)、蜡树(造烛原料)、楮树(造纸原料)、漆、甘蔗、茶、烟草等经济作物的栽培及用这些东西做原料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也逐渐地发展起来了。这些生产品是作为各地的特产而发展起来的。酿酒、制盐业也兴旺起来。林业和水产业也都发展为商品生产，特别重要的是养蚕业、缫丝业、棉织业的发展。

与商品生产的发展相平行，耕地也扩大了。领主和大町人投资开垦新田。贫苦农民为了活下去也不断地开垦。因此，全国耕地面积，从十六世纪的一百五十万町步^①左右增殖至十八世纪初的

^① 町步为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町步约等于99.18公亩。——译者

二百九十七万町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样开发的新田与过去的“本田”^①比较，对作物品种的限制较松，因而象近畿^②地方种棉业等类的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特殊的发展。

随着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发达，交通、运输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沿海航路，对商品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陆上，受幕府与各藩军事交通政策的阻碍，商品运输虽未能很好地发展起来，但人们的往来和通信却频繁起来了。

幕府制定的货币〔金(币)、银(币)、铜(币)〕流通全国，度量衡也冲破了藩的界限，在全国统一起来。这样首先从度量衡和货币流通方面把日本全国结成为一个经济圈了。

由于商业的发展，使江户、大阪以及各藩城市的人口迅速增多。同时出现了少数象三井、鸿池那样的大富豪，称霸全国商业界，并贷巨款给幕府

① 本田又称旧田，指德川幕府初期所勘定并列入土地登记簿的水旱田地，以后开发者为新田。——译者

② 近畿包括京都、大阪两府，兵庫、滋贺、奈良、三重、和歌山等五县。——校者

与各藩。又出现了一些大“株仲間”^①的同业公会，在领主的保护下垄断经营。然而町人的大部分则为大小商店的使用人、小商人、工匠、学徒、挑夫、短工等无产者。特权大商人和领主虽有密切利害关系，但由于他们也处于被统治的地位，领主随时向他们勒索款项，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等，所以也有和领主对立的一面。而一般的商人和无产市民，不但受到领主的剥削和压迫，同时，还要受特权大商人的压迫，因而与二者都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农村的阶级分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大变化。江户时代初期的农村，农民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领主的鱼鳞册上登记有自己的姓名，把领主土地作为自己的土地而从事耕种的“本百

① 德川时代大阪是日本国内物资集散的中心市场，各地重要物资先运大阪，再经该地商行转运各地。有地方别的商行，如萨摩行、土佐行等；也有商品别的商行，如粮食行、棉花行等。当时大阪有二十四个有名商行专营江户贸易；江户也有十个有名商行。这种经政府核准，或是依同业公会规定而获得的营业特权称为“株”；这些特权商人所组织的独占营业团体，则名为“株仲間”，订有规约，限制同业人员，并排斥非会员经营同一业务。——校者

姓”^①；另一种既未在领主鱼鳞册上登记姓名，又未占有土地的贫农，通称为水吞、或者小前，还有其他种种名称，各地不同。前者中有的原来就是类似小领主地位的富农，他们使用很多“下人”（半奴隶）和长工经营农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至十八世纪初，很多下人和水吞也上升为独立的本百姓（自耕农）了。领主的权力基础，是本百姓；本百姓愈多，领主的权力愈巩固，所以他奖励下人独立经营。同时，富农中有的也不使用下人，改雇短工耕种广大土地，有转化为本百姓中的最上层的倾向。

随着商品流通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有的富农乘机兼做商业资本家，不但收买农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贩卖牟利，有的还事先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加工，而给以微不足道的加工费（一般都是给产品）来收买产品。更进一步，例如棉织业等，不但棉纱，连织机等一切生产手段，统统由商业资本家供给农家，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多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里，已经形成了资本和雇佣的生产关系，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业。这些资本家称为“前贷资

^① 本百姓即江戸时代的自耕农。——译者

本家”或“批发行资本家”。

再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了很多织机，工人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走到那些作坊中去工作。这种工人被称为“织布下女”。作业过程采用分工方法。上述这种由很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工场手工业，到十九世纪初叶，以丝织业为首，有棉织、靛青、造纸、冶铁、酿酒及其他工业部门。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封建制度下所能发展的最高阶段。

这种批发行资本家或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不仅是农村中的富农，也有从各藩城市的商人转化来的。他们大多数又以农民、手工业者为对象，兼营高利贷。

有的富农和商人，从领主处承包开垦新田的工作，成为新垦地的地主。当然，土地仍属领主所有，地主还必须向领主缴纳年贡。他们又将小农们典当过期或抵押过期而无力赎回的土地并吞为自己所有。当时土地虽禁止买卖，但实际上小农的土地被富人用各种方法逐渐集中到他们手中去了。有些地主雇佣长工或短工经营农业，变成了自营地主。有些地主则将土地佃给没落了的本百

姓或水吞耕种，成为剥削高额地租（农民向领主缴纳的年贡和交地主的地租合计几达其全部收获额的70—80%）的寄生地主。维新前在近畿、濑户内海沿岸、江户近郊及其他商业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发达的地方，或是在年贡较“本田”低的“新田”方面，寄生地主虽然逐渐增多起来，但总的说来，还是自营地主居多数。

领主是不愿意出现这类中间剥削者的，因此颁布法令，使过期未赎的土地归还原主，并用尽其他办法，抑制地主的产生。但是，领主剥削逐年加重；加之，货币经济已经渗入农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无法防止小农的没落和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于是幕府和许多藩政府从十八世纪中叶起，为了拉拢地主作为对付农民斗争的堡垒，反而开始保护地主，采取放任地主兼并土地，和限制地主所雇劳动者的工资等措施。

这样成长起来的地主、商人、批发行资本家等阶层，一面受到领主的保护，对农民、手工业者进行封建剥削，与领主有共同利害关系；同时，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受着领主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又因资产阶级的自由成长遭到阻碍，也对领主深抱

不满。这相反的两面，哪一面成为支配他们行动的主要因素呢？这只有依当时领主与自耕农、贫农等的基本阶级对立情况及其他关系来决定。

一方面，极少数的本百姓，聚集了更多的货币和土地，成为地主、商业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民趋向没落，丧失了土地，沦为水吞、雇农、佃农，或受批发行资本家剥削的家庭手工业者、短工和夫役等。他们的生活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全部或一部分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某种形式的工资，变成半无产者的生活了。然而从农民的数量上看来，维新前仍然是自耕农和独立的家庭手工业者居多数。但是如上所述，那种向两极分化的倾向，逐年增强了。

这些本百姓、水吞、半无产者所构成的阶级，才是和封建领主绝对不能调和的、根本的对立阶级，才是摧毁封建制的革命力量。愈到幕府末期，贫农、半无产者所起的作用就愈大。这个阶级只有在和封建领主对立的情况下，才和地主、商人利害一致；但在农村内部，这两个阶层间的对立则在逐渐加深。

第二节 农民起义和 群众暴动的发展

人民生活的破坏 封建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并不意味着农民等劳动群众的生活有所提高；相反，生产愈增加，劳动群众受到封建领主的剥削就更加残酷；因为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完全成为领主和新兴的商人、地主、资本家们的东西了。

幕府与各藩的财政，本来以实物经济为前提，靠榨取年贡过日子，随着实物经济的崩溃，就必然地也日趋贫困。

因而幕府与各藩，实施了种种更残酷的剥削办法：

第一，从农民身上征收更多的年贡。甚至预征一两年，并增设各种苛捐杂税。

第二，幕府与各藩既然无法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便以增产兴业为名，奖励商品的生产，甚至于有时用强制的方法，以极不合理的低价收买产品，实行专卖；或者把产品的经销权包给特权大商

人独占；或则对特产品课以重税，真可谓尽搜刮之能事了。例如土佐^①藩的纸、长州藩的糖、盐等，都是藩营专卖，剥削农民与手工业者，阻碍生产的自由发展；又如萨摩藩的强制生产砂糖等，对生产者进行形同掠夺的剥削，这都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三，幕府与各藩向商人征收临时税，幕府又改铸货币，降低质量，攫取厚利，而各藩则发行名为“藩札”^②的不兑换纸币，强制流通。结果，使中、小商人和无产大众遭受损失。

这些尽管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但都不外乎是封建领主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加强剥削的手段。此外，农民和手工业者还受到与领主勾结的商人、新兴批发行资本家及地主的残酷剥削。织绸织布等工场手工业的女工，一般被迫工作十八小时，而所得工资，经常只能买燕麦充饥。

大多数农民受到这种双重三重的剥削，生活

① 土佐在今高知县。——校者

② 维新前各藩以粮食与其他出产物为基础，经幕府核准而发行纸币，有“藩札”、“金札”、“银札”等名称，维新以后统称为藩札。流通区域均限于各藩自己的领地内。废藩置县后由政府以新纸币收兑。——校者

越来越困苦，连养育子女的力量也没有了。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全国盛行堕胎、溺婴，以惨绝人寰的方法，限制人口。因而，日本人口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明治维新，几乎没有增加。随着农民的穷困，土地也贫瘠了，连年歉收，发生大饥馑，饿死的人动辄数万，甚至于数十万。农民抛弃负担沉重的土地而逃亡的也增加了。然而天地虽大，哪里有他们容身之所，只有沦为露宿街头的流浪者。

起义和群众暴动的发展 农民和町人被迫到不起来斗争便不能活下去的境地。而且这时候的农民早已不是十七世纪那样孤立地分散在农村里，他们同时又是小商品生产者或半无产阶层，生活关系和视野都扩大了。他们不但各对各自的领主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而且对于领主阶级的共同利害关系也滋长起来了（尽管尚未超出地方的范围）。这样，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农民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十七世纪农民斗争的次数既少，而且是以本百姓的反对清丈土地和增加租税为主，由名主、庄屋等村吏层的富农领导。到十八世纪中叶，便出现了没落小农要求收回抵押土地的斗争。十八世

纪后半期起义次数激增，提出了反对增加租税、反对杂税、反对赋役、反对藩营专卖以及特权商人的垄断等种种要求。大规模的斗争到处蜂起，历时颇久，参加者达数万人以至数十万人。其主力则为本百姓和小前，并以前者为主。地主、商人层有的是起义的攻击对象，有些则领导起义，各有不同。

与此同时，城市无产者也提出反对抬高米价的要求。1733年（享保18年）大歉收时，江户第一次发生暴动，捣毁囤米商店和重利盘剥放高利贷的商店。继而在1787年（天明7年）大饥馑时，以江户、大阪、京都三大城市为首，发生了大暴动，蔓延到近畿、东海^①以及全国其他各城市。与此同时，农民也在各地发动了起义。起义农民的要求中，包括反对抬高米价以及其他物价的要求。这说明起义的主力已经不是有余粮出卖或者是食粮充足的人，而是在青黄不接时必须买米度日的贫农、半无产者。以后每当米价腾贵时，几乎都爆发了最激烈的骚动。

农民起义和町人暴动进入自然地互相呼应、

^① 东海道包括东京都和三重、爱知、静冈、山梨、神奈川、埼玉、千叶、茨城等八县，是日本第一个大平原。——校者

一处起义立刻波及其他地区的阶段。这基础建筑在下列两个事实上：第一，由于上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分化的结果，城市无产者与各地贫农小农，对于领主以及与他勾结的村吏、大商业资本家等，客观上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第二，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商旅往来益趋频繁，一地有事立刻传到别处。

这一新阶段的农民、町人的斗争，到了1830年（天保年间）更加高涨了。由于连年大歉收、大饥馑，农村荒芜，农民颠沛流离，到了空前未有的状态。加以米粮以及其他物价暴涨，城市人民愤怒的火焰越烧越高，连年激起了大起义。1837年（天保8年）终于在当时最大经济中心的大阪，爆发了大盐平八郎（1794—1837）事变。

这次事变，是由于米价和其他物价暴涨，受苦的无产市民群众要求降低物价，和痛恨幕府官吏的无能、政治腐败、勾结大富豪、滥施压制等激起了民愤而造成的。原为大阪町奉行所^①“与力”^②

① 町奉行所是德川时代幕府设在江户、京都、大阪、骏河等处的官厅，专司市中的租税、户籍、诉讼等事。——校者

② 与力是德川幕府时的官名，隶属幕府及所属各地“奉行”（近乎县长兼警察局长），办理民政警务等。——译者

的学者大盐，不忍睹民众的疾苦，认为这不是一时的救济所能解决的问题，企图改革幕府政治，于是号召市民、向来被歧视处于非人地位的贱民以及近郊的农民，特别是贫农组织起来，共同斗争。这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将城市无产者和农民的共同行动组织起来，进一步提高到政治斗争的表现。这次事变虽然仅一天半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摄津、越后、周防^①等地都爆发了同样性质的事变。

这些事实就表明了江户时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在这基础上不断地发展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没有改变政治体制以求得解决之前，只有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激烈。

思想的变动 十八世纪后半期秋田人安藤昌益受农民斗争激烈化的影响，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统治，消灭现在的“法治世界”，回到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然世界”去；必须这样，由平等的日本人民所统一的和平富裕的日本，才能够实现。尽管这是空想，然而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统

^① 摄津在今大阪府和兵库县，越后在今新潟县，周防在今山口县。——校者

治的要求，第一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昌益的思想虽未能公开，也不能有所发展，但与此相似的思想，则以“神代复古”的形式，活现在农民中间。大盐的檄文中就有恢复神武天皇^①的政治制度一语，就是农民响往着没有剥削社会的表现。

以后的起义，贫农们就提出了“救世”、“均世”（平等）等口号，要求没收地主、富豪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大家。

地主、商人阶层一面与封建制度共利害，而另一方面又和它对立。这种两面性反映在改革的进步的方面，就表现为各种改良主义的思想。越后人本多利明（1744—1821）主张日本应该统一在一个君主之下，以其力量发展工商业，进行国外贸易，并开发属岛（指北海道、千岛、库页岛）。这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先声。秋田人佐藤信渊（1769—1850）幻想出这样一个社会：在绝对主义和官僚统治之下，把全部产业收归国有国营，废除土、

^① 神武天皇是日本历史上所说的第一代天皇，名彥火火出见，諡神日本磐余彥尊，公元前 660 年兼并诸酋，完成统一，在大和亩旁即位。把他即位这年作为日本的纪元。但事实上并无此人，是日本统治阶级所捏造，进步的日本历史学者都否定这事。——校者

农、工、商、贱民的身分制，全国人民都能在国营企业中工作；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统由国家办理，一律免费。他又劝大名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系统地整理当时的农业技术，实行增产兴业政策。出生于江户的海保青陵（1755—1817）则说人生万事都是商业交易，君主和家臣的关系也不外是劳役和俸禄的变相买卖而已。此外，荷兰文及由荷兰文传来的西方医学、自然科学、军事学等所谓“兰学”^①也有了发展。其中出现了改革的思想家高野长英（1804—1850），他不为任何威胁所屈服，为了真理和群众的幸福而坚持斗争。又主要在地主阶层中传播的本居宣长（1730—1801）等的“国学”，也提倡人情的可贵，攻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教与佛教的反人民性，这一点，给了封建制度以一定程度的批判。

天保改革 以大盐事变为最高潮，1830年的农民起义与群众暴动，更加激烈化，动摇了幕府和各藩的统治基础。他们为了挽救危局，试行过所

^① 日本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只许与中国和荷兰通商，所有西洋学术多从荷兰传来，所以通称西洋学术为兰学，中国学术为汉学；研究日本本国文物、制度、典章的则称为国学。——校者

谓重大的改革。

1842—1843年(天保13—14年)实行了幕政的改革。其要点是：第一，彻底加强对民众的镇压体制，镇压兰学；第二，恢复自然经济，压抑商业和农村手工业，加强农民隶属制；第三，解散株仲間，向商人征收巨额税款；第四，减免大名、旗本对幕府的欠债；第五，划江户、大阪方圆十里内归幕府直辖。这种违反社会发展的改革没有成功的可能。它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抗，由于把江户、大阪方圆十里收入特别多的土地划归幕府直辖，那些因没收而遭到损失的旗本或大名，也强烈反对，所以改革完全失败了。

与此相反，长州、萨摩、肥前^①等藩的改革，大体上都获得成功。长州在1831年(天保2年)夏天发生以贫农、半无产者、自耕农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和群众暴动，1837年在大盐事变影响下又爆发了同样的起义。由于这些起义的压力，引起了藩士^②的中上层和下层间的对立。与地方的地主和

① 肥前在九州西北，包括今佐贺县长崎县各一部分，以及佐世保市等三市十四郡。——校者

② 藩士即大名的家臣。——校者

商人有联系的下级武士，攻击那些掌握藩政大权、腐化无能的门阀。这些下级武士的势力逐渐影响藩政，从1838年（天保9年）起实行了藩政改革。这种改革拯救了下级武士，使长州藩得以拉拢中农以上的农民和地方商人与地主阶层，得到他们的支持，加强了藩在全国的商业活动，对改善农村秩序和藩的财政大体上获得了成功。同时，医学、军事，特别是陆军也采用了西方技术。

萨摩藩则经营琉球贸易和通过琉球对中国的走私贸易，以及扩大萨摩南部各岛的砂糖生产，加强专卖事业，以这些收入为基础，在改善藩的财政上也获得了成功。军事技术、特别是海军也采用了新的技术。这些改革到1860年发展为藩营机器纺织工厂和军事工业。

佐贺^①藩被大盐事变和藩内以贫农为主力的起义所惊醒，也着手改革。一方面建立起抑制寄生地主和高利贷等中间剥削、改由藩直接剥削小农的体制；另一方面则和长崎、兵庫的商人勾结，加强藩的商业活动，并暗中保护藩内大商人的走私贸易。这里的武器制造和海军也采用了新的技

^① 佐贺即今佐贺县。——校者

术。

以上三藩改革的共同点，都是和新兴地主、商人阶层有联系的下级武士出身的改革派，以财政或军事技术家及官僚的资格，参与藩政，尽最大努力改革财政，使之适应商品经济，并重新整顿和加强领主对隶属农民的掠夺。在这些渐露头角的改革派中，涌现了倒幕运动的领导者，进而做了明治天皇制政权的官僚。

此外，水户^①、土佐以及其他各藩，在此前后，也进行了改革。走幕府“改革”路线的都失败了，采取长州藩路线的，或多或少都获得了成功。这点就指明了日本历史今后应走的方向。

幕府在天保改革失败后，危机更加深刻化了，它的上层间也发生了分裂。德川三家^②第一名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③，由于严厉地

① 水户在今茨城县。——校者

② 德川家第一代将军家康封第九子义直为尾张藩主，第十子赖宣为纪伊藩主，第十一子赖房为水户藩主。将军无子时，此三家均有权作为继承人。——校者

③ 德川齐昭系水户藩第九代藩主。1853年美舰来浦贺，幕府起用他参预政务。他反对幕府和美国签订通商条约，攻击幕府当局的无能，致受处分。为攘夷派领袖。——校者

批评了幕府的腐败无能,反而被幕府申斥,勒令隐居。加贺^①、萨摩等外样大名和幕府之间,虽没有分裂,但也发生了对立。

改革上大体获得成功的各藩,也出现了如上所述的门阀与下层武士之间、保守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对立。

封建领主和农民、町人间对立的尖锐化,也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发展了新的分裂和对立,和过去的派阀势力斗争具有不同的意义。

第三节 尊王攘夷和 半殖民地化的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的侵略 当封建日本内部危机发展到这样程度的时候,外来的欧美资本主义的强烈压迫,又强加在整个统治阶级和人民的头上。

当时英、法、美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已经确立起来了。其他西欧国家,

^① 加贺在今石川县,包括石川市以及江沼等四郡。——校者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民主革命斗争也高涨起来，并进行了产业革命。轮船的发明使大洋也象内海一样，能自由航行了。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它不断增长的机制产品的销路和工业的原料资源，开辟了通向世界各地的航路，到处建立根据地，强迫别国缔结通商条约；它认为必要时，则恣意掠夺别国的领土。亚洲的封建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已将整个印度占作殖民地，1840年又挑起以武力向中国贩卖毒品的鸦片战争，压迫清廷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等五口通商，享有治外法权，实行协定关税制等。法国继它之后，也压迫中国。东面的美国，十九世纪中叶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加利福尼亚，消灭土人，同时，到达太平洋岸，开始向东方扩张。北方的帝俄，尚未进行产业革命，经济力量薄弱，靠用武力来弥补这种弱点。十八世纪末已领有整个西伯利亚，并南下压迫清朝，在千岛、库页岛则与日本的殖民势力发生冲突。

开港和幕府独裁的破绽 封建闭关的日本，也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大浪潮的里面去了。

1792年(宽政4年)俄国使节拉库斯曼来到北海道的根室,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以后到日本近海来的外国船只逐年增多,并与日本发生种种接触。1853年(嘉永6年)美国海军副少将培理,率领四艘军舰开入幕府的咽喉浦贺湾,强迫幕府就地接受他带来的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港的国书。幕府受美国舰队的威胁,被迫接受了。

这使整个统治阶级惊惶失措,陷于混乱,幕府的独裁政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幕府把情由呈报天皇,欲利用他的权威;并向各大名谘询对策。但这时谁也拿不出具体的对策。幕府只得暂时拖延对美国的答复,次年3月终于被迫与美国缔结日美和亲条约。规定开辟下田、函馆两港为美国舰船的停泊地,供给美国舰船的需用品,允许美国在这两港设领事,今后日本给予外国一切权益时,无条件地也同样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继而被迫与英、俄、荷也缔结了同样的条约。

以此为开端,水户、萨摩、越前^①、宇和岛^②,土

① 越前在北陆道西部,包括今福井县福井市以及足羽等八郡。——校者

② 宇和岛在今爱媛县。——校者

佐等强藩藩主对幕政开始有了发言权；他们也接近天皇，企图利用他的权威参与幕政。

这时，美国总领事赫黎斯来到下田，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幕府、天皇以及改革派的大名，虽然谁也不愿意开放对外贸易，但抵不住赫黎斯背后的美国武力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东亚的压力。幕府屈服在美国压力之下，终于在1858年（安政5年）1月，被迫与它缔结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称为安政条约）。

然而幕府不敢擅自签字，欲采取经天皇批准（敕许）的形式。但天皇被改革派的大名所劫持，没有轻易批准它。恰恰这时候又发生了将军的继承问题，于是继承问题便和条约问题连在一起，成为政争的中心。经过这次政争，萨摩的西乡隆盛（1827—1877），长州的吉田松阴（1830—1859）等作为改革派藩士的领导者，走上了政治舞台。

受赫黎斯逼迫而签约的幕府，这时正是彦根^①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担任大老，6月，他便在未取得天皇敕许的情况下签订了条约；并决定以自己这一派的人（纪州德川家的庆福，后来

^① 彦根在今滋贺县。——校者

的家茂将军)继承将军,对反对派则严加镇压(安政大狱)。

幕府继而又和俄、荷、英、法缔结友好通商条约。1859年(安政6年)6月,开放神奈川(横滨)、长崎、函馆三埠为自由贸易港。闭关的日本终于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去了。闭关的最大支柱之一,即勉强维持下来的封建经济以及它的全部上层建筑,由于开港,“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①便迅速地支解了。日本的开港,从世界史来看,意味着资本主义把全世界连结为一个市场的工作完成了最后的一环。使日本民族走上了这样的歧路:进而主动地资本主义化,还是受迫陷于和其他亚洲国家同样的命运呢?

尊王攘夷 幕府残酷地大兴安政大狱,并不能巩固幕府,反而把它削弱了。连过去一向期待改革幕府独裁的各藩武士也逐渐反对幕府。1860年(万延元年)3月,江户城春寒料峭,雨雪霏霏,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3页。——编者

水户、萨摩两藩的浪士^①，在樱田门外刺死了井伊大老，便成为政局转变的信号。出身于长州、萨摩、土佐、水户及全国各地的下级武士、乡士^②，即所谓“尊王攘夷”派的志士，竟凌驾大名之上，活跃在政治舞台的最前面。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天保期间想尽力使封建制度适应于资产阶级发展的改革派，或多或少与地主、商人阶层(家庭手工业的批发行资本家以及少数工场手工业资本家)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这一阶层出身。如第一节所述，他们虽然没有成为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而是作为朝着资产阶级方向改革的改良主义者而登场的。

尊王攘夷派中，有的可以说是以下级武士层做基础的保守的反幕派。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开港后封建经济的解体，他们是武士阶级

① 浪士与浪人同义。武家时代失掉了主人与官职俸禄的武士称为浪士。从室町末到江户初，诸侯兴亡无定，浪士也特别多。——校者

② 乡士是德川时代的用语，即住在乡村的武士。有的是兵农划分时留在乡村的武士；有的是庄屋、名主以及富裕农民等因垦田治水有功，或捐献粮食、款项，经藩主特许用姓带佩刀者。维新后一律编入士族。——校者

中受打击最沉重的人，所以非常憎恨那些使他们遭受损害的藩内门阀和幕府。

从历史上看，尊王有两种含义：其一，以尊王来提高幕府权威；因为征夷大将军的头衔是天皇赐给幕府的，尊王即抬高幕府。水户藩的尊王论原来就是属于这一类型。其二，是为反幕而尊王，由十八世纪末叶民间学者结合民众对幕府的不满与批判而开始倡导的。大盐的檄文中，对幕府压迫天皇，就曾加以攻击。把改革幕政和恢复神武天皇的政治要求，结合在一起。

开港后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尊王志士们，都是反幕派。因为他们不是革命阶级，并未具有与封建制度作斗争的民权革命思想，自己反抗幕府政权，为了寻求根据，才提倡向封建社会最高权威——天皇尽忠义的理论。与此相反，想拿尊王来加强幕府权威的人，以开港前大名中的改革派为中心，形成了主张天皇（公）与将军（武）携手的“公武合体”派。

攘夷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能的排外主义；特别是因为他们了解到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基础，所以坚决要排

除外国资本主义。幕府、大名、一般武士便是如此。这是幕末攘夷主义的本质。因而开港后，许多攘夷主义者反对负开港责任的幕府，和反幕的尊王论结合起来了。

另一种攘夷论，虽然具有排外主义的色彩，但其中包含有保卫民族与爱国主义的因素。与改良主义的地主、商人相结合的志士的攘夷论，如高杉晋作(1839—1867)等就是朝这一方向发展。但开港后两、三年的攘夷论都是排外主义。就是改良主义的地主与商人，当初也是由于开放海禁，受了封建经济解体的打击，因此，很自然地发生反抗，而主张排外。

封建经济的解体 对外贸易开放以后，生丝、茶叶、生发油、水产品等商品的出口，与年俱增。以出口商品为首，包括米在内，一般物价也不断上涨，刺激了生产，使输出品，特别是生丝和茶叶的生产激增。上州、信州、甲州以及奥州和其他各地的养蚕、缫丝业，益趋兴盛，并产生了缫丝工场手工业，各地的制茶业也迅速地发达起来了。在这一刺激下商业性农业获得了发展，新的在农村中的商人活跃起来了，呈现了局部的繁荣气象，富农、工

场手工业资本家、独立小营业主等都获得了利益。

但一般的情况，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涨，包括小农、贫农在内，所谓一般人民，特别是市民和武士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的生活却更加困难了。

更由于金银比价，日本的金价较国际价格低，银价则较高，因而便立刻引起了白银流人和黄金大量流出，物价腾贵和经济混乱，加深了人民生活的贫困。又由于生丝的暴涨，以西阵、桐生等为首的全国丝织品工场手工业、小营业也都受了很大的打击。仅桐生地方，由于织厂受到打击，就使一千五百名有关工人的生活陷于穷困，于是有三十五个村的代表再三请求幕府禁止生丝出口。其他地方也大体如此。同时，由于商业的自由发展，使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势的旧批发行资本家们也受到了打击。

幕末的进口贸易还没有达到外国机制产品大量流入破坏日本国内手工业的程度。单就这一点讲，对于封建经济的破坏作用还不算大。然而由于幕府、各藩输入大量武器、舰船等，以致二者的财政都发生困难，乃加紧压榨人民，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为攘夷而讨幕 攘夷很快便发展为打倒引狼（“夷狄”）入室的幕府运动。1861年（文久元年）到1862年，关东方面有以每年有两次收获的机织业地区的地主、商人层为背景的集团，关西则有原来出身于下级武士的志士，为了攘夷而开始拟订讨伐幕府的计划。其中出现了长州的久坂玄瑞（1840—1864），土佐的武市瑞山（1829—1865）等尊王攘夷派的全国领袖。

他们与公卿三条实美（1837—1891）联合，强迫天皇命令幕府限期封锁港口，排斥外人。在限期内（1863年5月），长州藩突然炮轰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尊王攘夷派更准备拥立天皇，发动倒幕战争。然而天皇不愿意封建秩序遭到破坏，暗中通知幕府。因此幕府于8月18日发动政变，将所有尊王攘夷派的公卿、藩士、浪士等尽行逐出京都。不久，有土佐藩的乡士吉村寅太郎（1837—1863）等在大和，筑前^①的藩士平野国臣（1828—1864）等在生野，纠合少数同志起义，声称讨幕，但由于他们不能和群众联系，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了。

^① 筑前在今福冈县，包括福冈、八幡、户畑、若松、直方等五市以及糟屋等九郡。——校者

半殖民地化的危机 安政条约不仅对统治阶级危险，也威胁着日本民族的独立。为了把日本变成欧美国家的半殖民地市场，在大炮威胁下签订的这个条约，规定外国侨民有治外法权、租界制度、协定关税制、片面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以及其他侵害日本民族主权和利益的条款，而且这个不平等条约没有规定有效期限。

各国不仅根据不平等条约压迫日本，并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也予以直接压迫，使它附庸化。

1861年从春到秋，帝俄军舰占据了日本海和东中国海分界处的要地对马岛的一部分，无理地向对马藩主提出永久租借土地的要求，恣意建设基地。幕府对此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对马藩主只要能在九州获得新的领地，便想抛弃对马逃走。只有对马的农民和渔民们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抵抗。嗣后英国出来干涉，俄舰才撤走。消除了对马的、也是日本的一次危机。

英国口头上虽说除了发展自由贸易外别无所图，实际上则想把日本变成为它在远东对抗帝俄的前哨基地。1863年（文久3年）以后，英法两国便以保护侨民，防止被抱攘夷主义的武士杀害为借

口,无理地派陆军部队驻扎横滨。又在同年7月,以报复前一年萨摩藩士在横滨郊外生麦村(现在的横滨市内)杀伤英人事件为借口,派舰队炮轰鹿儿岛,烧毁市街,并索取巨额赔款。继而英国又强迫幕府出钱为横滨英国驻军建造有兵营、弹药库、军医院等设备的宏大营垒,建筑面积共达四千六百坪^①,总工费达五万三千两白银。这是拟将日本永远置于英国统治下的军事基地。

英国又于1864年(元治元年)7月,以报复前一年长州藩炮轰外国船只、消除贸易障碍为借口,发起组织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进攻下关。长州藩想和平解决,但联合舰队无理地挑起战争,仅一日间就占领了下关地区。而以赔偿战费为名,向幕府勒索巨款美金三百万元。继而四国又以联合舰队吓唬幕府和宫廷,强迫签订了1866年(庆应2年)的“改税协定”。将主要商品的进口税率减少到值百抽五(是过去条约中的最低的税率),事实上把日本关税置于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共同管理之下了。日本日益陷于列强的半殖民地地位了。其后当幕府面临灭亡的时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民族危机。

^① 坪是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0.03306 公亩。——译者

第四节 倒 幕

反幕势力的统一和英法的态度 这期间，尊王攘夷运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当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外国船，遭法国舰队的报复而惨败时，为了挽救危机，高杉晋作起而执掌藩政。他挑选了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中勇敢有志之士，组成新军，名为奇兵队，继而又同样地改编了其他军队。长州藩暂时给人民以武装的自由。这样发端于排外主义的攘夷，开始具有为保卫祖国而斗争的意义了。高杉本人早在1861年曾到中国上海考察过，目睹殖民地人民的受难情形，非常痛心，因而从排外主义的攘夷派转变为保卫民族的立场。久坂玄瑞等从1863年起也转变为同样的立场。但由于同年8月政变，他们暂告失势之后，便以恢复势力和打倒幕府作为比攘夷还更重要的任务。奇兵队等就成为他们与幕府以及各藩门阀斗争的武力了。

萨摩尊王攘夷派的领导们，在和英国交战之后，渐渐从排外主义的梦幻中清醒过来。下关战役以后，使所有尊王攘夷派的领导人都转变为亲英

派了。他们不是为攘夷而倒幕，开始以倒幕为目的了。这种转变，不仅因为战败促使他们觉悟到攘夷一举是轻率无谋，他们开港时所受的冲动，后来也逐渐冷静起来，恢复了理智，开始知道必须积极地适应新的经济关系，不但不应该反对与外国通商，并且应该进而利用它。只有尚未摆脱下级武士立场的人，还没有抛弃攘夷的梦幻。但是他们也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不是外国而是镇压他们的幕府。

在下关战争之前，1864年上半年，水户藩士藤田小四郎(1842—1865)等的天狗党是攘夷派中的落后的集团，为了推动幕府攘夷，曾在关东起兵，但失败了。继而在同年7月，久坂玄瑞等率兵入京都，想把天皇夺回到自己一派手中，在宫门内外与幕府军激战而被歼灭(禁门之乱)。其后不久，发生了长州和四国联合舰队的战争，遭到惨败。同时，藩政暂时重归保守派掌握。于是从同年底至1865年(庆应元年)2月，高杉等率领奇兵队发动叛乱，得到藩内人民的积极支持而获胜，重新掌握藩政，积极进行军事改革，整顿抵抗幕府的体制。

这期间，萨摩藩中一度失势的急进派也恢复

了势力。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1830—1876）等执掌藩政，并表明反幕态度。不久，萨长两藩经土佐藩乡士坂本龙马（1835—1867）与中冈慎太郎（1837—1867）等的斡旋，于1866年（庆应2年）1月结成了互助同盟。

早在1863年（文久3年），英国公使阿尔科克就已经看到幕府的大势已去，而日本人民革命的幼芽正在逐渐成长，旧体制的改革，势所难免。他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中，担心人民革命一旦胜利，英国等在日本的优越地位，将有丧失的危险。确定了日本必须实行“从上而下逐渐渗入的改革”方针。派克斯公使也继承了这一方针。派克斯为了实现从上而下的改革起见，曾援助倒幕派，使它建立新的统一日本的政权。同时，与英国抗争的法国公使罗休则坚决支持幕府，希望它建立统一政权，而受法国势力的支配。幕府也依靠法国，取得资金上和技术上的援助，在横须贺建立钢铁厂、造船厂；在政治上也受罗休的指导，企图一举而摧毁倒幕派的据点——长州藩。

庆应年间的大暴动和起义 把历史推进到当时的基本力量，是人民的反封建斗争。1861—1863

年尊王攘夷派最初势力之所以能够高涨，也是由于他们以开港后因经济混乱而受苦的人民为背景才出现的。但由于当时他们还仅仅用张贴传单等方法向城市居民呼吁，没有和基本的生产群众——农民结合，所以失败了。当 they 与农民取得联系时，就能立刻挽回势力。长州内乱中各队的胜利，就是其中的典型。

农民起义从 1864 年起重新高涨起来了。1866 年(庆应 2 年)5 月全国爆发了空前的大暴动和起义，从兵库县开始，经西宫扩展至将军驻地的大阪，历时数日。以后近畿、东海各地相继发生暴动；同月底，江户也发生暴动，规模比大阪的还大。暴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物价特别是米价的暴涨和幕府向商人征收巨额军费，以致民怨鼎沸，因而激起的。人民反幕情绪激昂，大阪暴动被捕的市民中，就有人向官吏这样怒吼道：“这次暴动的元凶就是将军”！

与城市暴动同时，农村中也彼起此伏，到处都发生了农民起义。其中有继江户暴动后，在幕府根据地的武藏、上野一带，以贫农、手工业工人、工匠为主力的剧烈起义。一部分起义者，捣毁幕府

的代官所^①和高利贷者的住宅，焚毁了土地清册和借债字据，实行了“救世”。这里有了自发的土地革命的幼芽。同年，全国的起义以星火燎原之势开展起来了，仅大规模的就达数十次。9月间江户再度发生了暴动。

萨摩藩主以及其他强大的大名认为，现在已经不是征讨长州的时候了，应该赶快停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来建立统一的政权。原公武合体派首领岩仓具视(1825—1883)，看到民众不满情绪的高涨，也感到必须建立以天皇为首的统一政权，并开始与倒幕派取得联系。

幕府竟不顾这种情势，在6月进攻长州藩，但遭到长州全体人民的奋勇抵抗而失败了。

王政复古^②以后，幕府在法国公使的指导下进行了重要改革，想打倒反幕势力，自己成为统一全国的极权君主。第一，聘用法国军事教官团，着手建立近代常备军。为此，命令“旗本”等将俸禄

① 代官所——江户幕府直辖地方的官署。——译者

② 王政复古即明治中兴。日本自镰仓幕府以来，政治实权落于将军之手，天皇反而受将军的支配。所谓王政复古，并不是政治上恢复古代制度，仅仅是将政治实权收归天皇手中。——校者

的一半折合货币上缴，以充军费。与法国谈判，借款六百万美元，购买兵舰和武器；第二，改革老中制度，企图建立绝对主义官僚统治机构；第三，计划导入法国资本，设立日法合营的大商业公司，以垄断生丝的出口。此外还计划创设营业税、土地房屋税。如果这些改革能获得成功，日本便将沦为法国的属国。

另一方面，以萨、长两藩为中心的倒幕派，为了进一步攻击幕府，在宫廷中也进行了活动，并联络了全国的倒幕势力。英国公使曾给以政治援助。公使馆员曾暗示倒幕派首领西乡隆盛说：必要时愿给以军事援助。西乡在谈话中表示，日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政体的改革，不愿依靠外国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爱国意识的成长和排外主义是不同的。

幕府完全失掉了民心，以致连京都市内有人自杀或发生火灾，人们也说成是幕府腐败统治的结果。它的根据地关东地方^①，自从一年前发生起义以来，一直继续在动荡不安中。甚至于在隐岐

^① 关东地方包括东京都以及神奈川、千叶、埼玉、群马、栃木、茨城等六县。——校者

那样的孤岛上，勤王派的神主^①和地主也起而反抗官吏，组织独立的文武练习所（后来发展为岛民的自治机关）。九州的长崎与岛原地方的天主教徒，在幕府的残酷迫害下，潜伏达二百数十年之久，现在也公开了信仰。大阪的特殊部落民，也上书幕府要求人权平等。

旧的封建秩序到处在开始瓦解。但是，人民还没有自己的革命先锋队，也没有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这是由于尽管封建经济在日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在迅速成长，但要产生革命的资产阶级、人民在社会生产中相互合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团结起来，却还有相当的距离。因而革命的领导权便落到改良主义的倒幕派手中去了，在以打倒封建体制最上层的幕府为当前历史任务的阶段，倒幕派和人民群众能够结合起来，各地倒幕派给了当地人民以莫大的影响。

德川庆喜（1837—1872）鉴于倒幕势力的日益团结，接受公武合体派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1827—1872）的劝告，实行了“奉还大政”（10月14日），在形式上让天皇拥有最高权力，而由自己

^① 神主即日本神社内掌管祭祀的人。——译者

掌握实权。倒幕派被庆喜这种先发制人的手法，弄得有点惊慌失措，然而很快便挽回了局势。西乡、大久保等确信不以武力推翻幕府，决不能真正清除旧势力，乃积极进行准备。

10月下旬，从京、阪地方到东海道一带以至江户，发生天照大神神符从空中降落的迷信谣言，人心骚动，在街头狂欢乱舞，为期一个多月，使幕府的警察力量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倒幕派尽最大努力利用这种混乱。这时，幕府在江户已经威信扫地。从农民中征募来的新式步兵，大批逃亡，想征用军用土地时，农民就起义反抗，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农民逮捕了胡闹的法国军事教官，幕府的特别警察反而请求农民释放。

在这种情况下，公历1868年1月3日（庆应3年12月9日）倒幕派的政变获得成功，发表了王政复古，废除将军制的宣言。宣言中也有“王事一新”、“救民”等代表人民呼声的字句。

江戸城的投降和倒幕 当天就立即成立了名为太政官^①的新中央政府。公卿、强大的大名和

^① 太政官是明治初年最高的行政机构，统辖八省（部）及各厅政务，1873年改为内阁制。——校者

倒幕派藩士分任新政府的要职，其实权则操在大久保，西乡等藩土层手中。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夜新政府便决定要德川庆喜交出领地。这便是剥夺幕府的物质基础，使之变为新政府的物质基础，当然引起了幕府的反对。但是，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真正推翻了幕府。

在国际上，各国仍然承认幕府是日本的合法政府。负责幕府外交事务的老中，曾以半殖民地的条件给美国公使馆员朴特门以修建江户、横滨间铁路的权利，公文上写的日子是庆应3年12月23日(1868年1月17日)。

庆喜及其部下，决心以武力维护它的政权和领地，新政府也向幕府挑衅。1868年(庆应4年)1月3日(阴历)，旧幕府军和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终于在京都郊外发生冲突。幕府兵力虽三倍于政府军，但其主力步兵毫无斗志，终遭惨败，庆喜逃回江户。近畿以西各藩主即向新政府宣誓效忠。

继而政府发表了为拯救多年来在幕府苛政下呻吟的人民而讨伐庆喜的宣言，向江户进军。各国声明在天皇政府与将军政府内战期间，保持中立。

幕府内部最初虽有很多人主张接受法国援助，和官军决一死战，但当胜海舟（1823—1899）等说明陆军几陷于土崩瓦解，江户市民也深深痛恨幕府，关东一带人民已经起义等情势之后，便打消抗战意图。新政府及左右它的英国公使也同样害怕人民的起义，结果双方达成妥协，1868年4月以保全庆喜生命和德川家为条件。江户城未经战斗便让给新政府军了。

幕府领地完全落入政府手中，德川幕府被推翻，日本人民向完成民族统一和消灭封建制度，跃进了第一大步。

倒幕和对外关系 随着幕府的垮台，幕府和法国间的卖国计划也成了泡影。日本虽尚未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但已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倒幕前的日本和中国一样，日益趋向半殖民地化。但以倒幕为转折点，日本走上了摆脱这种命运的道路。

促成日本走上这条道路的决定性的力量，就是推翻幕府的日本人民。亚洲各民族的斗争，尤其是日本开港前后爆发的印度人民的反英起义（1857—1859）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

1865),使驻日英国公使等认识到“具有亚洲人血统的任何国民和民族,不经过顽强的反抗,决不会向欧洲人屈服”。这种认识便成为缓和外国侵略魔手的重大力量。当资本主义将世界连结成为一个整体的同时,客观上被它压迫的人们的共同利害关系也形成了,并且起着作用。

此外,英、法、俄的对立,象对马事件那样,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1861—1865)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列强势力的均衡,只有在日本国内存在利用它的力量时,才具有意义。例如对马岛人民抵抗俄舰建设军事基地和拒绝租地等,有了这种条件,才使英俄的均衡给日本带来有利的结果。

第二章 统一国家的形成 和走向资本主义

第一节 统一国家的形成

内乱 幕府虽被推翻了，但旧幕臣的大部分和关东以北各藩，以会津、庄内^①两藩为中心，继续抵抗新政府，内战继续扩大。8月旧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1836—1908）等率领全舰队逃走，中途又加入一部分旧幕府陆军和法国军事教官团，盘据函馆。

这次内乱，以萨摩、长州、土佐、安艺^②等近畿以西各藩军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官军），数量上虽居劣势，但无论在越后、奥羽，函馆都因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获得胜利。例如长冈藩^③是越后旧幕派

① 会津在今福島县若松市。藩主松平容保曾联合奥羽、越后诸藩抵抗官军，失败后被囚。庄内在山形县。——校者

② 安艺在今广岛县。——校者

③ 长冈在今新潟县。——校者

的主力，正当藩军与官军决战时，藩内人民为反对拉夫及其他要求，掀起了猛烈的暴动和起义，给藩政权以严重的打击。这里流传着官军胜利免税三年的传说，使人民对新政府寄与莫大的希望。东北地方的农民也随时起来协助官军，并供给官军情报。另外，地主、商人中的“勤王分子”也有组织军队参加官军的。一向担任官军最艰苦的方面军的参谋长板垣退助（1837—1919）眼看到这种情形，便痛感上下隔膜，国家必亡，如不早日实现四民平等的一致团结，日本是不会强盛的。

本土的内乱到9月底以官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同月，改庆应4年为明治元年，确定以后一个天皇一个年号。10月改江户为东京。年底各国也都取消中立，承认天皇政权为日本唯一的政府。继而是1869年（明治2年）3月奠都东京。

函馆的榎本军，在该地建立了地方政权。1869年2月，榎本政权将函馆郊外七重村周围三百万坪土地，以99年为期，租借给普鲁士人格尔德叶（R. gartner）。次年春，榎本军遭到官军的进攻，到5月投降。在这次战争中，市民反对榎本政权的压迫，也有人出来组织游击队，协助官军，对击

溃榎本军起了重要作用^①。

一般都说明治维新的完成，没有经过流血，这只能说没有流将军、反政府派各藩主和上层封建统治者的血，事实上是经历了为期一年半波及全国的内乱。

这次内乱的战费和新政府的财政，由发行“太政官札”^②和其他不兑换纸币四千九百万两及向三井等大商业资本家借款来供应。通过这次借款，新政府便和三井、岛田、小野等大商业资本家密切结合了。太政官札尽管是强制的，但它之所以能够流通，就是由于得到了大商业资本家的支持。幕府与天皇谁做统一全国的统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十分关心，只希望有一个稳定而统一的政权。他们依靠布满全国的金融网，正确地掌握情报，因而对幕府绝望，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新政府身上。

① 例如在函馆，铁工的徒弟莲藏在官军对榎本军发动总攻击的前夜，得到同志的引导，潜入榎本军的主要炮台，将全部大炮火门都封钉起来。

② 太政官札是1868年由第一个大藏大臣由利公正提议发行的政府纸币。当时政府军政支出浩繁，赖此供应，因滥发致使币值低落。1872年另外发行新币收兑。——校者

奉还版籍 这期间，新政府的方向渐趋明确了。才推翻幕府的时候，新政府考虑过建立一种以天皇为首领的封建各藩的联邦制，内战爆发后，便打消了这种想法，决定走中央集权的方向。在对外关系上，新政府声明无条件承认旧幕府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积极进行友好贸易。

3月间，新政府取得了近畿以西的地方后，发布了五条誓文，揭示了广兴会议、万机当取决于公论；应向世界求知识、以振皇基等基本方针。继而在江户城投降后制定了政体书，将政治大权集中于太政官，中央机构分为行政、议政、司法三部门，禁止各官兼职（仿照三权分立）。三级以上官吏用互选方法产生。这里反映了推翻二百六十余年旧政权的改革期的民主气氛。但所谓尊重公议舆论，并不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舆论，而是企图把官吏和公卿、大名、藩士等团结在政府周围。在公布五条誓文的同时，又向人民揭示五枚告示牌，它和旧幕府同样，永远严禁结党、聚众要挟、逃散、信奉天主教等。五条誓文不是近代日本民主主义的出发点，后者只有在人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才能出现。

新政府曾屡屡更改官制，中央集权一次比一

次更加强了，连尊重各藩舆论的假话也不说了，对人民所装的笑脸早已看不见了。倒幕和内战时的领导人物，例如萨摩的大久保利通、长州的木户孝允（1833—1877）、肥前的大隈重信（1838—1922）以及其他西南各藩出身的人，其实权和地位都增强了。他们不但不受自己藩主的统治，反而成为统治自己藩主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了。

1869年（明治2年）6月，政府实行“奉还版籍”^①，变旧藩主为中央政府任命的藩知事，将藩主的家庭经济与藩财政分开来，藩政治的基本方针必须服从中央。这样，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仍承认藩主对藩内领民的半独立的统治权，但已取消了他的领有权。又废除了大名与公卿的名称，改为华族。一般武士被分为士族和卒两级。士族的俸禄原来是土地的，一律以米代替；俸禄米也被大量削减了。以前新政权的性质，还不过是代替幕府成为全国的统治者，这时候它已与幕府不同，已经具有新的性质，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全国土地和

^① 版即版图，指领地，籍即户籍，指人民。这个政策形式上采取由大名申请，将自己的土地交还给天皇，所以称为“奉还版籍”，实际上是在政府周密布置下迫使大名交出的。

人民，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第一步。为了适合这种新的形势，同年7月改革了中央官制。

中央政府最初采取恢复古代天皇制官制的形式，分为掌管神庙及祭祀的神祇官与掌管一般政务的太政官，以前者居上位。太政官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大纳言、参议等，执掌国务，下设民部、大藏、宫内、刑部、兵部、外务等六个行政省和大学校（相当于现在日本的文部省）及弹正台（相当于最高警察本部兼最高检察厅）。至于地方，政府直辖地置府、县，藩的一般行政机构与县同。

收回民族权利 向中央集权跃进了一步的政府，对收回旧幕府给予美国的铁路利权和格尔德叶在七重村租借地的交涉，也获得了成功。

关于铁路利权，1869年1月美国公使要求新政府予以承认。政府在英国公使派克斯的策划下断然拒绝了。美国虽曾坚持其要求，并采取威胁态度，但政府以旧幕府老中所发的执照是在王政复古以后为理由，认为无效，经一年余的谈判，终于未付出任何代价，迫使美国放弃要求。

格尔德叶的租借地，因为新政府于榎本军溃灭后，函馆县知事又与他订了新的租契，所以对日

本不利。但由于政府坚持北海道(虾夷地)必须由自己开拓的方针,与格尔德叶交涉一年余后,1870年(明治3年)12月,终于付出六万二千五百银元的巨款为代价,收回了土地。

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各藩的衰落 尽管新政府夺取了旧幕府的和1868年内战中反抗新政府各藩的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领主,但它还没有自己的直辖军队。倒幕派中的大部分下级武士,由于新政府承认幕府和外国缔结的一切条约,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加速了他们的没落,而怨恨新政府。人民也由于与他们所期待的相反,新政府并没有减免租税,仍旧和德川幕府一样剥削他们,压迫他们,也强烈地反对新政府。

然而,这时作为中央集权政府经济前提的国内市场,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了,新政府又实施了一系列的必要政策,加速它的发展。即采取下列各项措施:例如禁止各藩设立关卡(1868年5月),撤销箱根及其他道路上的关卡(1869年9月),整理沿岸航路和港口(1869年以后),打破株仲间的垄断(1868年5月),整顿伪币、劣币并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设置通商司奖励贸易,统一并保

护全国的汇兑业务（1869年），修筑铁路并募集所需的外债（1870年），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1868年12月），旱田税统一缴纳现款（1870年7月）等。因此大大地推动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出口贸易从1869年的一千二百九十一万元顺利地增长到1870年的一千四百五十四万元，1871年的一千七百九十七万元，从这点，便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大商业资产阶级的勾结更加紧密了。

发展起来的国内市场的中心，以大阪、京都、东京三城市和横滨、神户两大贸易港为首，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商品经济界称霸的三井、鸿池、住友等大资本家则成为政府的支柱。这样，政府掌握着国内市场并逐渐强化它。这一事实，成了政府在政治上能够实行中央集权的条件。

国内市场的发展，换言之，就是封建的地方经济日益衰落，同时，又意味着各藩丧失了作为半独立封建国家而存在的经济条件。民间资本已经成长到超出藩的统制力了（从当时的暴动大都提出要求营业自由可以看出）。因而各藩已不能垄断领内的工商业，以挽救它的财政上的穷困了。关

于各藩的财政，1868年（明治元年）内战时，战败各藩固然不必说，即使是站在官军方面胜利了的各藩，也由于战费的支出，受了决定性的打击，已无恢复希望。因为财政困难，任何大藩也都被迫缩减军队和削减士族的俸禄。1871年初丸龟^①等数藩已经维持不下，乃自动向政府提出废藩的请求。

从政治上看，掌握西南强有力各藩实权的，是下级武士里面在内战中显示了实力的开明分子。他们的出身，和中央政府的官僚相同；而且他们也不断地被提拔为中央政府的官僚，因而他们对藩主和藩上层的门阀没有任何留恋，能够迫使藩主奉还藩籍的就是他们的力量。中央政府抓住这个阶层，来加强自己。

土地革命的萌芽 在这种情势下，倒幕后，人民反封建的斗争更加发展了。旧的封建体制已很难照旧维持下去，不得不实行中央集权，进行近代化的改革。新政府之所以能推翻幕府并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显然是由于利用了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结果。

农民斗争，是以贫农与半无产者阶层为主力，

^① 丸龟在今香川县丸龟市。——校者

并有中农、小营业者广泛地参加。农民斗争除提出了减轻年贡及其他负担、营业自由、反对强迫通用不兑换纸币和劣币，以及反对在兑换现金时遭到剥削等经济的要求外，还屡屡提出“救世”口号、公选本村村吏，以及统治数村的大庄屋等政治要求。1868年10月会津藩的“救世”、1869年8月从信州的上田、松代^①两藩领以至伊那地方十数万人历时数日的起义、同年10月越中的“蓑衣起义”等都是典型的实例。会津的“救世”，全体村民包括素无权力的小前（贫农）在内，组织了平等同权的自治团体，焚毁了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文书——土地清册、户籍簿等，无偿地收回了抵押土地，在全村中实行了土地革命。1869年春飞騨高山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开始时曾向太政官控诉知事的苛政，最后迫使撤换知事。1870年1月信州松代藩四郡七万人的起义，是由贫农领导，有善光寺町的市民参加，提出了废除藩的“商法社”、收回不兑换纸币等要求，直接与藩知事交涉，并取得胜利。起义人民和知事直接谈判，这还是第一次。

^① 上田在今长野县上田市。松代在今长野县松代町。——校者

1870年1月陆奥登米郡的起义，曾主张所谓复古，指国内一切都应该复古，人人有权收回过期未能赎回而落在别人手中的抵押土地。

这些都是当时最突出的斗争实例，但这些已不是孤立在大平原上的高山，而是大小山脉连绵重叠的最高峰。这里发生了土地革命的幼芽，同时也是日本近代民主主义最重要的源泉。这些起义在“救世”这一点上，农民群众已和地主、富农阶层发生了矛盾，但在要求减轻年贡等的起义中，仍然是一致行动的。

走向绝对主义 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封建大领主，农民斗争的发展，当然使它受很大的威胁。但是政府一方面受到人民斗争的压力，同时，却利用它削减各藩的权力，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改革。例如1869—1870年由于解散长州奇兵队等而爆发的士兵暴乱和农民起义，好容易才镇压下去；但是善后对策，井上馨（1833—1925）（原奇兵队军官，当时中央政府领导人之一）则主张除实行下列各项重大改革外别无他法，即现在领取俸禄的一万五千名藩士，其中一万人使之改务农、工业，其余五千人的世禄也应逐渐取消，这是当务之急。此

外应实行减轻人民的年贡，不束缚人民的自由权，废汉字，兴机械究理之学，以及其他改革。

这种主张虽未完全实现，但这里所指示的方向，就是山口藩^①和其他各藩所不能不走的方向。高知藩(土佐)是最早走上这一方向的代表。该藩从1870年(明治3年)起，由板垣退助(他在内乱中痛感四民平权为当前急务)领导，进行了以“人民平均之理为主”的改革，即大大削减士族俸禄、鼓励士族从事工、商业，取消一切身分特权，并废除旧日单由士族组成的军队，改为从士、农、工、商等全体藩民中征募的新军队。其他各藩有的也仿照它进行了改革。

这样，各藩的分散割据，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人民的斗争，不能继续下去了。代表日本社会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革命阶级——农民、小商品生产者的反封建斗争，已使封建领主阶级的旧统治形态维持不下去了。但它还没有革命的领导阶级，能把这个反封建斗争在政治上作全国性的团结，发展为推翻整个封建制度的革命。当时的资产阶级虽具有与封

^① 山口在今山口县。——校者

建领主对立的一面，但由于他们还具有依靠封建剥削的一面，尽管希望改良封建制度，但还不是推翻它的革命力量。

天皇政权，以这样的阶级关系为基础，代替幕府成为日本最高、最大的封建领主，一方面剥夺了大名、武士的势力，另一方面则压抑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成为唯一最高的中央集权政权。形成了基本上与世界史上被称为绝对主义^①的国家具有同样的性质。

废藩置县 大名的土地领有权取消后，整整经过两年，即1871年（明治4年）7月14日，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即免除所有藩知事的职务，命令他们来东京居住，继续发给世禄。但封建领主们为所欲为地实行专制，将近三百年了，中央政府想

^① 典型的西欧绝对主义是十六—十七世纪封建制度的最后阶段，当时世界上任何地方尚未出现资本主义的统治，从资产阶级和封建领主阶级的对立均衡中，拥立最强大的封建领主，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一的国家政权。它虽然是以固有的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政权，却起了推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历史作用。日本的天皇绝对主义在本质上也是同样的，但由于：第一，它成立时世界史的条件与前者不同；第二，它成立时国内历史的条件也与前者不同，因而与西欧绝对主义有一些重要差异，这点将在后面叙述。

彻底地剥夺他们的政权和土地，就必须先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万一他们起来反抗，才能镇压。这一问题，因任命萨摩的西乡隆盛和土佐的板垣退助为中央参议（长州的有力者都成为中央高官），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向中央提供最新式的步、骑、炮三队、计八千名，作为“御亲兵”（后改为近卫军），而获得了解决。准备好这支武装力量后，政府才突然实行废藩。从此建立为唯一不可分的统一国家。天皇成为唯一最高的绝对主义君主，文武官僚在天皇的名义下实行专制政治。

这个国家，不是人民民主的国家，有如上述，基本上是封建性质的国家。倒幕、废藩置县，并未成为具有这种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势力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然而，第一，由于这个改革，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分散割据，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使日本人民团结成为统一的民族。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①。由于跨上了这

^① 天皇制绝对主义国家的成立，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上具有进步意义。这一点并不等于说天皇是进步的。天皇与反对封建的宗教的权威作斗争而成立的西欧绝对主义君主不同，正由于他是最高的封建权威，才被拥立为统一政权的君主，不代表形成期绝对主义的进步的一面，而代表绝对主义封建反动的一面。

一步，便奠定了这样的基础：使日本成为当时亚洲唯一能从欧美半殖民地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

第二，这个改革，与政权从丰臣家转到德川家那种单纯的政权转移不同，更不是“复古”。正如下面所叙述，是“百事一新”、“维新”。维新以空前未有的深度和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社会的、经济的改革，有力地促使日本从封建制度转化为资本主义；这一点，具有革命的意义。虽然如此，但这个改革，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所以不能说是革命。

第二节 中央集权统治的确立

官僚制 天皇政权在废藩置县成功后，紧接着便着手整顿它的统治体制。8月实行中央官制的大改革，撤销模仿古代天皇制国家的神祇官，改为太政官中的一省，但不到一年又把它取消了。上升期的天皇制，抛弃了这种仿照古代祭政一致的政制。太政官分正院、左院、右院。正院为中枢权力机关，以大臣、纳言、参议组成；左院为法令审议机

关；右院为各省长官(卿)和次官(太辅)的合议制。

然而从 1873 年(明治 6 年)5 月起,以参议组成内阁,负责政策与法令的起草以及监督政务。因为参议大都兼任各省长官,左院和右院成了赘瘤,便于 1875 年撤销了。

政府的中枢部门几乎为萨摩长州两藩出身者所独占,肥前和土佐两藩出身者一时只担任参议而已。人民称它为藩阀专制政府。而政府也坚信建国的大法必须实行专制主义,特别是教育和兵制不能离开专制主义。

1874 年(明治 7 年)1 月设置了内务省,并在它的统一指挥下,设置了以东京警视厅为首的中央集权的警察体系。政府当局说:“要强化帝权,必先强化警察”,“束缚人民,正是保护人民”,除专司逮捕犯人等的司法警察外,又设置了所谓行政警察,从街头便溺以至家庭扫除等人民日常生活琐事,都被监视束缚。以警察力量为后盾,内务省又强制推行了“劝业”工作,即培植资本主义的产业。

关于监狱制度,1873 年末也制定了统一的监狱条例。1879 年(明治 12 年)在小管、宫城二处特

别设立了监禁长期犯人和政治犯的“集治监”。其后更在北海道的网走以及其他地方增设了监狱。

关于地方制度，新政府将旧藩的管界加以整顿和合并，1871年底分全国为三府七十二县，通过中央任命的知事以下的地方官，执行全国划一的行政。同时，村制也以旧日的村为基础，将无力负担警察和学校费用的小村合并为能担负这些费用的大村，废除过去的庄屋，名主等，村置户长、副户长^①，数村以上的地区则设置区。

区长、户长，依当地旧习，由町村居民选举，但现在的村与废藩后两年实行的地税改革（下面叙述）相关连，和以前的村性质有所不同了。过去是自然村落的性质，内部共同团体的色彩颇浓，全村隶属于领主，租税的缴纳以及其他义务都是以村为单位。名主、庄屋等村吏一方面是领主封建权力的最基层，另一方面也多少具有共同体代表者的性质。然而，新编成的村，不过是中央权力的行政单位，设置户长，不过是天皇统治最基层的爪牙有了个开端而已（1889年完成）。

^① 日本实施町村制度以前所设管理町村事务的吏员。——译者

征兵和建立常备军 与官僚制并列的最重要的机构,为庞大的常备军。天皇制政府成立之初,就是极端的军国主义,为了镇压士族和平民,曾尽最大努力建立强大的军备。“富国强兵”为政府最主要的目标,但它的所谓富国不是使人民富裕,而是牺牲人民丰富国库,建立足以供应近代军备的工业。

新的军备如果只以封建士族为基础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一点,无论从幕末长州藩(新政府的军事领导人 大村益次郎〔1824—1869〕和山县有朋〔1838—1922〕都是长州藩出身)的经验或是幕府的经验,都很清楚。专制政府又最怕全国人民自己实行武装的民兵制,于是只有向人民征兵,建立常备军。连这样做,政府还担心人民当兵,会转化为人民自己的武力,起初颇为踌躇。但如上所述,政府建立“御亲兵”——近卫军之后,才废藩置县,整顿旧藩兵,每一县都设置了士族军队,并设中央集权的“镇台”^①以统率它。这种镇压人民反抗的

^① 镇台系师团旧称。1871年以各藩士族军队组织镇台兵,分驻东京、东北(仙台)、大阪、西海(熊本)四个管区。1873年因设军港,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个管区。1889年废止。——校者

体系完成后，才于1872年（明治5年）11月颁布征兵令，向全国人民征兵，建立起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

海军是政府接收旧幕府与各藩的舰队，渐次加以扩充的。1872年1月虽将兵部省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因为当时是以镇压国内反天皇政权的势力为当前主要任务，政府的主力便放在陆军方面。颁布征兵令时，太政官的告示中虽曾谈到征兵制是废除武士独占武力压制人民的制度，使人民获得自由和平等。然而实际上不外是天皇制政府利用人民对自由平等的要求，以建立自己的武装而已。

当时建立军队的真正目的，主要是镇压政府的反对派。1872年的征兵令中对于官吏、独子、独孙以及不愿服兵役而缴纳代金的人，都免除兵役。这说明了征兵与领主强迫隶属农民服劳役具有同样的性质（1883年取消免役规定）。国民义务兵役制，从世界史上看，是开始于法国革命时期。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建立军队。天皇专制制度和征兵制度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而人民强烈地反对征兵，屡次发

生反抗运动，或虚报户口，逃避兵役。就是到了户籍制度严密，并取消了独子、独孙的免役规定，不能虚报户口逃避兵役时，逃避兵役检查，或入伍后逃走的，到1890年左右（明治23年）仍旧非常盛行。

根据征兵制建立起常备军后，1875年（明治8年）起便逐渐解散士族军队。同时，军队的任务也不限于镇压国内人民，乃是为了侵略海外而加以扩充了。

整顿身分制和整理俸禄 在官僚统治下，封建身分制也整顿了。废藩后不久，同年8月，取消秽多、非人，改列为平民，除超人身分的天皇及其家族外，全国人民划分为华族、士族、平民三等级，允许互通婚嫁。服装及其他日常生活上的身分限制也取消了。充任官吏或将校的权利也不再受身分的限制了。不同身分的职业限制、迁移限制也从1871—1872年中废除了。

这样，似乎已经做到了“四民平等”，其实华族拥有种种特权和巨额财产（承继其原来做封建领主的财产），事实上士族也仍居于社会上层地位，并照旧领取封建世禄。

四民平等的实际内容，是平民和下级士族获得作为资本主义必要的劳动者而受剥削的“自由”，以及全国人民服从天皇制统一支配的“自由”。旧的贱民身分，法律上虽列为平民，事实上不过在服兵役、纳赋税等义务上视为平民，以及向来因身分限定只能由他们从事的手工业被开放了而已。这种身分差别的废除，由于经济上没有得到解放，原属贱民身分的人，职业上，仍旧只能从事原来限制了的家庭手工业，实际生活不能提高。这种对旧贱民身分的差别待遇，直到现代依然存在。只要社会上有天皇、皇族这种超人的特权身分存在；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差别身分也必然会遗留下来。

华族、士族的俸禄，废藩后，也照样继续发给。如果不取消，国家财政将无法维持下去。而且在新的统治体制建立后，也毋须再养活士族，兼之政府有了足够镇压士族反抗的军队和警察，因而于1873年（明治6年）着手整理俸禄。1875年（明治8年）停止发放各类俸禄，代之以公债。政府为了整理华族、士族的俸禄而发行的公债总额为一亿七千五百七十九万元，仅年息就达一千一百六十

一万元。而1880年前政府的经常岁入为六千万元乃至七千万元，而且85%为年贡，因此支付公债本利是如何地加重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负担就可想而知。华族和领取高俸禄的士族拿公债购买土地，成为地主，或投资工业成为资本家，但大多数士族没有领到那样多的公债，因之他们的公债也很快地落到资本家手中去了。

宣扬大教和义务教育 任何专制政权，只用权力和暴力压制人民是不够的，必须进而统治人民的思想。天皇制政府成立之初，大多数人民对天皇是毫无所知的。因而政府于成立后便大肆宣传“天皇系天照大神的子孙”、“神代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等迷惑人民的话。又为了使人民特别尊重神道，禁止与佛教混合（如神社的神龕上禁止供佛象等）。但是这种神佛分离的政策，不久便发展为一部分人民主张废除寺院的运动，要求取消寺院的封建特权，并分配它的领地。因而政府便慌忙地于1871年（明治4年）又声明保护佛教和寺院。与此同时，1870年1月起宣扬“基于神道和皇道的大教”，1872年又特地设立教部省，动员全国的神官、僧侣及儒教学者向人民进行精神宣教，要

求对天皇要和对神一样地崇拜，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即政府命令）。但是失败了，因此，1878年又将教部省撤销。

这种灌输封建思想意识的宣扬大教虽然完全失败，但输入具有近代因素的义务教育制度，却获得了成功。1872年（明治5年）政府颁布学制，规定送儿童入小学受教育为家长的义务。学校的建立和维持费用由村民担负，并规定小学每月学费五角（当时米价一升约合七分）。人民反对这种负担，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抵抗运动。由于人民迫切要求受教育，儿童的就学率却与年俱增。

最初的学制，无论是教育内容和学校的管理，小学则听任市区町村，中学则委之于县。这种学制，从“学问为立身之本”一语，便能窥知它的意图是在灌输资产阶级社会所需的基础知识。但是1879年（明治12年）的教育令，完全剥夺了地方上对于教育的自主权，规定教育由中央集权划一统制。同年，又以天皇名义，颁布“教学大旨”，规定以灌输儒教道德为教育的中心任务。1881年（明治14年）为对抗当时震撼全国的自由民权斗争，教育令的施行细则便明确规定：“教育的目的，

主要是激发尊君爱国的意志”。这种义务教育原来就是以培养天皇制绝对主义的精神支柱为根本目的，不过是在学制颁布后数年才表面化。

第三节 收回国权和军国主义

收回国权的努力 天皇制政权把全国从九州到北海道统一为不可分的日本国，建立起深入全国各个角落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后，又致力于收回国权。这是利用人民反对幕府卖国政策的力量面建立起来的天皇制政权所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于废藩置县前收回铁路权利和七重村租借地的问题，前面已讲过了。1873年（明治6年）废藩后又收回了旧佐贺藩作为外债担保的高岛煤矿。同年，公布了日本矿业法，规定外人不得勘探矿山、租用矿区，不得担任经营、开采、精制等业务的业主，或是合伙经营。

此外，当时的政府坦率地告诉人民：“允许外国军队在我国港口登陆，外侨触犯我国法律，他本国的驻日官吏有审判权，就是最大的国耻”（岩仓具视）。政府不仅认为这是国耻，并且具有雪耻的

决心。不象现在的反动政府，把外国军队占领日本说成是“为了自卫”、“保障安全”等。

政府一成立，就决心要改订不平等条约，并屡次要英、法撤退横滨驻军。到了废藩置县成功后，政府为了修改条约，于1871年底以大纳言^①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选拔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1841—1909）等优秀的官员组成庞大的使节团，派赴欧美各国访问。使节团首先和美国进行关于废除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权、禁止外国军队登陆以及其他各项修改条约的谈判，但遭美国拒绝。欧洲各国政府也同样拒绝。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由于使节团在欧美作了一年零八个月的访问；加之在他们出国访问期间，国内进行了上述种种改革，完成统一了的日本，有了迅速的进步，行将进入近代国家之列；以及日本人民要求完全恢复主权的民族要求，如此强烈，给了欧美各国很深刻的印象。因此，1875年（明治8年）1月，英、法突然提出将撤退横滨驻军的通知。两年后，1877

^① 大纳言是日本旧官名，太政大臣的次官，次于右大臣，参预大政，掌管上奏和宣达圣旨的职务。——校者

年(明治10年)6月日本政府又解雇了在公使压力下聘用的横滨租界外人警察长官,并决定不再聘用外人。

这样,外国在日本享有的一切不合理的权益,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除不平等条约外,都经日本取消了。日本假如不这样早解决租借地及铁路修筑权、矿山权、驻军权、租借地警察权等问题,拖延到帝国主义的阶段,那么,帝国主义各国说不定会利用这些枷锁,把我国沦为与旧中国同样的半殖民地地位。

对欧美的屈从 天皇制政府所以在外交上有如此的成就,是与它当时仍然多少具有革新政权的进步性相适应的。但由于明治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绝对主义专制政权,所以不能用民主的方法团结全民的力量,走向完全恢复国家权力的道路上去。尽管木户孝允也承认“人人自立,国家自然能独立”;然而以专制主义为“建国大法”的他们,却亲手将人人自立——也就是使日本独立的道路阻塞住了。

政府期望修改安政条约。但在英国公使的压力下,反而于1869年(明治2年)1月和德国、9月

和奥匈帝国分别缔结了通商航海条约，其中有的条款，比安政条约对日本更为不利。

甚至在确定版图上面，政府也缺乏坚定的自主性。对于小笠原群岛，美国一向主张归它所有，但是到了1873年，由于国内情况和远东政策有了转变，美国放弃了以往的主张，这样，这一群岛才算被确认为日本的领土。对于库页岛南部，日本人的移住比俄国人在先，但是日本人缺乏系统的政策，只是放任自流地掠夺当地居民，因而深受当地居民的怨恨。因此，日本便逐渐地被后来的、但是在国家全面的政策指导下进行开发的帝俄所压倒。而自幕府末期以来，日俄之间就划定库页岛的国境问题进行了谈判。英美两国公使看透了日本绝无能力与俄国对抗来经营这块土地，因而劝告日本政府干脆放弃库页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终于不得不在1875年同俄国缔结条约，以整个库页岛作为俄国的领土，但俄国所领有的千岛列岛中部以北各岛属于日本所有。

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政策 天皇制政府对欧美屈从，却想从经济上、政治上侵略中国和朝鲜以求补偿。幕府势力推翻以后，各藩军队成为中央

政府的累赘。1869年初，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想用这些军队远征朝鲜，即所谓“征韩”，借以巩固中央政权。而朝鲜政府所奉行的封建保守主义，拒绝和新日本建立邦交，便成了征韩派的借口。

1871年（明治4年）日本政府和中國締結了友好通商條約。當時中國是朝鮮的上國，日本政府之所以和中國締結這個平等條約，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達到日本也成為朝鮮的上國。又在條約中規定中、日兩國相互有治外法權。這是根據日本的要求。日本為了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才不得不承認中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此外，在談判期間，中國曾提議中、日兩國結成同盟，反抗西方的侵略，但被日本拒絕。不僅如此，當時日本政府為了求得西洋各國的歡心，還給各國以侵略中國的方便。

士族們隨着政府實行廢藩置縣、征兵、整頓身分制和其他不利於士族的改革，加速了他們的沒落，因此，不滿情緒愈加高漲。政府為了轉移他們反政府的热潮，征韓論便愈益得勢。1873年（明治6年）參議西鄉隆盛為了把士族的不滿轉向對外侵略戰爭，並通過領導對外戰爭，在國內樹立起

士族的军事独裁，想抑制资产阶级的改革，坚持征韩主张。参议板垣退助也想乘对外战争机会，进行国内的民主改革，支持西乡。于是政府作了征韩的决定。然而，这时，恰恰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从国外归来，主张应以内治为急务，反对征韩，10月终于将征韩派全部赶出政府。

然而，岩仓等并不是反对侵略朝鲜，目的是为了打倒西乡派和板垣派的势力，以巩固绝对主义的官僚独裁。政府逐出征韩派后，第二年春便以报复台湾土民杀害琉球漂流民为借口，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这是以安抚征韩派士族的不满与夺取台湾的财富为目的的。这次侵略早在征韩派掌握政权的时候就计划好了，并得到美国公使德龙的鼓励。由于德龙的推荐，为了制定侵略台湾作战计划，特地聘用美国退伍将军李仙得为外务省顾问。美国想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

日本侵略台湾，当然引起中国的抗议。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于1874年（明治7年）亲自担任全权使节赴北京，在英国驻华公使越德的斡旋下，和中国代表李鸿章进行谈判，缔结了条约。日本撤兵，中国则付巨款给日本，作为偿还日军在台

湾修筑道路等的费用。大久保逗留在北京期间，越德曾向他示意，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得到英国的援助。英国的目的是想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

于是日本政府便照着英国的愿望行事了。1875年（明治8年）日本海军向朝鲜江华岛炮台挑衅，使守军开炮，趁机威胁朝鲜。1876年（明治9年）2月缔结友好通商条约。第一条故意写上“朝鲜是自主国……”，这表明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和中国争夺朝鲜的统治权。条约规定日本享有治外法权，在附件贸易章程中则规定免纳关税，完全无视朝鲜的关税自主权。天皇制日本，一方面受欧美不平等条约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将不平等条约强加在邻国身上。

武力吞并琉球 吞并琉球是上述明治政府整个外交政策的一环。琉球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向中国纳贡，也曾向萨摩藩进贡，又以独立国家的资格，自1854年（安政元年）以来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明治政府把琉球和萨摩藩视为上下关系，主张琉球为日本领土，1872年强迫琉球王室宣称自己是日本的琉球藩王。前一

年，利用琉球人被台湾土民杀害事件，日本政府借口为自己的人民琉球人复仇，企图远征台湾（前面已谈到了）。其真正目的，欲就此确定琉球为日本领土。琉球人在种族上是日本人的一个分支，琉球岛在地理上和九州南面各岛相连；而在经济上，日本同琉球的关系也日臻密切。因此，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本向近代国家的发展，迟早日本要和琉球合并，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天皇制政府的并吞方式是侵略。尽管如此，上述援助日本侵略台湾的美国，首先承认日本的兼并，继而其他国家也相继承认了。

琉球人民反对日本的吞并；中国也认为这是中国的领土，抗议日本的兼并。然而日本却在用武力镇压琉球人民的反抗之后，于 1879 年（明治 12 年）废琉球藩而改为冲绳县。对此，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权派的左翼，则从团结亚洲被压迫民族与和平的立场出发而加以反对，主张应当根据琉球人的意志，允许其独立。

吞并琉球引起了中日间的尖锐对立，1880 年（明治 13 年）两国暂时妥协，签订了将群岛南部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归中国、以北属日本的条约，

但该约附件所列修订中日友好通商条约，日本要求中国给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经商。中国不同意，分割琉球的条约也终于未获批准，以致中、日两国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但是由于日本接近琉球，随时可以出兵，而远离琉球的中国就没有这样便利，日本依靠政治上、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又得各国的支持，琉球全岛便未经战争，不晓得什么时候，变成了日本的领土。

军国主义 这样，天皇制政府便很快把民族独立与确立国权的民族使命转移到侵略软弱的邻国，“耀皇威于海外”的道路上去了。同时，国内的军部势力也必然增大了。1874年(明治7年)侵略台湾的时候，军司令官西乡从道(1843—1902)当政府尚在犹豫之际，便擅自出兵，政府竟无可奈何。朝鲜江华岛事件也只是海军部策划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采取和平政策，正因为政府的根本方针是侵略主义，西乡和海军部才敢于肆无忌惮地发动这样的大事件。由此可见，军部对政府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不是开始于后来侵略中国东北，而是起始于天皇制日本最初向海外侵略的时候。

军部在政府中的优越地位，不久便在国家制度上确立起来了。首先在1874年(明治7年)颁布的陆军省官制中：“陆军卿由将官中任命”，明确规定军部大臣的武官制。继而在1878年(明治11年)12月，设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以将官为首长，直属天皇。因此，它是与太政官并行的机关，不仅仅是旧陆军省参谋局的扩大。

参谋本部所掌握的用兵作战等所谓军令事项，政府无权过问。不但这样，参谋本部决定的某些军令事项，可以“下令陆军卿施行之”，于是政府机关之一的陆军省，也隶属于参谋本部了。这便为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干涉政治开辟了道路。尤其是陆军卿限于武官，如果参谋本部和陆军卿协同一致，很容易迫使政府屈服。

参谋本部的独立，早在1880年(明治13年)已经显示出它的威力。同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写了一篇《邻邦兵备略》，论中国的军备，呈给天皇。其中阐明为了准备中日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力言“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的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因之，过去的军令事项，无一不是以一切

政治、经济首先必须服从军备的政治理论为前提而作出来的。政府的政策被这种理论所摆布。所谓军国主义就是以军备和对外侵略为国家的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服从这一目的。天皇制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参谋本部的设立，便正式宣告天皇制采取军国主义了。

第四节 改革地税和扶植资本主义

改革地税的必然性 天皇制在它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统治方面具有开明的、资本主义的因素，它和旧幕藩体制比较，有它历史的进步性。然而由于它本质上是专制的、封建的，它的开明的、进步的因素仅仅是昙花一现便立即消失，暴露了专制主义的真面目。因此，在对外关系方面，一方面表现了努力恢复民族主权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向欧美屈从，对中国与朝鲜则开始就实行侵略的军国主义政策。具有这样两面性的天皇制，在促进封建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上面，从一般的意义来讲，是把历史向前推进了。但由于它的特质基础没有力量能超出专制的天皇制一步，因之不

能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使资本主义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起来。

天皇制政府通过废藩置县,打倒所有的封建领主,而成了全国唯一的领主,对于人民的剥削,无论是形式上或内容上都和过去的封建领主一样,没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天皇制政府强迫农民照旧缴纳实物年贡,岁入的85%经常依靠实物年贡。然而第一,当已经有了土地革命的萌芽、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高涨的时候,利用农民斗争削弱了封建领主制而建立起来的天皇制,清楚地了解旧的剥削方法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第二,天皇制一方面依靠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天皇制的历史环境是先进资本主义处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的环境。因之,天皇制是无法照旧维持旧的农业生产关系,必须进行适应于资本主义的改革。

这里客观上存在着农业改革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对天皇制官僚说来,就是岁入各地不统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页。——编者

的实物年贡与货币支出间的矛盾。而面对着农民斗争锋刃的民部省，则把这种必然性作为“平均税法”的问题提出来。民部省认为士、农、工、商同样受到国家的“保护”，对士和工、商业不征收任何税款，只有农民负担重税，是有欠公平，“必须减重增轻，使天下民产得以平均”。因此，认为应该承认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征收以地价为基础的货币租税（1870年9月）。

改革地稅的两面性 废藩置县后，政府愈益感到改革地稅的必要了。同时，也具备了可能的政治条件（统一全国的中央集权政权）。然而，向来就以封建土地制度作为物质基础的天皇制，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由于整顿官僚制、建立常备军、扶植资本主义以及其他建立绝对主义统治体制和军国主义等，所需的费用日益增大，再加仍旧要发给华族、士族的俸禄，养活封建领主阶级，政府也承认无法减轻农民过重的负担。因此，改革所采取的路线，是将封建的土地制慢慢地转变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以便一方面表示对农民让步；另一方面又保证政府的收入，并培植新地主阶级，作为天皇制

的阶级基础,以代替旧领主阶级。

废藩置县后,允许缴纳货币地税和栽培农作物的自由(1871年8—9月)。1872年2月,承认土地的永久买卖和所有权,并发给地契与土地所有者。这些部分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强烈要求,在开辟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上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土地所有权,仅仅承认幕藩时代本百姓和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还不是承认佃农对耕地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不是把土地交给农民。

继而在1873年(明治6年)7月,颁布地税改革条例。要点如下:

(一)旧年贡以土地的收获为标准,水田税为米,旱田税则缴纳实物或现款,新地税则改为水旱田一律按地价缴纳现款;

(二)税率为地价的3%,附加税三分之一作为村费,并规定丰年不增加,荒年也不减轻;

(三)旧年贡是向实际农业经营者征收,新地税则不问他是否亲自经营,一律向土地所有者征收。

从1874年(明治7年)到1880年(明治13年)在全国实施改革。从此,政府能在全中国征收统一

的稳定的货币地税。解决了收入是不统一的实物年贡和支出是统一的货币之间的矛盾。然而这种改革既未减轻农民的负担，也没有立刻改变旧贡租的封建性质。它只是改变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地承继下来的旧封建贡租的形式而已。

第一，因为这种地税率是以“不减少原来的岁入”为目标而规定的，各地虽有增减，但对全体农民阶级说来，所受的剥削和过去一样。

不仅如此，较实际丈量多出来的隐匿田，连过去的封建领主也容许作为农民的一线活路，现在也都被列为征税对象了，因而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改革条例第六章也承认了地税的过重，并允许“这种税率与旧年贡同样，包括物品税和房产税在内。将来如果征收物品税等，其岁入达二百万元以上时，则减少地税率1%”。其实，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条款”，以空头支票来欺骗农民而已。

第二，算定地价时，在收获物的价格中，没有把相当于工资的部分算作生产费，也列为“收益”，作为计算地价的基础，因而根据这种地价征税，是限于对剩余生产品征税而是对全部劳动产品的

价值征税。而且最初规定每经一次交易，地价必须加以改订。到1875年（明治8年）始规定今后五年不变，并按当时价格改订。这就意味着农民愈益改良土地，用进步的耕作法提高生产力，连这一部分也被列为征税对象了。这说明新地税的性质，在本质上和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被征收封建贡租完全一样。

当实行地税改革的时候，官吏擅自决定地价，反抗者则以“应视为朝敌，赤身驱逐出国”等话相威胁。用专制主义权力，超经济的强制方法确定地价，因而也确定了地税，这也说明地税是继承封建的贡租性质。然而，因为承认了土地所有权，自由经营获得了保证，再加地税改为定额现款，不久，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斗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成果，使地税的封建性质有了逐渐改变的可能条件。

圈占国有地 天皇制更通过改革地税，接收旧幕府和各藩的广大山林原野，列为国有土地。改革地税虽然承认人民的土地所有权，但不过承认人民过去一直缴纳年贡，而且自己能证明是自己“所有”的水、旱田地、房屋地基及其他土地的所有

权，而山林原野等人民不能证明是自己“所有”的土地，则一律划归国有。一村或数个町村共同砍伐劈柴、割取杂草或采伐木材的入会地^①也以种种借口收为国有地。又有很多有土地的人，因为害怕国家承认私有权而取得地契后被征收重税，只好忍气吞声让它收归国有。

这种掠夺山林的“圈占”一直继续到 1899 年（明治 32 年）。同年，政府对人民的反抗实行让步，暂时停止圈占，并将错占的民有地“归还”，但至第二年，国有和天皇领有的森林面积仍有一千五百十六万町步，约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 70%，民有森林不过五百五十万町步。而且国有林包括木曾的桧树林，秋田、高知的杉树林等，是日本最好的森林，也包括经营农业所不可缺少的割草、砍伐劈柴的林地等。一旦划归国有，农民在旧幕府时代还能自由使用的山林，现在连树枝也不能砍伐了。全国不断地发生以盗伐官有林的罪名被关进牢监的事件。

这种直接继承封建领有并扩大了国有地，

^① 日本农村有所谓入会地制度，划定一部分原野山林，作为全村居民共同采伐柴草的公地，名为入会地。——校者

不仅是天皇的直接财政基础之一；同时，阻碍着日本农业的近代化，以及牧畜和其他土地的利用，对于使农业束缚在半封建的零细的稻作经营方式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扶植寄生地主制和原始积累 改革地税的另一意义，即对寄生地主增加土地开了方便之门。

据推测当时全国的耕地约有三分之一是租佃土地，而改革地税时并没有将租佃土地交给耕者，原封不动地确认了地主的所有权。佃农人身仍旧有一半隶属于地主，而且必须向地主缴纳相当于全年收获量 60% 以上的实物地租。政府则把地租作为地税的源泉，认为佃农决不可拖欠地租，乃用国家权力保障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幕藩时代领主曾不满地主的中间剥削，而现在地主却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培植。天皇制最下层的区长、户长即来自这个阶层。

改革地税时政府公布的调查实例中曾记载：佃农耕种一反步水田，生产总价值中的 34% 被征为地税、村费，34% 归地主，佃农所得不过 32%。根据幕末几个地方的平均调查，其比率是 37% 属领主，24% 属地主，39% 归佃农所有。两

相比较，改革地税后，领主征收部分减少了3%，佃农减少了7%，都成为地主的增加部分了。此外有些地主在改革地税时，利用其户长或区长的地位，或将公地据为己有，甚至于将抵押地也无理地攫为己有^①。而天皇制政府则支持地主的霸占。地税是固定的，如果米价上涨，地主便能从这二者的差额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富农固然不必说，即对于一般自耕农来讲，承认土地所有权对他们是很有利的。这便是天皇制政府对农民的让步。中农以上和寄生地主同样能从固定的地税和米价昂贵的差额中获得利益。然对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小农、贫农说来，征收与旧时代相等的货币地税是没有任何好处。尽管地税率有了减低，然而较丈量多出来的土地和隐匿田被

^① 著名的例子，如神奈川县小田原附近真土村，有名松本长右卫门的区长兼户长的地主，将冠弥右卫门及其他村民六十余人的抵押土地，共计二十五町步，冒称自己所有，报在自己名下。冠等请求小田原警察署调解，要求归还土地。因有许多第三者出来证明，并攻击地主的蛮横无理，小田原警察署乃劝松本归还土地，松本不听。于是冠等向横滨法院提起要求归还土地的诉讼。虽然第一审原告胜利，但松本上诉，原告终于败诉。被害人等在激怒之下，捣毁了松本的住宅。从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人民直接的压力，天皇制便完全站在地主方面。

揭发,并课以各种新税,当时农民对此有如下的批评:

“虽然口头上说天子亲政,让百姓过安乐日子,但自维新以来,什么都加上了税,因而民间讥笑说:大约天皇近来正患气喘病,不然,为什么老是‘税,税’喘个不息”^①。“地税改纳现款对农民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因为农民很少能经常蓄备着税款,商人们熟悉农民的弱点,到了缴税期就压低米价,趁机牟利,农民又无法摆脱这种剥削。领取地契时还要缴纳印花税、调查费以及其他种种理由不明的费用。因而无论政府怎样说地契是保证土地所有者的法律,但根本上是为了满足贪欲而设立的苛政,这是无法掩饰的。结果,这种祸害都落在人民头上,给世上造成了莫大的痛苦。”(小川为治:《开化问答》,1874年出版)

改革地税,从小农看来,似乎是把行将被地主、高利贷剥夺的土地暂时给了他们。

而佃农在这次改革中,甚至于连表面上的暂时的利益也没有得到;相反地,如上所述,被剥削的程度却更加重了,不仅耕种权没有得到保证,永

^① 按税与喘两字,日语发音相同。——译者

佃权也被限期在五十年以内了。

改革地税最后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被当作使封建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而强制推行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农民被迫全面地卷入货币经济，一方面他们的财富被国家当作税款吸收去，以经营国营企业、保护特权商人、培植资本主义工业；另一方面，不外是使很多的小农没落，丧失一切生产手段，变成资本的牺牲品——工资劳动者。改革地税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扶植资本主义工业 1870年政府的一切政策，在经济上都直接或间接同保护与扶植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如发行太政官札等巨额不兑换纸币，就是国家掠夺人民财富，使特权商人发财。又如上面所述的改革地税，便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职业的自由、迁移的自由，实际上也不过是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而已。整理俸禄，一方面使多数封建家臣集体转化为无产者；另一方面把封建俸禄改发公债，就是说不久也会转化为资本（其转化的基础是从农民手中攫取地税）。义务教育制也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培养与训练必要的劳动力。

为了使封建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除上述一般情形外，政府还采取了直接培植近代工业的一连串的措施。关于发展国内市场的最初政策，前面已经谈过。1872年(明治5年)制定了国立银行条例，以一定的条件，由三井、小野及其他大商业资本家和各地富豪、大地主等创设了拥有发行纸币权的银行。这便是高利贷资本转变为与政府相勾结的银行资本，在扶植资本主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年，三井自己创办了银行(三井银行)，也是以办理官款为主要业务的。

废藩置县后，全国建立起统一的邮政制度。1872年(明治5年)东京、横滨间的铁路开始通车。

生丝是当时的大宗出口品，政府为了改良和增产起见，在群馬县富冈及其他地方建立了国营模范工厂，输入西洋新缫丝方法，并推广其技术。缫丝业是一般民营工业中发展最迅速的，虽然大部分是手工缫丝。但到1876年(明治9年)机器缫丝(但基本上是手工劳动)工场已有八十七处，煮茧锅五千个。到1879年工厂数飞跃地增到六百五十五处。1882年民营工厂总数为二千零三

十三处，职工六万一千零五十二人，其中缫丝业工场为一千零六十八处，职工为三万七千四百五十二人，都达民营工业的半数以上。这些资本家大多数是地主兼商人。

军事性质的工业 政府投入最大力量的产业，就是制造天皇制统治的物质装备，即具有军事意义的产业。最初的铁路建设，也不是单纯地为了经济的需要，主要还是考虑军事上、政治上的需要。以后的铁路建设也一贯是从军事上着眼的。东京、横滨间的电信，开通于1869年（明治2年），1877年（明治10年）电线延长达二千八百二十七英里。最初电信只供中央、地方的官厅和军队间相互通信。到1878年（明治11年）以后才允许民间使用。

政府又接收了以横须贺制铁所、东京炮兵工厂、火药制造所为首的旧幕府和各藩的兵工厂、造船厂，对其中优良的加以扩充，并新建大阪炮兵工厂及其他军事工厂。1871年更建立了赤羽局，开始制造机器。这些工厂都是聘用外国技师，从外国输入机器。此外，又建立了一些国营工厂。

这一时期配称为机械工业的，只是以军事工

厂为中心的国营工厂。日本的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以军事性质出现，到现在还仍然继续发展着。

矿山方面，旧幕府直接经营的佐渡金矿、生野银矿等都照旧归新政府直接经营。1873年政府制订的日本矿业法，规定一切矿山的开采权属于政府，并将佐渡、生野以外的院内银矿、釜石铁矿、三池煤矿、高岛煤矿等收归国营，目的是确立绝对主义的财政基础。在经营上则聘用外国技师，输入外国机器。这些国营矿山的工人是丧失了土地、没有生活出路的流浪者，被骗来干着最残酷的苦役。因此，高岛煤矿便在1872年（尚未归国营，由英国经营）发生矿业暴动。到了1873年改为国营后，则使用囚犯劳动，一般工人也与之同样地从事于比古代奴隶还不如的苦役。最新的文明技术和最落后的奴隶劳动，象征着天皇制下日本资本主义的姿态，而且不只限于原始的积累时期。

大商业资本和政府的勾结 这些国营工厂和矿山，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成绩。但政府为了扶植军事工业，不惜浪费人民巨款。军事工业以外的工厂、矿山，等到设备齐全，日本的技术家、工人能够操作并能获利时，即1880年便转让给与政府高

官有勾结的特权商人了。这一政策，具有以人民的税款帮助大商业资本家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的内容，在政治上则是为了使他们成为政府的支柱。

大资本家和政府的勾结在逐年加强。三井由于采取了与政府金融、财政政策表里一体的活动而迅速地成长起来。旧土佐藩土岩崎弥太郎(1834—1885)在废藩时以承担藩的一切债务、债权为借口，将原来属于土佐藩应该改归国有的轮船，据为己有，设立了“三菱公司”，专营运输。1874年(明治7年)政府派侵略军赴台湾时，为了军事运输购入的十三艘轮船，曾交给三菱公司负责运输。但战后政府仍将轮船免费借给三菱使用，并给予各种补助费，予以莫大的保护。三菱便很快地垄断了日本近海航路，后来成为三菱大财阀的基础就是这时确立的。

这种保护航运政策，不是由于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上的需要，而是因为天皇制企图向海外侵略，须保有作为海军预备运输队的商船队。因此，从便于战时动员出发，乃将商船队委托于一个特权资本家了。这是为了扶植军事性工业必然和垄断特权商勾结的典型例子。

特权商人和政府的勾结，在矿业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政府虽然将全国的矿山权收归国有，禁止民间开采，但如别子铜矿那样日本最大的矿山，从德川时代以来就由住友经营。然而由于矿山原为幕府所有，政府本应没收或卖给住友，或以相当代价出租，但却糊里糊涂地变成住友的私有财产了。住友财阀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日本就是这样，以天皇制国家对农民的掠夺为基础，从封建经济转化为半封建的、军事的、特权商人的资本主义。

第二篇 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 自由民权和天皇制

第一节 农民斗争和自由民权

废藩后的人民起义 新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统治、建立征兵制常备军、进行军国主义以及保护特权商人，这一切形式上似乎是新的，实质上则不外加强封建剥削。人民原来对维新政权抱着无穷的希望，现在处处落了空。因此，从废藩以后 1871 年（明治 4 年）起到 1874 年，人民到处蜂起，展开了反对天皇制的斗争^①。其规模的巨大和

^① 这些起义中虽然也有挽留旧藩主的反动要求，但规模最大的广岛县起义（1871 年 8 月），实质上的要求，也是反对新政府加重负担，弹劾新政府爪牙庄屋等的舞弊，并捣毁了很多庄屋的住宅。

又起义中有几次是反对废除身分差别制。上述福冈县起义就曾袭击了两处特殊部落。北条县（现属冈山县美作地方）数万人的起义也残酷地捕杀秽多。这说明人民长期受了封建统治者分裂政策的毒害。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主要要求，也是反对征兵，反对设立学校以及要求减轻负担等。

斗争的激烈都是空前的。

据记载，1871年发生二十四次起义（其中废藩前仅三次），1872年为十六次，1873年三十六次，1874年则为十三次。其中一万人以上的大起义有十一次，有六次是集中在1873年。尤其在本州的中国和四国、九州^①，曾连续发生数万人的起义，反对征兵制和设学校。反对征兵制的起义就有十五次（反对地稅的起义发生在改革实施期）。这些起义中最大者为1873年6月福冈县嘉麻、穗波两郡的三十万人历时九日的起义。这是因为米价高涨而引起的。起义者捣毁或焚烧了酒店、油盐店、粮店、高利贷业以及其他富户共约四千家，袭击了数十处官厅和学校，最后拥至县厅，将县厅焚毁。

以反对征兵为主要要求的高知县“压榨起义”，也曾反对废除身分差别制。他们说：把人民变为秽多有何好处？他们认为废除身分差别制是把农民降为秽多。政府的各项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人民遭到更残酷的剝削与压迫，因而使人民对于废除身分差别制也抱反感。当然，造成人民这种分裂，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当时人民政治上的幼稚。

① 日本称鸟取、岛根、冈山、山口、广岛等县地方为中国，香川、德岛、高知、爱媛等县地方为四国，福冈、大分、熊本、宫崎、佐贺、长崎、鹿儿岛等县地方为九州。——校者

这些起义的动力，不是因米价高涨获得了利益的人，而是受苦的贫农、雇农和半无产者，中农也广泛地参加了。地主一般地没有参加，但也有个别被迫参加的。1872年（明治5年）末大分县白杵地方爆发了大起义，达十三日之久，仅受处分的就有两万八千人。起义民众不仅向县当局提出反对屠宰牛马、降低物价、反对没收公地、减轻年贡、用政府纸币公平收兑旧藩札等要求，并要求释放两年前（1870年）因起义而入狱的人。起义者焚毁了县政府和町、村公所的各类文件，并捣毁了高利贷与富豪家。“附和随行者”两万六千余人中，有一百六十五人是町村长、保长，因参加起义被开除的士族也达一百四十人。町村长多数是在村民的压力下被迫参加，即所谓真正的“附和随行者”，而不是起义的领导人。

一般的町村长、区长等，由于他们是天皇制政权的最基层，在村内负责征兵和义务教育，所以必然和村民对立。又士族经常被召去镇压起义。这也说明了士族仍然是天皇制最主要的社会支柱。尽管士族也对政府不满，政府也整顿士族，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族和天皇制的对立还是次要的

(但不能把每个士族出身者和士族阶层混为一谈)。又当时士族仍然领取俸禄,从这一点也说明它仍没有失掉领主阶级的性质。而士族的领主性质通过整顿俸禄逐渐丧失的过程,就是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作为天皇制社会基础的成长过程。

建议设立民选议院 人民激烈的反封建斗争,迫使大久保利通等官僚也以安内为急务,坚决反对西乡、板垣等的征韩论,成为阻止 1873 年(明治 6 年)大规模侵朝战争的基本力量。前任参议板垣退助等因征韩主张失败而下野,于 1874 年 1 月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议,其中也曾提及,由于“有司(官僚)的专制”,“国家有土崩瓦解之虞”。即为了对付人民的斗争,维护天皇制国家,只有开放天下公议,设立民选议院。在建议书上签名的有和板垣同时下野的征韩派前任参议后藤象二郎(1838—1897)、江藤新平(1834—1874)、副岛种臣(1828—1905)。后藤一向是板垣的同道,江藤和副岛则因出身于佐贺藩,受萨、长藩阀的排挤,不满意而签名的。副岛以后没有为自由民权运动作任何贡献,江藤则回到家乡,被最反动的士族所拥立,发动了头一次士族叛乱,致被处死。

板垣以及他周围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片冈健吉(1843—1903)、小室信夫(1839—1898)等是这个运动的推动者。他们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建议,同时又在报纸上公布,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政府派学者群起反对,认为在人民无知无识的今天,设立民选议院,为时尚早,但他们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并且有很多人起面批驳这些反对论,表示支持板垣。其中大井宪太郎(1843—1922)化名马城台二郎,以犀利的笔锋,为维护民选议院的主张展开了笔战。

通过这种激烈的论战,民选议院的思想迅速扩展到知识界。板垣等在提出建议的同时,认为“保卫人民的通义权理”^①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并组织了“爱国公党”。“爱国”(人民爱自己国家的意义)一语,就是这时候产生的。板垣、片冈在他家乡土佐创立“立志社”,倡天赋人权论,认为政府是为保障人民的权力而设,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政府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对青年进行政治教育和团

^① 所谓“通义权理”和“天赋人权”,含义大约相同,就是说人皆具有平等共通的意义(价值)和权利。权理和权利,皆译自英语的 Right,即人类生而赋有平等权利的意思,为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原理。

结工作。小室以同样的宗旨，在德岛设立了“自助社”。其他各地也出现了同样的团体。

当时二百数十年的幕府被推翻了，大名制也废除了，正是一个改革跟着一个改革的时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充满着革新思想。有的在儒教“易世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倡共和制，有的则从西洋书籍中了解“自由”、“民权”的理论。福泽谕吉(1834—1901)发表名著《劝学篇》十七篇，以“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为开头语。每篇都发行了二十万册以上。这时期，宣传政府政策提倡“文明开通”^①的小册子，也不得不说政府是为保护人民而设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以这样的时代气氛为背景，民选议院建议案一旦出现，所有不满政府的人都起而响应，竟倡自由民权之说。

^①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输入，欧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来，视为“文明开通”，受到尊重。男子剪掉盘髻，改梳短发，本是为消除按身分装饰所必须采取的举动，却说成是从文明人的卫生观点出发。又大肆宣传说，遵从国家采用的阳历(1873年1月1日起)，是文明人或开通人，仍用旧历则为野蛮的守旧派，以及什么文明人吃牛肉等等。并出版了很多小册子，宣传政府各项政策，尤其是大多数人所反对的征兵制、义务教育、改革地税等，说是文明国家应有的制度，开通的人民不应该反对。

上流社会的民权说 板垣等理想中的民选议院，是要求给予士族和富农豪商——以前首倡勤王的人就是从他们里面产生的——以参政权。这虽然是天皇制内部改良主义思想的“上流民权说”，但它不仅代表富农豪商的要求，也广泛地反映了民众的要求。1875年(明治8年)2月，立志社以及其他同样地方团体的代表在大阪集会，将“爱国公党”改为“爱国会”，在全国展开了宣传运动。

政府大为震惊，再将板垣拉入内阁，5月公布诏书，将“逐步召集全国人民的代表，由大家公议，制定法律”。并召开了地方官会议。各地的志士又向地方官会议提出设立地方民会的要求，但政府仅设区、町村长会议以作代替。以致舆论界猛烈地攻击专制政府，出版了《评论新闻》(1875年4月创立)、《采风新闻》(同年11月创刊)等急进报纸，进行了必须推翻专制政府，自由要用血去争取等强有力的宣传。

自江藤新平佐贺叛乱以后，反动士族的叛乱，逐渐走上了有组织的武力反抗。这些宣传里面，有的就企图将士族叛乱宣传为合理。因为当时自由民权已经成了时代的口号，其力量之大，连士族

们也借口人民有推翻专制政府的革命权，以此为理论根据，表示自己的立场正当合理。1875年7月政府颁布谗谤律、新闻条例，对言论的压迫，比德川时代还厉害。虽是板垣也不能再留在这样的政府中，年底便辞职了。

士族叛乱和反对地税改革的起义 1876年（明治9年）3月，禁止士族佩用标志荣誉和特权的佩刀，8月取消他们的俸禄。于是反动士族的愤怒达到了顶点。10月首先在熊本发动了名为“神风连”的攘夷排外主义的士族叛乱。与此相呼应，福冈县秋月的士族也蜂拥而起；山口县的士族也在萩举兵。最后，被称为不满士族本部的鹿儿岛也开始蠢动，大有西乡隆盛一旦崛起，全国二十余县的士族即将闻风响应之势。

西乡自征韩主张失败而下野后，和同党士族一道，不服从中央的法令，也不向中央缴纳县内的租税，把县当做自己的领土，形成了自己拥有军队和士官学校的地方军阀政权。1877年（明治10年）2月，西乡终于被县内士族拥立，没有提出任何起兵的名义，发动叛乱（西南战争）。其兵力总约四万人，前来讨伐的政府军则有六万余人，经半年的

激战，西乡派终于被击溃。其他地方的叛乱也都未得逞。想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纵使有大西乡的德望和萨摩士族的勇猛，也只有走向灭亡。

这时又由于改革地税引起了各地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爱知县东春日井郡四十三个村的民众，从1875年末到1878年初，因反对县长擅自规定的地价（县长以“违反者则视为朝敌，连同他的家属放逐出国”相威吓），进行了两年多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从1875年末到1876年初，鸟取县一百五十九个村也曾起而反抗官府擅自确定的地价，结果，因为一部分村庄被攻破而失败。

1876年5月，和歌山县境内两郡人民为反对官府擅自规定的地价曾发动起义。继而在11月茨城县真壁郡和那珂郡也爆发了起义。同年12月由三重县开始，一方蔓延至爱知县、岐阜县，另一方扩展到和歌山县，发生了波及邻近四县的大起义。这次农民起义，比1873年福冈县的规模更大，而且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他们不烧毁民房，尽最大努力不侵害人民，但是，凡是有官家名义的东西，便一律予以捣毁、焚烧，并仔细地搜出各种帐簿、文件尽行烧毁。继而进攻町

村公所、学校以至县府、法院、兵营等政府权力机关，更烧毁监狱，释放全部犯人。但最后终被士族军队和守备的正规军镇压下去了。

福冈县的伊达、信夫两郡也发生动摇，其他各地也有起义的征兆。如岛根县那贺郡的佃农在改革地税时，就曾发动要求减轻地租的起义（1875年10月）。

象参议大久保利通这样的政治家，对反动士族的反抗，连西乡派也不畏惧，但看到民众起义的发展，则大为不安。政府终于在1877年1月4日，将地税率降低为地价的2.5%，其附加税率则从三分之一减低到五分之一（总的说来从4%降低到3%）。民众歌唱着“竹枪咚咚咚，撞出二分五”，确信自己的力量了。

减轻地税发表后，富山县砺波郡四千佃农向县府和地主提出了由国家保证耕地权^①和减轻地

^① 佃农提出的要求：“在地价簿上由佃农签名盖章，以证明是他的永久耕地，防止地主依权势夺回。改革地税本应以平均人民的劳逸为宗旨，实则地主经常安逸，而佃户却劳苦不堪，故不能不使佃户有充分的收入。”又在这些农民伪造的县府布告中，还有“决定废佃农之名，今后改为地主；废自耕农之名，今后定名为土地代价的所有者。”这显然是要求将土地交给农民。（《明治初年农民骚乱录》，富山县）

租的要求。斗争又向“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人民斗争的抬头 随着农民斗争的发展，自由民权也从单纯地反映民众的呼声转变为与民众相结合了。知识分子的天赋人权论和反对官府擅自决定地价的民众斗争相结合，即开始和农民、工商业者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

1877年(明治10年)6月，土佐立志社总代表片冈健吉等准备向天皇提出弹劾政府的建议中，列举八条，具体地指出“陛下任命的政府”政治上的种种乖谬。其中如：专制政治下的征兵令、政府以人民的税款保护特权商人、阻碍工业的发展、地稅过重以及未能修改条约等项^①，都明显地表现了产业资产阶级——他们是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发展产业的——和农民大众的要求。陈情书中又以“如继续这样地压迫和剥削，使民怨愈益积累；反动之极，陛下将何以自处？”拿

^① 建议中对政府使士族陷于没落，表示不满。并谓1873年政府反对“征韩论”，却在第二年侵略台湾，第三年又在朝鲜挑起江华岛事件，指责政府处理的不当，替“征韩论”作辩护。这虽表明立志社还没有超出士族反政府运动的范围，但本文列举各点，则说明他们已开始和民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了。

人民革命威吓天皇；并以“陛下将何以谢天地神祇？”责备天皇。他们从咒诅天皇，逐渐走上了解放自己的道路。

这个陈情书也公开发表了。这时，曾因资金困难一度停办的爱国社又重新建立起来，并于第二年即1878年（明治11年）11月在大阪召开第一次大会，全国的代表委员出席的达数十人。产生了由全国政社联合起来的全国性的领导组织。自由民权斗争开始发展为人民的斗争。

农村中，凡是实行地税改革的地方，都爆发了反对官府擅自规定地价的顽强斗争，并与自由民权运动相结合着。

杉田定一（1851—1929）出身于越前的富农家庭，过去任《采风新闻》记者，因撰文攻击专制政府曾被捕入狱。他在出席爱国社大会后回到家乡。当时该县知事正实行决定地价，也说“不服从官府评价者应视为朝敌，以放逐出国”威吓人民。杉田反抗这种压迫，领导越前七郡农民，进行了反对官定地价的斗争，并获得了胜利。他起草的不遵守县知事强迫定地价的理由书第三条写道：“所谓官、民，同样是人。同样是人作的事，就没有说人民不

对，官就绝对不错的道理”。这样，人类平等的主张便和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越前的自由民权斗争便从此发展起来。凡自由民权发展的地方，大体上都发生了同样的农民斗争。

农村以外的地方，当时也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人民斗争。爱国社召开大会前三个月，即 1878 年（明治 11 年）7 月，九州高岛煤矿（三菱经营）曾爆发了三千矿工反抗奴隶劳动的大暴动。

同年 8 月 23 日，东京发生了震惊专制政府的大事件。皇宫附近竹桥兵营的近卫炮兵第一大队二百六十余名士兵，在士兵三添卯之助、小岛万吉等领导下发动叛乱。这次事件的真相虽尚不清楚，但据政府发表的材料中谈到，士兵对前一年西南战争的恩赏没有把士兵包括在内，以及战后的减薪，甚为不满，屡向官长控诉，又被拒绝。因而不仅近卫炮兵，连东京镇台的炮兵也动摇了。终于在 8 月 23 日夜，竹桥炮兵的士兵起而杀死值班军官，拖着大炮走出兵营，首先向兵营前大藏大臣官邸开炮，继而奔向赤坂离宫。他们曾计划和近卫步兵联合，烧毁皇宫，逮捕各大臣，但事前被政府探知，未能和步兵共同行动，叛乱者立即被镇压下

去。三添、小島等五十三人被枪毙。

旧日本军队的革命叛乱，以后从未发生。关于士兵烧毁皇宫，是单纯为了逮捕慌忙跑往宫内的大臣们，还是对付天皇本人，以及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任何材料能使我们了解。但这次事件决不只是由于对赏赐的不满而引起的。它的背后可能有了自由民权的思想。我们从片断的史料中，也可窥知这次叛乱，事前是有计划的。此外，当时除东京各部队之外，驻大阪镇台的炮兵队、宇都宫分营、熊本镇台士兵也发生了动摇。

自由民权斗争就在这种情势下发展起来了。1879年4月政府设置了府县会，并把它宣传为似乎是自由民权派所要求的地方会议。其实它不过是为了想利用地方人民代表同意的形式来征收地方税的机关而已。因为就是县会否决县知事提出的预算案或法案时，县知事仍有权执行原案。继而在同年7月，中央政府给县知事以禁止议论国家政体的政治结社和演讲会的权限。

尽管这样镇压，政治结社还是遍及全国各地。同年11月爱国社第三次大会，有十七个府县的政社代表前来参加。会上，福冈共爱社的代表平冈

浩太郎（玄洋社的创立人）主张建议政府修改条约、开展伸张国权的大斗争；与此相反，片冈健吉则以开设国会为当务之急，认为不确立民权，集结民力，在专制政府之下不能修改条约，如果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会分散目标，而加以反对。讨论结果，片冈派的战略被采纳。这时他们已与两年前不同，扬弃了士族的国权主义因素，成为纯粹的民权派。以后平冈脱离民权运动，变成了天皇制侵略主义的别动队。清除了国权派，使民权斗争更加前进了一步。

第二节 自由党的成立

第一次胜利 1880年（明治13年）3月，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大会，参加代表计一百十四名，代表日本全国，从熊本到岩手，二府二十二县八万七千余名社员，改爱国社为“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并决议不再象过去那样，单纯向政府或天皇建议，而改为请愿，要求天皇开设国会。但政府不承认人民的请愿权，未予接受；而且制定集会条例，并命令警察蹂躏人民的政治结社与言论自由的权

利，于第八条规定“不得为议论政治而发表言论、派人宣传、散发煽动群众的文件以及通信”。因此，就使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完全不能进行了。但是自由战士们的斗争，并未因而削弱，仍进行秘密联系。

同年又预定改革地价，但当时由于支付西南战争的战费引起通货膨胀，米价连年上涨，以这般高昂的米价为基准而改革地价，农民大众怎能忍受得了！农民这种心情也影响了经营地主和富农。又自爱国社重建以来，自由民权的领导者虽然是知识分子、地主和没有特权的资产阶级，但这时候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一般都是一个人兼双重身分，而且已经不是纯粹的寄生地主，而是经营地主。

他们从固定的地价——地税和不断上涨的米价间的差额中获得利益，并企图进而发展为富农经营。从1874年（明治7年）到1881年间，西洋的种籽、树苗、农具、农法等相继传入，养蚕、制茶也在积极进行改良。这些都是要求发展为富农的自营地主和工场手工业资本家的努力。而阻碍他们发展的就是专制政府的高额地税。政府牺牲人民的利益，却将这些地税用于保护特权商人以及

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官僚制。这就是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农民进行废除封建地税和土地革命的斗争中被推动而参加自由民权斗争的经济基础。虽然他们和农民有对立的一面，但这时仍和农民大众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在这种情势下，不利于农民的地价改革，终究行不通。1880年（明治13年）5月，政府宣布再延期五年。延期之所以可能，就是自由民权斗争初步的胜利。延期不但防止了地价作不利于农民的调整，还促进了作为地税标准的法定地价与实际的高额地价分离，和1877年（明治10年）的减税相结合，起了削弱法定地价封建性质的作用。

设立国会的诏书 在初步胜利的鼓舞下，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和各地的政社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二次大会是在第一次成立大会后八个月，即1880年1月在东京秘密召开。这期间加入同盟的，比上次大会几乎激增了一倍，达十三万余人。大会曾就实现开设国会的方法进行讨论，其决议已不是向专制政府请愿，而是以人民的实力来争取了。“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人民的国土，难道我们人民没有要求在自己国土上设立国会的权限么！”

已成为实践人民主权的原理了。大会还决定在下次大会上各人都带宪法草案来。在会后的恳亲会上决定了“遇害同志遗族扶助法”。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他们抱定革命决心的雄姿。

次月，土佐的植木枝盛(1857—1892)等，以建立全国性斗争的统一领导部为目的，组成了自由党筹备会。该会盟约(纲领)中，只字未提及天皇或皇室，只揭示了扩大日本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谋求国家的进步，增进人民的幸福，全国人民平等，树立立宪政体等。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只字不提及增进皇室尊荣的，除自由党筹备会和翌年正式成立大会的宣言外，从未有过。人民主权思想和增进皇室尊荣，二者本不能两立。

政府一方面加紧镇压；一方面从1880年春起暗中征询各参议对于制定宪法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人民的不满不足为虑，有些人则承认政府的危机，主张他日应从上而下制定适当的宪法。仅参议大隈重信一人主张即刻制定宪法，于明治14年(1881年)实行选举。

大隈又暗中的在自己的机关报纸上揭露了当时政府欲将北海道开拓使的公有物，以不到时价

10%的不合理的贱价（而且无利息，分十五年付清），卖给萨摩藩阀的特权商人，加以指责，煽动舆论，攻击腐败政府。大隈想以此掩饰自己与三菱的丑恶关系，压倒萨摩藩阀的势力。

然而舆论却远远超越了大隈的意图，猛烈地攻击政府。这种不满政府保护特权商人的情绪，促使负担重税而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小工商业者和自由民权运动结合起来了。1881年5月全国酒店在自由民权派领导下，在大阪召开了反对提高造酒税的会议。

岩仓等最怕大隈派与自由民权派的联合行动，而且二者的联合和统一又极其可能。1881年10月全国自由主义者在东京集会，商讨组织一个统一的政党。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国会开设期成同盟的盟员，大隈派的自由主义者也出席了。日本全国没有一个府县不派代表参加。政府则阴谋分裂自由民权阵线。其最后一着，就是策划把大隈赶出政府，颁布开设国会的诏书，分裂改良派和革命派，并严厉地镇压不满意诏书的人。因于1881年（明治14年）10月12日，颁布诏书，内容要点：“将在明治23年（1890年）开设国会，颁发钦定宪

法，如有人对此仍怀不满，要求提早，并进行煽动，则当依国法惩治”。接着大隈便被免职。

在通常专为君主装饰仁慈的诏书中，竟以处罪来威吓人民，真可说是空前未有的。但天皇制政府也终于被迫不得不约定期限开设国会。自由民权斗争在政治上取得了初步胜利。然而，自由的斗士是不会满足这种从上而下的钦定宪法的，而且要等待八年之久，夜长梦多，难免不发生什么变化。加以地税也没有减轻。认为斗争刚刚开始，必须奋勇前进。

自由党与改进党的成立 然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分裂政策确实收到了效果。不满诏书的急进派和大体上满意的温和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加上围绕着即将成立的党的领导权问题，也开始发生了个人和地方派阀之争，以致组成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党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急进势力为了单独组成自由党，10月18日首先确定了盟约。在盟约的第一章中规定“吾党应力谋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增进幸福、改善社会”；第二章“吾党应致力于确立良好的立宪政体”；第三章“吾党应和国内与吾党同主义共目的的党派一致合作，以达成吾党

的目的”。以上只字未提及天皇或皇室，也没有国权主义的色彩，而第三章中则表明有意组织统一战线。29日选出板垣退助总理以下的领导者，正式建立了自由党。

九州的自由主义者，最初参加过组成统一政党的协议会，因不满领导权掌握在土佐派手中，没有加入自由党，于1882年（明治15年）3月，单独组成九州改进党。其纲领虽和自由党几无不同之处，但不论从他们以前的或以后的言行观察，都比自由党具有更浓厚的国权主义因素。此外，大阪地方的自由主义者于1882年2月组成了“立宪政党”。该党由于干部的个人关系和自由党合作，但其领导权则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其纲领和下面即将谈到的改进党，基本上站在同一立场。高唱增进“皇室的尊荣和国民的权利”。

东京的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最初参加自由党的，不久也脱党了。他们在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中心，组成“立宪改进党”，领导者有河野敏镰（1844—1895）、小野梓（1852—1886）、沼间守一（1843—1890）等人。《东京经济杂志》主编田口卯吉（1855—1905）也从党外给以支持。改进党

主张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倡导主权属于“君民之间”，实质上它把与萨、长藩阀关系薄弱的、依靠天皇制的大资产阶级（三菱即其中之一）做背景，是绝对主义内部的改良派^①。

与这些自由主义政党、特别是自由党相对抗，出现了名“立宪帝政党”的纯粹政府御用党，提倡主权在君的主张。

革命思想 无论是改进党、立宪政党以及九州和改进党，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大体上都满足于开设国会的诏书。自由党的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等根本都未超出改良主义的范畴，但自由党已成为人民的政党，其主力迫使板垣等也继续前进。自由党不是等待从上而下的钦定宪法，而是争取“民定宪法”（宪法制定会议所制定的宪法），主张主权在民。

据说由植木枝盛于1882年（明治15年）春起草的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案中，以“日本国遵循日本国宪而建立、遵从日本国宪而维持”，“日本人民

^① 河野敏镰说：自由党是“贫民之友”，“不尚气节，而重实践”，“爱少壮活泼之士”；改进党则团结了未加入自由党而抱自由思想的“资产家、学者、老诚之士”。

的建立日本国，其目的，是为了制定法律，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来阐明主权在民。规定由全体纳税者直接选举一院制议会，拥有立法权，国家预算只有通过议会才能成立。行政权属皇帝，但皇帝及其政府不经议会的决议，不能向人民征收分文，或从国库中支出分文。不仅应无条件地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信仰、思想、学问的自由，并明确规定人民有权利抵抗不法官吏和推翻违反宪法的专制政府。比现在的日本宪法更能贯彻民主思想。

政党和支持它的各种报纸，虽然展开了关于主权的争论，但自由党主权在民的主张，却压倒了一切。主张主权在民立场的小册子有如雨后春笋，赞美共和革命的歌曲也广泛地流行着，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沸腾着爱国青年的热血。“共和原理”“共和政体论”等也翻译、出版，提倡普选、一院制议会、民定宪法，夸耀皇统万世一系的天皇主义，则遭到人们的嘲笑。法文学者中江兆民(1847—1901)曾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卢梭的理论，是一位最急进的、有体系的自由民权的理论家。在他的著作中虽未公然主张共和制，

但他在私塾讲课时及遇有其他机会即进行共和主义的宣传。据说“如把自主的主字加以分析，就是王的头上钉上钉子。”这一流行语，即兆民所讲的。

妇女也参加了自由民权的斗争。以岸田俊子（后名中岛湘烟 1863—1901）、景山英子（后改姓福田，1867—1927）等为著名。特别是景山一直斗争到最后，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描绘她半生事迹的自传《我的半生》（1904年出版），是日本妇女政治的、社会的自觉历史的代表，也是自传中的杰作。

俄国的民粹派和虚无主义思想，也渗入自由民权运动之中。它对于以后自由党员走上武装起义有着很大的影响。

随着自由党员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提高，他们团结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思想也加强了。早在1876年（明治9年）自由主义左翼的周刊杂志《近事评论》，就曾反对政府吞并琉球，主张应按琉球人民的要求，允许它独立，并指出只有对这样的弱小国家采取公正态度，才是使日本从欧美压迫下走向独立的道路。1881年4月，当政府为琉球问题想发动中日战争时，《近事评论》和中江兆民主

编的《东洋自由新闻》主张中日两国无论是在历史上、地理上都具有不可分的关系，当此两国同受欧美压迫的时候，绝对不应该战争。

1882年（明治15年）7月，朝鲜士兵与市民反抗日本侵略，发动起义时，政府曾大肆进行战争的煽动，但自由党毫不为它所动。尽管当时有象杉田定一那样的人，抱着把亚洲从欧美压迫下解放出来，“征马踏上万里长城，……沛然耀皇威于五大洲”的幻想，但并没有成为自由党的支配思想。甚至板垣本人也在1883年口述的“通俗无上政法论”中，主张为争取亚、非被压迫民族的完全解放和世界的永久和平，应建立“万国共议政府”。

日本人民在自由民权斗争中，才树立起主权在民的思想，认识到为了实现人民的要求，必须建立人民的政党，并具有了人民革命权的思想。其领导者则为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或富农豪商出身的半封建阶层。他们虽然在各方面表现了阶级的软弱性，而且阻碍了斗争的发展，但他们在斗争过程中，首先将革命思想和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在日本人中间培植起来了，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三节 原始积累的强制推行 和自由党的分化

自由党员的革命化 自由党在成立后一年多的期间内，一直在发展着。军部担心自由思想波及军队内，于1881年（明治14年）设置了宪兵科，以监督士兵和人民。次年1月又颁布军人敕谕，强迫士兵奴隶般服从天皇和具有天皇代理人资格的长官。

此外，同年7月，政府又扩大集会条例的范围，适用于学术集会。更在同年年底制定请愿规则，禁止一切关于公事的请愿，只允许就有关私人利害关系的事项，向直辖官府请愿。如与官吏抗辩，强求受理，则处以监禁罪。

在这样加紧镇压和收买政策之下，很多自由党的领导者有了腐化、畏缩退却的表现（下面叙述），但广大的党员仍继续进行着革命的斗争。

自由党员开始直接领导了劳动群众日常要求的斗争。早在1881年6月，平民出身的自由党员柴田浅五郎以秋田县横手町为中心，曾联合农民

和士族约三千人,组成了“立志社”,以实现农民的“救世”要求为目标,计划暴动,但在举事前被逮捕了^①。

1882年5月,大和出身的樽井藤吉(1850—1922)在佐贺县的岛原创立“东洋社会党”。提出了“以平等为主义”、“以谋社会公众的最大福利为目的”等纲领,争取达到土地革命的要求。他们号称有党员三千人,实际上虽没有这许多,但确实吸引了很多农民。党成立后不满一个月,便被政府下令解散,然而樽井高喊“我们不是听内务大臣命令的人”,把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次年1月,终于被处以监禁罪。

东京方面,自由党的奥宫健之(1856—1911)等,于1882年12月,组织洋车夫成立“车会党”。虽然在还没有进行任何实际行动之前,就被扑灭了,但从这里可以窥知自由党走上了组织城市无产者的道路。

福岛事件 自由民权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

^① 根据田中惣五郎《日本的自由民权》。他们的要求虽不十分明了,但起义的旗上书有“改正厚德大元帅柴田浅五郎藤原胜博”等字;这里所谓“改正”,就是普通“救世”的意思。

上各种要求的斗争相结合，终于在福岛县发展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1882年任福岛县令的三岛通庸（1835—1888）曾发出“辖境内不许有一个自由党员和放火强盗”的豪语，对自由主义者进行了种种迫害，但河野广中（1849—1923）等福岛县的自由党员却丝毫没有屈服。三岛为了兴建不急需的大土木工程，向县民征夫征款，引起县民的激烈反抗。福岛县议会在议长河野的领导下，反抗三岛的暴政，否决了加重人民负担的预算案。但三岛则强制执行原案，村长处于县府命令和村民反抗之间，左右为难，竟有三名自杀。

河野等依靠群众的支持，一方面和同志宣誓推翻自由公敌的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则坚决进行废除道路工程的赋役和税款的斗争。11月警察逮捕了河野等，并捏造阴谋内乱罪。其后不久耶麻、大沼、河沼三郡的数千农民也起而暴动。

暴动虽然被立即镇压下去，但这次事件给自由党员以深深感动。使他们开始认识到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专制政府。而且，从这一年起，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急剧变化了（下面将说明其原因），各地都显露了起义的征兆。革命的自由党员在各

地积极地进行活动。

军队中也发生了动摇。1883年(明治16年)2月,据说仙台镇台的下级士兵和下级士官,在以新年宴会为名的集会上,发表了颇为过激的政治演说,致受军法审判。又在这件事发生前不久,即1882年12月,右大臣岩仓具视观察时局就作过这样的判断:“今日的形势恐与法国革命前的状况相去不远。政府所恃的,不过是拥有陆海军,人民则手无寸铁,但如果形势这样发展下去,就不可能保证士兵不背叛天皇政府,把枪口调转来。”其实,这并不是岩仓等为了制造镇压的借口而夸大事实。

干部的机会主义和战线的分裂 政府尽全力进行镇压、收买、分裂等一系列的工作。而自由党的首领们,则与下层党员的革命化相反,趋向机会主义,陷入了政府的圈套。

据说1882年(明治15年)4月,板垣退助在岐阜讲演会上遇刺时,曾掩住伤口喊出“板垣虽死而自由不死”。然而不久,便以考察欧洲立宪制为名出国。这是在外相井上馨等策划下,由三井出钱(其代价是延长三井承包陆军用品的期限),先

收买后藤象二郎，由后藤说服板垣。尽管板垣自己也不知道钱的来源，但在这样紧急关头，党的正副总理一道出国，等于脱离斗争。马场辰猪（1850—1888）猛烈地反对他们出国，并怀疑款项的来源。但板垣则不顾党员的反对，于11月启程了。马场等愤而脱党。于是自由党的干部分裂为左右两派了。

改进党认为板垣的出国是政府所收买，把它作为攻击自由党的好材料。而自由党则揭露改进党首领大隈和三菱的关系。把三菱譬作“海怪”，高喊“杀退”，叫改进党为“伪党”，致力于扑灭它。改进党虽然是改良主义的党，而不是革命的自由民权党，但在推翻萨、长藩阀政府为当前目标的时候，自由、改进两党进行联合斗争是有可能而且绝对必要，但两党都忘掉了共同的敌人，都想把对方打倒。政府以计已得逞，暗中欢喜，更进而利用帝政党以加深自由、改进两党的抗争。

原始积累的强制推行 两党战线分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强制推行原始积累政策，引起了急剧的阶级分化的结果。天皇政府自成立以来到1880年为止，一贯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用发行

不兑换纸币办法攫取人民的财富。到了地税改革完成以后，占租税 80% 以上的地税已经不再征收米而改为现款，数额也固定了，如果再继续通货膨胀政策，对政府反而不利。因为币值跌价，收入几乎都固定了的政府财政，必然要受损失。同时，对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大商业资本家也不利。“金禄公债”^① 虽然因通货膨胀而集中在大商业资本家手中，价格则一直低落，利息非常高，阻碍了对产业的投资。

政府不得不改用整理不兑换纸币、紧缩通货等剥夺人民财富的新办法。1880 年起，政府便开始节减开支，增加赋税（但都是不引人注意的间接税），谋积存现金准备。这一年，以节约为首要任务，将原由中央负担的府县监狱费、工程费等一律移交府县负担，因而给府县以征收地方税的权限（府县议会也因之建立了）。又将过去浪费人民巨

^① 金禄公债。1869 年版籍奉还后，各藩士卒均改称为士族，其后又分为士族与卒两种，到 1872 年废止卒的名称，一部分为士族，一部分编为平民，这就是士族阶层构成的由来。同年颁布征兵令，实行全民皆兵制，虽将士族的职务解除了，但他们依然向官厅支取俸禄。1873 年发行一亿六千余万元“金禄公债”给全国士族，而废止俸禄。——校者

款建立起来的所有国营工厂、矿山，除陆海军工厂外，都相继卖给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澁泽、浅野、五代等特权大商人（北海道开拓使出卖公产案即其中之一）。这不能说政府仅仅是为了节约财政，而是从旧的一般形式的奖励产业，转变为对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的特权商予以保护、扶植的政策。

1881年（明治14年）10月，大隈被排挤之后，松方正义（1835—1924）继任藏相（财政部长），他虽然知道紧缩通货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但他却执行了政府的原计划。将造酒税等各种间接税一律提高两倍以上，并创设新税。另外将附加于地税的地方税，从正税的五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一以上，并尽量加重府县税、町村协议费等人头税（酒店会议、福岛事件就是对这种政策的反抗）。

1882到1883年政府迅速地进行货币的整理、充实现金准备，并降低了利息。于是公债价格高涨，使有公债的大户，如特权商人、银行、华族等的财产变成了稳定的资本。例如1883年创立的大阪纺织股份公司，是由有金禄公债的华族和银行家澁泽荣一（1840—1931）等出资创办的。这就是金禄公债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典型例子。该厂有

纱锭一万五千枚，而同年，其他机器纺织工厂计十三家，共有纱锭不过两万八千枚，两相比较，该公司在当时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又特权商人以几乎等于无偿的贱价，从政府手中买到花费人民巨款所创办的工矿企业，开始转化为产业资本家。

阶级分化和走向寄生地主制 农村陷人极端萧条的深渊。从1882年(明治15年)起，米价开始暴落，蚕茧、生丝的价格也一直在下降，使小规模的手工缫丝业大受打击，丝织品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大批破产。最先是甘蔗和油菜籽，稍后有棉花、漆及其他往日的经济作物，被外国商品所压倒。大机器纺纱工业的兴起，使刚刚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农村土布纺织工业衰落下去了。

另一方面，租税公课的负担也增加了。根据当时农业经济研究者的分析，地税和府县、町村税的合计占每一反步水田收入(从收获的米价中减去最低成本50%以后的余额)的比率，1880年(明治13年)为28%，1882年为37%，1884年飞跃地增加到70%。

农村手工业的衰落，米、蚕茧等农产物价格的

暴落，再加上重税的负担，使中农以下的农民迅速没落。在纳税期，如不以50%的高利借款交税，税吏便会立即扣押土地，实行拍卖。价值百元的土地，最贱时仅卖三十一元。为了避免拍卖，只好抵押耕地。1884年这种耕地抵押的负债总额约达两亿元，约当同年经常岁收总额的二点五倍。因而虽幸免查封，结果，土地还是无力赎回。（参阅小野道雄、土屋乔雄合著《近世日本农村经济史论》）

第1表 历年土地受拍卖处分的人数表

1883年(明治16年)	33,845人
1884年(明治17年)	60,605人
1885年(明治18年)	108,055人
1886年(明治19年)	61,256人
1887年(明治20年)	35,096人
1888年(明治21年)	11,619人
1889年(明治22年)	7,968人
1890年(明治23年)	39,247人
1891年(明治24年)	67,329人

掠夺独立的小生产者，使之没落为无产者，并将掠夺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在极其残酷地强迫进行着。中农、小农的土地就这样地集

中到高利贷和大地主手中。地主并不想在集中的土地上扩大农业经营，而是把它交给借款的人耕种，地主收取约当全部收获的70%的佃租。又这时地主从佃租中缴纳给国家的地税率，由于地价的固定，每反收获量的增加以及米价的高涨，大约减少了相当于全部收获量的12%。这样地主便能够把佃农全部收获的55%左右攫为己有。因而地主何必辛辛苦苦去经营，并冒赔损的危险？

国家以军队和警察保障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不但这样，1884年（明治17年）3月，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地税条例，规定地税为地价的二分五厘，法定地价不变，并规定地价今后亦不变动。于是法定地价和买卖地价完全分离，因而农民增加的单位产量不致再被国家攫取。地主在国家权力保护下，几乎剥夺了佃农的全部剩余劳动。因而确立了地主不从事经营而走向寄生地主化的道路。这样到了1887年（明治20年），全国约44%的水田、34%的旱田变成了租佃土地，全国农户的22%变成为纯粹佃农，45%多少须租地耕种，而纯粹的自耕农则仅占33%。

法定地价和实际地价的完全分离，是四年前

迫使政府延期改订地价以来愈益高涨的农民斗争和自由民权斗争的成果。其利益虽几乎被寄生地主所窃取，但对农民来说，如果自己的努力和创造，能提高生产力，则增产的部分不至算入全部收获中，当作地税而被征收，削弱了地税的封建年贡的性质，使上层农民有可能从国家的半隶农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但是中农以下，由于间接税、地方税的激增，比减轻的地税还多，他们的全部剩余劳动力仍然被国家用强权攫取了。另外，国家的直接剥削虽减少了，但寄生地主制在农业上仍占支配地位，自耕农也受到地主各式各样的剥削，所以小农所处的半隶农的地位，并没有得到解放，依然是天皇制国家的直接对立者。

第四节 自由党的解散和起义

群马事件和加波山事件 1882—1884年（明治15—17年）由于政府激烈地进行了原始积累的掠夺，结果一方面使构成自由党基础的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大众迅速没落，陷于除起而战斗外别无

生路的状态；另一方面使富农和地方资产阶级出身的自由党干部，面对着农民的革命化而感到恐惧，走向与农民对立的寄生地主和高利贷者方面去，这些机会主义者更进一步走上了背叛的道路。

1883年夏到1884年，从关东西北部到信州、甲州以及东海地方的一部分，即养蚕、缫丝、织绸等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发达的地带，没落的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们自称为“借金党”、“困民党”，或称“佃户党”、“贫民党”，向地主、高利贷者及保护他们的村、郡、县政权提出勾销欠债、减轻地租及减轻或废除租税、赋税等要求，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里所说的“党”，虽然还没有健全的组织，也没有纲领，但是抱有同样要求的人们，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经常有共同的行动。

革命的青年自由党员和他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关东之野、东海之滨，壮士勇夫伺机起事的岂止两、三处”（《自由党史》）。他们彼此联络，计划在东北和关东一带发动起义。福岛事件以后，很多年青的自由党员确信只有用暴力推翻专制政府的一法。1884年（明治17年）春，准备参加起义的几达三千人之多。但由于农民分散性，而党

的机关又被抱机会主义的干部所操纵^①，不能形成坚强的统一的领导，大势所趋，只有进行分散的起义。

1884年（明治17年）5月，日比逊等群馬县的自由党员计划动员自耕农、佃农袭击并生俘为参加中仙道铁路通车典礼而集合在高崎的政府高官，进而攻击高崎分营（联队），实行革命，但被政府预先探知了。通车典礼虽然没有举行，但已集合的三千余人，并未解散，歌唱着“忆昔日美国的独立革命，也是农民起义，不流血，自由的基础是建立不起来的”。捣毁高利贷公司，占领了松并田警察分署，但在进攻高崎分营的中途，因粮尽而四散了。领导者被加上强盗、放火、杀人、聚众滋事等罪名，处以十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后来在9月间，发生了加波山事件。福岛事件中逃脱了的河野广体（河野广中之侄）等，正想趁机报复三岛的时候，三岛兼任栃木县令，在这里

^① 1884年6月自由党设立剑道场，名“有一馆”，作为青年党员的训练所。推左派的内藤鲁一为馆长。革命党员原欲把它当作统一的起义司令部，由于干部——包括内藤在内——都抱机会主义的态度而没有成功。

也大兴土木，成为民怨之的。河野等见此，乃和栃木县的同志计划乘栃木县厅举行落成典礼的时候，杀死在这里集会的三岛与其他高官，但未能准备就绪。为了筹集资金在东京行劫，遭到警察的追究。当被追到了即刻起义还是暂时放弃计划伺机再起的紧要关头，河野等自度终归难免要被警察追究，不如趁早决一死战。终乃与茨城县下馆的士族富松正安(1849—1886)等十六人盘据于茨城县真壁郡(1876年发生大起义处)的加波山，举起“推翻自由公敌的专制政府，建立完全自由的立宪政体”的“革命旗帜”。

群众对他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并准备积极地协助他们。警察也没有想到山上只有十六个人，不敢轻易地进攻。十六人曾趁隙下山袭击町屋警察分署。当时群众已用竹枪作武器，准备协助他们，但河野等没有和他们取得联系。又因为山上饮水发生困难，第三天黎明他们退出该地，被警察逮捕。其他未参加起义的同志也都陆续被逮捕。他们被诬为强盗，富松等七人被处死，河野等五人被处无期徒刑，其他七人则被处以有期徒刑，自由党员被处死刑是这时开始的。

自由党的解散 自由党的领导人看到下层党员的一连串起义而惊慌失措。他们害怕灾祸临头，乃以由于政府的严酷镇压，无法展开组织活动为借口，10月29日宣布解散。板垣、后藤、片冈固然不消说，连内藤、大井、中江、植木等也都赞成解散。只有在新潟地方进行组织活动被警察逮捕的星亨(1850—1901)拍来一封反对解散的电报。革命的自由党就这样可耻地结束了。改进党的大隈也想解散，但由于大多数骨干党员的反对，未能实现，仅总理大隈和副总理河野敏镰脱了党。

自由党的领导人放弃了民主革命斗争，同时，也丧失了对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心，在对外问题上，转变为绝对主义的国权主义、军国主义。解散前不久，即1884年(明治17年)夏天，后藤、板垣曾策划乘法国侵略中国属领安南和中国开战的机会，同驻日法国公使及法国东洋舰队司令等联络，取得他们的资金与军事援助，以促使朝鲜“自由主义化”为名，远征朝鲜。这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不过是充当法帝国主义的走卒而已。同时，又把自由党员革命的热情转移到对外战争上面去了。

自由党解散后一个多月，即12月4日，在驻汉城日本公使的策划下，朝鲜发生了亲日派贵族的政变，但仅三天就被朝鲜国王和中国军队镇压下去了。日本公使狼狈逃回。政府利用这次事件，大肆进行打倒中国的鼓动宣传，板垣等追随其后，积极地煽动虚伪的爱国主义，甚至于比政府还厉害，改进党也不甘落后，积极煽动中日开战。这真是日本人民的悲剧。

连左派的杰出领导人大井宪太郎，从1885年春起，也策划朝鲜独立运动。本质上和前一年后藤、板垣等的计划没有什么不同。计划内容是联合同志去朝鲜，刺杀朝鲜保守派大官数人，实行民主改革，使它脱离中国独立^①。但在准备中，出现了叛徒，将苦心筹来的资金在妓院里花光。11月间，长崎、大阪等地的同志全被逮捕了（大阪事件）。这种由于革命运动在国内开展不了，而企图向国外输出革命，并且是依靠专制政府发动对外战争来进行，以激起人民的“忧国心”的错误想法，

^① 使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并不等于是朝鲜摆脱一切外国势力而获得完全独立。大井等也打算使朝鲜从中国独立后，暂时置于法国保护之下。

是由于民权斗争遭受挫折，连大井也认为人民“顽僻透顶”，不能依靠而产生的。

秩父事件 自由党虽然解散了，然而日本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解散后不久，11月1日秩父地方的“借金党”约一万人，在自由党领导下发动了起义。起义前一年，他们就要求高利贷者勾消借债，或允许长期分年归还，并请求郡政府予以支持，不但未被采纳，反而遭到镇压。1884年（明治17年）经济愈益萧条，唯一指望的秋茧行市也落空。正在这时候发生了群马事件，东京、神奈川县境也不断发生起义。秩父地方的人心也跃跃欲试。于是出身农民的自由党员井上传三等便在8月间发动了运动，提出分年归还借款、停办学校三年、减少二分之一的杂税村费等群众性的要求。同过去是赌棍而现在债务累累的农民田代荣助策划起义。

9月20日加波山事件前，井上曾拜访了自由党本部的大井宪太郎，将起义计划告诉他，并请求指导。大井则反对起义，并派门生氏家直国去秩父劝阻。但这时加波山事件的消息已经传来了，民众情绪高涨，氏家也为之感动，积极地参加了起

义。

9月30日以井上、田代为中心决定提出：借款分四十年付清、停办学校、公课村费减半、修改征兵令、暂时减免地租、废除义务劳役以及其他要求。同时，拟定进攻前桥监狱，救出群马事件的同志，袭击高桥兵营，进而进攻东京的策略，并进行了费时一个月的准备。

11月1日清晨，各地农民戴上了白头巾，扎起袖子，拿起竹枪、刀和少数猎枪，参加起义。当夜就组成部队，由田代荣助任总理，石间村的加藤织平任副总理，每村组织了一小队，共组成两个大队。由井上负责财务，并分派了其他各人的职务，更定下军纪。部署妥当后，人民军便开始行动，捣毁各地高利贷者、地主的住宅，焚毁借据和地契，2日早晨进入秩父大宫乡（现在的秩父市），占领警察署和区法院，以县署为大本营。3日政府派来的镇压军（一个步兵大队和三个宪兵小队）逼近大宫，当时人民军的粮食不足，开始混乱。4日主力被击溃，一部分进入群马县，一部分进入长野县佐久地方，与当地民众一道，捣毁高利贷和警察机关，到10日全部被军警镇压下去了。田代、加藤

被捕处死，井上逃走了，过了法律时效后才露面。

饭田事件 秩父事件和福島、群馬、加波山等事件不同，领导权掌握在中农层手中，广泛地动员了贫农、小农和半无产者参加，而且有完备的组织。饭田事件也与此相同。

1882年（明治15年）1月，信州伊那地方的富农和缫丝业中的自由主义者出版了《深山自由新闻》，一时发行数虽达一万三千余份，但到1883年忽然停刊了。停刊的原因虽然不详，但绝不是一般所说的由于资金困难，基本原因可能是由于原始积累的推行引起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发展，使富农与资产阶级和一般人民之间丧失了一致性。但是1883年4月农民櫻井平吉等在饭田町组织了名为“爱国正理社”的自由主义团体，继承了这个报纸所开拓的思想基础。他们从1884年5月起开始支持名古屋同样团体“公道协会”的村松爱藏、川澄德次、八木重治等的主张，计划以武力“改变政体”。村松系毕业于外语学校俄语系，受了俄国“虚无党”思想的影响。八木是1884年6月在名古屋镇台入伍，充当卫生兵。他在军队中争取到中农、贫农出身的士兵同志二百余名，在

军队中拥有组织。单就这一点来讲，它的计划就较秩父事件进步得多了(后藤靖：《饭田事件》，人文学报二)。

但是八木在军队内的活动，并没有坚持到底，8月他将后事委托同志福住大宣等而往东京活动。八木、樱井和村松等集合在东京的植木枝盛家中，由植木写檄文，进行起义的准备。9月间伊那地方的农民起义，一开始便被警察镇压下去了。樱井等劝导这些农民，不打倒专制政府，决不能改善生活，并把他们组织起来。10月，三河、远江连续发生农民起义。11月秩父事件的余波传来，伊那的人民也发生波动。警察借口搜查秩父残党，按户搜查，没收一切武器和刀剑。12月3日爱国正理社遭警察搜查，同志相继被逮捕。

村松等计划在大队的旗帜上写“爱国义党”、“自由革命”、“天诛”，分队旗上写“减轻租税”、“修改征兵令”、“救济贫民”等标语。他们计划广泛地发动斗志高涨的中农、贫民、半无产者，并以他们为主力，由名古屋镇台的同志炸毁火药库，同时杀死所有的军官。公道会的队伍则在破坏监狱后人信州，与爱国正理社队伍会师，正式宣布起义。然

后进攻甲府街，和三千名甲府贫农党一起，指向八王寺，在这里会合全国同志，进占东京上野，以号令天下。事实上他们不仅没有和“全国的同志”，就是甲府的贫民党也没有很好地建立关系。

名古屋事件和静冈事件 在村松策划之外，1884年（明治17年）夏秋之间，名古屋地方的自由党员奥宫健之和富田勘兵卫等也曾计划联络名古屋守军士兵，释放犯人，占领爱知县全境，联合自由党员实行起义。但在事前为了筹措资金，想抢劫岐阜街上的富豪家，杀伤了警察，因而被发觉，10月以后同志陆续被逮捕。奥宫也于次年一月被捕，富田虽隐藏三年之久，也终于被捕。结果富田等三人被判死刑，奥宫以及其他二十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徒刑八年（名古屋事件）。

静冈县的岳南自由党员和远阳自由党员等，曾策划联合各地自由党发动全国性起义，但因看到各次起义连遭失败，乃转而采取暗杀主义。1886年（明治19年）7月，欲趁箱根离宫落成典礼时各大臣集会的机会，一举杀光。但在6月间其策谋便为奸细所透露，遭逮捕者达百余人。首谋中野二郎、中野三郎等二十五人被处以强盗罪（中野等

为了使新同志抱有决死的觉悟并保守机密，预先就想把这些人置于死地，所以故意使他们犯强盗罪)。这是自由党员的最后一次起义计划。

各事件的意义 总括上述各次自由党员起义事件，在秋田事件中，农民起义和自由党员已经直接结合起来了，福岛事件更进一步发展为有组织的政治上的结合。这时富农、豪商还是起义的领导者；到了群马事件，一开头，富农、豪商层便丧失了领导权，而由中农掌握。到了秩父事件，中农出身的民权主义者和小农、贫农的结合则达到高度的发展。饭田事件最有组织性，而且实际上已着手组织士兵，这一点，就是划时代的发展，并和下伊那的农民起义有了结合。这里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中农出身的民权主义者以及贫雇农渐渐结合起来了。

其中加波山事件，有浓厚的报复福岛事件的因素，因而未能把在福岛与群马事件中已经开辟的和民众相结合的道路更向前推进一步，暴露出幕末志士的无组织性。但它在发展武装革命的思想上面具有意义。而失去武装起义希望的名古屋事件和静冈事件，则成为与大众没有结合的士族、

知识分子民权主义者的绝望的恐怖主义。

秩父事件与饭田事件都是以养蚕、缫丝地带的中农、小生产者、贫雇农、半无产者的革命化为背景，因而在各次事件中算最具有组织性。然而在这种场合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进攻附近地区政府机关的准备，但以后的进京计划可以说完全是空想，幻想一旦举起义旗，四方同志便会立即响应。这与其说是个人的不成熟，不如说是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所难以避免的现象。

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即没有工业城市，和在这里初期形成无产者的集团能作革命的据点。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政党已经瓦解，放弃统一领导全国的任务，因而以雇农、贫民为基础的起义还没有成熟到能克服农民分散性的历史条件。但民众则处于不斗争便无法活下去的迫切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只有由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领导斗争，这里必然发生急躁的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不得不进行个别的斗争。

这样分散的人民，同拥有最新式装备的、极端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的军队以及警察作战，必然

要失败。

日本人民虽然具有这样历史的弱点，但是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和生存，为了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革命，别说是监狱和拷打，就是绞架也满不在乎，前仆后继，矢尽弓折，也没有停止奋斗。其革命的思想与实践革命的热情及勇气所发射的不朽的光芒，创造了日本人民最优良的传统。

第五节 天皇制的完成

天皇制机构的整备 天皇政权尽力把民主主义革命淹没在血泊里面；同时，又急急于整理它的机构。1881年（明治14年）在颁布开设国会诏书之前不久，政府已经确立以后日本帝国宪法的各项具体原则。又于1882年3月派伊藤博文赴欧美游历，向普鲁士和奥地利最反动的学者领教了如何披着宪法外衣，而保持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实质。费时一年，到1883年8月才归国。

政府又于1882年2月根据岩仓具视的建议，着手设定皇室物质基础的皇室财产。首先在公地中选择最有经济价值的土地为皇室领地。这样使

1882 年仅有一千一百一十町步的天皇领地，1886 年增加到三十倍计三万一千五百七十四町步，到了颁布宪法时，更加增大到一百一十三万町步，到 1890 年，又增加了两倍以上，达三百六十五万町步。领地的大部分都是象木曾、天城、富士等那样日本最大、最好的森林。其后经过多次整理，至 1940 年（昭和 15 年）除去那些“不要保存的土地”外，有一百二十七万町步的森林，三万九千町步的耕地划为天皇领地。

从 1882 年末到 1883 年初，政府又将日本银行、正金银行、日本邮船公司的官股，即变相的人民税款共八百六十万元，拨归天皇。天皇拥有这些股票，不只是为了有稳固的财产，而且是为了掌握日本的经济命脉。其后天皇又购买支配殖民地的银行和财阀公司的股票，到 1940 年底天皇所有的现款和按买进价格计算的有价证券，共计约有三亿四千万元。天皇就这样依靠掠夺人民的土地和金钱，成为最大的地主和财阀。

政府一方面确立保障天皇绝对性的财政基础；同时 1884 年（明治 17 年）又制定新的华族制度，作为维护天皇的政治的社会的“屏藩”。旧的

华族只是旧大名、公卿身分的称号，新制度则将官僚、军人中地位高的人，和王政复古的功臣（大久保、木户等）的子孙也列为华族。华族中则依其门第或功劳赐给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定爵位为世袭。其目的有下列三项：（一）作为开设议会时建立贵族院的准备；（二）给官僚、军人以荣誉，提高他们对人民的权威；（三）对贵族、官僚、军人、大地主、大资本家及皇室提供互通婚嫁和其他结合的条件。

政府又在1886年（明治19年）改革教育制度，加强从小学以至大学的管理，系统地灌输国家主义、天皇主义的教育，采取的方针是偏重官立学校，压抑比较容易输入自由思想的私立学校。

这期间，以伊藤博文为中心，进行了宪法起草工作。1885年（明治18年）12月，作为宪政的准备，废除旧日的太政官制（职权分为大臣、参议、各省长官三级），创设了以内阁总理大臣和各省大臣组成的内阁，直属于天皇，将军事以外的权力都集中于内阁。同时，将掌管皇室事务的宫内省从内阁中分出，使皇室事务与国务在官制上分开。这与把皇室财产从国有财产中分离开来是同样作法。

此外，又在内阁中设置了不属于宫内省的“内大臣”，掌国家和天皇的印玺，平时负辅助天皇之责。这是为了他日万一政府受议会控制的时候，继续维持天皇及其名义下的官僚专制机关。

民族意识的成长 天皇制政府虽然压服了国内人民，却仍然屈从欧美各国。

随着自由民权斗争的发展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国内市场发展起来了。又随着人民经济联系的日趋密切，民族团结和民族意识也成长起来了。不平等条约对于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与民族意识愈益成为无法忍受的枷锁和屈辱，要求修改条约，完成独立的呼声高涨起来了。马场辰猪早在1876年(明治9年)就在伦敦用英文写了《条约改正论》一文，表明日本人民有决心要将不平等条约修改为完全平等的条约。

1881年(明治14年)9月，横滨生丝商人，为了抵抗在治外法权保护下外商的不公正与横暴，组织了生丝联合货栈，欲将所有出卖的生丝都通过货栈和外商交易，并不经过外商而直接装运出口。外商声明不买货栈的货物作为对抗，于是内外商人发生了全面冲突。

这时，国内生产生丝的资本家，为了援助货栈，竟不顾损失，拒绝与外商直接交易。斗争进一步发展，横滨的收买商（进口商）也和货栈采取一致行动，拒绝与外商交易。神户港的贸易业者也表示合作一致。高松的商业会议所也发来坚决支援货栈斗争的盟约书。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致，经七十余日的苦斗后，终于获得胜利（井上清：《条约改正》）。

当日本民族正在成长的时期，为了实现改订条约，必须完成民主革命，用民主的方式团结全民族的力量。这一点，已如上述，木户孝允等也了解。1875年（明治8年）福泽谕吉发表的名著《文明论概略》中作了系统的阐述。此书立即为数十万人所爱读。自由民权斗争强调不确立民权，难以收回国权，也指出了修改条约唯一正确的道路。然而政府却没有走这条道路，反而加以阻塞。想依靠强大的军备和军事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而压迫邻邦朝鲜、中国；另一面则讨好欧美，企图逐渐完成条约的改订。

井上外相改订条约的谈判和压迫朝鲜 岩仓大使等修改条约交涉失败之后，1876年寺岛宗则

(1833—1893)任外相时，为了达到增加关税和保护国内工业的目的，要想首先收回关税权，但遭到英国等的拒绝。正在这时候，连续发生了外人偷运鸦片，而日本无权处罚；霍乱病流行时，外国轮船不遵守日本的检疫规则等，使人民痛感到只要治外法权存在一天，便无法保障民族的独立和利益，强烈地要求收回法权。于是寺岛便在1879年底辞职，由井上馨继任外相，秘密地和各国公使进行了修改条约的谈判。

井上外相在拟定改约方案时，曾反复地和各国公使举行预备会议，1883年6月提出重要提案：（一）在改订条约实施后五年，全面开放内地，准许外国人在日本内地旅行、居住、营业和不动产所有权等，享有与日本人同等的权利；（二）开放内地，同时废除治外法权；（三）日本法院聘任外国推事，外国人被告事件由外国推事居多数的法庭审判；（四）日本法律依据欧美的原理制定，用英文向外国公布，并接受其审查。

这只是在名义上废除了治外法权，实质上不仅司法，连立法也置于外国支配之下了。这方案比安政条约更加损害了民族主权。井上之所以这

样轻率地主张“开放内地”，就是希图输入外国资本。这不外是井上背后三井等特权商人的要求，企图和外国资本家勾结，以牟取利润。政府也同意这个方案。

另一方面，政府在1882年（明治15年）和1884年，发动了上述对朝鲜的侵略性事变，取得向汉城派兵的权利，要求朝鲜实行“改革”。因之加深了和中国的对立。1885年4月，中、日两国签订了条约（天津条约），规定两国今后出兵朝鲜时，须互相通知。这说明日本的意图，只要它认为有必要，将随时出兵朝鲜。

爱国民主势力的重新高涨 1886年（明治19年）5月起，政府以上述的井上案为基础，在东京和各国举行修改条约的会议。又认为为了改订条约，必须欧化，乃在东京修建一所大楼，名为“鹿鸣馆”，伊藤、井上等政府高官、华族、特权商人以及富豪同各国公使、外商等几乎每天晚上都举行西洋式的舞会。在文化方面也实行了所谓“欧化政策”，其实并不是学习近代的欧美文化，而是文化的殖民地化，这与井上的改革案性质完全一致。

政府的改约草案极端保持秘密。1887年（明

治 20 年)5 月, 内阁法律顾问波阿苏纳 德曾警告政府, 指出如果承认这样的亡国条约, 必将引起日本民族的愤激而导致革命事变。农商务大臣谷干城(1837—1911)从欧洲访问归来, 强烈地反对井上案。政府内部的反对论也高涨起来了。同时, 井上方案也被人民知道, 右翼国权主义者和左翼民主主义者群起而攻击政府。井上外相也无可奈何, 改订条约的谈判被迫于 7 月间搁浅了。

亡国条约案虽然被打消了, 可是井上外相仍安坐在外相的宝座上, 谷农相反于 7 月 26 日被迫辞职, 因而人民反对专制政府的情绪更加高涨。旧自由党左派的林包明等于 8 月 1 日举行了“谷君名誉表彰运动会”。所谓“运动会”就是示威运动。民主斗争采取这种群众斗争形式的示威是从这时开始的。

8 月 12 日板垣退助向天皇呈递长篇意见书, 主张政府放弃专制, 为实现平等条约, 应尽早实施“民定宪法”, 即不是天皇从上而下的宪法, 而是由人民制定的宪法, 减轻重税, 大量裁减常备陆军, 废除华族制度。板垣、谷、波阿苏纳德的意见书, 曾秘密出版, 不胫而走, 流传全国。于是各地以自

由党系的“壮士”、青年和学生为主力，为了争取民定宪法和平等条约不断举行示威、陈情和请愿运动。

9月，政府终于令井上外相辞职，同时，并召集地方长官，指示他们严厉镇压“对钦定宪法有异议者”和唱外交应由“人民公议”的人。又召集全国高等法院检察长和驻军司令，分别由长官给以同样的指示。这说明了政府决心加强镇压；另一面，也表明了争取民定宪法和反对秘密外交的斗争，是如何地高涨起来，威胁了专制政府。

10月，高知县人民代表片冈健吉等向政府提出“言论自由”、“减轻地税”、“挽回外交”三项要求。所谓“言论自由”乃是要求民定宪法的另一形式。这三项要求事实上成了全国民主势力的共同纲领。政府虽然禁止示威游行，但民众却不顾这种禁令，经常举行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12月初全国各地有两千余名壮士来东京集会，其中有人竟秘密地准备了炸弹。其他各地不断出现攻击政府的集会和示威。但从11月底起，从事秘密出版者有六十余人被拘禁，镇压日益加紧了。

12月25日夜，政府仓卒颁布保安条例^①，并即付诸实施。从当夜到次日清晨，以“阴谋发动内乱，有危害治安之虞”为借口，将中江兆民、片冈健吉、尾崎行雄（1859—1954）等出身于二十四个府县的数百人驱逐于远离皇宫三里之外。安艺喜代香等向首相提出反对保安条例的意见书，当场逮捕下狱。意见书上写道：“当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不忍袖手旁观，宁愿进而为法律的罪人，不愿退而作亡国的奴隶”。

侨居于北美的青年爱国者也参加了这次斗争。

这是革命的自由民权斗争的再起，但在保安条例的打击下失败了。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斗争的最后一波。

天皇制的完成 政府扼杀了自由民权之后，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颁布大日本帝国宪

^① 保安条例是1887年12月伊藤博文内阁为了镇压民权运动而公布的反动法令。内容要点：（1）禁止秘密结社与集会；（2）发行报纸及其他印刷品必须经过检查；（3）禁止武器的携带、搬运与贩卖；（4）有阴谋内乱、教唆阴谋内乱或妨碍治安嫌疑的人，禁止在距皇宫或行宫三里以内的地方出入、寄宿、居住，违者严罚。1898年废止。——校者

法，这和八年前政府所准备的宪法完全相同。

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内阁和全体官吏属于天皇，只对天皇负责，对议会和人民不负任何责任。宪法保障了军部和统帅权的独立。

议院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具有平等地位。为数约三百名的贵族、皇族身分的人和全国五千万人民具有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与西欧绝对主义君主政治的身分制议会在本质上是同样的，议会只不过是参预法律的制定而已。而且法律只经议会通过还不能成为法律，须经枢密院（根据宪法设立的天皇谘询机关）的审议、天皇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天皇（乃至政府）则可以不经过议会的参预，以敕令、紧急敕令及其他形式任意制定法律。关于国家预算提案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议会，议会只能审议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而且对于天皇命令的特别经费或既定经费，议会无权过问。

称人民为“臣民”，而人民的权利则附有限制。这时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只有纳国税十五元以上（相当于两町水田的地税）、年在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众议院议员的权利，只有具有同样财

产资格的三十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也就是说这时的议会是地主的议会。

总之，根据日本帝国宪法的天皇制与绝对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尽管附有这些限制，但是宪法确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使人民取得了选举权、被选举权、议会审议预算权的一部分立法权，这就是自由民权斗争的成果。

保护天皇制的最重要的暴力是军队。1890年（明治23年）时，陆军拥有七个师团——包括近卫师团在内、六队宪兵，约一万名北海道屯田兵，共计现役五万三千人、预备役二十五万六千人，海军则拥有二十五艘，计五万一千吨的军舰和十艘水雷艇。废藩置县以来，天皇制最大的努力就是建立军队。

第二个重要的暴力就是警察。颁布宪法时，拥有首都警视厅和散在全国各地的六百九十二个警察署、七百七十四分署、约一千四百个派出所。又在同年颁布的新町村制中规定一点三个村置一派出所。任何偏僻的深山，也都布满了中央集权的警察网。电信、电话首先为军队和警察而建立起来了。

同年天皇政府颁布町村制，合并町村，彻底清除自然村落的残骸，名之为“地方自治”。实际上是为了在宪法实施后，议会（众议院）势力增大，可能打击官僚内阁的情况下，避免中央政局变动的余波影响“地方行政”（内务大臣山县有朋语）。即以町村制作为议会政治下维护官僚专制的据点。虽然说是“自治体”，但其主要事务如征兵、征税、办学校等，大部分须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办事。例如学校的费用由町村支出，而教师的任免和规定教育内容的权利，则完全不在町村。又规定町村长为名誉职无薪俸，也就是说只有富裕而且有闲的人，即除了寄生地主外不能充当町村长。

町村会议议员的选举权只限于直接纳税两元以上（相当于三反步左右水田的地税）的人。因而贫农、佃农没有选举权。这和幕府时代不承认贫穷的水吞、小前的公民权又有什么区别？那时的水吞不负担村费，而现在的没有公民权的佃农则必须按户数比率缴纳。又由于选举权也按纳税额分为两级，规定每级各选出半数的町村会议议员，所以实质上町村会议就是地主、高利贷、商人的会议。次年又颁布了府县制和郡制，其中也规定议

员为两级制。这也是给大地主以特别权利的制度，把地主作为国家政权支柱的制度。

最后，为了树立天皇制的精神支柱，1890年（明治23年）10月颁布了教育敕谕。这是继军人敕谕之后，以天皇直接命令的形式，钦定国民教育主旨，鲜明地表明了专制主义绝对不能离开兵制和教育，充分贯彻了天皇制的基本方针。教育敕谕以忠孝为根本道德，一切道德生活必须统一在战时为天皇英勇奋战和永远保卫皇运。作为天皇教育基本教义的教育敕谕一经公布，日本的学问、思想、信仰就完全失去了自由。

这里所完成的天皇制的物质基础，就是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庞大的国有地、天皇领地、寄生地主所有的土地。天皇制以此为固有的基础，并将天皇制所扶植起来的特权大资本家的资本和国家资本做支柱，这点已经在前面阐明了。

第四章 日本资本主义 的确立

第一节 最初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

社会不安和工人状况 1890年（明治23年）天皇制完成了它的物质基础以至意识形态，并召开了第一次帝国议会，前途正呈现着无限光芒的样子，不料刚刚确立的日本资本主义便发生了最初的经济危机。又由于连年的大歉收，不论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出现了“无业无钱”的贫苦大众，各地都爆发了米粮暴动。暴露了天皇制基础的深刻矛盾。

同年1月下旬，富山市民因米价高涨而发生动摇，继而波及同县东部一带。从春天到初夏，京都市内和京都府管辖地区、三重县、东京等地都发生了贫民与饿死者，引起了社会的不安。从5月末到7月下旬，鸟取、福井、柏崎、下关等处都爆发

了数百人乃至千人的米粮暴动。7月20日佐渡矿山镇相川的矿工与市民两千数百人也实行暴动。相川的暴动是同年米粮暴动的最高峰，结果，经政府出动了一个中队的军队才镇压下去。其后又有若狭暴动、秋田县穷苦大众的暴动，至7月底由于米价低落，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次米粮暴动不只是由于歉收和米价的高涨，而是和最初的经济危机造成大量“无业无钱”的失业者有密切关系的。

1882年(明治15年)至1885年，由于政府强制推行原始积累政策，引起深刻的萧条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呈现了急剧的发展和繁荣。1884年末至1890年底，公司的资金从一千三百四十万元飞跃地增加至一亿八千九百万元，达十四倍。民间的企业热潮，以纺纱业为中心，这期间民营机器纺纱厂和纱锭数从十九个厂五万枚纱锭增至三十个厂二十七万七千枚纱锭，日本式纺纱工场手工业完全走向灭亡，纺织业方面已经机械化了。企业勃兴，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私营铁路，以华族投资受政府特别保护的日本铁路公司——修筑东京、青森间的铁路——为首，如雨后春笋，创办了

很多家。铁路线长度从 1886 年到 1890 年几乎增加了十倍。

这种资本主义产业，是国家和地主迫使农民没落，以从农民手中攫取来的半封建的地租为基础而兴建的国营军需工业，和受国家特别保护而发展起来的私营工矿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产业，集合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强迫他们从事囚犯劳动、奴隶劳动。

例如国营三池煤矿就奴役着两千犯人和与犯人同样待遇的没落农民。1883 年大浦煤矿发生火灾时，尽管当局明明知道坑内剩有二十四名犯人和二十二名普通工人，但为了扑灭火灾起见，竟封闭全部坑口，冷酷地把四十六人烧死在里面。后三池煤矿以几乎等于零的贱价让给三井，继续实行奴隶剥削。三井便依靠这样的剥削，获取巨利，开始从商业、金融业发展为矿工业。三菱也通过后藤象二郎买到国营高岛煤矿，走上经营矿工业的第一步。这里的奴隶劳动特别受人攻击。1882 年爆发了如上所述的矿工暴动。1884 年发生霍乱病时，公司竟残酷地将发病才一日的患者，活活地都放在铁板上烧死。这样死掉或被害了的占全部

矿工的一半，达一千五百名以上。

工业方面，工人状况的恶劣程度也不亚于矿业。民营工场工人从1883年的八万七千人，1890年增至二十四万一千人，其中大部分是从事缫丝或纺织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十六小时，男工工资为一角七分至一角九分，女工则为一角二分左右。就是当时民营的唯一机器纺织厂，每天只得四分钱工资的少女也不在少数。1890年纺纱业的工资，女工平均为八分二厘，男女平均为一角七分（公司宿舍的伙食费每天也需六分钱），而且每天十二小时一班，深夜也在工作。这和外国比较，日本女工的最高工资也不过相当于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然而每个纱锭每年消费的棉花量：英国是三十五磅，殖民地的印度才一百三十四磅，日本则达二百二十磅。这说明日本纺纱工人担负着惊人的沉重劳动。

最初的经济危机 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极端贫困，他们虽然也有缴纳税款等的货币开支，但其生活资料的大部分仍不得不自给自足。又工人状况也如上述那么悲惨，购买力很小。因此，国内市场和发展着的生产力相比较，相对地变得极

端狭小了。

此外，又因为政府保护特权大商人和奖励有关军事性质的特定产业(特别是航运、铁路)，因而各产业部门间显著地不均衡，发展得很不平均。第一是封建的、细小的农业和资本主义产业的不均衡；第二，在资本主义产业中，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农、工、矿业的生产。尤其是地方上的高利贷与中央的寄生在政府下面的银行资本压倒一切部门，获得了异常的发展；第三，在工业部门中，国营军需工业方面，如发明村田步枪(1881年)已接近国际水平，但产业方面需用的机器工具的生产则极端落后。纺纱是机器化的大工业，织布则一般地为工场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第四，出口贸易将近一半依靠向美国输出生丝，如果那里受到打击，整个经济便会发生动摇。这种种便使日本资本主义具有特殊的不稳定性。

加之当时的日本又在不平等条约下，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束缚，而本来就狭窄的国内市场，又被外国商品侵占了。例如1889年(明治22年)棉纱的国产量为二千五百五十一万四千斤，输入量为四千二百八十一万一千斤，1890年国产量增至三

千六百三十一万八千斤，比输入量的三千一百九十万八千斤才略有增加。

上述情况，使 1885—1890 年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和狭小的国内市场间的矛盾益趋尖锐化。而连年歉收、美国的经济危机和银元对美汇兑的暴涨，以致生丝出口激减，这种种也起了加剧的作用。于是 1890 年（明治 23 年）5 月，日本资本主义便发生了最初的经济危机。1889 年棉纺织业成立了“大日本棉纺同业联合会”（简称“纺纱联合会”或“纺联”），而 1890 年纺联便决定减产三个月。又如上面所述，尽管国内市场有一半被外国商品侵占，然而纺织业却在政府保护下很快地便向中国进行倾销输出，因为经济危机，铁路事业过去那样旺盛的景况也消失了。股份公司的额定股本从 1890 年的两亿两千五百四十七万七千元减至 1892 年的一亿九千八百七十四万六千元，其中农业公司资本减少了 45%。

经济危机主要给农产品加工业、工场手工业以打击。缫丝工业的手工缫丝减少了，而机器缫丝则有了增加。又纺纱虽然减工了，但全年操作的纱锭数和棉纱生产的绝对量则增多了，其增加

率也没有减少。这次危机结局是牺牲了小手工业，为近代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只因当时大工业为数甚少，经济危机使大小城市产生了“无业无钱”的贫民；又加上歉收，引起了各地的米粮暴动和社会的不安。

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 从这一年起，贫民问题立刻成为社会政治问题了。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半失业化的贫民窟，较大的报纸杂志曾报道了他们的惨状。农村中，由于“农民疲惫”，也加深了地主和佃农的对立，并威胁着政府。1890年5月，三重县川口村的佃农组织了名“彻交社”的农会，想用团结的力量来要求减轻地租，但被政府解散。又有小林与平，以广岛县为中心，发起了“神代复古的请愿运动”。这是要求象神代那样将土地以及其他的東西平均分配给全体农民的请愿，是恢复神代无君无政府的运动。据说贫民赞成的甚多。同年6月虽被政府明令禁止，但运动至翌年1月仍在继续（其后情况不明）。当然，这就是披着神秘外衣的土地革命和共和制的要求。

不仅贫民问题，1890年工人问题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天皇制政府吸收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的教训,1880年(明治13年)制定的刑法中规定处罚农、工业雇佣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及其他的斗争。1886年(明治19年)甲府雨宫缫丝厂女工一百五十余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这是日本近代产业工人的第一次罢工。两年后发生了上述的高岛煤矿事件。同年创刊的《国民之友》杂志介绍社会主义与社会党的情况。1889年欧洲第一次五一节的情况由酒井雄三郎(1859—1900)在该杂志上介绍过来。同年10月,大阪天满纺纱公司三百余名女工,为了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数日间的怠工。1890年《国民之友》号召工人应立刻团结在同业工会的周围,互相帮助,并作万一时的罢工准备。1892年(明治25年)大并宪太郎等创立了东洋自由党,发起了保护工人制定租佃条例的运动。

当时日本还没有产生社会党的客观条件。然而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迟早也必然会出现,这事好象梦魇一样,威胁着统治阶级。1892年5月,当时最大的政党自由党(旧自由党人在1890年创立的党)发表了这样的宣言:“富者压迫贫者的弊病,日甚一日,其反抗表现为同盟罢工,

或是制定工作时间限制法，这是社会大变乱的征兆。我党的自由主义是使富者贫者各安其分，共享社会福利。进而实现平均共有的社会主义，这是我党与追求自由主义一样所要追求的目的。”

这些情况，说明日本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以农民为主力、城市无产者和没有特权的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集团同天皇制国家、大地主、特权大资产阶级间的对立，开始转变为以工人和贫农、小农集团为核心的全体人民与资本家、地主、天皇制的对立（但尚未完全转变完了）。

第二节 改订条约和中日甲午战争

政党和政府的对立 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大，引起从第一届议会到第四届议会之间，政府对众议院与政党间的激烈斗争。

往年自由党、改进党等各种势力，被保安条例镇压之后，从1888年（明治21年）到1889年初，由后藤象二郎发起，想“大同团结”以对抗政府。但它已丧失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欲团结与萨、长藩阀政府对立的藩阀以外的地主和资产

阶级的政治势力，而挤进藩阀政权内去。等到1889年3月后藤背叛“大同团结”而加入藩阀政府后，大同团结便分裂为大同俱乐部与大同协会等组织。

此后不久，大隈外相修改条约的方案被泄露，其内容是：不无条件给外国以最惠国待遇；仅最高法院聘任外国法官等。虽然较井上方案有所改善，但实质上是用外国法官和预约法典，与井上方案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而又重新引起人民激烈的反对运动。旧大同团结派的两个团体和右翼国权主义的三个团体联合起来推动了整个斗争。但其指导思想是国权主义，已经与民权绝缘了。随着民间反对运动的高涨，政府内部的井上馨（农相）等，因为与大隈派对立的关系，也以用外国法官是违反宪法为理由起而反对。大隈方案终于在10月被葬送了。同时，五团体的联合也宣告瓦解。

后来，自由党系各派经过激烈的派阀抗争之后，于1889年9月成立了“立宪自由党”。这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中改良主义的政党。

第一届议会以来，以自由党为主力，联合改进党，成立了“民党”，提出“体养民力”（减轻地税）、

“节减政费”的口号，猛烈地攻击政府。尽管它已失去了旧日的革命性，但以上述的社会不安为背景，却给政府以威胁。民党集中攻击预算案（几乎没有进行要求政治自由和废除镇压法令的斗争），削减军事扩张费。民党尤其是想通过议会对预算案的审议，对于官吏定员和增减薪俸能确定一个原则，而置官僚政治于议会统治之下。但在第一届议会时，土佐派已经叛变，因之这个原则未能确立起来。

第二届议会解散了。当选举下一届议会时，明治天皇曾秘令政府不要再让上届议员当选，应选出“忠良的议员”，并另拨专款，充干涉选举的费用。于是品川弥二郎（1843—1900）内相便以收买甚至使用暴力干涉选举。但其结果民党仍然取得胜利，民党和政府继续对立着。

1892年（明治25年）12月召开的第四届议会上，民党通过了削减官吏薪俸和建舰费的决议，政府则以宪法为挡箭牌，拒绝削减既定经费的官吏薪俸。假如当时民党联合民众并动员他们，可能给专制政府以重大打击。如上所述，但自由党由于非常害怕“社会党”的幻影，根本不打算动员群

众，反而向天皇提出攻击政府不执行议会决议的陈情书。政府也向天皇控诉议会违反宪法。

天皇把政府与议会的意见交付枢密院审议。枢密院本来是军部、官僚巨头的巢穴。结果，天皇听了它的意见，颁布诏书，大意是：“兼六合掩八纒”^①乃皇祖遗训；而目前形势，建造军舰，确属刻不容缓。决定建舰费由天皇和文武官吏捐献，并指出议会无权削减既定经费。民党便完全失败了。诉诸天皇怎么能得到别的结果！

改订条约和“强硬外交” 在这以前，当大隈方案失败后，1890年（明治23年）2月起，山县有朋内阁的青木周藏（1844—1914）外相，提出了六年后完全收回法权、税权，同时，日本开放内地，不用外国法官，取消预约法典的方案，和英国公使进行了修改条约的谈判。自大隈方案遭到人民的反对而被葬送后，象这样的方案是任何内阁也都不得不提出来的。

当时，英国在远东和帝俄的对立日趋尖锐化，尤其是1891年春，俄国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计

^①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八纒一字”的口号相同，它的意义就是置全世界于天皇支配之下。

划后,更使英国惊慌。当时地中海和印度洋,是欧洲到远东最重要的交通线。英国靠控制地中海和印度洋,以保持它在远东的优势。如果帝俄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英国所垄断的交通线,必将大受打击。因而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前哨,乃希望与日本接近。

这种情势,本有利于青木的对英交涉,但由于1891年5月,发生了俄国皇太子在大津被刺伤的事件^①,青木外相辞职,对英交涉暂时也停顿。继任的榎本武扬外相和松方内阁,表面上将青木方案稍加修改,准备和英国谈判,但尚未开始前内阁便垮台了。由伊藤博文继任内阁,陆奥宗光(1844—1897)任外相。

新内阁在对第四届国会取得胜利后,1893年7月起开始和英国进行改订条约的谈判。这个方

^① 天津事件,因发生于琵琶湖之南,故亦称湖南事件。俄国皇太子为参加在海参崴举行的西伯利亚铁道破土典礼,乘军舰来远东,顺便访问日本。当时日本的国权主义派宣传说,俄国皇太子是为征服日本,而来考察地理形势。警察津田藏三信以为真,故刺伤他。日本政府密令大审院,处津田死刑,以息俄国之怒。大审院长儿岛惟谦(1837—1908)坚持立场,认为不应处津田死罪。为了保持司法独立,拒绝政府干涉,仅处无期徒刑。

案比青木方案又后退一步，根本放弃关税权，只指望五年后收回治外法权时稍加提高税率。因为政府和军部这时正在伺机发动中日战争，并进行了具体的细节准备。又因这个战争需要取得英国的支持，所以政府不能完全收回关税权以影响英国的经济利益。企图侵略邻邦的军国主义，就不惜这样地与欧美妥协。

第四届国会失败后的自由党，转而支持伊藤内阁。改进党虽仍居野党地位，但改进党和政府的抗争已不是要求休养民力、节减政费等内政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和各派右翼国权主义者联系，参加了硬六派^①，主张强硬外交，彻底改订条约，在未达到目的前，则厉行现行条约^②，给外人以苦痛。

硬六派的领导人是贵族院和枢密院的各派国

① 硬六派即改进党、国民协会、同盟俱乐部、东洋自由党、同志俱乐部、政务调查会。——校者

② 例如现行条约规定：外人除外交官和享有特别规定的人，不得在居留地以外居住，或在离通商口岸四日里以外的地方旅行。但这时实际上住在东京、轻井泽或到内地去旅行的人已经不少。如厉行现行条约，外人一定大感不便。厉行条约，正如现代的铁道罢工斗争，运用严格遵守各项运输法规的战术一样。

权主义者,以及长州藩阀品川弥二郎、萨摩海军军阀巨头西乡从道等,并暗中和山县有朋(当时的枢密院议长)勾结。参加硬六派的改进党中的资产阶级,对于日本与朝鲜的贸易,受中国压制,深抱不满;又为了确保朝鲜为日本资本主义稳定的粮食资源地,认为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东洋自由党也参加了硬六派。他们也把反政府的斗争目标转移到对外问题上。硬六派无论对政府进行任何攻击,虽然不会给政府以打击,但政府却恐怕硬六派的过火行动会伤英国的感情,而感到棘手。于是便解散了第五届议会,并解散硬六派中最强硬的大日本协会。

1894年召开的第六届议会中,硬六派仍略居优势。人民反政府的热潮愈加高涨;同时,也摆脱了山县和军部的幕后操纵。不但反对伊藤内阁,并进一步有反对专制政府的倾向。于是政府慌张,山县也同情伊藤,但已无法挽救,5月30日众议院终于通过了不信任案。

日英条约的改订 这时,朝鲜爆发了名“东学党”的一种信奉宗教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为了镇压暴动,5月31日向中国请求援军。日本政府

为了侵略朝鲜，处心积虑，早就作好了中日战争的准备，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极好机会；并认为对外战争可能满足反政府的强硬派。政府既然有了这样的打算，虽经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案，仍不辞职，反而于6月2日解散了议会。

然而政府深恐与中国开战后，俄国出来干涉，自信没有单独抵抗的力量。因此，在作最后决定之前，必先获得英国的支持，所以迫切希望修改日英条约能早日成功。同时，英国也极怕日俄结好，一定要把日本拉到英国方而来，使它与俄国对立。因而日英两国的步调渐趋一致，尤其是由于日本的一再让步，日英改订条约便于7月16日在伦敦签字。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致祝辞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很显然，英国完全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发动战争。

日英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批准后五年起生效（新约未生效前仍照旧约）；（二）生效后，完全废除治外法权；同时，日本全面开放内地，允许英人有在内地居住、旅行、营业的权利（但无土地所有权）；（三）最惠国待遇应以相互平等为原则；

(四)条约有效期间,从生效时算起,计十二年。

根据这个条约,就法权方面讲,日本是亚洲各国中第一个与欧美各国基本上有平等条约的国家。条约中完全没有聘用外人法官的规定,形式上也没有预约法典。不消说,促成日本国际地位提高的基本力量,是人民反对卖国条约的斗争,这一事实毋待赘言。只是因政府为了侵略亚洲国家,想讨好英国,一再让步的结果,才使这个条约还没有完全恢复平等的国权。日本的关税自主权仍未收回,仅特定品种可以提高税率而已。连与法权有关的过去租借地的外人租地权也仍然照旧,除最初规定的租金外,无论是土地及其地上物,都不能再征收任何税金。这显然是租借地(租界)的残余。

从同年到 1896 年,和英国以外各国,在原则上仿照日英条约也签订了新条约,都是从 1899 年(明治 32 年)7 月起生效。

中日甲午战争 日英改正条约签字后九天,即 7 月 25 日,日本舰队未经宣战就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舰队,并予以歼灭。至 8 月 1 日才正式宣战。

在这以前，6月6日，中国政府将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的照会（根据天津条约）送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不放过时机，当天，日本驻汉城公使便将日本出兵朝鲜的事通知中国。事实上日本在两天前早已开始出兵，6月8日前锋已到达仁川。以后日本政府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的要求，欲把朝鲜置于日本监督之下，并拒绝中国共同撤兵的提议。谈判时，故意和中、朝两国玩弄技术，拖延时日，但这些都不外是等待日英条约的改订和争取作战准备时间的手段而已。到了日英条约改订签字后第三天，即7月19日，便命令联合舰队在23日以后自由行动，25日便开始突袭。

如上所述，这是天皇制长期以来策划在亚洲扩张势力的战争。尤其是在天津条约以后，天皇制的最大努力就是准备中日战争。又自1890年经济危机以来，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希望独占朝鲜的市场和资源。但是这次战争的主要推动者，还不是资产阶级，天皇制是名符其实的推动者和领导者。而促成这次战争的经济因素之一，是产业资本对市场的要求，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天皇制寻求“富源”的要求。客观上则是为进行原始积

累而掠夺殖民地。

战争仅仅经过八个月，便以有充分准备的日军获得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因为中国不是以全国力量进行战争，仅李鸿章的北洋陆海军和日本作战；加上中国是封建割据的状态，日本则是这样组织完备的军国主义国家，就造成了它的胜利。

1895年（明治28年）4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下关签订了和约。规定：（一）朝鲜完全脱离中国；（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三）日本获得赔款白银二亿两（约合三亿日元），远远超过日本的战费两亿两千五百万元；（四）以中国和欧美各国所订的条约为基础，迫使中国与日本缔结中日通商条约。根据第（四）条缔结的中日新约，日本不仅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和租界权等与欧美各国同等的权利，还取得了欧美各国不曾有过的权利，例如长江的航运权、日本产业资本在中国商埠和港口的投资权等。当时日本还没有力量向中国投资，但这种投资权以最惠国条款的关系，立即适用于欧美各国。这点在当时与其说对日本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鼓励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英国更为有利。

日本夺取辽东半岛，立即引起了俄国的干涉，俄国诱同在远东和英国竞争的法、德两国，联合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被迫退还，但取得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代价。

这时日本虽仍屈从欧美，做他们的远东鹰犬，但已成为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基本上从被压迫的国家变成压迫别国的国家了。日本天皇制对外的基本矛盾，已不是压迫者欧美和被压迫者日本的矛盾，而转化为压迫者日本和被压迫者朝鲜、中国的对立了。

第三节 机械工业的发展

“卧薪尝胆” 当三国干涉退还辽东半岛的时候，明治天皇对伊藤首相说：“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为晚。”（佐佐木高行著《明治圣上与臣高行》）日本的统治阶级，以抱侵略主义的天皇为首，侵略亚洲的野心更加嚣张起来了。继续扩

充军备,并向人民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强迫人民忍受一切痛苦,再行增税。陆军部的经费,从1896年(明治29年)的七千三百万元增至1903年的一亿五千万万元,达两倍以上。每年预算中的40%左右是直接军事费。

中日甲午战争的临时军事费为两亿两千五百万元,相当于当时经常岁人的两倍以上。完全同德川时代征用军费一样,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压榨出来的(高桥是清《自传》)。由于战费的支出,使资本家大发其财。银行资本的利润率从战前1893年的47%增至1894年的50%,1895年的51%,1896年则增至63%。据说陆军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1837—1928)曾把石子掺入军用罐头中,贪图暴利。实际他所获得的暴利,真象拿石子当牛肉卖,一本万利。

从中国攫取来的三亿四千五百万元,其中两亿七千五百万元,即约75%以上,是用于中日战争的善后事业以及为准备战争而扩充军备(临时军事费七千八百九十五万元,陆军扩充费为五千六百八十万元,海军扩充费为一亿三千九百二十五万元)。从剩余部分中拨出两千万元为皇室财产,

仅以一千万元充作教育基金。牺牲人民而掠夺来的赔款，就这样地几乎全部落到天皇和一部分大资本家手中去了。

这样庞大的战争利润，加上从中国掠夺来的赔款，再加上夺取了广大的土地和市场，以及战后借口“卧薪尝胆”，对人民进行掠夺，以致资本主义工业以国营军需工业和特权商人的资本为首，有了飞跃发展，资本主义也迅速地确立了。

机械工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是首先表现在工厂、公司的总数与资本额二者的增加上面。1893年（明治26年）以前建立的公司和工厂数，1894到1902年间，分别增加了五点二倍和一点三倍。公司的实收资本1903年（明治36年）比1894年增加了三点三倍。各产业部门中资本金的分配，虽然银行资本所占比重最大，但这一时期工业资本的增加率约达二点七倍，超过了银行资本的增加率。又平均每天使用十人以上的工厂总数，1904年比1893年增加了三倍，而其中使用动力机的工厂则激增至五点九倍。至此，日本工业生产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第2表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各业的发展情况

		1893年	1897年
农 业	公 司 数	171	148
	资 本 额 (万元)	254	222
工 业	公 司 数	1,919	1,881
	资 本 额 (万元)	7,825	10,538
商 业	公 司 数	1,848	3,630
	资 本 额 (万元)	3,872	36,002
运 输 业	公 司 数	195	454
	资 本 额 (万元)	9,034	16,468
计	公 司 数	4,133	6,113
	资 本 额 (万元)	20,986	53,250

(根据《帝国统计年鉴》)

纺织与缫丝业的发展 民营工业中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1903年纺织业的资本额、开车的纱锭和产量,都比1893年(明治26年)增加了三点六倍以上。但是工厂数则以1899年的八十三处为最高,以后逐年减少,而每个工厂的纱锭数则

有所增加,即逐渐走上了大企业化。

中日甲午战争后,每年生产的棉纱,有30%出口。棉纱和棉制品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比率,1897年为10.2%,1902年为10.5%,日俄战争胜利的1905年则增至15.5%。与出口棉纱和棉制品的增加相反,其进口量则逐年在减少中,1897年以后国产棉纱、布的出口量,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也终于超过了进口量,仅次于生丝,成为出口贸易品中的中枢。而且几乎全部是输往中国(特别是东北)和朝鲜,占日本向这些地区输出总数的40%到50%。棉纱、布及其出口的发展,关系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前途。

第3表 棉纱进出口数量的比较

	进 口 量	出 口 量
1892年	7,253(千元)	8(千元)
1895年	7,413(千元)	1,034(千元)
1897年	9,881(千元)	13,490(千元)
1900年	7,375(千元)	20,589(千元)
1902年	2,018(千元)	19,902(千元)
1905年	1,702(千元)	33,246(千元)

(根据《日本纺织年表》)

促成棉纱、布发展的主要条件,是1896年废

除棉花进口税、国家的保护、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军事需要（军用被、服）、低微的工资和过重的劳动。

国营军需工业的意义 国营军需工业，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走在日本机械化大工业的前列，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确立时期也是如此。民营工业所用的机器，虽然主要是依靠进口，但其中的一部分则为国营工厂的出品。民营机器工厂至二十世纪初，无论是工人数、动力马力数以及它的增加率，都远远落后于陆海军工厂（参阅下表）。而且民营机器工业的发展也和军需工业密切联系着，并依附于军需工业。

**第4表 国营军需工厂和民营
机器工厂发展的比较**

	陆海军工厂			民营机器工厂		
	职工数	马力数	每一工人 分配马力数	职工数	马力数	每一工人 分配马力数
1899年	25,073	8,438	0.337	20,872	4,054	0.194
1903年	53,593	19,843	0.370	32,029	5,494	0.172
1906年	93,704	68,403	0.730	55,829	15,464	0.277
1909年	68,605	97,063	1.415	46,834	29,904	0.639

（根据《帝国统计年鉴》）

对于军需工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八幡制铁所(钢铁厂)的创立。这是1897年(明治30年)花了一千九百二十万元巨额创业费建立起来的。铁厂使用的原料,就是以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为背景,和掠夺一样,强制中国供给的大冶的铁矿石。

当日本强制收购大冶铁矿石将成事实的时候,德国企图以年息四厘贷款四百万元给中国,以垄断大冶铁矿。因而日本在1903年11月给中国三百万元借款,年息六厘,为期三十年。并在契约上订明,在此期间内,中国不得把大冶铁矿租借、割让给别国,或将矿石卖给别国。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借款,较德国的数目小而利息高,却能够排挤德国而使中国接受,即由于日本在远东拥有最大军事力量的关系。

1901年八幡制铁所建立后的第一年,出产的生铁占全国总产量的53%,钢材占83%,走上了钢铁自给自足的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一步,奠定了军需工业的基础。

国营军需工业在这一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1899年吴工厂两座西门子炉开始投入生产,

建立下濑火药制造所。1900年大阪工厂的四吨平炉开始生产；1901年该厂的动力改用电力；又过两年，该厂已用自制的钢铸造炮身。

铁路与航运 交通事业也迅速地发达起来。铁路营业延长哩数，从1893年的两千零三十九哩加长到1898年的三千哩，1901年突破了四千。航运方面，从1893年轮船十一万余吨增至1903年的六十五万六千吨，几达六倍。又在1896年日本邮船开辟了欧洲、美洲、澳洲三大远洋航路之后，1897年大阪商船、日本邮船开辟了台湾航路，翌年大阪商船又开辟中国长江航路，同年东洋轮船公司更开辟了旧金山航路。

铁路航运的迅速发展，不仅基于一般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而且和军事有密切关系。根据1892年铁路敷设法召开的铁道会议，有军部代表参加，第一届主席就是由参谋次长担任。铁路的建设，首先从军事意义上来考虑。1896年为了补助海军扩充计划，制定了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这和过去的保护与扶植特定的公司不同，给予第一级大轮船（战时能改造为巡洋舰者）以奖励金，开辟了全面保护大资本家的途径，走上了保护帝

国主义航运政策的第一步。

贸易和金本位制 随着生产的发展，进出口贸易也有了激增，货物品种也多少发生了变化。1893年进出口总额约九千万元，1903年则激增至三亿一千五百万元。输出品虽然是以生丝、茶叶等半制品居大宗，但棉纱、煤、铜、棉织品等也渐趋重要。输入品则棉纱等轻工业品逐渐减少，机器、工具类和棉花、石油、铁矿石等原料品则增多了。

以上述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实行了金本位制。日本事实上是银本位制。由于政府认识到迟早必须采用国际通用的金本位制，所以从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起，便开始调查研究。战后政府就把从中国掠夺来的赔款作为基金，1897年10月实施金本位制。尽管这样做，对于日本资本主义向外发展很有必要，但由于当时采用金本位制对出口贸易不利，曾遭到产业资本家与对中国贸易有关的商人反对。然而政府为了扩充军备，迅速输入外国资本起见，毅然实施了。

工人状况 随着资本主义，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发展(有如下表)，产业工人也渐渐增多了。

第5表 国营民营工厂的工人人数

每五年平均	国 营 工 厂		民 营 工 厂	
	总 数	其中女工数	总 数	其中女工数
1882年	4,758	1,817	51,189	35,535
1885—1889年	10,505	1,546	139,293	—
1890—1894年	11,895	1,098	325,979	—
1895—1899年	22,465	1,471	425,602	252,651
1900—1904年	53,071	5,803	472,955	291,327
1905—1909年	157,306	33,229	637,043	591,003

(根据小林良正：《日本产业的构成》)

工人遭受和原始积累期同样的残酷剥削。1890年国营工厂熟练工人的平均日薪仅两角四分，缫丝女工则为一角二分，有的只有九分（同年白米每升六分）。中日甲午战后两年，即1897年，大阪纺织业一万两千名职工中，每天工资三角八分的仅三百八十七人，一万人则在一角七分以下（同年白米每升为一角一分到一角八分）。

产业工人的性别比率，女工所占的比重极大，在民营企业中则达男工的一点五倍以上。尤其是缫丝和纺织工人，几乎大部分是幼弱的妇女。1901年关西纱厂的职工中，50%以上的女工都不满二

十岁，十四岁以下者达 11.4%^①。缫丝女工也大致如此。大阪各种工业二十一个工厂的工人中，四分之一都不足十四岁。出口品的火柴工厂，和其他工厂比较，贫穷子女尤多，半数以上的职工为十岁到十四、五岁的儿童，甚至有六、七岁的幼儿，担负摆火柴梗的工作。

缫丝工厂的工作时间，平均是十四小时，有时达十七、八小时。而纺织业则在政府保护政策和结成卡特尔的条件下，进行夜间作业。“夜班一般是从晚上六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深夜两、三点钟，睡魔纠缠得顶紧，灯光照着脸色苍白的女工的凄凉姿态。……各工厂几乎都是分职工为甲乙两班，日班夜班，每周轮流更换。夜班下班时，为了清扫机器，还要加班四小时。”（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

矿山、纺织、渔场等工人的工作条件，尤为恶劣。工人不仅被食堂制度、堆栈制度、宿舍制度等

① 详细描写女工状态的有细井和喜藏的名著《女工衰史》。虽然是描写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情况，1900年的情况仍然相同。不，直到现在也依旧是这样，1954年近江丝绸厂的“人权罢工”就是很好的证明。

所束缚，还有鼓励工人名誉心的奖旗制、罚金、减薪、减食等惩罚制度。对于幼女也加以殴打、监禁，甚至于在工厂内施行游行示众的私刑、体罚。1899年某纺织工厂宿舍发生火灾，女工被锁在屋子内，逃不出来，竟有三十一人活活地被烧死。这和大浦煤矿的烧死矿工是一样的。

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是靠这样的残酷剥削确立起来的。而这种剥削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农村中广泛地残存着以半封建地主制为核心的各种封建关系，以及在它压迫下农民的悲惨生活。

第四节 寄生地主制的扩大

资本主义渗入农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也必然被卷入资本主义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农业人口的减少。从1870年到日俄战争时期，农家总户数的绝对数也略有减少；因之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以相当的速度降低了。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1873年（明治6年）为78.69%，1891年（明治24年）减为70.32%，

1903年则减为64%。但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则增多了。特别是六大城市（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神户）的人口增加得特别多。1886年（明治19年）为一百九十四万一千人，而1903年则增至四百零九万四千人，达两倍以上。

第二，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加，使米、麦、蔬菜以及其他农产物的需要急剧增多，并推进了它的商品化。另外，农民为缴纳税款也增加了现款的需要，又因土布等自给自足的手工业逐渐为大工业所摧毁，农家必须比过去购置更多的东西，因而小农、贫民只好减少自己吃的米粮，不得不尽量多卖（饥饿出售）。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力也逐渐有所提高。锹和犁等生产工具也广泛地进行了改良。如浅耕除草器“太一车”的发明便是例子。当时虽被人说是“赶走短工”，但这确是一大进步。东北地方也普遍使用牛马深耕，并渐次改湿田为干田。又盛行品种的改良和推广优良品种。此外，购入的肥料也增多了，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东北输入的廉价豆饼也增多了，代替旧日的鱼肥，渐居重要地位。以过磷酸石灰为主的化学肥料在

中日甲午战争后也逐渐普及了。从1900年(明治33年)起尽管数量很少,但也开始使用了硫酸。因之水稻的种植面积和每反产量也如下表有了增加。

第6表 种稻面积、总产量、每反产量

每五年平均	种植面积	同指数	总产量	同指数	每反产量
1878—1882年	2,548千町	100.0	29,812千石	100.0	1,169石
1883—1887年	2,617千町	102.7	33,785千石	113.3	1,291石
1888—1892年	2,677千町	107.4	38,860千石	130.4	1,420石
1893—1897年	2,736千町	108.9	37,673千石	126.4	1,358石
1898—1902年	2,836千町	111.3	42,479千石	142.5	1,479石

(根据《日本农业发达史》)

第三,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工业用农作物,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国际的联系,其品种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大麻、蓝、甘蔗、大豆等被廉价的进口货所压倒,几乎已经不再种植了。供制灯油用的菜籽,也由于煤油灯和城市的瓦斯灯及后来电灯的普及也停止种植了。种植这些作物的土地开始改种麦子或青菜了。稗、粟等商品价值较小的杂粮,除自家应用外已不多种了。

商业性农业的变化中尤为显著的，即种棉业的衰落和养蚕业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进口棉就渐渐压倒了国产棉花，但在1896年由于纺纱资本家的要求，实施棉花输入关税免税法之后，植棉便迅速衰落，至1900年已经绝迹。这意味着以国产棉花为原料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灭亡。过去种植棉花的土地，在大阪及其他大城市附近改种蔬菜，其他地方则植桑，与种棉的衰落相反，全国盛行养蚕。桑园面积和中日甲午战争前五年平均比较，战后五年平均增加了27%，养蚕专业农户也逐渐增多了。

寄生地主制的扩大 资本主义的渗入农业，使农业的生产力有了提高和商业性农业获得相当发展，农民在一定的程度上变成了小商品生产者，这就是农业也走向了资本主义化，不过在当时仍然是对封建的寄生地主最为有利。而雇佣短工或长工经营数町步以上的自耕富农，从原始积累时期起便逐渐寄生地主化了。而这种倾向从1900年前后起迅速加强。原因是贫农、小农的女儿和次男三男去城市工作者日益增多，以过去的条件雇佣男女工人已经不容易了，与其付出较过去高的

工资，进行大规模经营，不如作寄生地主较为有利，而且安全。

农民经济商品经济化，出卖的米愈益增多，而购入的肥料和生活资料也有所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由于负担重税和高额地租，被迫尽量多卖农产品，手头更紧了。这种情况给地主放高利贷以良好的机会。大多数小农受地主、肥料商人、粮商、高利贷者的剥夺，日渐成为债务的奴隶，有些人则被迫抛弃土地变成佃农。然而以地主阶级占压倒多数的国会和以这个阶级为台柱的天皇制政府，却积极保护地主。

1896年（明治29年）政府创设了劝业银行和府县农工银行。它经营以不动产作抵押的低利长期贷款，说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经营，但并不是为小农通融资金，而是为大地主服务的金融机关。地主借到长期的大量贷款，投资于农业以外的企业上面，或以高利贷借给农民牟利。

此外，1900年9月实施产业合作法，设立了作为小农通融资金机关的信用合作社。它虽有助于上层中农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但由于它吸收农村的零碎资本，以购买债券和股票，在把农村资

金吸收到非农业资本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无论是不动产银行或信用合作社都是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地主、资本家勾结起来，成了他们发财的手段。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日益富裕，进一步寄生化了。其中有些人离开农村，移居城市，加入资本家的队伍。城市资本家也在农村购买土地，作为保障财产安全手段之一。这样，到了二十世纪时，离乡的大地主增多了。全国耕地中出租土地的比率的增高，有如第7表所列。

第7表 出租地比率的增加(3府33县)

	1892年	1903年
自耕水田旱田	304万町步	292万町步
租佃水田旱田	203万町步	234万町步
合计	508万町步	526万町步
租佃土地占全部耕地的比率	39.99%	44.48%

(根据渡巴信一：《日本农村人口论》)

1898年(明治31年)实施的民法，最后在法律上确认了寄生地主制。民法中规定土地所有权比耕种权占绝对的优先。又据1900年的治安警察法，确立了国家严厉镇压佃农反抗地主斗争的

体制。这是采取近代法律的形式而具有封建的超经济的强制因素。

农民状况 寄生地主制的扩大,从反面来讲,就是小农的没落。生产力的提高,多少增加了农家的收入,但这离提高农民生活和扩大经营还相差甚远。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肥料,只是使每反的单位产量有所增加,并未提高生产效率。又由于当时全国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是不足一町步的小农经营,即使这些都是自耕地,而每反产量的稍许增加,对于经营来说,其收入是不会有有什么了不起的增加。而且,地税、地方税的负担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较战前增加了40%。此外,1896年(明治29年)一方面增加酒税和实行烟草专卖,另一方面则加强私人造酒和烟叶的管理,以及增加其他关税等,国家加紧压榨,使农民的收入更加少了。

佃农,都是所谓“五反农民”的极端小农经营(耕田不足五反的自耕农和佃农合计,在1900年前后达总农户的40%以上)。每反步的地租率虽稍有减少,但因税额随着每反产量的增加却增加了,因而提高佃农生活几乎不可能。他们一旦遇

到灾害或疾病，生活便陷于绝境。据横山源之助（1870—1915）《日本的下层社会》（1898年）的记载，耕种五反步佃农的情况是：“除去地租、肥料、种籽等费用外，就是不把工资计算在内，也很难有五十元以上的年收入”。较之当时年收入一百二十元至一百三十元的工匠，或年收入九十至一百元的小工，佃农的收入真是少得可怜。

小农、贫农变成了半无产者，出卖季节性劳动，女儿充当纺纱、缫丝或织布女工，长子^①以下的孩子去从事工厂、矿山、渔场或土木工程等劳动，也有的变成了永久的工资劳动者，但是一遇到市面萧条，便被迫立即重返家园。他们一旦借了地主的债，便永远无法还清。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地主对于力争一小块租地的农民有剥削高额地租的可能；另一方面产生了无数想找工作做的人，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极低的代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致资本家需要多少工人有随时都可以雇到的可能。

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 在封建土地制度的

^① 日本习惯上和法律上都是由长子继承家业，所以当时农民的长子不去做工人。——校者

压迫下，农民不能摆脱依靠家族劳动的小规模经营，他们的生活也是靠把子女送到工厂去作工，合全家族的收入才能勉强维持。在这种情况下，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又支持了半封建的地主制；同时，也使资本家有对女工进行残酷剥削的可能。由于青年男女的劳动，不是为了维持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独立生活，而是为了帮助穷到连多一文钱也好的家庭生活，因而资本家能压低工资。另一面，低工资又永远阻碍了男女青年的独立，把他们束缚在封建的家族制度之下。

国家为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在1898年实施的民法中坚持了父权家长制度。制定民法时，进步的法学者曾提出：江户时代的町人，父权家长制已经削弱了，主张近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家族，必须以夫妇为中心。而政府则认为“平民的习惯不能作为习惯，所谓日本国民的习惯就是指武士的习惯”。通过这种反动主张，继承了封建武士的家族制度，用民法把父权家长制强加在全国人民的头上。另外，这种家族制度的政治意义是以对家长的绝对服从来保证人民对天皇（以及天皇的政府和军队）的绝对服从。

第五节 工农阶级的成长

工会的成立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也必然成长起来。“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舞台揭幕前的准备”。“中日战争一结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舞台便揭幕了。”（石川、幸德合著《日本社会主义史》，1907年出版）

1894年（明治27年）1月，大阪天满纺织厂女工为了排斥监工举行罢工。首谋者虽以触犯刑法中的妨害工业罪而受处罚，但以后各地相继发生了劳资纠纷和罢工。如1897年（明治30年）北海道硫黄矿、岩手大桥矿山、兵庫神子畑铁矿、福岛磐城煤矿等处的矿工、大阪天满纺织厂工人、京都友染职工、群馬新町纺织厂、岛根高津纜丝等纤维工人以及其他工厂工人都起而斗争。此外，造船工人、制盐工人、切烟丝工人、石匠、锯匠等工匠也被卷入斗争浪潮中，据警察厅统计^①，同年罢工共

^① 警察厅的统计有很大的错误。例如据该统计，1906年的罢工、怠工为十三次，参加人数仅两千零三十七人，事实上同年仅大阪炮兵工厂就发生了一万六千人的大罢工，没有计算在内。虽然除警察厅的统计外，别无历年的罢工累计数，但如引用该项统计，反而歪曲了事实，所以未便列举。

计三十二次，参加人员达六千三百人，据推定，实际上有这个数字的两倍。

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促进了它的团结和组织化。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等原来在旧金山组成了名为“职工义勇会”的劳动问题研究会；回国后，于1897年建立起职工义勇会，向各工厂分发《寄给职工们》的传单，进行组织职工会的宣传。继而在同年七月，由高野和片山潜（1859—1933）^①等组织了“工会期成会”，并出版机关杂志《劳动世界》，由片山任主笔。

同年底，由于期成会的努力，成立了职工会。到1900年该会在东京及其附近地区组织了四十

^① 片山潜在1859年12月生于冈山县农民家，后去东京做印刷工。二十六岁赴美国，于苦学中毕业耶鲁大学。继而往英国，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896年回国，对于建立工会期成会、社会民主党、日本社会党等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在领导这些组织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活动，将在正文中叙述。由于他是经常和工人密切联系的实践家，所以能逐渐克服他初期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和第二国际的错误思想与错误理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模范。1921年赴苏联，翌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国际反帝反战斗争的领导者。以后生涯，贡献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1933年11月5日结束他七十四年的斗争生涯。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内。

二个支部，拥有五千四百名会员。支部以炮兵工厂、甲武铁路、横滨铁工厂、芝浦工厂、日本铁路大宫工厂、石川岛造船所、横须贺造船所、赤羽海军工厂等为中心。1898年2月，日本铁路公司机务工人四百余名为了反对解雇、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这是使东北线一带的列车完全停驶的大规模而且有组织的罢工。罢工取得了胜利，迫使公司收回解雇十人的成命，接受全部要求。工人认识到团结的力量，组成了“日铁矫正会”。

工会期成会仿照五一节，秘密地准备在1898年4月3日举行“运动会”（示威运动），遭到警察的禁止。但1901年（明治34年）4月3日，由反政府的报纸《二六新闻》主办，在东京向岛召开“日本劳动者恳亲会”却获得成功。事先卖出的人场券达五万张，但政府只允许五千人集会。又以炮兵工厂为首，许多公司与工厂的经理禁止工人参加，工人却在深夜一时左右结队前往，会场上虽配置了一千名警察队，并不能有所作为。大会获得成功。这虽名为恳亲会，实际上是有计划的示威集会。片山潜在大会上提出五条作为“工人要求”的提案：（一）政府保护工人；（二）普通选举

权；(三)保护童工、女工；(四)工人享受免费教育；(五)规定每年4月3日为“工人大恳亲会”。第(五)条显然是意图举行日本式的五一节。

工人阶级就这样地逐渐提高阶级觉悟并团结起来了。有如上述的片山提案中所表明，工人进行了争取普选、反对治安警察法以及保护童工、女工的斗争。又大宫铁路工厂工人俱乐部于1899年掀起了废除公娼运动，揭开了日后这种运动的序幕。工人阶级就这样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各项要求，进行了斗争。特别重要的是开始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主张实行土地革命，这点将在下面叙述。

全体农民的斗争和足尾矿毒事件 随着资本主义渗入农村，农民也开始和城市乃至全世界联系起来。而且他们本身也经常出卖季节性的劳动，成为半无产者，其子女有的就变成了城市大工业或矿山的工人，因而农民受到无产阶级的影响，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当时农村的基本矛盾是全体农民和以国家为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对立。主要的斗争是减轻地税及其他税款，要求归还为国家没收的森林原野，反对修建铁路、公路时无理征

用土地，并以私造等形式抵制酿酒税、其他间接税以及烟草专卖。在要求归还森林原野的斗争中，农民到处以实力进行采伐。因此，1899年政府和地主便制定了国有森林原野归还法，想把农民付诸审判（非常麻烦，其结果，总是对农民不利）。

在农民反抗国家和特权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震撼当时社会的是足尾铜矿矿毒事件。

财阀古河市兵卫（1832—1903）经营的栃木县足尾铜矿的矿毒，流入渡良濑河，使沿岸一带变成荒地，到1890年已成为社会问题了。十万受害农民在曾积极地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国会议员田中正造（1841—1913）的领导下，掀起了防止矿毒救济受害农民的运动。但政府不肯作有损古河丝毫利润的让步，以致沿河两岸农民受害逐渐加深。从1897到1900年他们曾四次大举进京请愿，但每次都和警察队发生了冲突。1900年2月第四次进京时，数千人组成的进京示威队和警察、宪兵展开了流血的搏斗。结果，三十多名被加以“聚众滋事罪”（相当于现在日本的骚扰罪）被捕下狱。在这次事件中，幸德秋水（1871—1911）、木下尚江（1869—1937）等社会主义者和在《万朝报》的民主

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等曾支持受害农民，进行了斗争。但政府最后仍然是没有接受农民的要求。

贫农、佃农的斗争 这时城市工人和农村贫农的利害共同性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害共同性开始对立地发展着。1897年(明治30年)，即中日甲午战争后最初爆发经济危机的这年夏天，以信州饭田地方为首，东北、信越、北陆^①、关东、北九州等地都发生了有很多贫农、城市贫民参加的米粮暴动。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后寄生地主制的扩大，以佃农和地主的对立为中心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也发展起来了。佃农贫农为了要求减轻地租和确保永久租佃权，在各地提出了“租佃问题”，佃农协会的建立也有了萌芽。片山曾有这样的记述：“每年秋天各地都有地主和佃农的冲突，而这种冲突逐年在加剧，例如足利町(栃木县)助户地方的佃农于明治30年组织的贫民共党会、香川县阿野郡

^① 日本称本州东北部为东北，亦称奥羽，包括福岛、宫城、岩手、青森、秋田、山形各县。信越包括新潟县及长野县、群馬县的一部分，即高崎铎至新潟市铁路沿线地方。北陆为旧八道之一，即本州面临日本海地方，包括福井、石川、富山、新潟各县。——校者

加茂村佃农组织的人道会等类似佃农协会的组织，各地都有。这就是佃农运动的萌芽。它将成为不久以后轰轰烈烈的佃农运动的种籽。”（《日本劳动运动》）

从1897到1907年的十年间，产生了二十二个佃农协会。其中明显地把改善租佃条件作为目的之一或全部目的的，就有十个协会。

另外，这时特殊部落民的组织也萌芽了。以1902年冈山县“备作平民会”的成立为首，奈良县以及其他地方都有了同样的组织。

社会主义的萌芽和普选运动 随着工人斗争的激化和组织的萌芽，同时，基督教人道主义、社会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混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萌芽了。1898年片山潜、幸德秋水、安部矶雄（1865—1949）等建立了以“研究社会主义原理是否适应于日本”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后改名为“社会主义协会”）。从此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思想过去只有个人从事研究与介绍，现在开始了有组织的共同研究。又使自由民权派出身的知识分子幸德秋水和基督教徒出身的片山潜等逐渐成为社会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斗士。

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地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道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群众性的争取普选运动开始于1897年7月，信州的中村太八郎联合松本及其附近数个町村的同志，散发以请求实行普选为目的的传单。鼓动群众争取普选的运动，不发生于东京，而出现于信州松本附近，这绝不是偶然的事。这是该地养蚕缫丝业的发达，动摇了农村旧的生活和意识的反映。

1899年10月，片山等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民权左派的大井宪太郎共同组成了“普通选举同盟”，展开了争取男子普选权的斗争。日铁矫正会等工会也参加了“普选期成同盟”。片山又发表了题为《社会改良手段、普通选举》(1901年)的小册子。在附录中有幸德、西川的关于普选的文章。

国际主义和工农联盟思想的萌芽 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本也迅速地步它的后尘，社会主义者又针对这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00年11月幸德秋水攻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指出日本经济还没有成长为真正的“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而是“军人的外强中干的帝国

主义”。他更在第二年发表了名著《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家为了争夺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市场和独占原料资源的产物、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问题。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江兆民、大井宪太郎等虽尚未摆脱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但如幸德等由于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显然已越出了这个限界，有了国际主义与和平思想的萌芽。

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也不再采取“神代复古”等形式，而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开始作科学的讨论。社会主义者西川光次郎（1876—1940）著《土地国有问题》一书（1904年），指出拯救农民的根本方法是把土地交给农民，消灭寄生地主。他更进一步指出，即令实行土地国有，如不实行社会主义也不能真正解放农民。主张产业工人必须和农民联合起来。幸德秋水也批判了无论是减轻地税或完全取消地税，不过是对地主有利，并指出农民之所以苦于没有土地或土地太少的原因，是由于大地主垄断土地，主张“欲拯救小农必先征讨大地主，我们应立即展开完全消灭地主的大运动，只有展开土地公有的大运动，才是救济全体农

民的根本办法”（见1903年幸德为圆城寺天山著《地税全废论》写的序文）。这些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虽然成为下面将要叙述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但无论是幸德或西川，实际上都还未进行组织农民的活动。

把土地平分给农民的思想，除社会主义者以外，安冈雄吉也有同样的主张。宫崎民藏于1902年（明治35年）创立了“土地复权同志会”，从农民均享土地为人类权利的立场出发，企图把农民组织起来。其主要著作《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于1906年出版，这一运动就是从这时发展起来的。

日本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及其意义 无产阶级就这样地成为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核心，把民主主义者团结在它的周围。并出现了社会主义者。它在政治上的结晶，就是1901年5月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日本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党虽然是以安部、幸德、片山、西川、木下、河上清等为核心，但党的组成并不只是由这些少数知识分子的力量，而是由小石川炮兵工厂和日铁大宫工厂锅炉间的先进熟练工人推动建立的。

日本社会民主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目标,揭示了为了人类平等与世界和平,完全废除军备,消灭阶级,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等社会主义“理想”,又在实际运动纲领中提出取消贵族院、废除治安警察法(1900年制定)、缩减军备、实施普通选举法、制定工会法、保障工人的团结权、制定保护佃农法、禁止童工、女工的夜间作业等民主主义的要求。又在“宣言”上说明了理想纲领,其中最后提出党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争取普选,坚持议会主义。党虽在当天被下令解散,但其纲领和宣言却刊载在一些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社会主义者们并未因遭受禁止而有所畏缩,继续团结在社会主义协会内,展开社会主义的宣传。

这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都只是刚刚萌芽。工会也由于一次又一次地遭受镇压^①和思想上的不成熟,至

① 在镇压方法上,已经采取捏造事件的手法了。日铁矫正会就是1901年10月被政府捏造事故而解散的。当10月明治天皇去东北地方检阅陆军大演习时,车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故,尽管这完全是铁路局的责任,而警察和路局却捏造说这是矫正会的阴谋(事前也作了这样的欺骗宣传),下令解散。(赤松克麿:《日本社会运动史》)

1902年虽然衰落下去，但它却给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威胁。

日本统治阶级为什么对工农运动会感到威胁呢？第一是由于日本的资本主义和寄生地主制以及站在这上头的天皇制，只有工农和全体劳动人民象奴隶一样地服从，才能维持其存在，如果对剥削和统治稍加反抗，就会给统治者以很大威胁。特别是最先建立起工会的军需工厂、铁路和造船所都是天皇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最大的动脉。这里的工人有点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给天皇制以很大的打击。

第二，这种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说来，是极其幼稚而且是思想复杂的混合物，但是对于绝对主义的各种反抗都曾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社会主义者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急先锋。例如足尾矿毒事件，社会主义者坚持到最后，还是站在被害农民方面，奋勇斗争（田中正造的越级上告文也是由幸德秋水执笔的）。

尤其是从父权家长的家族制度下解放妇女的问题，也是由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并明确地指出妇女的经济不独立，便不能获得解放。福田（景

山)英子确信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解放,她曾加入平民社。1903年(明治36年)同堺为子、远藤清子等同志展开了废除治安警察法中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条款的运动。如上所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废除半封建的地主制——天皇制的固有基础——问题。

第三,从历史的规律来看,日本的工农运动不久就会发展为象英国的工会或德国、俄国的社会党。这一点,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官僚和统治阶级就已感到不安,而现在这种幼芽竟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更加使他们感受威胁。

年轻的工人阶级承担了资产阶级所抛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是土地革命、普通选举、争取政治自由、反对侵略战争、批判帝国主义、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解放妇女等项。自由民权斗争的时候,整个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由没有特权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包括具有这种倾向的富农、地主)领导,和天皇制、大地主及特权大资产阶级作斗争。现在呢,农民中以佃农、贫农为核心,以这些农民和工人阶级为主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各种民

主义者，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和地主阶级、特权大资产阶级以及建立在这上面的天皇制进行斗争。——这是从 1900 年前后起日本社会基本的阶级对立。

第六节 地主资产阶级的天皇制

资产阶级参预政治 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的阶级关系，天皇制也发生了变化。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经济力量的增强，也促进了它们的政治势力的增大，它们在组织上加强了政党对官僚政府的压力。中日甲午战争后无论哪一任内阁，如不通过各种形式和议会政党紧密地结合起来便行不通。

1898 年第三次伊藤内阁曾企图拉拢自由党，增加地税（增加扩张军备的财源），但遭到自由党的反对，并于 6 月与进步党（1896 年由改进党改组而成）合并，组成宪政党，否决了增税案。伊藤从这个经验中痛感到“雇佣兵不足恃，必须拥有亲兵”，取得三井系大资本家的资助，在任职首相期间，曾企图组织御用政党，未能成功而全体辞职。

伊藤向天皇推荐宪政党的大隈或板垣为后任首相。军部方面以山县有朋为首，虽起而反对，未能生效，结果，还是成立了由大隈任首相、板垣任内相的宪政党内阁。这个所谓隈板内阁，也是因为大隈、板垣都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又是华族，成为他们受命组阁的必备条件，而且陆军大臣又必须是由军部推荐的将官。由这两点看来，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政党内阁^①。前任内阁勉强留下来的陆相桂太郎（1845—1913）说了这样的挖苦话：“一般人说新内阁是政党内阁，但必须说它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半身不遂的内阁”（因为它不能自由拟定军部大臣）。然而不得不任命众议院多数党的首领来组阁，这一点，说明官僚专制政府正在发生变化。

这时的政党，通过“院外团”这种组织，还和议会外的群众有些联系，但它基本上还是议会内的党、议员的团体。他们的选举地盘主要是地主阶级，选举费是由党首领从三井、三菱等大资产阶级

^① 从此以后，日本的军部大臣，也仍旧是来自政党之外，没有出现过一次真正的政党内阁。只是从1924年到1932年，确立了一惯例，即任命在众议院中获得多数信任的政党领袖来组阁，这将在下面叙述。

手中拿来的，或是议员自己拿出来（他们大部分是大地主或公司的大股东）。大资产阶级收买了政府和政党。因而不久便引起了攻击，说这是实行“金权政治”。

隈板内阁的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攻击“金权政治”的演说中谈到：“假如日本一旦实行共和政治，三井、三菱就会当总统。”山县一派把这句话宣传为尾崎主张共和，作为倒阁的材料，利用宪政党内的自由党系和进步党系的争夺势力，千方百计进行分裂活动。因此宪政党再分裂为自由党系的宪政党和进步党系的宪政本党，内阁仅存在四个多月就垮台了。

其后，又成立由山县任首相的军阀官僚内阁。山县虽然极端讨厌政党，但由于不取得政党的支持，重要政策便不能推行，乃以利权收买宪政党，实现了悬而未决的地税增加案。代表地主阶级的宪政党所以同意多年来一直反对的增加地税案，主要有下列两点理由：第一，因为他们从政府手中所取得的权利，足以弥补因增税而受到的损失还有余（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就是其一）；第二，如上所述，这时的地主几乎都变成了寄生地主，很容易

把增加地稅的負担，轉嫁在佃農身上。

此外，山縣內閣又提出 1900 年改革選舉法的方案，將選舉權的納稅資格由十五元減低到十元，增加城市議員數。這樣，使地主代表居壓倒多數的議會中，資產階級能比以前選出更多的代表。山縣用這樣的手段，助長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從中操縱，以維持軍部、官僚的獨立性（憲政黨內自由派和改進派的對立，多少就具有地主和資產階級對立的性質）。

山縣內閣盡量利用了憲政黨之後，便又拋棄了它。為了使政黨勢力不能從根本上威脅軍部和官僚起見，同年用明文規定軍部大臣必須由現役大、中將充任。過去，事實上也是由現役武官充任陸軍大臣，而現在則從制度上加以確定，與參謀本部的帷幄上奏權相呼應，進一步樹立了軍部獨裁制。此外，更擴大樞密院的權限。又以“穩定行政”為借口，實行修改文官任用令、文官分限令^①、文

① 文官分限令即規定文官地位的獲得與喪失的法令。除特任官、公使等有特別規定者外，普通文官都適用此法令。官吏除被判徒刑或受懲戒者外，非根據本法令不得免職或降級；並規定免職、退職、退休等詳細辦法。——校者

官惩戒令、阻止自由任用敕任官,以及其他进一步加强官僚体制独立性的措施。

地主资产阶级的天皇制 资产阶级和地主政治势力的扩大,他们相互间的对立,以及他们和官僚专制政府的局部利害冲突与妥协过程当中,大体上结成了三者的联盟。他们在根本上、阶级上结成一体,与成长起来的以工农为首的全体人民尖锐地对立着。

1900年3月,山县内阁和资产阶级地主的议会全场一致地通过了治安警察法。第一届议会尚未召开前,政府急忙制定了1890年的集会和政社法,把1880年的集会条例改得更加严厉了。其主要目的是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治运动。现在则已允许设立该法令所禁止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各政党的联合会以及支部。因为这些东西对天皇制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怕。所以统治阶级把它取消了,同时创设了具有新的性质的镇压法。

治安警察法的制定,就是过去的集会条例和新闻条例等所有镇压民众运动法令的复活,它和刑法中有关工、农业妨害罪等规定结合起来

加以系统化，将正在萌芽中的工人、农民以及劳动人民对天皇制、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以摧毁。过去的集会和政社法只针对政治性的集会和结社；治安警察法则变本加厉，使警察可以任意镇压或解散关于政务和“一切公务”的集会和结社（如工会农会等），以及各种群众运动。不仅禁止官吏、军人，也禁止官、公、私立学校的教师、未成年者以及妇女参加政党或听政治演讲。工人农民为了进行斗争，联系同志也在被禁止之例。反对这个法令的，只有工会期成会和社会主义者。

山县致力于加强天皇制的独立性，同时，伊藤等则进行了和资产阶级、地主结成同盟的活动。山县制定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同年8月，伊藤拉拢宪政党，组成了立宪政友会。伊藤在成立大会致词中号召“从事农、工、商者”入党，就是企图把地主和资产阶级团结在官僚领导的政党中。至此，往年自由党进步的反官僚传统，完全丧失了。

此后，不仅政友会，就是宪政本党以及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党，也都是由大官僚担任总裁和干部。

政党变成了天皇制和地主资产阶级同盟的组织了。这便意味着完成了和工人农民对立的反动集团的统治体制，它已不是和天皇独立性对立的東西了。天皇制就这样照旧保持其绝对主义的权力，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天皇制了。

资产阶级正象所说的“金权政治”那样，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它还不能代替天皇制建立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治。

原因是：第一，如上所述，无产阶级根据历史的规律，开始威胁着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压迫无产阶级，并把它束缚在奴隶状态之下，不得不靠天皇制的专制。

第二，明治初年以来，日本资产阶级受到天皇制的大力保护、扶植，到了资本主义确立之后，仍然依附于天皇制，并具有军事的性质，而且和天皇制固有基础的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密切地结合着。因而资产阶级既没有打倒天皇制的意图，也没有打倒天皇制的力量。

第三，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具有半封建的性质，因而一方面天皇、特权大资本家、华族和大地主迅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部

分的农民、工人等劳动群众则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是一方积累财富，另一方积累贫困。这作用，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具有半封建的性质，就显得更加厉害了。因此，国内市场相对地日益狭小；因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刚刚确立，而日本的资产阶级便很快地想独占海外的市场和资源，有如下面所述。

因之，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后，仍然依附于绝对主义的天皇制，不能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独裁的政权。

走向帝国主义 如前一章和本章第一、三节所述，日本资本主义是特权大资本家在政府保护下变成产业资本家，在各产业部门中，它和国家资本的垄断支配逐渐加强着。

例如 1901 年参加银行公会的一百七十余个银行中，第一（澁泽）、第十五（华族和天皇合资）、三井、三菱、安田、鸿池、住友及正金等八行的存款占银行公会会员银行总存款的 51%，全国存款约五亿元，大部分存在上述八大银行等总数不到二十家的银行中，其他两千家银行中的存款，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地方银行为这些大银行所支配，地

方的小资本家、商人则受到地方银行的剥削。二十世纪初,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已拥有自己的银行,投资于各种重要产业,形成具有垄断威力的“四大财阀”。继起的有古河、浅野、澁泽、鸿池等。

少数大资本家通过供给原料、代销产品或通融资金,使多数的小企业、工场手工业、家庭工业变为自己的附庸,剥削它们的利润。例如纺纱资本家以大机械化垄断棉纱的生产,高价售给工场手工业、家庭工业的织布厂,并使它们从属于自己。小资本家则对束缚在寄生地主制下的贫穷农民进行半封建的残酷剥削。如上所述,小资本家剥削来的东西,又被大资本家剥夺去了,所以他们不但永远发展不起来,而且每当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时,便不断地没落下去,使大资本家发财。然而在有许多工人——他们不管条件怎么恶劣、工资怎样低微,都肯忍受,能有一分钱的收入也好——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会产生剥削他们的小资本家。小资本家只是作为大资本家剥削农民剩余劳动的桥梁而存在着。

农民和工人的贫困,已不用多说了。因此,国内市场永远是贫弱的。此外,又由于半封建的农

业发展速度极为缓慢，不能适应于随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激增的粮食需要。1890年以前因为“饥饿输出”的关系，米还是出超的。但从1893年（明治26年）起米便转为入超了。到1903年以后，每年必须输入五、六百万石，超过国产米的10%。因而确保粮食资源的要求就高涨了。

又由于半封建的农业，不能大量生产大机械工业所需要的品质优良的原料，如棉花、甘蔗，因此，轻工业原料也只有仰给于国外了。此外，重工业所需要的铁矿石，在国内几乎没有。

抵补这些输入的出口物资，主要是生丝、棉纱、布和茶叶。但如上所述，日本资本主义的前途，只有依靠棉纱、布的输出，而且是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的东北输出。

上述情况，使确保朝鲜与中国做日本资本主义稳定的原料、粮食资源地和商品市场的要求更加加强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种要求的强烈也不亚于天皇、军人和官僚。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靠天皇制的军事力量。而且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东亚，由于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更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

于军事力量的依赖性。

资产阶级就这样的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后，仍然依附于绝对主义天皇制，以天皇制为先锋，和地主阶级一道走到帝国主义瓜分东亚的竞争场内去了。

第五章 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一节 日俄战争

侵入朝鲜 日本统治者经中日甲午战争把中国势力从朝鲜排出去以后，不得不和比中国更为棘手的帝俄对抗。这时日本虽然已经在朝鲜确立了经济的优越地位，但并不以此为满足，它的野心露骨地表明想进一步在政治上把朝鲜变为属国。于是利用朝鲜宫廷内部的派阀之争，甚至于连过去利用过的人也被摒弃了。1895年（明治28年）10月驻汉城公使三浦梧楼（1846—1926）唆使日本警察和凶汉冲入王宫，杀死王妃闵氏，这就使朝鲜的统治者不得不倒向俄国那边。

同时，1896年日本政府将朝鲜政府给与美国人的汉城仁川的铁路修筑权收买过来，又无理地夺取了朝鲜政府打算给法国人的汉城釜山的铁路修筑权。然而当时日本的资本家几乎没有修筑这

些铁路的资金。因之，只有短距离的汉城仁川铁路才在 1901 年通车，而汉城釜山铁路直到日俄战争迫在眉睫时，尚未动工。后因军事上的迫切需要，在参谋本部的要求下，由国家拿出巨额补助金，好容易才于 1904 年 10 月（日俄已开战）通车。日本一方面苦于国内资本的缺乏，急于输入外资；另一方面则基于军事上、政治上的目的，向外输出资金。幸德秋水曾引用汉釜铁路做例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军事的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阶段 当日本如此积极地向大陆扩张的时候，1870 年末至 1900 年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迅速地压倒了小资本，进行了资本的积聚、集中，形成了垄断。生产上进行独占，同时，银行资本也开始集中到少数大银行的手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发展为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的统治。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完全为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置于“财政寡头”统治之下了。

进入这个阶段，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垄断资本企图把自己的统治网布满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各垄断组织间为了争取

世界市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大垄断资本家垄断了国内市场之后，组成了国际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分割商品输出市场和投资领域，确保本国的势力范围或殖民地，又垄断后进国的铁路、矿山、海关等利权，或渗入该国的财政，并企图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对于殖民地则抑制它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垄断它的资源，只许它生产本国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用掠夺方式劫走。同时，不仅向该处推销本国产品，还输出资本，迫使当地居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征收重税，夺取最高利润。

当资本主义进入这个阶段，世界的领土已被列强作为势力范围瓜分完毕，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后进的帝国主义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势力范围，因之，各帝国主义相互间必然发生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终于爆发为帝国主义战争。以美国夺取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而挑起的美西战争（1898—1899）^①和英国为争夺南非的脱兰

^① 美西战争时，菲律宾民族在阿基拉多领导下，协助美军，进行了民族独立斗争。但在战败西班牙后，菲律宾民族得到的，不是民族独立，而是比西班牙更加残暴的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斯瓦尔(Transvaal)而向布尔人(荷兰殖民者的子孙)挑起的布尔战争(1899—1902)为分界线,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

列强瓜分远东的竞争 在这前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目标开始指向了远东。列强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或则割取中国的边境地带,或则从中国夺取利权等,进行瓜分中国,至十九世纪末叶更进而向中国内地伸张势力。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更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三国干涉日本就是瓜分中国竞争的表现。德、法、俄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代价,使中国接受了四亿法郎外债,支付日本赔款,从金融上控制中国。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除了占领边境和殖民之外,进行了新型的帝国主义掠夺,以攫取铁路利权或政治贷款等统治弱小民族。

帝俄于1896年和中国缔结了以日本为对象的军事同盟(中俄密约),取得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它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1898年自己又强迫中国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地区,并取得南满铁路的修筑权,逐步向中国东北进行帝国主义的扩

张。法国于 1895 年 6 月夺得了把滇越铁路延长到中国境内的权利，1899 年租借广州湾，并迫使中国承认不得将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割让予他国。德国以山东省的传教士被害事件为借口，于 1898 年租借了胶州湾。英国也于 1898 年租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并取得了在中国各地的采矿权和筑路权，以及中国海关税务司只能用英人的特权。美国也于 1898 年 4 月取得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并在占领菲律宾后，进一步窥视中国。1899 年 3 月美国务卿海·约翰向列强提议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对中国贸易利权上的“机会均等”。这不外是要求给迟来参加瓜分中国的竞争者以向中国伸张势力的自由而已。当时情势，俄国独吞中国东北，英美两帝国主义则希望开放该地，基于这种共同要求，而有此举。海氏在发表这个宣言之前，曾和英国政府进行了商谈。

镇压义和团和日本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愈益残暴，使中国人民的生活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中国人民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就是 1900 年（明治 33 年）春爆发的义和团斗争。义和团以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土地被夺去了的山东、

河北农民为主力，有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穷苦的知识分子等参加。爆发于山东省，蔓延到河北省，破坏或烧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通路——铁路以及帝国主义阴谋的巢穴、并且是掠夺中国人土地而成为大地主的基督教会。其影响扩展到山西、陕西、四川、广西、福建、云南等省，波及中国全国。华北人民终于包围了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区。帝国主义列强（俄、英、德、法、美、奥、意）则组织联合军以图镇压。

义和团的斗争，最初只直接指向欧美各国，日本根本没有参加的理由，但是日本政府很久以来就想找机会参加瓜分中国的竞争，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便积极地参加了帝国主义的联合军。各国最初曾反对日本参战，但因英国忙于布尔战争，美国忙于对付菲律宾的民族斗争，都不能派大军来中国，而义和团的势力又日益强大，终于接受了日本参战的要求。联合军共计三万二千人，以一万二千名日军为主力，于8月占领北京，取得了巨额赔款和驻军于北京的权利，使中国愈益陷于附庸的地位。

当时日本不仅提供了帝国主义联合军的主

力,甚至于企图单独占领福建,曾从台湾派军至对岸的厦门,但遭英国的抗议而撤回。日本参加帝国主义联合军,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战线上的“宪兵”。日本在经济上虽还未具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但它这一弱点因“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①而得到了补充。

日英同盟 参加镇压义和团的日本,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起见,既感自己力量的不足,又觉得专靠钻列强相互对立的空子也是不够,因此,必须和哪一个国家勾结起来。这一点,在侵占厦门计划遭到英国的反对而失败之后,使日本的统治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未来的扩张打算,究竟是和英国同盟来对抗俄国,抑或和俄国协商对抗英国?关于这问题政府与军部里面意见有了分歧。

主张日英同盟的有山县有朋和外相加藤高明(1860—1926)(三菱女婿),主张日俄协商的则为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日英同盟是加速对俄战争

^①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14页。

的路线。日俄协商则是从日本的经济军事的力量着想，主张暂时避免与俄冲突的路线。这种对立不是原则上的对立，不论伊藤、井上或山县、加藤都一致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向朝鲜与中国东北扩张是轻而易举。反对日英同盟的主张，是怕同盟的结果，“连日本在中国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工商业利益恐不幸也将被迫放弃”（井上馨）。但当时远东的实际情况，是俄国在义和团事件之后，驻大军于中国东北，正在加速使中国东北殖民地化，因而只要日本想侵略中国东北，日俄协商便毫无意义可言。而且英国在改订日英条约时已经那么显明地表示愿意和日本一道对抗俄国。再加在镇压义和团战争中证明了日本是英国很好的工具。在这样互相利用的情况下，1902年（明治35年）2月便缔结了日英同盟条约。三国干涉以来日本统治者蓄意已久的日俄战争的路线就这样决定了。

对俄宣战 日俄战争和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都是天皇制的侵略战争，但是这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地位已与中日甲午战争时有所不同了。日俄战争时，日本的统治者们已毫不掩饰它独占市场和权利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资产阶级当

然也热望垄断中国东北的市场。他们的经济学代言人田口卯吉在 1903 年的新闻记者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满洲问题不解决工商业就没有发展希望”的演说。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1852—1906）大将，在决定开战之前，曾邀请第一银行总裁“财界领袖”澁泽荣一探询资产阶级对战争的决心，并请求协助。首相桂太郎以下各大臣和银行家就战时财政进行协商之后，才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日俄战争就是这样由冒险主义的天皇制军部、官僚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独占市场的野心相结合而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战争。

1904 年（明治 37 年）2 月 8 日，日本舰队突袭仁川港和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两天后，即 2 月 10 日才正式宣战。不经宣战突然袭击对方重要基地，这是日军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就曾使用过的手法。

这次战争不仅仅是日俄双方的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也具有国际帝国主义对立的背景。日本的背后有英美，俄国的背后有法国，而英法又共同与德国为敌，德国希望俄国东进等，国际关系极为复杂。由于当时英俄在远东的对立居于主要地

位，所以日俄战争实具有以日本为鹰犬的英国和俄国抗争的意义。日本则全面依赖英美的金融援助，进行了这场战争。其战费总额十七亿一千六百万日元中的八亿元是从英美金融资本业募集的外债。

反战运动 早在1903年（明治36年）春，报纸杂志便展开了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宣传，鼓动开战。右翼保守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把人民苦于贫困而怨恨政府的情绪转移到对外强硬政策上面去了。

在这种情势下，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1870—1933）、基督教徒内村鉴三（1861—1930）通过《万朝报》进行了反战和平的热烈宣传。到了战争终于不能避免的时候，《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泪香）（1862—1920）便放弃了反战的主张。幸德、堺、内村等为了坚持反战立场，退出了万朝报社。

内村因为不能坚持真理，乃转移笔锋不谈一切政治问题。而幸德与堺则与同志于1903年（明治36年）11月组织“平民社”，出版了以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为宗旨的《平民新

闻》(周刊)。它是站在工人立场的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报纸。参加者有石川三四郎(1876—1956)、西川光次郎、安部矶雄、木下尚江、片山潜等。此外，田冈岭云(1870—1912)、白柳秀湖(1884—1949)、伊藤银月(1871—1924)、中里介山(1885—1944)等经常为该周刊撰稿。平福百穗(1877—1933)、小川芋钱(1868—1938)等杰出的画家也常将画稿寄交该报刊登。

战争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进行。日本陆军主力从朝鲜向南满洲进攻，另一支强大部队攻入辽东半岛，于1905年(明治38年)1月攻陷号称难攻不落的旅顺要塞。其后，全军以破竹之势向北推进，3月10日在沈阳会战中获胜。而海军则在黄海之战及其他战争中击沉或封锁了俄国远东舰队。

另一方面，人民的生活却陷于非常痛苦。政府通过纺织品消费税、通行税(走路也要抽税)以及其他以间接税为主的一连串的增税、捐献、摊派公债、新设盐专卖制、扩大烟草专卖等各种办法，尽量压榨人民。此外，更通过战时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加倍压榨人民。而壮年男子又相继被

征入伍，动员的兵力达一百零八万人。农家的耕畜也被征用了。结果，使农村衰落，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陷于最低水平。例如京都西阵，出现五千名贫民和连一斗糠只掺一合米的饭都吃不上的人们。爱知县西部零散的织布业地带被解雇的女工竟流落为娼妓，很多被送到朝鲜和广岛去。

《平民新闻》虽屡屡被命令停刊或处罚负责人，但它并没有屈服，继续报道人民的困苦，反对战争。

更值得提及的是，平民社向遥远的海外爱好和平的同志发出呼吁，倡导以国际团结来反对战争。1904年《平民新闻》发表了《告俄国社会党书》的社论，呼吁日俄两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分种族和地域的不同，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认为这一呼吁是与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发表反对合并亚尔萨斯·洛林的宣言，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一事具有同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决心掀起日俄两国人民反战反帝的共同斗争。

1904年8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召开的

各国社会党大会上，日本代表片山潜和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在讲台上紧密地握手，双方都发表了坚决打倒两国专制政府的军国主义的演说。大会全场一致地通过了法国代表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案。

尽管在政府和统治阶级煽动的假爱国主义的热狂中，而反战、厌战的情绪却深入人心。诗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给进攻旅顺的弟弟题为《君勿死去》的诗中有“旅顺城的存亡算什么”的句子，激烈地反对战争。大冢楠绪子（1875—1910）在《百度参拜》^①一诗中写道：“当被问道国家和丈夫孰重的时候，只有默默而饮泣。”这些诗曾公开登载在大杂志上，博得人民的喜爱，政府对之也无可奈何。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立川云平也曾攻击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并指出思想是不能用暴力压服的。

《平民新闻》遭到一次又一次的镇压，终于在1905年1月被迫停刊了。但是平民社的人们仍

^① 日本风俗，凡欲为亲人求福，或为仇人降灾，每晨赴自己信奉的寺庙中祈祷，叩首后退至头门，折回再拜，反复参拜百次，连续二十一天，以表虔诚，称为“百度参拜”。——校者

然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俄国第一次革命和日俄战争的结束 日军在沈阳会战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已濒于兵尽弹绝的境地。士兵连预备役都召集完了，将校和下级军官已极端缺乏。此外，战费的筹措也成为不可能了，完全没有增税和发行国内公债的余力，并失去了募集外债的可能性。原因是美英的资本家害怕进一步援助日本，会使它得到彻底的胜利，完全独占中国东北的关系。这样便使日本难于继续作战。

另一方面，俄国如果只是在远东和日本作战，还有增派陆军主力的可能，但由于国内发生革命，使沙皇难于继续进行战争。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受到半农奴式的残酷剥削，处于完全无权的状况。又帝俄压迫许多少数民族，被称为“民族的监狱”。更由于沙皇政府干涉别国的革命运动，又被称为“国际的宪兵”。

帝俄自 1861 年实行不彻底的农奴解放以来，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也成长起来了，并且出现了几

个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而组织的团体。只是当时的民粹派(少数的革命知识分子以农民为基础,实行个人恐怖,企图推翻沙皇制度的团体)在革命队伍中居支配地位。而普列汉诺夫则在国外组织“劳动解放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民粹派。列宁则在彼得堡组织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事组织工人的活动,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从二十世纪初叶起,俄国的工人运动迅速地高涨起来。又在工人运动影响之下,农民也展开了革命的斗争。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也高涨起来了。1903年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拥有纲领和章程及统一领导组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党围绕着组织问题分裂为两个集团——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日俄战争爆发后,孟什维克堕落到保护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的立场了。与此相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肯定了这次战争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坚决主张只有沙皇军队失败才能早日结束战争,对俄国人民才有利。

沙皇政府为了把高涨起来的国内革命运动转向于对外战争，乃发动日俄战争。但结果适得其反，战争却促进了革命。

由于战争破坏了人民的生活，和宪兵政治的加紧压迫，以致俄国人民的革命情绪迅速地高涨起来了。1905年1月旅顺的陷落，使沙皇政府的威信扫地，人民的不满达于极点。1月22日彼得堡的工人在牧师加邦率领下，为了向沙皇请愿集会在冬宫前面，沙皇的军队向工人开始射击，使雪白的广场上立刻染上了被害工人的鲜血。在“血的星期日”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展开了大罢工。

工人阶级从经济罢工发展为要求打倒沙皇专制的政治罢工，5月各城市都发生了同盟罢工。工人也开始武装起来，伊凡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把联合罢工的委员会改为工人的权力机关“苏维埃”。在工人阶级斗争的鼓舞下，农民情绪激昂起来了，部分地区发生了在工人领导下的农民斗争。6月停泊在敖德萨的“波将金”号铁甲舰的水兵爆发了起义。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也趋于激烈。

领导这次革命的孟什维克，认为这次革命是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主张工人应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并放弃对农民的领导。与它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才能获得成功。事实上资产阶级看到人民革命的高涨，则企图和沙皇结成联盟。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迅速地加强了。10月，革命蔓延至全国，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使俄国的工业陷于麻痹状态。政府企图集结大军镇压工人，可是运送军队的铁路一条也不通了。沙皇终于让步，在10月30日颁布了承认人民基本人权的诏书。然而工人看清了这种让步并不是实质的让步，12月，他们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以莫斯科为首在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终于失败了。但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不仅动摇了沙皇制度的基础，并给予全世界帝国主义体制以重大打击。欧美的工人运动在这次革命的影响下飞跃地发展起来了。亚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急剧地高涨起来了。

日本社会主义者间已经萌芽的国际主义精

神，到俄国革命时更前进了一步。《平民新闻》停刊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报纸《直言》，几乎每期都说明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示了日本人民对它的共鸣。

在第七号(1905年3月19日)《告俘虏们》的文章中写道：“各位：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犹如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正如西欧各国的革命经常是等待法国的信号那样，现在东方丧失了独立的国家，看到俄国革命的信号，急于想恢复独立——请看中国！请看朝鲜！”^①

朴茨茅斯和约 当俄国国内革命象暴风般发展起来的时候，1905年5月27日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日本海被日本联合舰队所歼灭，更增加了沙皇政府继续作战的困难。而国内的革命，如上所述，终于波及沙皇军队内部去了。

^① 通常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促使亚洲觉醒的信号，于是很多人认为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具有进步作用。但是亚洲的觉醒，基本上不是由于日俄战争，而是由于俄国第一次革命唤醒的。这一点，如上所述，当时日本的先进人士就已经看得很清楚。日本的胜利，确实给印度、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信心，但它没有象俄国第一次革命影响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惧怕俄国革命的不仅是沙皇政府，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也同样害怕俄国革命会影响本国的工人阶级，害怕做欧洲反动支柱的帝俄会崩溃。德国皇帝在日本海海战后，担心俄国的进一步失败，会使沙皇的生命也难得保住，再三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田奈德：《日俄战争和罗斯福》）。日军在沈阳会战和日本海海战中所获得的胜利，出乎英美意料之外，他们感到不安，想伺机出来干涉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抓住日本希求斡旋的机会，乃于6月劝告日俄两国讲和，敖德萨的水兵起义，加强了罗斯福促成日俄媾和的信心。沙皇也只有讲和之一法。结果，日俄两国于1905年9月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由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1855—1911）和俄国全权代表维特签订了媾和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迫使俄国割让南部库页岛，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并将南满铁路、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其他从中国手中夺去的权利让给日本。日本虽然想攫取更多的权利，但因没有继续作战的自信，只得屈服在美国压力之下。

第二节 垄断财阀的成长和 寄生地主制的统治

人民的牺牲和统治阶级巨利 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即或取得胜利，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只有使他们的生活遭受破坏和流血牺牲。交战二十个月间，战死和因伤致死者达十万六千八百二十人，受伤者达十七万人以上，患病者达二十二万人以上（其中六万三千六百零一人死亡）。实际上为了天皇制、资本家和地主的战争而死伤的兵士，几占总兵力的40%。

由于农村中的劳动力被夺走，再受重税负担，牛马和车子也被劫走，农村衰落了。战争的头一年虽然勉强混过去了，但第二年即1905年便发生了空前凄惨的大歉收。由于政府为了保持地主的利益，采取了高米价政策，大歉收立刻成了大饥馑。特别是东北数百万人民就和幕末天保期一样，已临濒于饿死的危险。日本的统治者虽然有运送军队的铁路，但没有运送粮食给饥民的火车。

人民大众的血汗和眼泪，使高官、将军们晋升

为华族，增加了财富、荣誉和特权，资本家、地主和富豪袖手便从人民血汗所凝成的税款中获得公债利息（利率为5.4%—8.25%），取得各种补贴，得到军事费中二十亿元的军需物资订货，获得战时超额利润。例如战前的1903年（明治36年）全国银行赢利约一亿四千二百万元，而战后的1907年（明治40年）则增加了60%，达两亿两千四百万元，同一时期内全国工业公司的公积金，也从三千万元左右激增一倍以上，达六千四百五十万元。其中，同一时期，纺纱联合会所属各公司的赢利，从一千三百一十万元，激增两倍多，达四千零四十七万元。当时的《东洋经济新报》写道：“公司和银行的人们，实际上从内心欢迎战争”。这是完全正确的。

产业的发展 以战时利润和扩大军需生产为动力，以及利用上述牺牲人民的鲜血在朝鲜与中国东北所获得的独占乃至半独占的市场，使资本主义产业飞跃地发展起来了。各行业公司数和资本额增加如下：

各种产业中，工业的发展最为迅速。纺纱、缫丝等轻工业也继续发展了。纺纱业每日平均开车

的纱锭数从 1903 年一百二十九万枚增至 1914 年的二百四十一万枚，生产量从八十万包增至一百六十七万包。同时期内缫丝业的机器缫丝增加两倍以上，手工缫丝则减少了；1914 年机器缫丝产量为二百八十九万贯，而手工缫丝只有六十一万贯，说明这个部门也机械化了。

日俄战争后，获得显著发展的是电气、煤气、自来水和机械工具、造船、炼钢等重工业。全工业部门中使用动力的工厂数，除国营工厂外，达二点七倍，而其中机械工具、造船、铸造等工厂数则达三点八倍。

然而在重工业部门中，国营工厂仍居重要地位。国营工厂数从 1906 年的六十六个增加到 1914 年的八百四十二个，使用的马力数则从十一万马力增加到三十一万马力。1907 年国营重工业工厂数为四十一个，同种类的民营工厂数则为七百零三个，但使用的动力，前者为六万四千马力，后者仅两万五千马力，可以看出国营工厂所占比重之大了。特别是国营八幡制铁所，1906 年大加扩充，生产的生铁占国产总额的 70% 以上，钢占 90%。继八幡之后，1907 年由三井出资，得到海

军的援助,并输入外资,在北海道室兰建立了日本制钢所,也是半国营性质。

第8表 各业公司数与资本额的增加

	1903年	1906年	1909年	1914年
总计公司数	9,247	9,329	11,549	24,954
实收资本(千元)	887,606	1,069,706	1,367,164	5,848,640
农业公司数	186	188	264	557
实收资本(千元)	2,308	2,943	7,999	54,827
水产业公司数	84	91	131	209
实收资本(千元)	1,590	4,733	9,205	29,905
矿业公司数	125	134	178	347
实收资本(千元)	23,297	47,432	175,508	456,257
工业公司数	2,372	2,407	3,262	9,213
实收资本(千元)	148,397	198,567	367,277	2,156,568
商业公司数	5,786	5,785	6,869	12,866
实收资本(千元)	449,058	498,014	630,847	2,565,850
运输业公司数	739	742	845	1,761
实收资本(千元)	262,956	318,017	176,327	585,234

(根据内閣统计局《企业的发展与资本的集积》)

财阀进行垄断 正如钢铁业所表明,重工业的发展,第一,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日俄战争后,军部强烈要求增设陆军四师和海军八八舰队(以

战舰八艘和巡洋舰八艘为骨干的大舰队)。由于财力不足,没有按照军部要求那样做,不过却在继续扩充军备,成为发展重工业的基础。

第二,重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资本与财阀或是财阀系统和政府有特别勾结的资本所垄断。造船方面的三菱、川崎,钢铁、机械工具生产方面的三井、川崎,化学工业方面的住友等即其中的典型。电力事业也由东京电灯与猪苗代水力发电厂等财阀系大公司所垄断着。

第三,这些工业部门,在直接投资或技术援助的形式下,输入了大量外国资本。从1906年到1913年外资(大部分为英美资本)增加到六亿四千万日元。同期间,全国公司的实收资本约增加十亿元,与此相比,就可以明白外资的巨大意义了。日本帝国主义由于负担日俄战争的战费外债所造成的对英美垄断资本的从属性,因此更是加深了。

财阀垄断资本在其他工业、矿业以及银行业等部门也都确立并发展起来了。促成发展的因素是1907年(明治40年)的危机。

1906年(明治39年)以两亿元股本(官股一半)创设“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以此为开端,出现了企业热潮,建立起很多产业公司,股票也在不断地上涨。然而昙花一现,从1907年起开始暴落,使战后投机性公司以及与它有联系的中、小银行纷纷破产。日本股票的暴落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有关,即受了美国的影响。日本的经济危机从金融部门蔓延至产业部门,中、小的铜、铁业大部分破产。1908年纺纱业相继实行减产歇业等,1909年非直接军需产业的肥料、面粉、制糖、水产、仓库、金融业等在军事繁荣期间所设立的中、小公司,大多数都破产了。

这些中、小公司和得到国家资本援助的垄断军需公司不同,刚刚创办,财阀就预料到它们将被整理。1907年1月,危机爆发前不久,三井物产的理事就曾说:尽管创办了很多水力电气、纺纱、矿山、肥料、面粉、制糖等企业,但这些迟早会遇到困难,或经不起困难而破产,不过这个困难时期,实际上是整理企业的时代,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实奠基于此时(见《东洋经济新报》)。果然,通过危机,确立了财阀对整个产业的支配权。

纺纱业中三井系的钟渊纺纱公司和三菱系的富士瓦斯纺纱公司壮大了。1913年（大正2年）以这两公司为首的七个公司，集中了全纺纱业资本的57.4%，纱锭的58.7%。造纸业中三井的王子造纸、制糖业的大日本精糖、石油业的日本石油和宝田石油、肥料业的大日本人造肥料（由东京人造肥料和大阪硫酸钠合并成立）等分别在各个部门中用吸收、合并的方法进行资本的集中，进而至于生产的积聚。又占日本矿业生产半数的煤矿业，财阀系五公司和海军直营煤矿，垄断了整个产量的54%。1913年住友、古河、藤田、三菱、久原五大公司的铜矿产量则达全国总产量的69%。

这些大公司在各个部门中相互缔结了价格协定、共同销售、生产协定等，结成卡特尔。而纺纱、制糖、肥料、石油等部门的大公司则进而破坏这种协定，合并经营困难的公司，使企业愈益集中。和三井、三菱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如化学肥料业，则在掌握经销、流通的——象三井物产那样——财阀公司的推动下，组成了卡特尔。

企业的集中，特别是在财阀资本的推动下进行，有很多并不是以生产的积聚为前提。而三井、

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银行加强它对产业的支配权。1910年组成了十六个银行的辛迪加。1909年三井将自己的企业以直系公司的形式改组为康采恩，继而三菱、住友也实行改组，完成了财阀对金融和产业的垄断形式，和国家资本密切结合起来，强化了对产业的支配体制。于是确立了以财阀为首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

财阀的支配、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由于国家和垄断组织——财阀的结合，很快地促成了。这样，使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官僚的军事的特征。这种特征和八幡制铁所在炼钢方面的垄断相平行，国有铁路方面表现得最显著。

政府和军部从军事的立场出发，很早就想把铁路收归国有，日俄战争的经验，更加强了这种想法。因而政府在1906年（明治39年）便将重要铁路收归国有，把纵贯朝鲜的铁路和南满铁路接轨，统制国内交通，完成军事动员运输网，建立为侵略中国的军用铁路干线。在铁路国有政策下，政府以四亿七千万元——相当于其实际投资的两倍——收买以三井、三菱系公司为首的三十二个私营铁路公司，发给公司五厘利息的公债。如按实际投

资计算，公债利率达九厘六毫之多。也就是说资本家在铁路国有后，不负直接经营铁路的劳苦和危险，与国家资本相结合，寄生在国家资本之下，稳得10%的高额利息。其后，三井、三菱进而把三等煤以头等煤的价格卖给国有铁路，此外，又通过将钢铁、铁轨、车辆、机器、土木材料、衣服等卖给国营铁路，继续取得巨额利润，加深了和国家的结合。

1911年(明治44年)才完成改订条约，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开始以关税保护国内产业。但它不是保护一般产业，而不外是保护财阀垄断资本和以外米进口关税保护寄生地主制而已。关于进口米的关税问题，当时曾有过激烈争论。产业资产阶级因为降低米价是维持低工资基础条件之一，曾反对关税，而帝国农会以及其他地主组织强烈地要求增加关税。又三菱银行董事等一部分有力的垄断资本家也从需要维持半封建的农村出发，赞成收关税。这样，便决定了征收外米进口税。

资本输出的开始 这样形成和成长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尽管一方面处于不得不输入巨额外

资的情况下；但另一方面，却很快地向外输出资本了。资本输出开始于台湾——以前中日甲午战争所获得的殖民地——的糖业投资，和基于中日甲午战争从朝鲜攫取的利权，由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修筑汉城仁川间、汉城釜山间的铁路，以及国家资本对中国大冶铁矿的投资，民间资本建立的上海纺纱公司（1902年）等。向中国输出纺纱资本，是有意识地企图抑制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

日俄战争后，又输出了很多以国家资本为首的具有军事政治意义的资本。其中以南满铁路公司的设立最为典型。三菱在朝鲜建立的兼二浦制铁所（1909年）、大仓洋行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本溪湖煤铁公司（1909年）以及其他为了确保原料资源的投资，和为了掠夺朝鲜的土地和资源而设立的半官半民的东洋拓殖股份公司（1908年）等就是例子。另一方面，纺纱资本也在1906年建立了上海纺纱第二工厂，1911年和1913年上海的内外棉纺织公司开始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华纺织业有了飞跃的发展。向朝鲜输出的民间资本虽然也有一些产业资本，但如东洋拓殖公司等仍

以掠夺朝鲜农民为目的的商业与高利贷资本居多数。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米粮商品化 由于日俄战争中战时食粮的需要和战时战后资本主义产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政府为了保证战时食粮的供应，在宣战的同一天，向地方长官颁发“改良农业”的严厉命令。这是由于战争中不能从中国东北输入豆饼以及一般肥料的缺乏和涨价、劳动力的被征入伍和耕畜的征用，必然引起生产力的低落。改良农业的目的，是政府企图用强化劳动来增加单位产量。因此，要求用盐水选洗米麦种籽、采行长条形的共同秧田、直线插秧、用人手消除害虫、推广高产果树、蚕种和饲料等。实际上农民不能忍受这般苛重的劳动，曾反对这种“农业改良”，但遭到政府的镇压。政府“为了增加国富，采取了不惜与农民为敌，也要坚决执行的方针”（广岛县农会），与地主组织的农会勾结起来，强制执行。因之在“邻保互助”的美名下，强制组织“农民合作社”，战后也仍然保存下来。因此稻麦的种植面积与每反产量，如下表所列，有了增加。

第9表 稻麦种植面积与每反产量的增加

		1902年	1907年
米	总产量	3693万石	4905万石
	种植面积	284万町步	290万町步
	每反产量	1.3石	1.6石
大麦	总产量	814万石	1013万石
	种植面积	64万町步	65万町步
	每反产量	1.27石	1.72石

(根据土屋乔雄:《续日本经济史概要》)

第10表 养蚕业和茶业的发展

	1902年	1907年	1914年
茧	2549万贯	3456万贯	4412万贯
茶叶	678万贯	736万贯	866万贯

(根据土屋乔雄:《续日本经济史概要》)

又随着主要出口业缫丝业的繁荣,桑园面积自1902年经1907年至1913年间,从三十一万七千町步增至三十九万町步,更飞速地增加到四十五万町步。因之产茧量也如上表所列,有了激增。养蚕成为农家现款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又由于养

蚕需要一定时期的集中劳动，因而在扩大经营的同时，不只是作为副业，作为专业经营的也增多了。此外，蔬菜、苹果、蜜柑等供给城市消费的商品和除虫菊、烟草等的生产也急剧增加了。

官僚和地主的勾结 农业生产这般发展，也给寄生地主带来最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产乃至商品化是“和农民斗争”，单纯为了地主、商人以及天皇制的利益而强迫推行的。他们贪图利益，阻碍了农民的扩大经营。更于 1905 年（明治 38 年）作为战时非常特别税之一，对进口糙米与白米征收关税，战后也未废除；到 1911 年（明治 44 年）又将每百斤税率从六角提高到一元。这有保护地主的作用。地主是供给国产米粮的大户，提高税率，就使他们能和廉价的进口米竞争。

政府为了强制推行过去由米商同业公会所办理的谷米检验制度，又于 1910 年（明治 43 年）令各府县制定粮食检验制度。虽然有些县从 1900 年就实行了粮食检验，但到这时才制度化。1911 年已有二十六府县实行，以后更推广到全国。

根据检验制度，佃农所交的米粮必须经过从品质、干燥、容量、除虫以至包装的严格检验，要合

规格。这与封建时代领主检验年贡米是同样的，只是政府代替地主来检验。此后便在各地组织了地主会，从1908年到1912年竟达五百零七个之多。各地都联合起来举行地租米的评定会，对交纳不合格米的佃农予以罚米的处分。

寄生地主制的完成 地主虽然得到很大的利益，并不把它投入农业经营。有的投资地方银行，有的投资工业，有的亲自经营工业。特别是在1910年以后，政府扶助劝业银行实行土地抵押贷款，更助长了地主寄生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富裕中农虽然一部分有了富农化的倾向，但因为一般地是寄生地主利益大，所以地价昂贵，又阻碍了富裕农民购买土地，扩大经营。因此富农只求能赚钱，与其扩大经营，不如自己也做寄生地主来得稳当。因此便如下表所示，一——二町、二——三町的中层自耕农只有日益减少。

在这期间，小农和佃农、贫农更加穷困了。1905年的大歉收和饥馑充分地暴露了战争给农民带来的痛苦。1904年以来的增税，加重了消费税。1908年强化对酒的管理，烟草的专卖愈益把农民卷入货币经济中。1911年（明治44年）起，

部落领有的森林统一划归町村所有，因之，农民在经营上所需要的公地被剥夺了，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肥料来源。

第 11 表 自耕农户数的变迁
(全国七十三个村平均一村数)

	1889年		1904年		1909年		1914年	
	户	%	户	%	户	%	户	%
5反—1町	66.6	(39.8)	66.7	(39.4)	63.7	(39.7)	64.1	(40.2)
1—2町	67.6	(40.5)	66.8	(39.5)	64.4	(40.2)	64.8	(40.3)
2—3町	22.8	(13.7)	23.8	(14.1)	21.6	(13.6)	20.3	(12.7)
3町以上	10.0	(6.0)	11.9	(7.0)	10.6	(6.5)	10.7	(6.8)
总计	167.0	(100.0)	169.2	(100.0)	160.3	(100.0)	159.9	(100.0)

(根据《日本农业发达史》第四卷)

“无论哪个树林，连接落叶或割青草的权利都落到有余钱的人的手中。……一般都感到缺乏落叶和青草，而购进各种便利的人造肥料。但是这也只对金钱充裕的人便利，而贫穷的农民是没有份的。然而，不用这些肥料，就不能获得足够的产量以缴纳一般水平的地租，因此他们(贫农)煞费苦心设法购买人造肥料。”(长冢节：《土》)

于是贫农变成了地主、富农的债奴。根据大藏省的调查，1912年农家负债，以不动产担保者

达三亿七千八百万元，以动产担保者为七千九百万元，无担保者则为两亿八千九百万元。其后负债也在急剧地增加着，90%以上是自耕农和自耕农兼佃农的负债，而且大部分是10—25%的高利。

同时，佃农从1908年的一百四十九万户，约当寄生地主除外的自耕农以下的农户的27.58%，增至1915年的一百五十二万户，达27.92%。又同一时期，自耕农兼佃农则由二百十二万户即39.15%增至二百二十二万户，达40.56%，而纯粹的自耕农则从33.27%减少到31.25%。这样，就有70%的农民或多或少都租佃地主的土地了。这时经营地主几乎也都变成了寄生地主。地租率由于各地的农民斗争虽略有减低，但地主则依靠加强了的统治力，致力于提高生产力，增加其实际上的地租收入。

第12表 地租的变迁

	东北6县	关东6县	中央2府5县	西南5县
1897年	1.04石	1.16石	1.24石	1.15石
1902年	1.15	1.19	1.25	1.18
1908年	1.20	1.20	1.25	1.19

(根据《日本农业发达史》第四卷)

为了保证这种剥削,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建立了有组织的保证寄生地主制的农会和产业协会等。

1907年(明治40年)各地建立了农业实验场。同年农会也改名为帝国农会,直接和中央政权结合起来。1909年由农商务、财政、内务各省官僚和地主代表合组了产业协会的中央机关,名“大日本产业协会中央会”,并在全国各农村设有支部。这些机关都由地主掌握,地主成了半官僚。为了维护半封建地主制度,他们使用经济的、物质的、警察的力量以至和修身说教等一切手段和方法。此外,警察也和地主机关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于直接强迫“改良农业”,实行所谓“警察农政”。

至此,寄生地主制全面完成了。同时,也充满着矛盾。

第三节 吞并朝鲜、掠夺殖民地

吞并朝鲜 经中日、日俄两次战争,日本取得了超过本国总面积76%以上的广大殖民地,并将超过本国数倍的南满洲置于半殖民地势力范围

内。仅就这一点看来，日本已经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

1904年(明治37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立即强迫韩国(朝鲜于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签订日韩议定书，继而在8月，又强迫与之订立第一次日韩协约和雇佣外人协定，把朝鲜变为日本属国。这些“议定书”和“协定”与现在把日本束缚在美国占领体制下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是类似的。

然而日本不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谅解，还是没有把朝鲜变为殖民地的自信；因之，首先征求美帝国主义的同意。因为美国不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南进威胁菲律宾，而指望它北进与帝俄斗争，所以在朴茨茅斯条约签订之前，1905年7月29日就和日本签订了密约(桂、塔夫脱密约)，内容是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而日本则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权。继而又在同年8月和英国签订第二次日英同盟，日本担负协助英国安全地统治印度的义务，英国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权。在日本取得美英两国承认之后，俄国才被迫在朴茨茅斯和约上承认了日本的同样权利。因为日本帝

国主义成了美英帝国主义的“远东宪兵”，才敢大胆地在朝鲜大肆暴威。

1905年11月的第二次日韩协约中规定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由伊藤博文出任朝鲜统监。继而在1907年又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将韩国的立法、行政以及人事等大权，均置诸统监之手。不久，便解散韩国军队。至1910年（明治43年）日本终于以大军威压汉城，包围宫廷，在刺刀的威压下迫使韩国皇帝承认日韩合并，反对者则惨遭杀害。（朝鲜民族的反抗斗争将在第五节叙述）

日本改统监府为总督府，规定选陆海军大将任总督，乃任命陆军大将寺内正毅（1852—1919）为第一任总督。总督直属天皇，统帅驻朝鲜的日本陆海军，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行政等大权。总督下面任陆军中将一人为宪兵司令官兼警察总监；各道宪兵队长兼任各道警察队长，树立了宪兵政治体制。合并初期，在朝鲜全国置一万六千二百十四处宪兵警察机关，布置了两万二千名宪兵和二十万宪兵辅助人员^①。司法官、行政官更不

^① 此项数字系根据朝鲜历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朝鲜民族解放史》的记载，如根据《续日本宪兵史》（田崎治久编著的半官

必说,连小学教员也都武装了,事实上,所有的官吏都变成了宪兵。不仅如此,政府更在朝鲜布置了一个师团的军队,到1915年以后则增加到两个师团。

日本帝国主义以这一支暴力镇压了朝鲜人民的反抗,除反动卖国的贵族外,剥夺了一切朝鲜人的权利。朝鲜人在警察即决权与强制执行权的暴威下,受到无法无天的压制,他们不经过法院审判,就被任意处置。

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是把朝鲜作为侵略亚洲大陆的据点。1911年10月完成了鸭绿江铁桥和安沈铁路的修建,把合并前已修筑的汉城釜山、汉城新义州的纵贯铁路和中国东北连结起来,完成了侵略中国的动脉。又以此为干线,在合并后修建了湖南、京元、咸镜等铁路。港湾方面,则修整永兴、镇海两大海军基地,并立即建立起电信网。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些设备说成是把朝鲜近代化了,其实这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朝鲜实

方记录),则驻朝鲜的宪兵自1913年4月增加后,司令官以下共计七千九百九十九人,分布在宪兵本部、分队以及派遣所等一百九十九个机构中。本文所举机关数和人数,不限于宪兵,包括警察及辅助人员在內。

行军事统治和剥削而建设的，不是为了朝鲜民族的利益和幸福。朝鲜的民族工业被 1910 年（明治 43 年）12 月颁布的“公司令”（朝鲜设立公司须经总督许可）所压抑。朝鲜的民族资本在 1911 年拥有七百四十万元，至 1917 年几乎没有增加。与此相反，这一时期的日本资本则从一千零五十万元增至五千九百万元，增加达五倍半。其中大部分是矿业、军需工业、土地公司和金融公司。

日本掠夺朝鲜，在“土地调查”上最露骨地使用了暴力。早在合并前的 1910 年，统监府就已开始了“土地调查”，合并后的 1912 年颁布了土地调查令，经四次变更计划，八年间夺取了朝鲜人的大部分土地。即把官有地和民有地区分开来。依此，（一）一方面承认朝鲜贵族、官僚的封建占有地的所有权，保证他们剥削 50%—70% 的高额地租，使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柱。同时，（二）将未开垦的土地、沙地、旧公有地、旧公田的大部分计八百八十万一千五百十三町步土地收为总督府的领有地。（三）又在军用地、铁路用地等名义下，夺取了大量的土地。（四）更提出了为朝鲜农民所不能理解的土地申报手续，以所有权证据不充分或违

反手续等名义，夺取朝鲜农民的耕地、山林和原野。把掠夺来的这些土地的一部分，以几乎等于零的贱价卖给东洋拓殖股份公司以及日人的其他地产公司。

这样，总督府便成为朝鲜最大的地主，和它勾结的日本资本家都变成了大地主兼高利贷金融業者，逐年夺取朝鲜农民的土地而肥胖起来了。

此外，日本政府又奖励日本移民，总督府将从朝鲜人手中夺来的土地交给他们。这和日本政府向满洲移民同样，目的是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人的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就是想把国内半封建地主制的深刻矛盾，向榨取殖民地的方面谋出路。政府向贫穷的农民宣传：“朝鲜、满洲有无限的土地”，而奖励移民。当然，日本本土的贫农不能在朝鲜变成富农，移往朝鲜去的农民，几乎没有。

朝鲜出产的米粮被夺来补足日本国内的粮食。1914年（大正3年）收获米粮一千四百万石中运往日本的计一百四十万石，尽管1919年（大正8年）的产量减少到一千二百万石，而运往日本的米却倍增至二百八十万石。其后更加紧掠夺朝鲜的米粮，因而朝鲜出产的米愈多，相对地，朝鲜人

的消费量则愈加减少了。

如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把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第二向朝鲜输出资本攫取殖民地利润，剥削朝鲜农民使之隶属化；第三独占朝鲜为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资源、食粮供给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以后便役使大量没落了的朝鲜人民，视同奴隶，替日本从事最悲惨的奴隶劳动。

统治南满洲 日俄战争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存在，在既非日本也非俄国的领土上作战，日俄和约中则恣意决定处理中国的领土。中国虽然提出抗议，但日本以武力压迫中国。不仅迫使中国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关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规定，更进而夺取了新的利权。

翌年即 1906 年，日本从俄国手中接管了旅顺、长春间的中东铁路，设立南满洲铁道公司，独霸南满铁路。日本称辽东半岛的租借地为关东州，置关东都督府，以陆军将官为都督，除执掌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的行政外，还有军事指挥权，事实上实行了军政。这就是后日关东军的起源。都督制度就是对中国人民进行军事统治和掠夺的体制。关东州是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根据地，旅顺比

俄国经营时代更加大规模地要塞化了。

美帝国主义在满洲铁路中立化、机会均等的美名下，很早就企图以金元的力量，支配满洲。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于1905年10月和日本政府代表签订了与日本合资经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契约。然而另一方面摩尔根系的美国金融资本家则和日本媾和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签订了向南满铁路投资的契约。等到小村回国后，知道哈里曼的收买契约是抵制日本独占南满铁路，乃加以反对，并宣布废弃该约。日本就这样在美国资本的互相竞争中独占了南满铁路。数年后，满铁公司向纽约银行家借到三百五十万元贷款，又从美国买进铁轨、机车等以维持满铁的经营。

日本就这样在金融上依靠外国资本而独占了南满铁路的经营。又由于租借旅顺、大连地区，控制着大连港。日本利用大连港，表面上说“机会均等”或“门户开放”，实际上无论在关税或是运输方面，对于外国商品都予以差别待遇。日本货除了这个有利的条件外，再加政府和正金银行对于运往中国东北货物在金融上给以特别保护，于是在中国东北市场上以棉织品、杂货为首，充满着日本

商品，很快地便驱逐了英美商品。而在这种输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三井物产公司。此外，又以满铁公司和大仓洋行为中心，相继攫取了开采抚顺、烟台的煤、本溪湖的铁等帝国主义的权益。

日本背弃了战前开放满洲门户的诺言，为了巩固日本在南满的垄断地位，1907年、1910年、1912年曾三次和帝俄签订关于日俄两帝国主义分割满蒙势力范围的协定。帝俄在日俄战争之后企图向近东扩张，加深了和德国的对立，因此才缔结了这一协定。

剥削台湾和库页岛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以后，任命陆海军大将为总督（第一任为海军的桦山资纪〔1836—1922〕，第二任为陆军的桂太郎，第三任为陆军的乃木希典〔1848—1912〕，第四任为陆军的儿玉源太郎），在总督的指挥下置台湾军，用军队镇压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巩固其统治。继而从1898年（明治31年）起，在全岛设置二十个地方厅，实权则操在警务科手中。各支厅长以下全部职员由警察担任。强迫实行类似德川时代五人组的保甲制度，建立起人民对“治安”负连带责任的体制。政府就这样的在台湾全岛确

立了军事警察的统治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日本从1910年到1914年发动了“讨伐生蕃事业”，历时五年，费两千余万元巨款，摧毁了台湾人民的抵抗，企图彻底消灭他们。

这种军事统治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略华南和南洋结合进行的。义和团战争时日军占领厦门，就是把台湾作为军事前进基地。美西战争时，台湾军参谋也曾去菲律宾策划，寻找向南洋扩张的机会。

总督府在完成统治机构的时候，为了把台湾作为军事基地，1899年着手修筑纵贯台湾的铁路，仅七年就竣工了，1906年开始通车。这条铁路连日本的资本家也认为不是营利事业，因而他们虽曾设计，但却未着手修建。基隆港的扩建修整，与其说是为了商业目的，也不如说是为了军事目的。于是以三井为首的特权大商人可以大胆地向台湾发展，垄断台湾贸易，着手在当地经营制糖业。又在台湾总督府的特别保护下，铃木商店成长为财阀。

总督府继占领后的“土地调查”，1910年（明治43年）又进行了森林原野的调查，把经过调查

的林野的97%收为官有地，其中一部分卖给特权商人。总督府本身也成为大地主。又对盐、樟脑、烟草、鸦片烟实行专卖，牟取巨利。三井、铃木等垄断制糖公司，在总督府武力保护下夺得来的广泛土地上对台湾农民进行半奴隶的剥削，夺取暴利，而且至1911年止，政府又给了他们六百万元的补助费。

这样，台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向南方扩张的军事的政治的据点，同时，也变成了经济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日俄战争的结果，归日本领有的南库页岛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同台湾一样的。在灭绝原住民的政策下，一方面逐渐消灭原住民，另一方面使它成为三井造纸厂的纸浆工业地带而修筑了铁路，并修筑港湾作为北洋渔业基地，使之完全为垄断资本服务。又把南库页岛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库页岛和西伯利亚的军事基地。这点，1917年（大正6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后更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第四节 日本社会党和幸德事件

火烧东京警察机关 当日本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统治阶级以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而自豪的时候，在他们而前的工人、农民、市民则连续地进行了空前的大规模的斗争。

受到战争灾难而深怀不满的人民，在9月5日签订和约这天，爆发了火烧全东京警察机关的事件。

政友会的野心家是极端的军国主义者，总想找机会推翻内阁。他们和一部分产业资产阶级，欲将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转移到对讲和条约争取战胜果实太少上面去。签订和约这一天，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了反对和约国民大会。但当数万群众动员起来以后，超过了这些野心家的意图，而变为具有群众独立斗争的性质了。

早在9月3日，桂首相写给他的首领山县有朋的信中就曾报告说：“下层人民的激昂，把政务和社会混为一起，把讲和问题视为社会问题，即转化为对统治者的阶级斗争问题。这是应该特别警

惕的。必须把讲和问题化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务问题。”

5日的大会，在日比谷公园里虽暂告结束，但是群情愤激，深表不满，不肯轻易地散去。当警察想用武力强迫解散的时候，便立刻爆发为群众对统治者的实力反抗。三万（或谓五万、六万）参加者，首先捣毁了内务大臣官邸，并袭击了桂首相的御用报纸《国民新闻》（社长为德富苏峰）。接着分为几队，又新加入了一些群众，捣毁并放火烧毁东京全市的警察署、分署和派出所。群众仍愤愤不平，不以此为满足，进而从市内拥至郊区，一夜间反复地袭击了警察机关。群众曾袭击警视厅，但因有大队警察防守，未能达到目的。这时已与政治野心家所计划的反对和约运动没有丝毫关系了。国民大会的委员们有的怕事，情愿受拘留；有的则逃走了。

6日，虽经派近卫师团去镇压，并颁布了戒严令，但当天晚上，群众又在日比谷公园集合，并烧毁附近通行中的电车，再度袭击内相官邸，烧毁市内外剩下来的警察机关。东京全市十五个警察署中，有十三处被烧毁，而派出所被烧毁的有一百四

十一处，被破坏的有二十八处。群众方面被警察杀死或负重伤的达六百余名，被捕者竟达一千五百六十五人^①。

首都市民烧毁全部警察机关的消息传到横滨、大阪、名古屋、神户以及其他各地，民众立刻激昂起来。社会主义报纸《直言》把它和当时的俄国革命相比较，而加以评价说：“俄国革命是统一的、自觉的，这次事件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自觉的，但从其本质上看，今天的事件实际上和俄国革命是同样的，可以说是日本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革命的气氛”；并称赞“群众”力量的伟大。这种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这次事件也受了俄国革命所给世界人民的无形的精神上的影响）。

第二年（1906年）1月人心大致稳定之后，桂军阀内阁即行辞职，由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多少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侯爵西园寺公望（1849—1940）以政友会为与党，组织了内阁。

劳资纠纷的扩大和暴动 日俄战争后的阶级

^① 这次事件，过去只称之为“日比谷烧毁事件”，这不过是统治者极力缩小事件的阴谋而已。本文所引数字系采自《东京经济杂志》明治38年9月23日号。

斗争,从首都市民烧毁全部警察机关开始,劳资纠纷也以空前激烈的程度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从战争中的1905年前半期起,罢工就有了增加,规模也大了。8月,兵库县反对播州盐业公司降低工资的罢工,参加者就达三千六百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积累了财富,并扩大了营业,而资本主义掘墓人——工人的力量也壮大了。

1906年(明治39年)1月初,青森县大凑的海军修配厂发生了要求特别加薪的全体罢工,2月东京石川岛造船所,8月东京炮兵工厂,吴海军工厂等日本帝国主义基础的兵工厂陆续发生了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解雇工人的大罢工。12月大阪炮兵工厂一万六千名工人举行了为期十天的空前大罢工。原因是8月吴工厂罢工后,吴、舞鹤、东京的陆海军工厂都增加了工资,只有大阪没有增加,因而掀起罢工。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共同利害、阶级团结已超出地域而成长起来。首先在大工业化的国营军需工业中掀起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斗争。

1907年(明治40年)的经济危机,使劳资纠纷的次数和参加的人数都达到最高峰。造船厂、

船坞、兵工厂、煤矿和矿山的斗争尤为激烈。其中特别激烈的是2月足尾铜矿全体矿工三千人反对支付物品工资、增加现金工资、废除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和改善待遇等二十四项要求，遭到拒绝，即起而割断电线，用火药烧毁事务所，并占领了仓库。这里的工人南助松，以前曾在北海道夕张煤矿领导罢工，被驱逐后，携妻子白并操来足尾，组织工会，名“大日本劳动至诚会”。这次罢工在他的领导下，很久以前就有所准备，所以能坚持斗争。最后，终于出动三个中队的军队，经过十天虽被镇压下去，斗争却达到了目的。

以足尾暴动为导火线，4月末北海道幌内煤矿、6月四国别子铜矿，由要求提高工资转入暴动。在镇压别子的暴动中，也出动了军队。这次暴动就是因为资本家时时用奴隶主式的暴力压迫工人而引起的反抗。矿山中把矿工视同囚犯、视同奴隶，强迫劳动，只有通过这种决死的斗争才能得到一点改善。又在矿工中出现了象南助松这样的组织者，尽管还很幼稚，但开始拥有工会。这一点，说明了矿山工人阶级的成长。

农民斗争 农民也逐渐拥有很多的组织了。

根据农林省的统计,1907年(明治40年)有十九个佃农协会,五年后,则新建立起四十一个协会。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在山梨、长野、新潟、富山、三重、和歌山和九州地方受到相当的支持,即在此时。

农民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地主和佃农的对立。从广岛县四个郡反对共同秧田以及其他强制“改良农业”、要求减轻地租的大规模斗争(1907年)开始,以反对粮食检验为契机,各地都发生了租佃纠纷。

农民虽还不是公开的,但却提出某种理由,强烈地要求地主减轻地租。这种情况连真山青果(1878—1948)的小说《南小泉村》(1906年)虽是站在地主的立场,但字里行间也充满着憎恨的情绪,使世人认识到农民斗争是由于他们的生活陷于“同蛆虫一般”的惨状。1910年(明治43年)长冢节的小说《土》曾连续刊载在《朝日新闻》上,逼真地描绘了利根川畔佃农、贫农的悲惨生活。

日本社会党的成立 工、农、市民的斗争这样地壮大起来了。以此为背景,并与之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发展起来了。日俄战争结束那年10

月，平民社虽被迫解散，但平民社同人中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们在 1906 年 2 月便以堺利彦为中心（幸德秋水在国外）组成了日本社会党。虽曾向警察署提出申请书，表明“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没有揭示纲领。但无论如何，从这时开始，约一年内，社会主义政党却能够进行活动了。正式党员虽只有二百人左右，而警察则认为社会主义者在全国有两万五千余人。军队中也有了。它和六年前社会民主党的时候比较，社会主义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该党建立后三个月便组织市民进行反对东京市内电车涨价的斗争，继续达六个月之久。这说明社会党从思想团体发展为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了。它从 1907 年（明治 40 年）1 月起出版了机关报《平民新闻》，企图进一步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足尾的南助松就是该报的读者。他领导的斗争，曾和社会党取得联系。总的说来，社会党虽尚未超出知识分子、学生的思想宣传团体，但政府惧怕它和工人、市民、农民结合起来，1907 年 2 月 22 日便下令禁止。4 月，《平民新闻》出到第七十五号便被迫停刊了。

向国际主义前进 在这种苦难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的团结也加强了。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提倡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幸德和中国流亡到日本的民族主义革命家也有交往，《直言》和《平民新闻》经常发表支持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幸德的代表著作《社会主义精髓》也译成中文了。

1907年7月，乘着欢迎英国独立工党领袖哈笛来日本的机会，日本、中国、印度、菲律宾、越南的社会主义者、民族革命家们在东京召开了“东亚友好会”。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时候，日本人民最优秀的儿女就这样地和东亚各民族加强团结。

社会主义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合并朝鲜，也曾站在“世界平民阶级共同利益”的立场，通过了坚决反对的议决案。

“吾人尊重朝鲜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自治权利，认为帝国主义政策是违反世界平民阶级共同利益的。因而希望日本政府履行保障朝鲜独立的

诺言。”(1907年7月21日东京社会主义有志会)

幸德事件 然而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幸德在社会党被解散前不久，在美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回国，主张在日本这样专制的国家，除工人的“直接行动”——同盟罢工外，别无其他革命的途径。与此相反，片山潜、田添铁二(1873—1908)等在第二国际议会主义的影响下，则主张必须以争取普通选举权和议会主义来实现革命，两派对立着。幸德认为日本的议会没有什么力量，同时，又受了兵工厂一系列的大罢工和足尾铜矿斗争威力的感动，加强了他的除“直接行动”外别无其他途径的信念。工会还在有耶无耶的状态中，不可能发动同盟罢工。幸德的见解，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犯了对形势估计过高的“左”倾错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是具有同样意识的知识分子占多数，所以能获得他们的支持^①。

政府的镇压越来越紧。1908年6月，东京的社会主义者在欢迎出狱同志大会上，挂着“无政府共产”字样的红旗，并高唱革命歌，警察便立刻逮

^① 片山潜的议会主义，虽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但在当时的阶段上，比幸德路线的害处较小。

捕了堺、大杉荣(1885—1923)、荒畑寒村(1887—)等十五人，其中还有菅野须贺子(1881—1911)等四名妇女(红旗事件)。大杉被判监禁两年半，堺两年，其他数名也被处以监禁刑。这表明政府是不惜用任何卑劣手段，想消灭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久，西园寺内阁以镇压不力被撤换，桂太郎再度组阁(7月)，加紧镇压。

无政府主义急进派，对于这种镇压，不组织阶级的群众的斗争去反抗，而企图依靠个人的恐怖手段。1910年春菅野和信州的宫下太吉等人曾指出：“所谓天子是经济上掠夺的首领，政治上罪恶的根本，思想上迷信的源泉。必须推翻他”。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摧毁天皇制整个机构，认为只推倒坐在机构高峰上的天皇就可以了。

从他们的同志奥宫健之的疏忽的言行中，政府探明了他们的计划，逮捕了宫下以及以幸德为首当时在狱外进行活动的所有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与宫下案毫无关系，政府捏造他们是阴谋暗杀天皇。进行秘密审判，并无辜地判处二十四人以死刑，其中幸德、宫下、菅野、大石城之助等十二人于1911年(明治44年)1月24日执行(其他十

二人改为无期徒刑)。

这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于1910年12月在巴黎日本公使馆前举行了反对判处幸德死刑的示威；伦敦、纽约的社会主义者也向日本公使馆提出了抗议书。国际主义者得到了各国同志的援助。政府和整个统治阶级名之为“大逆事件”，挑起人民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与憎恨，并在东京警视厅中设置了专门镇压社会主义、工农运动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从此以后连“昆虫社会”这种自然科学书，因为发现书内有“社会”字样，竟被禁止发行。这样疯狂地镇压一切社会主义运动。

友爱会 幸德事件使日本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遭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日本的进步人士放弃了对天皇的幻想，先进的人们认识到不推翻天皇制，日本人的自由、进步、繁荣以及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诗人石川啄木(1886—1912)的趋向社会主义，就是由于这次事件的愤激。

社会主义者虽被镇压下去了，但工人阶级是不屈服的。1912年1月东京市电车工人举行了要

求提高工资的罢工。片山潜曾指导这次罢工，并取得胜利。片山因此被判徒刑，出狱后被迫流亡国外(1914年)，以后二十年间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热爱的祖国来。

这以后，工人阶级继续成长着。铃木文治(1885—1946)于1912年(大正元年)8月组织了名“友爱会”的工会。尽管该会是主张劳资合作主义，又是以机敏的大资本家澁泽荣一为后台，但因为没有其他组织能建立起来，所以先进的工人相继入会。五年后，友爱会拥有会员约两万人，并在全国各主要工厂地带设有支部。这时才成长为日本真正的全国性工会。随着友爱会的大众化，它已超出了铃木等的意图，逐渐发展为阶级斗争的组织了。

第五节 大正政变

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立 工人、农民、市民对天皇制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从烧毁东京全市警察机关开始，屡屡演成暴动。其质量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加强，是日本资本

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矛盾。

第二个矛盾是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和美英帝国主义对立的形成和发展。日俄战争后由于帝俄和德国的竞争，把主力放在近东方面，因此，缓和了英俄在远东的对立，世界上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逐渐成为英德的对立了。在这种情势下，1907年（明治40年）7月，日本和帝俄缔结了关于分割满蒙势力范围的协定。围绕着争夺中国的问题，美英，特别是美国成为日本主要的对手了。

美国和日本的对立，早在日俄战争末期就已开始，因为战后日本拒绝了美国资本参加经营南满的要求，把南满当作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加深了美日的对立。只由于美国还没有越过太平洋来和日本作战的力量，1908年（明治41年）11月和日本缔结协定，尽管是含糊的态度，却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互相承认维持两国在远东的地位和现状，暂时消除了危机（鲁地高平协定）。

日本恃其在远东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地理上最接近中国的有利条件；与此相反，美国

则依靠它雄厚的资本,展开了“金元外交”。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于1909年12月向日本政府提议使满洲铁路“中立化”——以各国共同管理的名义,事实上由拥有丰富美元的美国支配。——日本和帝俄协商,拒绝美国的提议,同时,和帝俄缔结第二次协约,约定采取共同行动,对抗美国的向中国扩张势力(1910年7月)。

美国也不示弱,三个月之后便贷款五千万美元给中国,并缔结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内地与东北的财政制度,以及在东北发展某种工业”的协定。美国在这次借款中,曾联合英、德、法银行团组成“四国借款团”。日本和俄国则共同与之对抗。正当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展开斗争的时候,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1912年2月建立了中华民国。因为贷款的对象消灭,使日俄集团获得了胜利。但是日本和美国关于争夺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对立,则日趋激烈(终于发展为1941年的日美战争)。

这期间,日本和英国也逐渐疏远。1911年7月虽签订第三次日英同盟,但同盟相互援助的规定已不适用于美国了。日本侵略中国,不仅和美

国而是和英美集团发生了冲突。

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殖民地朝鲜、台湾以及日本新的侵略对象中国之间的对立尖锐化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个主要矛盾。

1906年朝鲜士兵，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横暴的合并政策，早就发生了斗争。在斗争的鼓励下连高宗皇帝也对日本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抗。1907年6月皇帝派密使赴荷兰海牙出席万国政府召开的和平会议，希望各国政府保障朝鲜的独立，但为各国所拒绝。事情发生后，日本于7月强迫高宗皇帝逊位，由年幼的皇太子即位。朝鲜的民众固然不待说，也激怒了一部分贵族，各地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动。

继而到8月，日本又迫使朝鲜解散军队，群众和士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起义扩展至全国。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在朝鲜全国仍然继续了数年间游击战争。朝鲜民众称这次起义者为“义兵”。在整个斗争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杀死了一万七千余名，伤了三万七千余名。身负这种残暴统治责任的第一任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于1909年

(明治42年)10月赴俄国途中在哈尔滨车站被韩国爱国志士^①刺死了。

朝鲜的爱国志士们就是在合并后也没有停止反抗斗争。有的逃避迫害,去中国上海和东北,特别是去间岛,据守长白山脉,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甚至于在东京的留学生中间也燃起了民族独立的火焰。不久终于爆发为1919年(大正8年)3月1日“独立万岁”的民族起义。

如上所述,日本为争夺中国,一方面与美国抗争,一方面则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对此,中国民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1908年1月,日本轮船第二辰丸偷运武器,驶入澳门港,被中国官宪查出,没收私运武器并扣留船只。日本政府企图以此为借口,与中国开战,乃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威胁中国,提出“赔偿损失”等要求。中国政府被迫屈服了,但中国人民愤而展开抵制日货运动,直到年底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1911年中国革命^②时,三井物产最初卖武器

① 安重根。——校者

② 在这次革命前后,孙中山曾几次流亡日本,得到头山满(1855—1944)、内田良平(1874—1937)等右翼国权主义者的帮助。从这点以及其他事实看来,似乎头山等曾支持中国革命,其

给清朝政府，后来卖给革命党。三菱也与革命党约定，以革命成功后取得山东省沿海渔业权为交换条件而贷款与革命党。他们预料到革命的胜利，企图预先收买革命党。另一方面，大仓洋行等插足中国东北的财阀则支持清朝。

日本的垄断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对于中国的内乱，常常是各助一方。军部、官僚虽然都反对中国建立共和制，但在具体政策上，意见并不一致。日本的统治者都想乘中国内乱机会，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展开各派各样的策动。这样却失掉了中国各党派信任，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

台湾人民也不断地进行反抗。除每年达数百次的小暴动外，1907年、1914年曾大举袭击日本

实这只是表面上的看法，实际上他们想扼杀中国革命。当中国革命成功建立起共和国后不久，头山等便想乘第一次大战的机会，颠覆革命政府。1914年10月29日黑龙会代表内田良平写给外务次官的意见书中说，必须变更中国现在的共和制为君主政体，并提出把全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一些建议，比以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还要苛刻。他们的“援助”中国革命党，是和三井、三菱的援助具有同样性质；资金也是由陆军和三井、三菱拿出来的。

官厅。1913年和中国革命相呼应，秘密地开展复归祖国的运动。这里也有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幼芽。

国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立、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都是帝国主义必然陷入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就是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由。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清除这种矛盾，竟捏造幸德事件，疯狂地镇压人民，并依靠武力压制殖民地，徒使日本社会更趋于黑暗而已。在经济上由于军警费用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并且使人民的生活愈加陷于贫困。从1907年的经济危机以来，日本资本主义输入了庞大的外资，虽然使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了，但在危机后未能出现应有的繁荣，一直延续着慢性的萧条。敏感的人们感觉到日本已经走上了绝路。这在夏目漱石（1867—1916）的某些小说中与石川啄木的评论《时代闭塞的现状》中（1910年）也有了明显的反映。

中产阶级和近代文化 然而这种“时代的僵局”即使在认识上感觉到或自觉到是一种僵局，但在这种感觉和自觉的本身中就已滋长着打开这种

僵局的力量在内。社会主义者的斗争一时虽被摧毁了，但如上所述，工人阶级继续在前进中。以新兴小资产阶级为主，又出现了对于民主主义的要求。近代的多少具有人民性的文化，也成长起来了。

日俄战后，确立了以财阀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时，一半依靠垄断资本而又与它有着矛盾的产业资本也逐渐确立起来了。学习资产阶级各种科学和艺术的学生、教师和新闻杂志记者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多少感到天皇制和帝国主义以及支持它们并从中取得最大利益的财阀和半封建地主制，是阻碍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剥夺市民个人自由、用封建家族制度束缚人们、阻碍学问和艺术发展的东西，并对它展开了批判。

以这个阶层为基础的国木田独步（1871—1908）、岛崎藤村（1870—1943）等先进的自然主义文学，日俄战后曾风靡一时。这就说明日本也产生了近代文学。独步、藤村以及反对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独树一帜的夏目漱石等的文学，树立起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由北村透谷（1868—1894）等所追

求的近代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并进行苦斗,批判半封建的天皇主义的道德和资产阶级的庸俗性,有了人民文学的幼芽。但是这个幼芽并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又石川啄木超越了自然主义文学,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的诗和评论中阐明了人民文学的方向。可惜天不永年,没有大的成就,便病死了。

这时期,口语文大体上也确立了。口语文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二叶亭四迷(1864—1909)和山田美妙(1868—1910)等先进者的提倡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社会科学方面,有不少人与天皇主义的不合理性展开斗争,为发展批判的、合理的观念而努力。比如历史学方面的津田左右吉(1873—)关于日本神话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自然科学方面,这时也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如铃木梅太郎(1872—1943)发现维生素乙,达到国际水平的成绩。

又以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成长为基础,产生了由妇女本身进行的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1911年(明治44年)9月平冢明子(雷鸟)(1886—)等

五个妇女组织“青鞮社”^①，出版了《青鞮》杂志。该社的主要目的虽然是发展妇女文学，不仅如此，它还进行了妇女解放运动，和阻碍妇女发挥“天才”的封建女性观以及对妇女的压迫进行了斗争。在《青鞮》第一期上，平冢明子写道：

“原始时代，妇女实际上是太阳，是真正的人。现在，妇女是月亮，依靠别人而生存，依靠别人而发光，似病人苍白面孔的月亮。我们现在应当把隐藏起来的太阳夺回来。”

新妇女们要求破坏为男人利益而制定的旧道德、旧法律，展开了斗争。青鞮社艰苦奋斗，历五年之久，终于在残暴的迫害下被迫解散了。但这一斗争却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对粉碎人们的偏见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倾向，在政治上则团结为反对官僚专制和军部横暴、争取普通选举和建立议会政治的人民运动。这个斗争，基本上是由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所唤起的。第一

^① 1850年伦敦开文学家、艺术家联合会，到会女性均穿青(蓝)色袜子，因有Blue-Stocking之称。这就是青鞮社命名的由来。——校者

次大战中及以后的“民本主义”——妥协的民主主义——运动的发起人吉野作造(1878—1933)曾以亲身的体验证实这点说：“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开拓者，无论如何，应当推社会主义者们。”(1928年)

从1910年起，由美浓部达吉(1873—1948)等提出“天皇机关说”对日本宪法作了自由主义的解释，认为主权不在天皇而属于国家，天皇不过是作为国家最高机关拥有统治权而已。“天皇机关说”逐渐得势，代表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给宪法以新的解释，企图为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树立基础。

以这个阶层为基础的普选要求，也是受了社会主义者普选斗争的影响而更加炽烈了。日向辉武、藏原惟郭等在1909年到1911年的历次会议上提出了普选法案，终于在判处幸德等死刑后不久，众议院为了顾全人民的面子，表面上予以通过。但贵族院则以“给穷人以选举权等于背叛国家”为理由而否决了。

中间阶层的民主势力，继续攻击桂内阁。又由于扩张军备和财政困难，大资产阶级也不满意桂，他终于在1911年8月辞职。继而再由西园寺

以政友会为基础组阁，着手整理财政。但陆军不但不节约，反而提出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这是由于统治殖民地，特别是统治朝鲜而感到必要。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间的矛盾，招致了本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

西园寺依靠资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拒绝这种要求。于是陆相上原勇作(1856—1933)单独辞职，陆军不提出后继人选，1912年12月内阁便垮台了。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攻击军部的横暴，报纸和杂志揭露陆军将领和御用商人的腐败勾当，要求改军部大臣为文官制的呼声高涨起来了。

大正政变 发生这件事之前不久，即同年7月，明治天皇死了，大正天皇即位。他毫无能力，完全由内大臣兼侍从长桂摆布。当西园寺内阁垮台后，桂就请天皇颁布特别诏书，命他组阁。人民猛烈地攻击桂的专横。

萨摩藩的海军，看到人民这样反对桂(长州藩陆军)，曾拒绝提出海军大臣人选，但因天皇又颁布诏书，命令前任海相留任，才算组成了内阁。政友会的尾崎行雄与立宪国民党(由改进党与宪政

本党于1910年3月改组而成)的犬养毅(1855—1932)等,高喊“打倒派阀”。但两党都有一部分人被桂收买了。

1913年(大正2年)1月召开了“全国新闻记者同志大会”,议决尽全力维护宪政(实际上是争取宪政),每天在新闻记事或论说中进行了宣传。另外,报纸又看穿了政党是把护宪运动作为满足自己野心的工具,曾向人民发出警告,一面批评政党领导人,而又加以鼓励,政友会总裁西园寺等才决心倒阁。

2月5日议会休会后再继续开会,犬养、尾崎等提出对内阁的弹劾案。尾崎在说明中指责桂说:“他常把天皇做挡箭牌,把诏书做炮弹,攻击政敌”。政府再下令休会。在休会期间,桂曾访问西园寺请予支持,遭到拒绝。于是桂又把天皇抬出来,命令西园寺支持内阁。因之西园寺不能有所作为了,却在暗中鼓励党员。

2月10日议会再开会,从清晨起就有数百群众包围议会,激励胸前佩白蔷薇花的护宪派议员。政府虽以两千五百名武装警察和三个小队的宪兵威吓群众,但群众并不屈服。桂再令议会休会,警

察队则拔剑砍伤拒不听命解散的群众，因之更激怒了群众，他们袭击警视厅，烧毁警察署、派出所，把石子象雨点般投向政府派的报社。1905年9月5日的事又重演了。暴动波及大阪、京都、神户、广岛等全国各地。

桂虽仍想恋栈，并企图再解散议会，但是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1855—1928)威吓着说：如悍然解散议会，就会爆发内乱。桂因感绝望，终于在2月11日辞职了。这就是被称为“大正政变”或“第一次护宪运动”。桂之所以这样顽强，一方面是由于有三菱财阀的支持，和收买了国民党的大部分；另一方面则依靠天皇和陆军的绝对支持。但是人民的舆论却比天皇、陆军的力量更大。

桂内阁辞职后，天皇就在同一天任命海军军阀山本权兵卫(1852—1933)大将组阁。政友会立刻投靠山本，并推荐大臣，成为他的与党。他们的“护宪”目的，正如报纸所警告。国民党也发生分裂，其主流投奔桂，组织了“立宪同志会”。犬养派虽然剩下来了，也失去了斗志。只有报纸、杂志和群众攻击这个新的军阀政权。山本内阁不得不多少向舆论让步，规定陆海军大臣、次官得由预备役

的将官中选任。

然而山本内阁，在 1914 年（大正 3 年）度预算中提出大规模的扩充海军军费案，又在整理税制的名义下，一方面减轻资产阶级、地主的负担；另一方面完全无视人民渴望已久的废除纺织品消费税、交通税和盐专卖制，以及中小工商业者所特别要求的废除营业税。从 1914 年 1 月到 2 月，又发生了与前一年同样的“打倒派阀”的群众斗争。

正在这时候，数年来海军高级官员在建造军舰和购买其他军需品时，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英国维克斯公司以及三井物产公司接受巨额贿赂的腐败事件被揭露了（西门子事件）。于是不满税制和整肃军部的要求与打倒军阀、官僚专制的要求合而为一，数万群众于 2 月 10 日和前一年同样，包围议会，与四千警察以及一个大队的陆军部队发生流血冲突。

尽管发生了这样大的事件，政府却在众议院以政友会的绝对多数获得信任，但由于遭到贵族院反政友会、反萨摩军阀的攻击，山本内阁终于在 1914 年 3 月 24 日垮台了。

嗣后任命山县派的官僚青浦奎吾（1850—

1942)组阁,但遭到海军反对而流产。结果,由大隈重信以立宪同志会为基础,无条件接受陆海军的要求,组成内阁。外相为三菱女婿加藤高明,他是事实上的总理,所以这任内阁被称为三菱内阁。

同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立即参战,乘各国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第三篇 总危机

第六章 总危机的开始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日本的扩张

第一次大战和日本的执政者 1914年（大正3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德两国互相宣战后的第五天，即8月9日，元老^①井上馨对

① 所谓元老是辅佐天皇的。对于宣战、媾和、选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其他基本国策等重要政务，拥有向天皇或政府提出建议的权能，居于政府之上，为天皇制执政者中的最高长老。1889年（明治22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统治者们害怕议会势力有压倒政府的可能，奏请明治天皇下诏，赐予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1840—1900）以特别元勋的待遇，被称为最初的元老。不管他们是否居于政府大臣的职位，具有出席内阁会议的资格，可说是处于监督政府的地位。其后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1842—1914）、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等相继被尊为元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西乡、桂两人逝世外，还有五名元老，其中以山县和井上最握实权。其后元老的势力，随着“民本主义”的高涨而衰落。1922年山县死，只剩下西园寺一名，干涉政府的情况虽然已经没有了，但内阁更迭时，仍由他独断地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1940年（昭和15年）以后，这种习惯虽已取消，但不是由于民主主义的发展，反而是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连元老也看作眼中钉。

另外两位元老山县有朋和大隈重信建议道：“这次欧洲大战乱，可说是发展日本的、大正新时代的天祐，日本应该立刻举国一致，利用这个天祐良机，即立刻停止政争，收回为一党一派利益的一切要求，如减税废税等，巩固国家财政基础，和英、法、俄三国联合起来，确立‘日本在东洋的利权’，笼络‘中国的统一者’。”大隈首相和山县元老都“非常赞成”这一基本方针。

日俄战争以后，特别是1907年（明治40年）的危机以来，刚刚确立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很快就步入了穷途（参阅第五章）。国家财政，输入巨额外资，战后仍继续着战时的重税，并且更加重了，以此不断地扩充军备，支付为统治殖民地每年逐步增大的军警费，极力推行铁路国有，扶植军事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便于垄断资本赚钱的政策。在元老所谓“大正新政”的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乃至1914年，几乎已经濒于破产，连支付外债利息也发生困难。贸易连年入超，现金准备额从1906年的四亿九千五百万元激减至1914年的三亿四千一百万元，维持兑换制度也感到困难。苦于重税的中小资本家和

农民以及劳动群众的生活，受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连年物价上涨的痛苦，愈益恶化了。因而国内市场和膨胀了的生产力相比较，更显得极其狭小而不稳定。1913年（大正2年）有六个中小银行破产，半官半民的日本兴业银行也濒于破产。1914年（大正3年）4月，大阪的证券、米粮以及三品（棉花、棉纱、棉布）等交易所的机关银行——北滨银行也被迫歇业了。

以这种经济状况为背景，人民护宪的浪潮，同各种减税废税等要求以及对军部专横腐败的愤怒相结合，威胁着专制政府与军部。

虽然想依靠殖民地以补救国内市场的狭小，但又苦于镇压朝鲜台湾的民族抵抗，须开支庞大的军警费。而且日本的“许进不许出”的掠夺政策，也很难使这些殖民地发展为日本的商品市场。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企图寻找机会，进一步向中国大陆扩张，以摆脱困境。1911年（明治44年）秋天，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后，政府在10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下列基本方针：阻碍革命党把中国真正统一起来。当前姑且维持满洲“现状”，以待“对日本最有利而且有成功把握的机会”，再“彻

底解决满洲问题”，即将满洲完全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乃至殖民地。在这一时机到来之前，以全力在中国内地树立日本的“优越地位”。

根据这个方针，政府便干涉中国革命，以武力阻止革命波及中国东北，并用各种手段使中国不能建立起共和国。1912年1月底，在“保护满洲侨民”的借口下，派兵一师驻大连，但也没有任何效力，1912年2月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不予正式承认，并派陆军现役军官进行“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一方面助长中国的混乱，另一方面则尽最大努力攫取帝国主义的权利。因之，加深了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和美、英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经济实力无论如何也敌不住美英的日本，便依靠它在列强中地理上最靠近中国和在远东拥有最大的军事力量，以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宪兵自任，等待着统治中国的“最有利而且有完全成功把握”的机会。

第一次大战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怪不得日本的统治者们，以元老为首，一致把这人类史的惨事认为是“大正新时代的天祐”。的确，第一次大战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深刻的矛盾中救了出来，

给了它飞速发展的机会。事实上，这次大战包括日本在内，给世界帝国主义体制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因而，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是“天祐”而是带来了危机，这一点在当时日本执政者中有谁曾多少预想到呢？

参加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所引起的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从十九世纪末叶起迅速地赶上了先进的英国。德国商品和英国商品在世界各处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在航运方面德国也逐渐压倒了英国。德国企图从英、法手中夺取其殖民地，从俄国夺取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置近东于自己势力之下。德国以奥匈帝国为属下的盟国，奥匈帝国也想和德国一起控制巴尔干半岛。近东方面，在俄国、英国势力与德国势力扶持下的土耳其，投靠了德国方面。德国和奥匈帝国从十九世纪末与意大利结成了三国同盟。但是意大利对于奥匈帝国，由于后者阻碍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具有敌意；又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开始向巴尔干伸张，因而三国同盟逐渐冷淡了。及至英、德对立激烈化时，

意大利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没有与英国战争的自信，1914年8月，英德开战时便宣布中立，其后则加入英、法方面对德奥作战。

英国与德国等三国同盟对抗，为了保持它的既得地位，打倒竞争者，进而从土耳其手中掠夺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乃在日俄战争后和法俄接近，组成“三国协约”。法国自从1870—1871年战败以来，仇视德国。从德国手中夺取铁煤产量丰富的萨尔地区，收回1871年被德国夺去的亚尔萨斯、洛林，是法国资本家渴望已久的。帝俄在日俄战争以前，曾把西方的英国和东方的日本作为主要敌人，因此曾和德国接近；战后则和日本、英国妥协，在东方和日本分割满蒙，在西方则与英国分割土耳其，打起“泛斯拉夫主义”旗帜，企图置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国家于自己势力之下，并夺奥领加里西亚。又俄国的最重要产业部门几乎全为英、法和比利时的资本家所掌握，这一点决定了帝俄和英、法相结合。

以英、德为盟主的帝国主义两大集团的对立，从1907年危机以后，更加尖锐起来，发生过局部战争多次，终于以1914年6月奥太子在塞拉热窝

被塞尔维亚（其背后有帝俄）青年暗杀事件为导火线，7月28日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间爆发了战争，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第二天俄国也对德国宣战，继而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4日德军想破坏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发动进攻，当天英德互相宣战，扩大为全欧洲所有国家都被卷入的史无前例的大战。继而日本、美国、中国也纷纷参战，发展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战。

看到英德开战而兴高采烈的日本政府，借口日本负有日英同盟的义务，要站在英国方面参战，想抓住这绝好机会。英国政府却于8月4日表明英国不希望日本卷入大战，同时并向日本声明：如果威海卫和香港遭到德军攻击时，愿接受日本的援助；又于8月7日为了击毁中国海面上的德国伪装巡洋舰，请求日本出动海军。这正是日本政府所期望的事。

政府立即决定对德宣战。当然日本不是为了英国而战，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参战。英国政府大为惊慌，乃于14日以“东亚战争，会招致中国的混乱，进而引起全东亚的骚扰，将给英国贸易以很大的打击”为理由，希望日本不要参战，并收回先

前的援助要求。加藤高明外相则表示日本已经不能变更其决定，希望英国同意日本参战。在这以后的日英谈判中，英国鉴于不能阻止日本参战，乃要求日本的军事行动局限于东中国海和胶州湾的德国租借地，并暗示日本参战是侵略主义。日本不同意这种要求，主张保留全面的行动自由。8月23日，以日英同盟的友谊为借口，对德宣战。

占领山东 英国只想利用日本作为自己的工具，这虽然是片面的自私自利的想法，但日本的参战的确是露骨的帝国主义的行为，参战以后的行动，也立刻表明了参战的真正目的。

9月2日，日军一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面的龙口登陆。中国政府声明在日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向日德双方提出希望战斗局限于龙口莱州和胶州湾附近的要求，但日本并未理睬。继而又派一个半师的陆军部队于13日占领胶州湾，11月7日攻陷德军重要要塞青岛。

另一部分日军，无视中国的抗议深入山东省境，10月6日（在攻陷青岛一个月前）占领济南，从德国手中夺取从济南到胶州的胶济铁路，并宣布归日本经营。日本又在提交德国的最后通牒中

要求“德意志帝国政府以胶州湾租借地全部还给中国为目的，将该地无偿地无条件地移交给帝国（日本）官员”，然而日本在夺取了德国的租借地和权利之后，并不把它还给中国。不但如此，日本把山东半岛的德军全部驱逐之后，它的军队仍然留驻该地，并强化基地。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以搜寻德国东洋舰队为借口，进攻南太平洋，10月初占领了全部德属南洋群岛。

英国见此，为了使日本疲劳和加强协约国的对德战线，再三要求日本派陆军去欧洲，并派海军往地中海，都遭日本政府拒绝。到了1917年（大正6年）3月，才派小舰队去印度洋和地中海。这也是以英、法承认协约国对德胜利后将日军占领的赤道以北德属南洋群岛划归日本为交换条件的。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日本参战的最大目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将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1915年（大正4年）1月18日，日本以山东派遣军和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向中国政府提出五号二十一条要求。第一号是关于日本接收山东省内

旧德国权利和铁路修筑权以及其他要求，其目的在将山东省置于日本支配之下。第二号是关于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南满洲铁路和安奉铁路的权利期限，均再展期九十九年，以及其他将东部内蒙古和南满洲几乎完全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各种要求。第三号是独霸汉阳、大冶、萍乡的煤铁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宣布不将中国的沿海和岛屿割让给他国。第五号是中国政府聘用日人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而且日本顾问必须多于其他任何国家的顾问总数。中国警察由中日合办或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或由日华合办的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供应，或向日本采购。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承认日本的布教权（意味着进行特务活动的自由）以及其他关于华南铁路权利的要求。

这时中国正是军阀袁世凯实行卖国的独裁统治时期。1911—1912年的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完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大业，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被野心家军阀袁世凯所窃夺。他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援

助，实行反动的卖国政策。1913年7月到9月江西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但终于被他击溃。以后他愈加露骨地反动化，1913年10月逼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继而解散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反对袁的卖国政策）。1914年1月连国会也解散了，建立独裁制，在帝国主义列强援助下抱着当皇帝恢复帝制的野心。

由于中国的革命被野心家所出卖，这是日本敢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大原因之一，这二十一条露骨地表现了日本欲将中国殖民地化。日本曾暗示袁：如果他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就支持他即帝位。袁也心动了。然而尽管他的胃口很大，因为他亲眼看到人民的强烈反抗，也难咽下第五号那样的要求。第五号要求日本对各国也保守秘密，但2月10日已被在袁政府中的英、美代表知道，英国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第二天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抗议二十一条的大会。中国的各城市也掀起了猛烈的排日运动。袁虽拼命的镇压，但亦无效。由于这种民族反抗的压力，迫使袁政府对日本也多少采取了强硬的态度。4月17日第

二十四次谈判以后，中日交涉暂时陷于停顿。5月4日政府与元老会议，议决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但其中第五号除保留福建省接受外国投资时须首先与日本协商一项外，其他各项要求不得不取消。

在最后通牒威吓下，袁政府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一天被中国民族规定为“国耻纪念日”。过去把日本当作亚洲先觉者而予以尊敬的中国民族革命家，开始认识到日本是比欧美帝国主义更为残酷的帝国主义。

第四次日俄协约 大隈内阁和加藤外相先向中国提出第五号那样不寻常的、使人无法接受的要求，后来又撤回，这种作法，即使从帝国主义立场上来看，也很不高明。而中国民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掀起的强烈反抗，便予反对党以“外交失败”来攻击政府的绝好机会。

大隈内阁虽早已屈从军部，接受了增设两师陆军和扩充海军的要求，但由于内阁在众议院是以少数党的立宪同志会为基础，根本不可能通过增设两师团的预算案。因而政府便于1914年12月解散第三十五届议会，于1915年3月举行大

选，一举而打垮在野党的政友会和国民党，政府党同志会等三派在众议院获得了绝对多数。这次选举中，山县直系、警察出身的大浦兼武（1850—1918）担任内务大臣，尽收买干涉的能事。这次干涉是继1892年（明治25年）解散第二届议会品川内相干涉大选后的第二次大干涉。同志会的选举费是由三菱财阀供给的。政府就这样制造了在野党的所谓“不自然的多数”。1915年第三十六届临时会议通过了增设两师团案。

山县等所期待于大隈内阁的事情至此实现了。同时，他们不满这任内阁，尤其是对加藤外相（同志会总裁）关于外交问题不常向元老作报告，认为是藐视元老而表示愤怒。元老们本来就非常讨厌政党，看到大隈内阁具备了政党内阁的倾向，便着手来搞垮它。当时他们用“外交失败”作为攻击的工具。山县和井上认为对抗美国向中国伸张势力，不能单依靠日英同盟。要求政府缔结日俄、日法同盟，特别是日俄同盟；加藤外相则认为无此必要。因此，也加深了元老和政府间的鸿沟。

这种情况鼓励了政友会和国民党对政府的攻

击。在野党在临时议会上集中地攻击二十一条要求的“失败”——认为有不会引起中国人民反感的更好办法，但不是反对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和大浦内相的干涉选举。这时，大浦收买上届议会的政友会议员，使之赞成增设两师团案也被暴露了，结果，大浦被迫辞职（7月28日）。继而主张内阁应负连带责任的加藤外相和八代六郎（1860—1930）海相、若槻礼次郎（1866—1949）藏相三人辞职，内阁因而改组（8月10日）。

改组后大隈内阁的外相为石井菊次郎（1866—1945），他不仅和英国协调，也想方法和法、俄协调。10月参加了英法俄三国对德不单独讲和的伦敦宣言（在石井就任前即已决定）。同时，他对于中国，鉴于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卖国政策和帝制野心的运动日益激烈，乃与英、法、俄三国共同劝告袁世凯延期称帝（10月）。这件事又成为在野党攻击政府的口实。他们指责他关于东亚问题不采取单独行动，而与西方国家取同一步调是很奇怪的。元老、政府、在野党都这样沉醉于帝国主义的竞赛中。1916年（大正5年）7月3日，政府签订了第四次日俄秘密协约。过去的协约日俄

两国仅仅是为了分割满洲和蒙古，而第四次协约则是以全中国为对象，为防止它在政治上受对日、俄两国有敌意的第三国（指美、英）操纵而采取共同行动，因此，与“第三国”交战时，两国互相给予军事援助。

寺内内阁和宪政会 这个协约使山县也感到满意。于是更认为大隈内阁已成赘疣。尽管它在众议院拥有绝对多数，1916年（大正5年）10月遭到元老、贵族院以及在野党各方面的攻击，终于全体辞职了。同一天，朝鲜总督元帅寺内正毅被推荐为后任首相。寺内为山县直系的军阀巨头。人民好容易推翻了桂、山本两任军阀内阁，总算把历史推进到了以政党为基础而组织大隈内阁的阶段，但由于这个内阁和政党一味实行帝国主义侵略和腐败政治，又没有力量对抗元老与军部的压力和策略，因而又倒退到军阀官僚政府的时代。

原敬（1856—1921）领导政友会公然与寺内内阁勾结起来。原因是热中于利禄的政客们不甘长期寂寞。犬养毅的国民党也暗中与寺内勾结着。寺内内阁成立后第二天（10月10日），加藤高明以同

志会为中心，联合前任内阁与党三派组织宪政会，自任总裁。宪政会的建党宣言中声明：“宪政贵乎遵循宪法条款，尊重天皇的大权，严明内阁的责任，使国家政治常在国民的大基础上运用。”多少反映了时代的民主倾向。但在加藤背后能看出三菱金库闪烁发光的魔影，说明它是代表大垄断资本家的政党，并且依靠了一部分地主。宪政会虽然是与寺内内阁对立的唯一在野党，但不是反对天皇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派。

由于在野党的宪政会在众议院中占绝对多数，“超然内阁”是行不通的，因而寺内内阁便解散了议会（第三十八届议会）。选举结果，得到政府帮助的政友会成为第一大党，它与国民党联合起来，在议会中占过半数。宪政会惨败，较解散前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势力。任何政党如果是政府的与党便获胜，居在野党地位的则失败，这就是由于日本的选举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是在警察干涉下进行的。

美国和中国的参战、石井蓝辛协定 这期间，世界战局出乎各交战国最初预料之外，变成了可怕的长期大消耗战。至1917年死伤了几百万人，

战争仍无结束可能。后方劳动人民的苦痛，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各国内部人心开始动摇，酝酿着革命。终于在1917年3月（俄历2月）帝俄首先爆发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资产阶级领导的临时政府虽然违反人民的愿望，继续进行战争，而俄国革命则向前发展，使协约国的统治者们大感不安（下面叙述）。

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家们鉴于协约国形势的恶化，担心通过摩尔根公司贷给英、法政府的二十亿美元化为乌有。又由于英、法在战争中已经精疲力尽，不能继续向美国订购大量军用品，使美国经济有陷于恐慌的危险。尤其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体制，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有起来镇压的必要。因此，美国政府便以反对德国开始无限制潜艇战为借口，于1917年2月3日和德国断绝邦交，继而在4月6日正式宣战，作为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

这时美国把中国也拉入了战争中。它的目的是企图使中国成为协约国的一员，以牵制日本。日本最初虽极力反对中国参战，终于以协约国承认日本继承山东省的旧德国利权为条件而同意了。

中国于1917年3月14日对德断交，8月14日对德宣战。

参战后的美国不得不同日本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1917年11月2日，由日本代表石井菊次郎大使和美国国务卿蓝辛互换了关于中国的日美公文(石井蓝辛协定)。据此，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南满的“特殊利权”，但不得侵害中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以及仍旧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对各国工商业的机会均等。美国虽一时含糊其辞地对日本让步，但后来一遇到机会，就企图撤回它的这个让步。

产业的飞跃发展 大战给日本在亚洲以横行的机会，同时也给了日本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景气和繁荣的机会，战争爆发后一年左右，由于战争以致外汇突然停止、海上运输停顿、以及世界交通的中断和混乱，使本来就很薄弱的日本经济受了很大的打击。然而从1915年下半年起，以出口贸易的跃进为基础，各种产业有了显著的发展。这是由于大战后欧美商品退出了亚洲市场，日本商品便乘机涌了进去；再加以俄国为首，各协约国所需要的武器军用品等也大量增加了。

第 13 表 1914—1919 年进出口贸易表
(单位:千元)

	出 口	进 口	合 计	进出口相抵后出超数 〔(一)为入超〕
1914年	610,532	633,397	1,243,929	(一) 22,865
1915年	733,056	563,391	1,296,447	169,655
1916年	1,173,975	794,532	1,968,507	379,442
1917年	1,663,454	1,088,306	2,751,760	575,147
1918年	2,014,192	1,744,849	3,759,041	269,342
1919年	2,156,593	2,335,751	4,492,344	(一) 179,158

(根据《日本经济六十年史》)

贸易以外,还有航运收入以及其他外汇收入。因此,保有现金数从 1914 年末的三亿四千一百万元激增至 1919 年末的二十一亿四千五百万元,达六倍以上(其中十三亿四千三百万元在国外)。于是使战前原来是输入外资的日本一变而成了资本输出国。不仅购买了俄国政府的公债,也购买了英国政府的公债。

各种产业的总产量在 1914—1919 年间,依价格计算,增加三倍以上,各产业部门对总产量的比例,农业从 1914 年的 45.4% 激减至 1919 年的 35.1%,工业在同时期内则由 44.4% 激增至 56.8%。

第 14 表 各种产业总产值的变化
(单位:百万元)

	1914年	1919年
农 业	1,380(45.4%)	4,162(35.1%)
水 产 业	157 (5.1%)	455 (3.8%)
矿 业	157 (5.1%)	514 (4.3%)
工 业	1,372(44.4%)	6,738(56.8%)
合 计	3,066(100%)	11,869(100%)

(根据冈崎次郎等著《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年表》)

由于大战中物价的连年上涨，生产数量的增加率虽然没有象价格上所表现的那么大，但以1913年为一〇〇，至1918年，十二种主要商品(米、麦、丝、棉纱、棉布、洋纸、水泥、砂糖、生铁、钢、煤、铜)的生产数量则增至一六七。在同时期内，作为中立国而获得最大战争利润的美国，它的生产额也仅增加了10.5%，两相比较，就可以了解日本在战争中生产力增加速度之快。特别是砂糖增加三倍以上，生铁增加二点四倍，钢增加二点一倍和水泥增加一点七倍。仅上述十二种中的矿工业生产总数，就从一〇〇增至一八〇点六

(美浓部亮吉著：《日本的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

在这种景气的刺激下，出现了很多新建和扩建的企业。1914年末公司总数为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八个，资金（实收资本和投资）为二十亿六千八百七十八万元，1918年末公司数增至两万三千零二十八个，资金达四十七亿零七百零八万元，1919年公司数达两万六千二百八十个，资金则为五十九亿七千五百四十九万元。如按行业别则有如下列第15表：工业方面无论公司数或资金都增加得特别快。全部企业中各行业所占的比重无论就公司数或是资金数讲，商业（销售货物、银行、其他金融、保险以及其他商业）部门虽仍居最高位，但其资金所占的比率却减少了。与此相反，工业各部门资金所占的比率则增加了。工业的急剧发展，也表现在工厂和产业工人数字的增加上。经常使用五人以上的工厂数及工人数，1914年约有三万二千个工厂，九十四万八千工人，至1919年则达四万四千个工厂，一百六十一万工人。矿工则从二十九万四千人增至四十六万五千人。

第 15 表 1914 年和 1919 年各行业
公司数和资本额的变化

		1914年	1919年
总 数	公司数	16,858 (100%)	26,280 (100%)
	资本金(万元)	206,878 (100%)	597,549 (100%)
农 业	公司数	339 (2.0%)	611 (2.3%)
	资本金(万元)	1,464 (0.7%)	5,293 (0.7%)
水 产 业	公司数	175 (1.0%)	210 (0.8%)
	资本金(万元)	1,810 (0.9%)	2,939 (0.5%)
矿 业	公司数	197 (1.2%)	403 (1.5%)
	资本金(万元)	16,554 (8.0%)	47,279 (7.9%)
工 业	公司数	5,046 (29.9%)	10,086(38.4%)
	资本金(万元)	66,251 (32.0%)	224,340(37.5%)
商 业	公司数	9,909(58.8%)	13,137(50.0%)
	资本金(万元)	97,385(47.1%)	246,054(41.2%)
运 输 业	公司数	1,192 (7.1%)	1,833 (7.0%)
	资本金(万元)	23,413(11.3%)	71,643(12.0%)

(根据内阁统计局《企业的发展与资本的集积》)

在工业各部门中,纺织业的计划资本 1919 年飞速地增加,约达 1914 年的九十七倍弱。但它的产量,棉纱不过一点三倍,蚕丝按价格计算,增加五点二倍,按产量计算则仅增加一点七倍。这个

部门中尤以出口棉织品生产增加得特别多，棉布出口开始超过了棉纱。

这一时期内，制铁、造船、机器工具的生产，发展尤为迅速。1919年铁、钢的生产，民营制铁业占半数，但这些民营制铁业也是依靠1917年的制铁奖励法，获得免税与奖励金以及其他政府的大力保护而发展起来的。说明国家和垄断资本的结合有了新的发展。造船业方面1914年建造七十九艘轮船，共八万二千八百吨，1918年则激增至六倍，计四百四十三艘，共计五十四万零五百吨。此外铁轨、车辆、动力机、工作母机、武器等机械工具的生产，在此时期也大体上确立了。

但是机械制造业尚未确立起来（1918年机械工业工人数约十六万九千人中，机械制造厂的工人数还不到1%，仅一千六百五十人。又轻工业的机械，如纺织机也多半是依靠进口。尽管纺织业的计划资本增长九十七倍，而实际生产设备却未达两倍，这就是主要原因。又无论从工厂数、职工数或生产数量上看，整个工业生产的70%以上是轻工业，说明了日本还是一个轻工业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过上述产业的发

达，企业的规模也壮大了，并进行了资本的集中，从公司数和投入资金的规模来看，资金五百万元以上的公司，在 1914 年占公司总数 0.37%，其资金为资本总数的 38.6%，而 1919 年此种大公司则占公司总数的 1.77%，其资金实达 53.6%，如举资金一百万元以上的公司为例，其资本总数所占的比例，1914 年为 62.8%，1919 年则达 79.3%。

按工厂规模看工人人数，1914 年使用工人一千名以上的工厂数为八十五个（占全部工厂数 0.27%），工人人数则为经常使用五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总数的 17%，及至 1919 年，工厂数增至一百六十个（0.36%），工人人数则达 22.2%。如举使用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为例，在同时期内，工厂数则从 4.27% 增至 5.06%，工人人数则从 48.6% 增至 65%。从这里可以了解大工厂的发达和生产的集中。

与产业资本的集中相平行，银行资本也在集中。如下表所列，在大战中银行数减少了，分行则有所增加（小银行被大银行合并），平均每个银行的实收资本和公积金都增加了。

第 16 表 银行资本的集中

	1913年	1919年
银行数	1,614	1,344
分行数	2,099	2,563
平均每一银行的实收资本	243(千元)	536(千元)
平均每一银行的公积金	76(千元)	129(千元)

(根据《金融事项参考书》)

财阀系银行的垄断力量很早就增大了，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第一次大战后不久，三菱银行从三菱合资公司中划分出来，资金由一百万元增为五千万日元，三井银行增资为八千万日元。其他大银行都在 1919 年增加了巨额资本。如上所述，兴办企业的热潮疯狂高涨，通过资金的筹集，加强了银行对企业的支配力量。日本的银行董事兼管其他事业者逐渐多，从这一点，也说明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溶合起来了。

资本家，特别是纺织、制铁、造船、航运和贸易等业垄断资本家的利润，真象神话一般。战前这些事业的利润率仅 10%，至多也不过 30%，但从 1916 年下半年起则急剧上升。例如据公布的利润率，1918 年下半年航运达 191.6%，造船达

166.6%，棉纺达115.9%，矿业在1916年上半年则为187.4%，化学工业、机械、车辆工业也都从50%提高到70%。当然这都是公布的数字，另外还隐瞒了巨额利润。例如钟纺、东洋纺、大日本纺、合同纺等四大公司公布的1917年下半年的利润合计为三千五百万元，但到1920年战后经济危机前，上述四公司的秘密公积金就达两亿元（高桥龟吉：《大正昭和财界变动史》上卷）。

这些利润的绝大部分落入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旧财阀手中，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对日本经济的支配力量。又神户的铃木商店据说它最盛时已经超过了三井物产。而仅以两万元资本起家的内田轮船公司的财产，据检查院的查定，1919年将借入款项除外，仍有七千万元之多。涌现了一些新兴财阀和“钢铁暴发户”、“轮船暴发户”。垄断资本主义就确立起来了。

资本输出和西原借款 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也盛行了资本的输出。不仅购买了俄、英等协约国的公债，并向中国输出巨额的纺织资本。1913年以前日本资本在华经营的纺织工厂有六个，纱锭十七万四千七百枚，织机两千六百四十八台，大

战中(1914—1919年)新增加了八个工厂,十八万六千五百枚纱锭,两千三百五十二台织机(1920年经济危机后向中国输出的纺织资本更增多了)。1932年国产棉纱对中国的出口数,还没有在华日商纱厂的产量多。此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开始具有重要意义”。(见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所载《小帝国主义论批判》)。

日本资本家不仅向中国输出产业资本,对中国人进行奴隶般剥削,以获取利润,还抱着更大的野心,为了使中国在政治上也隶属于日本,寺内内阁和垄断资本家不通过普通外交途径而派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为特使去中国,贷与段琪瑞政权以总数一亿四千五百万元(外有武器借款三千二百万元)的借款。

当时的中国,袁世凯的帝制野心为第三次革命所摧毁,黎元洪任第二任总统,北洋军阀段琪瑞任总理,掌握实权。这个政权和获得英国援助的华中直隶派军阀相抗争。同时西南各地也出现了军阀,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中。就在这个时期,日本扶植中国东北的土匪张作霖。寺内内阁

欲乘机把段琪瑞政府变为自己的傀儡，乃于 1917 年 9 月至 1918 年 9 月间，给了上述的大借款。名义上是为了修铁路、救济水灾或弥补大战的战费，但实际上是供给段琪瑞战费，以打垮中国的革命势力和反段势力。因而没有一点实质上的担保。这个借款的三分之一由临时军事费拨出，全由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出资（这种政治上的浪费是直接使这三家银行，进而使日本经济不能克服战后经济反动影响的最大原因之一）。

日本在第一次大战中，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就这样地取得了中立国的利益和战胜国的利益，而实现了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它使日本人民和朝鲜、台湾、中国人民遭受了无法估计的损失。而且在这个扩张着的帝国主义内部发展着极其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早在大战尚未结束的 1918 年夏天就爆发了。这一点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叙述。

第二节 伟大的社会主义 革命及其影响

二月革命 正当日本资本主义由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取得暂时的异常的繁荣和跃进而冲昏了头脑的时候，实际上，大战使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在内陷于极端贫困和痛苦之中，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整个体系，并加深了它的危机。大战使资本主义各国内的阶级对立迅速发展，使工农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高涨，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被它们统治着、压迫着的各民族之间的对立尖锐起来了。终于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

在俄国，当 1905 年革命暂时失败后，从 1912 年春天起，新的革命运动高涨起来了。工人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罢工逐渐增多，并号召农民对地主作斗争。连沙皇的陆海军中，也发生革命行动。到 1914 年这些运动愈加高涨了。沙皇政府之所以急于发动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想把革命运动转移到对外战争和帝国主义的狂潮中去。

但是战争反而迅速地加深了俄国统治者的危机。前线的失败，后方人民生活的穷困，激起了俄国人民对于为沙皇政府和富豪利益而进行的非正义战争的愤怒。领导人民斗争，组织它、推动它、发动它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1912年11月，大战濒于爆发的前夕，第二国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社会主义代表临时大会，各国工人认为参加为资本家利益的战争是一种犯罪，并宣布第二国际的各支部、全国工会将尽全力为和平而斗争。但是战争一旦爆发，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外，第二国际所有各党都在“保卫祖国”的美名下，成了帝国主义者的帮凶，把祖国和人类推向战争和毁灭^①。

政党方面，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不仅希求和平，并且为了推翻战争祸首的沙皇政府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布尔什维克还建议组织“第三国际”，作为为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国际统一组织，以代替因赞成战争而破产

^① 但在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有反对党支持战争而始终坚持反战、和平与维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集团。其中最大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的集团。它以后因其秘密机关杂志《斯巴达克》——采用古代罗马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 Spartacus 的名字——而被称为斯巴达克团，逐渐发展为德国共产党。又法国统一社会党的饶勒斯，也是坚决反对战争，在法国参战前一天被暗杀。

的第二国际，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1917年1月9日（公历1月22日）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及其他广大地区都掀起了政治性罢工。争取和平、土地、面包和各民族平等、打倒沙皇政府的革命，象暴风雨般发展起来了。

2月26日（3月11日）首都的工人由政治性罢工和示威转变为起义。警察队和宪兵队企图以武力来镇压，但是士兵却站在工人方面。为争取军队站到革命方面来，特别是女工进行了最大努力和坚强的斗争。从这一天起建立起工人和士兵代表的苏维埃。1905年仅仅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1917年2月则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的苏维埃。由于士兵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所以苏维埃就是工人和农民的专政机关。

2月27日（3月12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军队迅速转到工人方面来了，决定了沙皇政府的命运。3月2日（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沙皇政府被推翻了。

十月革命 革命的结果，在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地主阶级的临时政府与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双重政权局面。临时政府继续进

行战争，无视人民的和平要求。土地和面包也没有得到保证。4月列宁从流亡地回国，在彼得格勒领导革命。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其目的不是以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而是用说服的方法，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以改变苏维埃的政策，通过苏维埃改变政府的组织。这是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领导方针。

然而自从临时政府用反革命军队袭击彼得格勒群众7月3日为要求停止战争实行和平政策而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便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全部政权落到社会革命党和有孟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手中，于是革命的和平发展时期也告终了。原因是临时政府实行反革命的暴力统治。布尔什维克致力于巩固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同盟，以作为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

8月末（9月上旬）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反革命的叛乱。通过粉碎叛乱，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并获得俄国人民多数的支持。俄历10月25日（11月7日）开始起义，当天推翻了临时政府。国家的全部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

当夜召开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

大会的第二天，俄历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通过了和平宣言，向所有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呼吁，立即开始不赔款、不兼并的公正的民主的和平谈判，为此，应立刻签订停战两个月的协定。此外苏维埃政府又废除了秘密外交，宣布废除革命前俄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大会又通过了土地法令，立即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改为全民所有，无条件地供给全体劳动人民使用。根据这个法令，农民获得了旧日地主、资本家、皇室、修道院、教会等手中的一亿五千万公顷以上的新的土地。

在同一天，又成立了第一任苏维埃政府。

从首都的革命胜利后到 1918 年 2 月，苏维埃革命迅速地扩大到广阔的俄国全国。人类史上第一次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

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继建立新的国家机构与土地国有化之后，又将一切大的产业国有化，以彻底清除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封建残余；又为了实现男女平权以及各民族的自由发展和完全平等——俄国在沙皇统治下被称为各民族的牢狱——而实施了一连串的革命措施。

苏维埃的和平建议遭到英、法的拒绝。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德国签订了和约。其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容忍了它，实现了和平。

外国对苏联武装干涉的开始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和平的实现给予交战各国人民以深刻的影响。早在二月革命的影响下，1917年4月，德国的柏林、来比锡以及其他城市的军需工厂工人就曾举行罢工。5月，德国几艘军舰中发生革命运动。十月革命以后，德国工人和士兵的反战斗争更加高涨。在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从1917年春天起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在法国，由于1917年4月西部战线大攻势的失败和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有一百个连队以上发生了反战运动。

1918年西欧各国的反战和革命运动更加扩大，并且具有组织性。在奥地利则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2月奥匈帝国的海陆军中发生暴动。德军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大多数部队已经失去战斗能力。到1918年，反战运动和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时，德国就发生过

反对向俄国提出苛刻条件的大罢工。英国和法国也都发生工人抗议自己政府的反苏政策，并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罢工。

西欧各国，特别是协约国的统治者们，害怕俄国革命的影响日益强烈和俄国退出战争对德军有利。他们策划把俄国革命扼杀在摇篮里面，而使俄国恢复资本主义，继续作战。1918年上半年，外国帝国主义和俄国国内的军官、地主、资本家等反革命势力便勾结起来了。

1918年1月初，日本和英国的军舰侵入海参威准备武装干涉俄国革命。2、3月间英、美军舰侵入牟尔曼斯克，派陆战队登陆，形成进攻彼得格勒的形势。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是被奥军召集出勤于东部战线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士兵，或被帝俄俘虏，或自行逃亡，革命后，与苏维埃政府商定，由海参威乘船到欧洲西部去，参加协约国军队的）从俄国西部赴海参威的途中，在齐齐哈尔宾斯克受英、法军的煽动，进攻苏维埃政权，并占领各地。6月，日、英、法、捷克联合军占领海参威，解散当地的苏维埃。

这个期间，日本、美国、英国、法国间订立了派

联合军赴西伯利亚和捷克军一起摧毁俄国革命的计划。但因从西伯利亚方面进行干涉不得不以日军为主力,美国担心干涉成功时,其最大利益会被日本独吞,最初犹豫不决(关于日本的行动在下一节还将叙述)。日、美、英三国捏造了西伯利亚的捷克军遭布尔什维克迫害的谎言,在拯救捷克军的借口下,宣布向西伯利亚进军(日本于8月2日宣布,美、英宣布在后)。美国出兵七千,日本最多时曾派七万三千军队到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

在俄国的西部和南部,德国撕毁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占领了克里米亚,从顿河流域向北高加索进攻,指向巴库油田和内高加索,并侵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大战结束和凡尔赛体制 在这个时期,大战逐渐对德不利。1918年7月德国用最后力量在西部战线发动大攻势,但受到了英、法联合军毁灭性的打击。这一败仗对德国革命运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斯巴达克和独立社会党左翼对工人、陆海军士兵的影响力,迅速增大了。各地都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德国的同盟国保加利亚于1918年9月投降,

10月末土耳其也投降了。同月奥匈帝国的捷克人、霍尔瓦齐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人宣布独立，奥地利帝国事实上已土崩瓦解了。陆海军士兵的暴动愈益激烈。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

至此，德国投降仅仅是时间问题了。10月末，基尔军港的德国海军拒绝舰队出击命令，11月初工人士兵的苏维埃掌握了舰队和基尔市的实权，德国北部各城市也都归到苏维埃手中。继而柏林也发生革命，11月10日德意志帝国被推翻。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11月11日共和制德国向协约国投降了。

大战结束了。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结束了四年三个月的世界战争。交战各国动员兵力总计约七千万人，战死一千万人，负伤以至残废者达两千万人以上，数百万人因饥饿和传染病而死亡。战争末期出现了坦克车，并开始以飞机轰炸和空袭城市。毒瓦斯也被使用了。于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变成为帝国主义大量杀人的工具，造成人类史上空前的惨事。

大战给各交战国的经济以莫大的打击。战败

的德国、奥国固然不消说，就是战胜的英、法两国，经济上也由于受到战争的创伤，数年后尚不能恢复。只有美国和日本（尤其是美国）的经济获得了飞跃的发展。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世界贸易和金融的中心由伦敦移往纽约去了。

1919年6月在法国凡尔赛签订了和约。英、法、日、美等战胜国夺取了德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德国本土的一部分，并课德国显然无法支付的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巨额赔款。限制德国的军备。奥地利和土耳其的领土也遭到掠夺。东欧中欧在民族自决的美名下建立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以上原属俄国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上原属奥匈帝国领土）等国，都是反苏反德的英、法附属国。

凡尔赛会议所建立起来的新世界，不外是战胜国英、法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体制。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虽要求将山东省旧德国利权交还给它，但因它所依赖的美国，也和日本妥协了，没有达到目的。日本夺取了山东省的德国利权，并以委任统治地的名义接管了赤道以北旧德属南洋群岛。

根据威尔逊总统的提议，组织了国际联盟作为“和平处理国际纷争”的机关。但它没有允许苏联和战败的德国参加。美国金融资本通过战争开始支配着欧洲的金融，害怕加入国际联盟会妨害它在欧洲和中南美的行动自由，所以美国国会也拒绝加入本国总统所提议的联盟。没有俄、德、美三个主要国家加入的国际联盟，本质上不外是为英、法维护凡尔赛体制的工具，不能成为保障和平的力量。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 帝国主义列强战后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干涉。在德军败退的俄国南部，有英、法舰队和陆军的侵入，勾结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尽全力想颠覆苏维埃政权。凡尔赛媾和会议，另一面则成为反苏战争的秘密司令部。1919年3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给议会的秘密备忘录中说：“允许苏联存在，讲和会议是不能结束的。”

以英、法、日、美为首的十六个国家从四面八方进攻革命的俄国。不仅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连虚构的借口都没有，帝国主义各国便侵入了俄国。高尔察克、邓尼金、克拉斯洛夫、弗兰格尔、尤

登尼奇等俄国的反革命将军们和外国干涉军勾结起来，使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濒于危机。受沙皇苛政和连续四年战争所蹂躏过的俄国，食粮、衣料、燃料都很少；再加干涉军和反革命军将顿河流域、乌克兰以及高加索等食粮燃料地区隔断了，以致食粮、燃料更感缺乏。

然而俄国工人阶级并没有灰心丧气。布尔什维克党宣布化全国为阵地，将全国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都转入战时规范。工人和农民相继作为义勇军加入红军。人民把这个政府当作自己的政权而感到自豪。把它的政策理解为自己的政策，为了坚决保卫它，忍受一切困难，同反革命军与外国干涉军进行了战斗。六十个以上的俄国各民族、种族在帝俄时代曾不断地进行反抗，现在则协力同心，团结起来，保卫社会主义政权。这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社会主义各项政策和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关系。

与此相反，反革命军和干涉军为俄国人民所极端仇恨。干涉军本国内的人民，以工人阶级为首，也激烈地反对干涉战争。干涉军的士兵们受到俄国人民的影响，反对本国统治者的非正义战

争。1919年4月侵入敖德萨的法国舰队水兵，拒绝参加干涉作战，起而叛乱。西伯利亚的日军也完全没有斗志。帝国主义者后方的殖民地，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民族革命运动也发展起来了。这就无异缚住了干涉者的手足。1919年4月英国参谋总长威尔逊大将不得不招认英国必须撤回它在俄国和欧洲的军队而集结于英国本国、爱尔兰、埃及和印度。

俄国人民就这样得到了各国工人和民族革命家的支持，终于突破了危机。1919年夏秋间粉碎了西伯利亚和北部的干涉军与反革命军。1920年1月英、法、意三国解除其对俄国的封锁。西伯利亚的美军也撤退了。

1920年4月，在美、法帝国主义煽动下，波兰军侵入乌克兰，反革命将军弗兰格尔则向顿巴斯进攻。这时英、法没有能公开向俄国宣战的原因，是由于英、法工人的反对。结果，这次最后的大规模干涉战争也被苏军粉碎了。10月波苏间缔结和约，11月盘据在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将军也被歼灭了。尽管有日军在西伯利亚继续干涉，但基本上已经结束国外干涉战争和内战的时期，社会主

义俄国完全获得了胜利。

这一胜利有力的说明了俄国革命不是一小撮过激派的阴谋，而是在一亿以上俄国人民大众忘我的支持下取得的；不然，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权怎样能维持下来并粉碎十六个国家的干涉军呢？这一胜利也说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历史前进规律的；不然，假如十月革命只是偶然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怎样能突破内战和国外干涉战争的危机呢？

这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3月的第七次大会上把党名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个党名是完全符合党所规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的。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影响下，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左翼、共产主义势力迅速地发展起来，学习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开始建立新的政党。1919年3月建立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来自三十个欧亚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第三国际的建立宣言和纲领。共产国际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继承第一国际的传统，克服了第

二国际腐败透顶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而建立在列宁主义的原则上的。它是从欧洲以至亚洲殖民地的各国各民族的共产党为支部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和大胆自我批评的原则上的革命组织。共产国际的建立“**是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前阶**”^①。

俄国革命的意义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变。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俄国一国范围内的革命，而是人类开始从剥削社会向没有剥削社会的转变。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是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执掌政权。社会主义革命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消灭一切剥削的革命，确立了被压迫阶级中最富革命性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权。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

^① 列宁：《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455页。

转变^①。

十月革命割断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占地球陆地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支配全世界的体制了。和资本主义并立的有社会主义存在，并日益发展着，而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给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以革命的影响。因此，十月革命开辟了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不仅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这次革命也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的统治，无论在帝国主义后方或其外围，都受到一年比一年更大的打击。十月革命解放了旧俄帝国内六十余个被压迫民族。它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下进行的民族革命。这一实例使十月革命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感化，使它具有新的性格。就同日本有深切关系的事件来讲，

^① 参看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作）》，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3—204页。

1919年3月朝鲜爆发的独立革命，同年5月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都是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然而过去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则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环的意义。

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强大的公开的中心。因此，组织包括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革命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可能了。十月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整个体系的危机的最大标志，给它以永远不能恢复的致命伤。

十月革命也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它是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胜利，是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

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崩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并存，以及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间正在发展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具有新的性质的斗争，促使帝国主义各国相互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化、更加激烈化了。它们的对立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结果，它们的实力发生了变化而引起的。首先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主要是德国）的对立，第二，在战胜国间，围绕着太平洋和中国，日本和美、英间的对立，以及英、美在世界各地的对立，都日趋尖锐。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对立，由于它们共同敌视苏联，虽曾屡次谋求妥协，但仍不能消灭或根本削弱，而终于发展为日、德、意对英、美、法的大战。

资本主义世界整个体制就是这样地陷入了危机，陷入了总危机中。

第三节 米粮暴动——经济 危机的开始

大战中的城市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日本资本主义周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了总危机，也使日本资本主义内部陷入了总危机。在大战中，日本一方面异常繁荣，进行了帝国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劳动群众的重大牺牲和阶级对立也尖锐起来了。殖民地朝鲜和半殖民地中国又时刻准备燃起民族斗争的火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与美、英两帝

国主义的对立也愈益深刻化。俄国革命和大战的结束，同时，便促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

战争繁荣使航运、造船、钢铁业、矿业、机械、纺织、银行以及其他大垄断资本家获得巨利，但这是牺牲劳动群众而获得的。一般人强调地说出口贸易的陡增是战争景气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出口的陡增，首先是饥饿输出的结果，这种饥饿输出是政府通过集中人民零碎的邮政储金、发行公债、以及征税，从人民身上搜刮到巨额资金（约十亿日元），充作资本家进行出口的外汇而强制推行的。因此，国内生活必需品异常缺乏。人民既被政府征收保护资本家的费用，又受生活物资缺乏及其价格暴涨的损失，无异遭受双重掠夺。

钢铁、造船及其他重工业、军需工业等无一不是用人民税款保护奖励因而逐渐发达并获得利润的。并不是专靠向国外销售产品以取得利润来扩大再生产的。

此外，资本家不是扩充生产设备，而是强迫工人夜间操作，加强劳动强度，尽量利用现存的设备，以提高它的利润；工人则因过劳而疲惫不堪。

例如日立制作所编的《日立制作所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到1917年(大正6年),由于去年以来不断地加班,通宵操作,员工渐感疲惫因而增产有困难。”

第17表 第一次大战中实际工资的降低

	物 价 指 数	工 资 指 数
1914年	100.0	100.0
1915年	102.0	99.1
1916年	122.0	101.9
1917年	154.0	116.7
1918年	202.0	153.3
1919年	248.0	217.9

(根据高桥龟吉:《大正昭和财界变动史》)

由于上述的加班和夜间操作,工人收入多少有所增加,但工资提高因此受到抑制,实际上收入反而减低了。一般综合物价指数(日本银行调查)和工资指数(农商务省调查)如以1914年为一〇〇则如第17表所列,有了显著的距离。

就拿制造出口武器工业中最兴隆的日本兵器公司的熟练工为例,这些出入花街柳巷的“暴发户”,也不过是因为实行计件工资制,拼命地工作

十二小时以上,工资因此多些而已,其单价则随工人熟练程度的增加而递减,最初每件工资为一角二分,递减为每件一角、八分、七分,以致工人难于忍耐起而罢工(野田律太:《劳动运动实战记》)。

第 18 表仅就包括工人伙食、房租、光热、被服等费的生活指数和实际工资指数作比较。1915 年实际工资指数虽有上升,但从 1917 年即战争繁荣时期起便开始低落,而在最繁荣时期生活费指数就上升到工资指数的两倍以上。

第 18 表 第一次大战中生活费的上涨

	生活费指数	实际工资指数
1914年	100.0	100.0
1915年	92.5	108.2
1916年	100.6	105.1
1917年	123.7	98.4
1918年	174.3	92.3
1919年	216.9	102.3

(根据玉城肇:《米骚动的社会背景》中所引《人民评论》1948年8月号中所载上田贞次郎、井口东辅:《我国的生活费和实际工资》)

最走运的工矿工人的工资实质上尚且降低得这么多,那些夜间工作没有加班费而工资又很低

的公司低级职员、教师、警察、低级公务员、私人商店的使用人以及日本城市中极大多数没有固定职业的贫苦人，在大战期间，他们生活上的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

大战中的农业与农民 作为资本家维持低工资条件的，即构成工资主要部分的米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比一般物价涨得既慢且少，换言之，即农民供大资本家的牺牲，以低米价支持低工资，使垄断资本能够攫取超额利润。

根据第 19 表，战前农产品价格较平均物价以及垄断资本所经营的纱价、煤价都高。到了战争爆发后，一般物价暂时低落时，米麦下跌尤剧。但当 1916 年工业品价格急剧上升时，米麦价格直到 1917 年才达战前水准。1918 年起虽然急剧上升，并成为米粮暴动的导火线，但仍远远落后于垄断物价。在大战初期，政府为了提高米价，乃于 1915 年公布“米价调节令”，实行收购。从 1917 年起，政府为了压低米价，曾抛售一些存米。但是因为如再降低米价，则违反卖米大户——地主的利益，所以并未认真实行。

第 19 表 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差异

(1907—1913 年的平均=100)

	物价指数 总平均	棉纱	煤	米	大麦	豆
1913年	105.2	108.7	102.3	127.3	125.1	113.8
1914年	100.0	87.3	109.7	95.3	80.0	106.3
1915年	101.4	81.7	99.8	77.2	66.1	84.9
1916年	122.7	109.1	110.7	81.4	71.8	78.0
1917年	155.8	193.4	216.1	116.2	129.0	103.4
1918年	197.1	273.7	295.7	192.1	232.2	172.7
1919年	247.2	394.0	321.6	271.3	254.0	281.3
1920年	272.4	320.8	320.3	262.6	237.8	306.7

(根据昭和 10 年 (1935 年) 农林省农务局出版的《东京市场的重要农产物价格指数比较表》。为了避免战争的影响所以选择 1907—1913 年的平均数为基数。本表从高桥龟吉:《大正昭和财界变动史》转载。)

大战后半期物价上涨,加以城市人口增加,使农产品需要激增,刺激了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如以 1914 年为一〇〇,则 1919 年扩大到一〇四点四,特别是旱田达到一〇六点五。以 1925—1929 年的生产指数为基准,1913—1917 年五年的平均产量和前五年平均相比较,都有增加,计米增 8%,麦也增 8%,蔬菜增 9%,经济作物增 11%,蚕茧增 13%,畜产增 10%。综合农产物价指数如以 1913

年为一〇〇，1919年即达一一四点八。尤其是养蚕增长为一六三点八，畜产增长为一二六点一。由于生丝出口最盛，如把蚕茧产量按价格计算，则从1914年的一亿七千五百万元，到1919年激增达四点四倍，计七亿七千一百万元。这就是所说的农村繁荣的中心。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营规模也起了变化，农家总数约增加三万五千户，不足五反的农户实数为六万一千户，在农业总户数中的比率减少1.28%，五反以上不到一町的农户也略有减少，相反，一町以上不到二町的确有增加，二町以上的大规模经营者，在此繁荣期间(1914—1919年)也增多了。又从另一角度看，农户总数中专业农户与兼业农户的比率则从1914年的六八点四七比三一点五三，变为1919年的七〇比三〇，专业农户有了增加，兼业农户在比率与实数上都有减少。这种减少与耕地面积不足五反农户的减少有同样倾向，即表明了超零碎农户被排出于农业之外，完全变为无产者了。相反地，专业农户和一町以上不足二町农户的增加，表明了中农以上的农户在这个时期，作为小商品生产者多少有了较好的条件。

特别是雇工经营养蚕、畜产、种菜等的富农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米粮生产在碾米与调整作业方面也开始使用动力机，用化学肥料的也有增加。这些都说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较前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日本农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米麦生产，由于寄生地主制的压力依然很强，所以资本主义的经营几乎尚未成长起来。按耕种规模来讲，不足五反的农户有了减少，但相反地，从耕地占有面积来讲，不足五反的农户则增加三万一千户，即增加0.93%，又十町以上不满五十町的大地主则从四万零七百六十二户增至四万五千九百七十八户，五十町以上的大地主则从两千九百六十三户急增到四千二百二十六户。大地主增加之快为从来所没有。由于五反以上不足十町的地主有了减少，所以有土地的农户总数也减少了五万三千户。也就是大自耕农丧失了一部分土地，变为小农。他所丧失的土地则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去了。

一方而是自耕农的佃农化，中小经营者的增加，小农经营的贫农走向无产者化，脱离了农业。另一方面上层富农和大地主由于养蚕、园艺、畜产

的兴隆，特别是米粮投机，获得了巨大利润。然而中农富农的繁荣主要也是依靠受美国行情所左右的养蚕业。这就是大战中农民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战争的繁荣，对大多数的农民好处极少，而大地主和佃农的对立，希望上升为商品生产者的中农和地主制的对立，都已经成熟了。下层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系则愈加紧密（农民本身的无产者化，农民家属的无产者化），中农生活受资本主义情况变动的的影响愈益强烈，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简言之，即想向上升的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半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小农生产和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都加深了。

工农运动的新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达，产业工人的增加，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成长。为了反抗日益加剧的生活困苦，工人的罢工逐渐增多了。此外，以友爱会为首的工人组织，尽管是慢慢的，但有发展。特别是从1917年起有了飞跃的发展。

1914年6月东京洋纱公司解雇工人一千名，工人组织了工会，名为“工友会”，与之对抗，举行罢工，并请求友爱会予以援助。罢工虽未获得成功，却促进了工人的团结，友爱会也从此发展起来

了。同年，在常盘煤矿设立了分会，翌年（大正4年）在京都、横滨、川口、日立矿山、大荒矿山（岩手县）、横须贺、王子、小野田（山口县）、足尾铜矿、大阪等处设立支部，并成立海员支部，到1916年会员达一万人以上，同年5月友爱会又设立妇女部，出版机关杂志《友爱妇女》，更将组织推广到九州煤矿、北海道的室兰制钢所，1917年初会员增到三万人了。

第20表 工人运动的发展

	罢工次数	参加人员	工会成立数
1914年	50次	7,904人	6
1915年	64次	7,852人	4
1916年	109次	8,413人	13
1917年	398次	57,309人	14
1918年	417次	66,457人	11
1919年	497次	63,137人	71

此外，1917年4月东京欧文印刷工人成立了工会“信友会”，这是1907年暂时停止活动的“欧友会”的复活。关西方面除友爱会的支部外，1916年5月横田千代吉、西尾末广（1891—）、坂本孝三郎等以机械工人和电气工人为中心，在大阪建立

了“职工工会期成同志会”，拥有千名以上的会员。尽管由于领导者的分裂，于1917年底解散，西尾等加入友爱会，坂本等则单独组织“劳动问题研究会”，继续斗争，到1919年（大正8年）以大阪铁工工会名义而恢复起来了。

这些工会虽然也和友爱会同样，是劳资协调主义，但是作为工人开始走上阶级的自觉来讲是具有意义的。1918年3月，室兰制钢所发生罢工，要求提高工资40%，这说明了战争的繁荣只是给工人带来了痛苦。

租佃纠纷从1917年起也逐渐增多，同年发生八十五次，1918年发生了二百五十六次，1919年则达三百二十六次。斗争的战术也采取了完全拒绝缴纳地租，或则只缴一部分，而将要求减低数扣留（如爱知县鸣海町从1917年开始历时数年间的纠纷），或则团结起来举行各种示威运动，或则用小学儿童同盟罢课等（如1914年爱媛县关川村，1917年岐阜县清水村，同年兵库县粟鹿村，冈山县兴除村等的斗争）的战斗方法。与此同时，佃农协会从1913—1917年一共建立八十八个，翌年仅一年间就新建八十八个协会，以后急剧增加着。

特殊部落民在日本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地位，被歧视为“社会以外的社会”，在贫穷和屈辱的深渊中过日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与普通社会的联系，也不得不愈益密切^①。他们非常愤恨这种无理的歧视，要求维护人类应有的权利与荣誉的觉悟也提高了。1916年（大正5年）由于博多某报纸登载了诬蔑部落民的消息，特殊部落全体起而捣毁了该报社。这种类似的事件，以及在军警机构或学校内因被歧视全体起而抗议的事，在不断地发生着。

^① 据内务省1921年（大正10年）调查，全国特殊部落总数为四千八百九十个，共计约九十万人，其中居部落内的约八十三万人，离开部落外出的约七万人，但实际上部落数与人口数可能都还要多。特殊部落人口的60%虽然住在农村，但多少能从事农业的不过全部落人口的49%。其耕地面积平均不过五反左右，不到全国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的半数；而且耕地分配状况很不均匀，有40—50%的特殊部落农户是连一坪土地也没有的纯粹佃农。

换句话说，就是农村的特殊部落民，从阶级上看，是贫农、半无产者和无产者的密集集团，在封建时代，受身分差别制度的压迫，被排挤于农业之外，进到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仍旧被排挤于土地和农业之外，但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他们原来世代相传的手工业衰落了，又没有被近代产业所雇佣，因而既没有土地，又无工作的部落民，常常为了获得一坪耕地，不得不忍受任何坏的条件。因此，特殊部落佃农的地租比平均地租还高

劳动人民阶级觉悟的提高，使注视人民动向的统治阶级的机关杂志也在1916年7月将其所抱的恐怖坦白地招认如下。

“听！工人对资本家的诅咒声。看！佃农对地主的不满面孔。他们以低微的工资，微小的收入，象机器一样地工作，只是增加资本家与地主的收入，他们每天在现实教育和周围环境刺激之下，逐渐有了觉醒，能永远忍受资本家地主牛马般的使

30—40%。维持特殊部落民，对寄生地主是极有利而又重要的条件。

尽管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城市的特殊部落民受身分差别制残余的阻挠，不能加入近代产业工人的队伍中去。于是大多数的特殊部落民，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都从事日趋衰落的零碎家庭手工业（多数从事皮革、稻草、竹及其他加工工作）和不安定的杂役以糊口，为失业、贫穷、疾病所苦，和文化也绝了缘；又加上婚姻、社交及其他种种歧视，他们真是受“封建野蛮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残酷夹攻，处于社会以外的社会”（河上肇）。

然而随着天皇制政治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达，特殊部落民的生活关系也广阔复杂了，与社会的接触也频繁了。例如小学和军队，都不能不让他们进去。他们中间，尽管是少数，也出现了近代产业工人。有的则从事行商，到处奔波，也感受了时代的气氛。他们当中还有小商业资本家和师傅等小资产阶级，通过商业来往，与社会的联系也广泛了。他们在与社会接触中，对于这种歧视和侮辱，愈加感到难于忍受，因而更加强烈地要求平等权利。（关于上面的事实和史料，请参阅部落问题研究所编《部落的历史和解放运动》一书中井上清所著“现代篇”。）

役吗？他们必然会在最近的将来学习欧美的榜样，站在坚强的基础上，以温暖的肉体 and 冷酷的黄金势力展开争霸战。（中略）如果我们将来只许强者优胜者横行而不改变这种态度，正如明治维新时少数当权者在政治上的没落一样，不久经济界也将实行维新革命，现代这些资本家与地主必将陷于牺牲的命运。”（帝国公道会机关杂志《公道》）

社会主义者重新展开活动和民本主义 幸德事件以后被窒息了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重新展开活动。堺利彦从1915年（大正4年）9月起，创办了《新社会》杂志，翌年山川均（1880—）也加入，评论社会问题，介绍欧洲和俄国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对于俄国革命以非常共鸣的笔调报导过来。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荒畑胜三（寒村）最初办《近代思想》（1912年9月创刊），以讨论文艺问题为主。1914年9月停刊，改出月刊《平民新闻》，大胆地恢复日俄战争前后《平民新闻》的传统，开始实际斗争，但因连续遭到压迫，不到一年便停刊了。嗣后又出版《近代思想》，等到《近代思想》也遭到迫害后，又出版了《文明批评》和《劳动新闻》，企图直接和工人结合起来。山川和荒畑又

于1916年创办《青服》^①杂志，主张工人应有团结权与罢工权。1917年（大正6年）1月的大选中，堺被推为候选人。这原来是以宣传社会主义为目的，虽然只得了四十五票，但能出马为候选人，即此一点，也说明社会主义者重新展开公开政治活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第一次护宪运动以来，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者所提倡建立议会政治的主张也继续发展了。1916年1月号《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所写的：《论宪政实质及正确实现的途径》一文，主张政治应该尊重民众的舆论，以它为基础，因之必须建立以政党内阁、众议院为主的议会政治。他说，什么舆论，实质上是“哲人”制造的，民众受“哲人”指导，形式上确立舆论；甚至于说近代政治与“绝对民众主义”不能相容。这种主张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的理论来讲，虽然是极其不彻底，但在当时的日本，这种妥协的民主主义——“民本主义”^②——

① 《青服》命名的由来，因为当时工人的作业服，大抵是藏青色。

② “民本主义”一语，并不是吉野作造所创造，他仅将当时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所用的语言，给以系统的内容。

实质上是具有影响力的。

当时鸟居素川（1867—1928）任《大阪朝日新闻》主笔，邀请长谷川如是闲（1875—）、大山郁夫（1880—1955）等为编辑，起了民本主义运动的大机关的作用。遇事猛烈地攻击寺内军阀内阁，嘲笑其为“非立宪内阁”（寺内的头象福神 Billiken）^①。从1916年起又连载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1879—1946）的《贫乏物语》（《贫穷的故事》）。他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以社会政策为出发点而写的，但把劳动群众的贫穷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提出来，起了很大的影响。它之所以能在《朝日新闻》上刊载，就说明民本主义者开始和无产大众接近，早已到了任何妥协的民本主义也必须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时代。

俄国革命的影响 当日本国内这种情势向前发展的时候，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继而欧洲各国的工人革命运动以及爱尔兰、捷克、匈

^① 一说“非立宪”三字，日本发音与 Billiken（福神）同。寺内是军阀专制内阁，故当时报纸杂志用日本注音字母ビリケン内阁以讥之。——校者

牙利等民族独立革命运动也都爆发了。它直接给社会主义者、先进工人以及知识分子以很大的激动。

1917年(大正6年)5月,二月革命后不久,东京的社会主义者就秘密集会,通过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的决议,祝贺革命成功,表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并将议决案在片山潜在美国出版的《平民》杂志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俄国刊物也登了。此外《新社会》每期都以最大共鸣的口吻报导俄国革命的消息。1917年12月并曾募集资金以援助因反对美国参战而被捕的I.W.W.^①会员的保释运动。(荒畑寒村:《劳动运动的复兴期》,载1928年2月出版《社会科学杂志》特辑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

先进的工人听说俄国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权,感到无比的兴奋,如友爱会机关杂志所载各支部会员的来稿^②,有的说:“把生存的希望带来

^① I. W. W. 系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产业工人)的缩写,1905年在美国芝加哥创立的战斗性工人组织。从它的左翼中产生了美国共产党。

^② 载友爱会机关杂志《劳动和产业》1918年(大正7年)10、11月号上。当时该杂志的总编辑为野坂参三。这些文章是由编

了”，而表示无限的感激（仙台，原田忠一）。有的说：“专制的力量似强而实弱，一旦民众起来反抗便比朽木还不如，容易摧毁；民众的力量似弱而实强，振臂一呼，虽是强盛的政府也将随之土崩瓦解”，对民众团结的力量有坚定的信心（大阪，楠政市）。有的说：“傲慢的平氏，傲慢的罗曼诺夫王朝，俱往矣！现在该轮到谁？”（神户，唯雄）。有的说：“社会主义不是学者的空想而竟实现了，多么有意义！”（川崎，深川中岭）。有的说：“资本主义全盛的世界，四而尽是敌人，俄国人民在这样的环境里，想实现劳动主义的理想起而革命，饱尝着先驱者的艰苦和悲伤”（福冈，山崎国三）。大多数都洋溢着感激、共鸣与希望。其中也有的说：“使产业荒废，人民从哪里去求幸福？（俄国人）真是可

编辑部出题悬赏征求的。据说来稿总数不过二十篇，选载了十四篇，都是同年8月以后写的。其中显明地始终支持革命的六篇。一贯反对革命，高唱工人爱国心的，有上述舞鹤支部会员的一篇。这篇可能是海军工厂的官方宣传文，假借友爱会支部干事名义发表的。其他文章虽然说什么在举国进行战争的时候，发动革命是非常不好；或是说革命两字“听起来就令人讨厌”，但却写道这对日本的资本家与政治家是一付良药；或说俄国革命有它必然要发生的原因。其中也有人因为害怕警察或公司当局，尽管内心支持革命，却假装反对口吻。

怜而又可怕的无自觉的人民。”还有舞鹤支部海军工厂会员模仿友爱会会长铃木文治的口吻说：“希望工人把俄国的现状引为殷鉴，大战结束后各国必将发生激烈的商战，愿彼此互勉，作为一个商战战士起而奋斗。”有的来稿一方面认为革命使俄国陷于混乱，被迫签订布列斯特的屈辱条约，予以指摘；另一方面则警告日本的政治家资本家赶快从俄国统治阶级的命运吸取教训。这种想法的思想根源就是友爱会的劳资协调主义，但它本身也发生了动摇。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很多进步学生走到群众中去，开始和劳动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民本主义者虽然并未积极支持十月革命，但对推翻专制政府是具有好感的，《大阪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从1918年起主张承认劳农俄国，反对干涉俄国革命。

又十月革命和受十月革命影响而发生的欧洲革命运动，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媾和十四原则”的民主主义与民族自决主义——受布尔什维克“公正而民主的媾和”原则的影响而提出来的——等，使旧的专制权力、旧的秩序，无论是在

帝国主义本国内或殖民地与附属国内都发生了动摇。日本也这样被卷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一个革命大波浪中去了，原因是日本存在着上述这些社会条件。1918年(大正7年)5月寺内首相在地方长官会议席上曾训示说：“由于民众生活非常困难，资本家和工人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国民思想在外国的影响下，正发生着不合于国体的变化，应予警惕。”数月后原敬首相也承认：“民众不知何时感染了外国的空气；社会主义的传播现在已使我们处于无可奈何的形势中”（《原敬日记》，大正7年11月3日）。

出兵西伯利亚 统治阶级是按他们的身分来理解俄国革命的。二月革命之后，日本政府仍旧供给俄国临时政府以武器，并不惜承购一亿五千五百万元的公债以援助它。帝制被推翻后，只要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日本的统治者仍旧与俄国友好。但在十月(11月)革命后，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立刻出而干涉革命。当11月14日苏维埃政府宣布对德停战，当天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便和在满洲里对苏维埃宣战的哥萨克谢米诺夫大尉取得联系，而参谋本部的荒木贞夫中校当时作为欧

洲战线观战武官正驻在俄国，也和谢米诺夫反革命军勾结起来。1918年1月12日，日本军舰两艘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非法驶入海参威，继而又派陆战队登陆，干涉当地的苏维埃（以后和英军一起，迫使苏维埃解散，前面已经叙述）。

为了干涉俄国革命而出兵西伯利亚的问题，俄国革命后不久在巴黎协约国会议上法国代表早就提出过，美国和英国也曾试探过日本的意见，当时日本政府含糊地表示不愿意出兵。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日军被外国利用，不愿和外国联合干涉，而进行单独干涉的准备，日本最初预料革命会把俄国搞成四分五裂，布尔什维克不久也会崩溃。以此为前提，进行干涉。第一，扼杀俄国革命；第二，乘机夺取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为日本领土，或在此建立日本的傀儡国家；第三，使北西伯利亚和南满洲之间的北满和内外蒙古自然地落入日本手中；因之第四，强化对中国的统治，建立起对抗大战后英美等向亚洲扩张势力的基地；此外，第五，则企图转移日本人民革命热情于对外战争上面。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总认为与英、法、美等联

合出兵不利，但是因没有任何名义能使出兵合理化，又恐不取得协约国同意，贸然出兵而遭到美、英反对时，万一干涉战争长期化，日本的军费和军需品的供给都不得不依靠美国，必被美国拒绝，因此，突然单独出兵也有困难。日本干涉政策的这种矛盾，当时政府内部形成了对立的意见，一派是上原勇作参谋总长和本野一郎外相以及后任后藤新平（1857—1929）外相等主张单独大规模出兵论，另一派是元老山县有朋和他的门徒寺内首相、政友会总裁原敬、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等主张对美妥协论。

英国方面虽然也希望尽早摧毁社会主义政权，但由于认为从西伯利亚方面进军干涉，对日本最为有利，因而感到踌躇。英法也各有打算。帝国主义的相互对立，使对俄军事干涉迟迟不能决定。

这期间日本已逐渐完成了干涉准备。从1918年3—5月政府强迫中国签订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下列各项：（一）日华两国基于同等的地位和利害出发，共同保卫远东，免受敌人，实际是苏维埃政权的侵略；（二）因此，日军和中国军在北

满洲实行共同作战，或共同出兵到中国境外；（三）为了共同作战，日本派官员到中国军内，将来负责联络任务以及在中国共同建立军事基地，共同使用。

这和今天“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同样的，意味着把中国军作为日军的附属品，在中国境内用中国人民的费用建立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不仅压制苏联也是压制中国本身的军事基地。知道这个协定的中国学生、商人、工人在各地展开反对卖国协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猛烈运动。因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也是其主要势力之一，文部省乃勒令他们退学回国。

当军事干涉还在拖延未决的时候，日本从1918年5月起随着米价的暴涨，社会急剧不安。政府认为出兵西伯利亚再不能踌躇了。美国看到日本打算毅然出兵，为了不使干涉的利益为日本独占，也表示同意出兵。8月3日日本政府以“根据美国提议，为了拯救西伯利亚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为借口，宣布出兵。按条约国的协定，日本派兵一万两千名，美国七千名，英、法合计五千八百名开往海参威方面，并规定日本根据需要，得出兵

西伯利亚。事实上,出兵后两个月,日军以超过协定六倍以上的大军,占领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各个城市和交通要地^①。

米粮暴动的开始 正当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亚时,早为统治者所担心的米粮暴动便爆发了。从6月底到7月各地就发生了要求提高工资的工潮,在大阪、京都连监狱的看守、法院的廷丁等政府的爪牙也发生了动摇。7月3日,东京增加了警察两千五百九十九人,约40%以上,从这点也可以了解当时群众激动的情况。

米价从同年春起直线上涨,春天白米一升为二角钱,夏天便继续涨到四角五分、五角、五角五分。

暴涨的基本原因是半封建地主制度下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即由于地主制的压力,米粮生产和工矿业生产的发展相比,显然落后。仅就1917年和1918年来看,因为时令不正的关系,本国的产米量比1914—

^① 日本干涉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反抗干涉运动,详见井上清著《对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干涉战争》(《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二册)。

1916 年间任何一年都减少。尤其是 1917 年较 1916 年约减少了四百万石（约减 6.6%，1918 年与 1917 年相同），而城市人口比战前增加了 20%，工矿业人口则增两倍以上，农村也由于手工业人口的增加，使米粮需要急剧增加了。（1914 年的消费总额为五千四百十八万石，1918 年则达六千零六十三万石，增加了五百四十五万石，即约增 9%），因而大商人预料到青黄不接期的涨价，大肆进行囤积居奇的投机。又如上述，大战期间大、中地主激增，他们的囤积居奇也趋激烈，米价怎得不暴涨！

然而政府则维护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对于这种暴涨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产业资本家和一般人民虽然强烈地要求废除进口米的关税，政府并没有采纳。不仅如此，却叫三井物产公司、铃木商店（与后藤外相勾结）^①等特权大商人垄断外米进口，他们甚至于不轻易出售。

促使投机更加激烈化的是为了预备出兵西伯利亚而收购军米。军米的数量虽不清楚，但日本

^① 当神户发生米粮暴动时，铃木商店曾被烧毁，但它并不介意，8 月底，为了多赚钱，派员往全国各产米区收买。

需要米粮最多的首推军部。当准备大规模战争时，必然会引起米价腾贵，所以在开始出兵西伯利亚的同时，米价便高涨起来，并引起了米粮暴动。这一点在《大阪朝日新闻》的社论中也曾强调地指出。

当米价日益暴腾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则如上所述激烈地降低了。

人民的思想 and 情绪由于生活突然陷于困苦深渊中，再加前述日俄战争后火烧警察机关与护宪示威运动等经验，以及俄国革命的影响和民本主义宣传的力量，以致发生了上述变化，终于爆发为全国性空前大规模的米粮暴动。

米粮暴动开始于富山县渔村中的劳动妇女。7月23日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从事码头搬运工作的渔民妻女们^①，被派去搬运米粮运往外县。她们认为米价的昂贵就是由于运销外县所造成的，乃要求货主(米商人)停运，但遭货主拒绝，于是激

^① 新川郡沿海地区的男人，大多数去北海渔场工作，留在家中的多系妇女和儿童。妇女们是从事渔业、搬运和家庭手工业的无产者，每当青黄不接时期，生活陷于困难的妇女，向町、村当局或财主要求帮助的斗争，直到近代犹屡屡发生。

怒了她们，便停止搬运，并于当天晚上集合商量关于要求停止运米出境和贱价出售的问题。

随后同郡沿海一带的町、村由妇女数十名或数百名组成为一队，走到财主、米店以及町村公所要求廉价售米，救济穷人，并停止外运。到8月声势益张，8月5日在下新川郡鱼津、中新川郡滑川、西水桥、东水桥、生地等发生数百人的暴动，其中以妇女为主，也夹杂有男人。当天，东水桥町意图阻止米粮外运的群众中有一人被警察逮捕。为了夺回他，第二天有三百人拥入距离该地一里有余的滑川町警察署。8日滑川町也有数百人向警察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同志。民众已经开始和警察对抗了。8月8日群众运动扩展到县内各地，包括富山市在内。

全国的蜂起 这些事件首先由《北陆时报》、《北陆新报》、《高冈新报》等以同情民众的心情报道出来。继而8月5日、6日大阪《每日》《朝日》两报纸也以同情笔调报道了越中妇女暴动的消息，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冲动。8月9日京都和名古屋两大城市民情鼎沸，10日晚上京都市柳原特殊部落民首先起义，后市内及近郊（现在的市内）的

其他特殊部落民，以及特殊部落民外的无产大众也相继蜂起，发展为历时四天的大暴动。每天都有数千人袭击米商以及平素为人民痛恨的富豪店铺或住宅，但终于被军队镇压下去了。

10日晚上名古屋也有数万市民在舞鹤公园集合，举行了没有主席团的群众大会，很多工人、工匠、小商人发表了要求降低米价的演说，接着群众便袭击米粮交易所。到17日止，计八日间，每天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如以富山县的起义为米粮暴动的第一阶段，从京都、名古屋的起义到8月15日止则为第二阶段。暴动扩展到近畿、山阳^①、四国、九州、北陆、东海、东北的大中城市。大阪从11日起到13日，神户从12日到14日，奈良14日，和歌山13、14两天（以上为近畿），冈山13、14两天，广岛12、13两天（以上为山阳），高松14日，高知15、16两天（以上为四国），门司15、16两天（以上为九州），金泽12日，福井13日（以上为北陆），静冈13、14两天，东京从13日起到15日（横滨较迟，是16、

^① 山阳是本州岛西端地方，突出于日本海与濑户内海之间，成半岛形，包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校者

17 两天), 甲府 15 日 (以上为东海和关东), 福岛 13、14 两天, 仙台 14、15 两天(以上为东北), 都发生暴动。

这一周间是米粮暴动集中的时期。除上述的大中城市外, 在各府县的一些城市中也发生暴动, 13 日以后, 各郡部也发生暴动。大阪、神户、冈山的事件规模最大也最激烈。

又各地的暴动中, 以京都、神户、冈山为首, 凡捣毁和烧毁得最激烈的地方以特殊部落民的活动最为突出。农渔村中发生暴动也以特殊部落民居多数。在整个米粮暴动过程中, 特殊部落民是主要参加者, 是最具有战斗性的分子。他们由于封建的身分差别, 被排出于安定的近代产业和农业之外, 不但物质生活在我国人民中算最苦和最不安定, 精神上也经常受着难以忍受的侮辱, 而受着同样痛苦和侮辱的人们又密集在同一地区, 在米粮暴动这种地域性的斗争中必然会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警察却利用这一事实恶意地宣传说: “米粮暴动是一般人民被特殊部落民所利用”, 煽起群众的歧视偏见, 以分裂群众。

第二阶段大中城市的暴动中, 群众的攻击对

象最初是哄抬米价的小米店，要求廉价出售。进而指向粮行，如名古屋、东京在最激烈时，曾攻击米粮交易所。高利贷业与富豪家被捣毁的也很多。攻击时必然和警察发生冲突，因而大多数警察派出所被烧掉或捣毁。群众更时时袭击警察署。警察几乎被群众弄得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大中城市参加起义的群众中，近代产业工人所占比重不大，例如大阪为当时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估计工人只占群众的四分之一，至多也不过三分之一，其余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贫民（包括特殊部落民）。但这并不是说产业工人起的作用小，相反，在某些地方，产业工人显然起了领导作用。例如在名古屋舞鹤公园的演讲者中职工就占多数。神户的起义也是三菱造船所职工要求提高工资，因遭拒绝，在所内发生暴动所引起的。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群众大会上，因发表演说而被捕的中间，就有职工山本悬藏（后为共产党干部）。

尤其是吴市（从12日到14日）与舞鹤（13日）两地的海军工厂的工人，无论在人数上或活动力方面都成为暴动的主力。吴市于14日深夜以产业工人为主，共约三万人，灭掉市内街灯，在

黑暗中捣毁米铺和富豪家，并和水兵团展开数小时的市街战，群众方面当场死亡三名，重伤四百名，水兵团中则有一名军官和十五名水兵受伤。

产业工人的斗争和米粮暴动相结合的实例，除上述三菱造船所之外，还有其他几个明显的事实。但大多数工厂中当工人展开斗争或即将发动斗争时，由于资本家接受工人要求或廉价售米而防止了。

首都东京发生米粮暴动使政府大为震惊。13日以天皇名义拨款三百万元为“贫民救济费”，政府也拨出一千万元，三菱、三井及其他财阀共捐数百万。各府县也以地方费和地方富豪的捐款，急筹救济。当局一方面用这些钱廉价出售进口米，致力于稳定民心；另一方面，政府于14日禁止报纸登载米粮暴动的消息。对此，全国报社以大阪《朝日》、《每日》为首，由社长带头为了维护言论通信的自由，共同进行了斗争。大阪《朝日》以威胁的口吻写道：“政府如果这样横暴，将招致白虹贯日，使金瓯无缺的国体发生裂痕”（即发生革命危及天皇制的意思。以白虹贯日喻君主被刺）。

政府与资产阶级虽竭力欺骗镇压，也是无效，

8月16日以后暴动扩展到农村、地方城市与煤矿区，军警与群众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16日以后为第三阶段。

农村的暴动中，例如冈山县船穗村（8月14日）和奈良县法隆寺村（8月14、15两天），由租佃纠纷转变为暴动，发生攻击地主或村长家的事例。农村的暴动一般都发生在过去村内已有贫富斗争的地区，或是象京都府近郊因商业性农业的发达，引起富农和贫农的阶级分化，以致贫农半无产者化而苦于粮食缺乏的地区，以及建立了小工厂的地区。即多数的性质，已从单纯的饥饿暴动前进了一步，使以前佃农、贫农、半无产者反抗地主、富农（同时多兼营米商）的阶级斗争，在城市群众起义的刺激下，又复爆发起来了。

煤矿工斗争从8月17日福冈县蜂地煤矿开始，到9月17日明治煤矿斗争结束时止，计有福冈、佐贺、熊本三县十余处的矿工斗争。与此相呼应，9月6日北海道空知郡沼见煤矿工人以及从8月17日起到19日山口县的冲山煤矿工人，先后起而响应。其中大多数是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为主，和要求公司降低米价以及其他物价结合起

来而举行的罢工，由于公司和警察持挑衅态度发展为暴动。

这些斗争最为激烈，矿工与军警对抗，使用炸药以及其他武器，以致有死伤发生。其中最激烈的为冲山煤矿的暴动。9月17日矿工一千名向事务所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因公司毫无诚意，矿工愤而捣毁事务所。嗣后全体矿工一万余名同时蜂起，烧毁该矿的资本家住宅和别墅，并烧毁了街上的大商店、妓院。第二天早晨军队开始出动，矿工为夺还前夜被捕同志，曾两次向警察反攻并与军队正面对峙。军队开枪射击，打死矿工十三名，重伤十六名。19日以军队为主力，在警察、复员军人会以及青年团的协助下，共同围攻，矿工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日本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以煤矿工人的暴动为最后一波，大规模的米粮暴动终结了。从最初渔津町的小事件起到明治煤矿的暴动止，凡五十七天中，日本全国一道三府三十三县都发生了暴动，其他各县也无处不发生群众斗争。全国人口有四分之一被卷入进去。群众中被逮捕受到检查机关处分者八千一百八十五人，其中被提起公诉的七

千七百零八人，至 1918 年底被判处徒刑的两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有七人为无期徒刑。当时尚在审判中的有二百二十二二人^①。暴动较严重的有三十三个市，一百零四个町，九十七个村，出动军队的也达十七县，六十个市、町、村之多^②。警察已无法对付群众，用军队的力量好不容易才将全国的暴动镇压下去。来自日本人民中的士兵，在全国各地镇压日本人民，甚至于打死他们。天皇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

米粮暴动是突然发生的，事前完全没有计划和组织。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看到群众突然蜂起，虽是欢喜若狂，但没有领导他们，组织他们，替他们拟订计划。他们只是跟着群众跑，或在群众中间张贴一些在何时何地集合的传单，或成为群众的前锋，领导部分群众，还没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已有领导整个暴动，统筹规划，作全面部署的领导人物。然而组织和计划的萌芽，在第二阶段

① 米粮暴动全部被告最后判决的日期不详，但经大审院（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的两人，都是和歌山县某村的特殊部落民。

② 有过暴动和出动军队镇压过的地方，如果详细调查，一定还要多，本书所举数字，是井上已经调查的。

产业工人的行动和第三阶段煤矿工人的行动以及把租佃纠纷和米粮暴动相结合时就很明显了；也就是说，米粮暴动虽然基本上是自发的饥饿暴动，但它却向着有组织有目的有意识的斗争方向发展了。

群众在米粮暴动这一行动中，很少人企图从政治上来解决问题。但在名古屋的群众演说中，有人攻击寺内内阁，并要求打倒它。也有人认为必须向知事市长提出要求，或是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40%。大阪的暴动就是国民党举办的米价调整演讲会散会后听众的示威运动引起的。福井群众也企图向县长提出要求。这些例子说明群众中间有把米粮问题理解做政治问题的成分。于是通过米粮暴动在群众中间奠定了这样的基础：使群众能接受革命的政治领导。

米粮暴动使几百万人民深深地体会警察和军队——国家权力是什么，是为谁服务的。也体验到如果群众勇敢地站起来，统治阶级并不是那么坚强。友爱会会员曾联系俄国革命写道：“这次事变似乎是用军队的力量镇压下去了，士兵是什么人？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贫民全部起而斗争，

恐将陷国家于极悲惨的境地”（《劳动及产业》，1918年11月号）。

通过这次体验，日本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米粮暴动给日本的劳动运动以强有力的刺激，把它放在广泛的革命轨道上了”（片山潜）。在俄国革命和米粮暴动以后，日本已经不是以前的日本了。以工人阶级为首被天皇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半封建的地主制压迫剥削的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带着自己的要求，开始团结并发展起来了。创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和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人民为争取自身的权力而开始斗争了。米粮暴动是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也是它整个体制的总危机的开始。

国内阶级对立的新的质的发展、1919年3月朝鲜的三·一独立革命和同年5月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完全动摇了。再加1920年的经济危机，使经济构造也显明地发生了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以及与美、英对立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一直在加深着。

第四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

原敬内阁 米粮暴动一举实现了政党政治家、自由主义者多年来苦心追求而未获成功的事业，即推翻了寺内内阁，实现了以政友会总裁原敬为首相，除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外，其他大臣皆选自政友会会员的政友会内阁（1918年9月29日）。元老山县虽然想推荐西园寺公望或其他军人官僚为首相以接寺内之手，但因上层当权者间均深觉官僚内阁已不能稳定米粮暴动后的民心，极力推荐原敬，三井财阀的益田孝（1847—1938）等也拜访山县极力推荐，终于实现了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内阁^①。所以说原内阁是乘官僚军阀被群众迫得陷于无力的时候，在资产阶级推动下成立的。

原内阁的使命，简言之，第一是巩固军部、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同盟，设法使扩张军备和资本家

^① 山县向来讨厌政党，其所以不得不推荐原敬，连原敬自己也承认，是由于米粮暴动暴露了官僚内阁无力的关系。（前田莲山：《原敬传》）

的利益趋于一致；第二是安定人心，制止革命化。

大战的结束，给资本家以重大打击，但原敬政府以各种名目付出救济金，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1918年的铁路营业哩数为六千零七十八哩，1922年底达到七千零六哩）以及其他各种“振兴产业”的政策。为了开辟财源，政府发行巨额公债，实行一连串的增税。“振兴产业”和扩张军备，尤其和改良武器，新建舰艇是分不开的。原内阁最初编制的预算便将海军历来所希求的八八舰队的建设经费正式列入，即从1919年（大正8年）度的预算开始。日本的钢铁业与造船业战后都很萧条。这和铁路建设同样，都是拯救它们的手段。1919年（大正8年）度的陆海军费比前一年增加46%，1921年（大正10年）度则激增至两倍以上，计七亿三千一百万元，占预算总额的49%。

政府就这样牺牲人民大众以满足大资产阶级和军部的要求，因此，安定人心的第二项任务就不可能实现。“突如其来的变动”^①即革命的变动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要爆发，这是原内阁不得不继续

^① 1919年（大正8年）4月2日原首相和陆相田中义一（1853—1929）（山县的部下）的谈话。

担心的。

工人运动质的发展 工人斗争从米粮暴动时期起开始急剧地高涨，战争结束后更加激烈了。1919年中仅民营产业的罢工、怠工就有四百九十七次(比前一年增加了八十次)，参加人员超过七万人。又有东京炮兵工厂以及其他兵工厂两万七千人，历时二十天的罢工。造船、钢铁、矿山等繁荣部门中发生规模更大的斗争。斗争的80%是要求提高工资，而且是一下子要求加薪40%—80%。其中也有要求增薪150%的(如釜石矿山)。又矿山、造船所的斗争中，在要求提高工资的同时，也有反对公司取消廉价售米的。米粮暴动已发展为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斗争走向暴动化的有播磨造船所、釜石矿山、足尾铜山、神户制钢所等共九处。

这些斗争和过去比较，在某些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发展。第一，比过去更有组织有计划。同年组织了七十一个工会(前一年为十一个)。斗争都是由工会领导。矿山方面，足尾、釜石的斗争也是由前一年(1919年9月)该两矿山工人组织的“大日本矿山劳动同盟会”组织领导。日立矿山的斗争由友爱会矿山部领导。其中最要有组织的要推神户

川崎造船所一万一千人的斗争。在执行委员会（现称为斗争委员会）的领导下提出增加日薪70%、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改善待遇等要求，举行怠工十天，并取得了胜利。

第二，在走向组织化的同时，同一产业部门的同盟罢工也从这时开始了。7月东京十六个报社的制版工人组织叫做“革进会”的工会，提出加薪80%和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举行了同盟罢工。以后，东京的印刷业中陆续发生罢工。10月，印刷工会的信友会为了反抗东京印刷同业公会和一百六十余个工厂主而举行了同盟罢工。

第三，工人的阶级团结有了飞跃的发展。上述第一、第二两项也说明了这一点。足尾铜山罢工时，东京的劳动团体就作出下列决议：“我们劳动团体对于一切劳资纠纷不能认为只是局部问题，应该视为关系工人阶级全体的消长，希望今后排除情面观点，协力一致，以求贯彻目的。”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个别资本家对个别工人的事，而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

其结果，这一年不仅陆续建立了很多工会，并出现了统一的联合组织。友爱会矿山部、大日本

矿工同盟会等联合组织的全日本矿工总联合会，以足尾斗争为契机而成立了。1920年（大正9年）5月，友爱会、信友会等九个工会组成了“工会同盟会”。

同年，第一次在东京上野举行了五一节示威游行，参加者达一万人。

阶级团结的加强也表现在下列三点上：第一，上述川崎造船所工人提出的八小时工作要求被接受后，立刻变成为各工厂、矿山的共同要求；第二，开始提出罢工权、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体谈判权等要求；第三，各次斗争中采取怠工战术。一处有斗争就象浪潮一样号召同一工业部门的工人取一致行动。简言之，即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并促成了友爱会的改组。

1918年8月友爱会大会上，作了下列决议：（一）取消旧的会长（铃木文治）独裁制，改为理事会制；（二）将地域性的支部改为按职业别或产业别的组织；（三）改友爱会名称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又取消了旧的、完全是劳资合作主义的纲领，指出了工人不是用工资买卖的商品，要求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确立最低工资制以及其他改

善劳动条件、普通选举权、修订治安警察法等等要求。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友爱会大会。开会仪式中高唱劳动歌以代替日本国歌。

针对工人阶级的成长，政府、资本家等一方面组织半官半民的“协调会”，谋求劳资合作（1919年12月），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斡旋下由流氓头子们组织了“大日本国粹会”（1919年10月）。除此之外，政府与资本家又扶植了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暴力团，用暴力摧毁工人斗争以及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

1920年（大正9年）2月，国营八幡制铁所的三万工人提出反对解雇工会（劳友会和友爱会）干部、提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要求，被拒绝后，便起而罢工，以致熔矿炉的火焰也熄灭了，但终被国粹会、警察和宪兵用暴力镇压下去了。又从同年2月到4月，东京市内电车工人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解雇、提高工资等要求，从怠工而进入罢工。警察没有任何借口，就逮捕了所有的工会干部和战斗的工人，市电当局因而得以解雇数百人。这次罢工时，陆军本打算派工兵队开

电车，但在民主舆论的攻击下未得实现。这些事实表明了工人已被迫和国家权力发生冲突。又早稻田工程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欲破坏罢工，申请开电车，并得了学校当局和教授会的同意，但遭到舆论的攻击，也未得实现。

战后的经济危机 在劳资冲突中迎接了 1920 年的新春，严重的恐慌加深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

1918 年 11 月大战结束，以染料、药品、造船、钢铁为首，棉纱布、纺绸等业都遭到了打击。但由于美国的繁荣，欧洲各国战后恢复工作进展迟缓，需要大量物资，1919 年到 1920 年初出现了比战时更加兴旺的繁荣气象。正因为这样，便使大战末期已经产生的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迅速地成长起来了。贸易从 1919 年起再度转为入超了。由于过去繁荣本不是建立在提高劳动群众生活和国内市场的健全发展上面，相反地是降低人民生活，使国内市场相对地大为缩小，因此海外市场一旦开始缩小，必然使投机的异常膨胀的日本资本主义陷于危机。

从 1920 年 3 月股票价格开始暴落，各种物价

一齐下降。4月英国也发生危机，立刻成为世界性的危机。它又反过来影响日本，以致主要商品价格一再惨跌。生丝价格，1920年8月比1月跌落到三分之一以下，纱价，10月也比3月的最高价格跌落到三分之一以下；到12月，铁价比3月跌了一半，糖价比5月降低40%。其他物价也都从危机前的最高价格下降30—50%。生产方面，1920年和1919年比较，造船减少35%，钢铁减少20%，织品减少30%，棉纱、生丝、生铁缩减10%左右，生铁、钢、造船到1921年更加激烈地下降了。因为经济恐慌，从4月到7月银行遭提存的有一百六十九件（其中属于总行的有六十七件），公司商店的破产以纺织、绸缎布匹商为首，达二百八十五件。

重工业方面，由于技术较国际水平低，成本又高，不能与欧美进口货竞争。生铁是其典型之一，需要的30—40%为进口货，而国内的生产设备却有40—50%处于休闲状态。

经济危机也给农业以深刻打击，农产物价格都暴落了。尤其是农业经济支柱之一的蚕茧，1919年夏秋间的价格每贯为一点二一元，而1920年

则降低到其半数 of 五点一二元。米每石也从 1920 年 1 月的五〇点一〇元降低到 12 月的二五点二九元，并在继续下降着。而农家从垄断资本手中买来的化学肥料等物的价格却只降低 10—30%。

经济危机也给地主、富农以打击。大战中稍有发展的两町以上的富农经济，以经济危机为分界线开始减少。但牺牲最大的是小农、贫农。农业人口在 1921 年和 1922 年约减少三万五千户。此外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从 1920 年到 1929 年（昭和 4 年）也每年在缩小着（此十年间缩减二十二万六千町步）。尤其是旱田，即经营商业性农业的土地减少了。这说明农业危机的慢性化。

反抗危机所带来的损失，租佃纠纷也高涨起来了（下面叙述）。因之寄生地主制在 1920 年（大正 9 年）以后，走上了和过去不同的方向。即从这时起至 1932 年（昭和 7 年）止不足一町和不足五反的小土地所有者增加，有土地的农家总数也增加，但拥有一町以上的各阶层，包括大地主在内则开始减少。即土地开始分散了。水田的售价以 1914 年为一〇〇，1919 年为二五四，达最高峰，1920 年则大幅度地下降至二一六，以后逐年下降（小峰三

千：《日本耕地价格的研究》）。寄生地主制由于慢性的农业危机和农民斗争而开始崩溃了。

当危机之际，原内阁为拯救大资本家，从3月到8月间支出三亿五千万元的人民税款。其中也有五千万元是“为拯救蚕丝业”而给“帝国蚕丝股分有限公司”的，还有一千万元是给地方农工银行的低利贷款，但这不是拯救彻夜劳动的蚕农而是拯救可向缫丝厂、出口公司和农工银行等借到资金的地主。又于1921年（大正10年）制定“米谷法”，这是政府用特别资金调整米价的法律。它的目的在于不使地主因米价暴落遭受损失，并防止米价高涨到威胁资本家利益的低工资基础的程度。这是大地主和垄断资本同盟的新形式。

战后经济危机加深了农业危机。生产力和国内市场的矛盾也愈加尖锐化了。同时，由于以后美、英重新向亚洲市场发展，日本资本主义以重工业为首，一般都陷于慢性萧条中。官僚内阁或政党内阁一方面运用大藏省储蓄部门的资金，或由日本银行贷放救济资金，或借口保护而免税，或支付补助费、损失补贴费等来救济大资本家，另一方面则促成组织卡特尔，进行企业合并，以加强垄断资

本的统治力量。

工人、学生和普选运动 陷于危机的资本家用降低工资、解雇、歇业等残酷手段将其损失转嫁到工人阶级头上。由于官宪保护资本家的激烈攻势，使1920年的罢工数从前一年的四百九十七次激减至二百八十二次。罢工的要求也都限于防卫的守势，但斗争的性质却强烈化了，坚持达一个月以上的占全部斗争的10%以上。斗争不仅发生在重工业和矿山部门，即轻工业部门也很激烈。例如东京的富士瓦斯纺织工厂，6月间为反对无理解雇友爱会员、要求保证工会的团结权而发生罢工。获得工会同盟会以及其他工人团体的支援，坚持了两周，终至精疲力尽而结束了。同年底连东京三越百货店洋服部也发生了劳资纠纷。

工人在反动攻势下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同时，又进一步开始要求普通选举权的政治斗争。支援他们的有先进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1918年(大正7年)9月米粮暴动后不久，京都的友爱会员和京都帝国大学学生组成了“劳学会”。东京方面从同年11月吉野作造博士在辩论

会上粉碎了右翼团体“浪人会”的民主主义论^①之后，民主运动风靡于学生间。同年底东京帝大产生了“新人会”；1919年在早稻田大学诞生了“人民同盟会”、“建设者同盟”。京都的同志社大学、东京的法政大学以及其他学校也都建立了民主主义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大多数都从民主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开始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了。

工会和进步的学生、知识分子于第一次大规模的共同斗争是普选要求。1919年2月11日东京一千多名大学生召开要求普通选举权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大阪则以友爱会为中心，举行了工会普选讲演会。以后东京、京都、神户、名古屋以及其他各地以工人和学生为主力，获得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进步学者、知识分子支持的普选运动，广泛地展开起来了。最初发生米粮暴动的富川县滑川以及其他地方小镇也都展开了普

^① 这次讲演会是应浪人会的挑战而举行的。浪人会曾用暴力迫使《朝日新闻》社长解聘鸟居素川等进步编辑，想乘势打击吉野作造博士。但在学生、工人、市民支持之下，博士毅然应战，彻底粉碎了敌人。

选运动。

大战前普选运动是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领导，即或有社会主义者或工会参加，也仍未超过少数人思想宣传运动的范畴，现在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群众运动了。而且这时运动的理论基础已经不是旧的天赋人权论，而是为保护工、农的生活利益而争取政治权利的思想。宪政会的尾崎行雄、岛田三郎、小泉又次郎等也和普选运动有联系。他们想利用群众运动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并想把群众局限在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范畴之内。当时尾崎为了“在工人中间树立勤王思想”，想筹措资金，曾向宫内省进行活动（《原敬日记》，大正8年2月20日）。

原内阁为了转移人民对普选的要求，在1919年3月第四十一届议会上提出议案，把选举权资格从过去纳直接税十元降低到三元以上；同时又改大选举区制为小选举区制。通过纳税额的降低，给自耕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选举权，想把这个阶层从民主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选举区的缩小，对于在农村拥有地盘的与党政友会是绝对有利的，又是拥有选举监督权的政府对付反对党选举

运动的有利制度。

这样的敷衍方法，舆论决不会满足，普选运动更加激烈化了。在野党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虽然并不欢迎普选，但“感到与其被人民逼迫而接受，不如主动地给予人民”。又认为到了现在如用普选把人民局限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内，在对“人民思想的利导上，阶级利害的调和上”，都是最好的办法（《加藤高明》下）。加以宪政会在全国范围内不象政友会那样在地主阶级中拥有地盘，为了战胜政友会惟有指望给占城市人口绝大部分的工人、无产大众以选举权。基于以上的几点原因，宪政会便于1920年（大正9年）1月通过了普选的决议。从1月到2月在第四十二届议会开会期中，总同盟、日本交通工会以及其他东京市内四十余个劳动团体、学生团体连续地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以此为背景，宪、国两党于2月14日共同提出给男子以无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议案。岛田三郎在说明提案理由时解释：只有普选才能使人民的不满不走向革命，而开辟用议会主义解决的道路，确是拯救国家的途径。

从这一天起反复地出现数万群众奔向议会示

威。政府于26日以本提案骨子里面潜藏着威胁现存社会制度的不稳思想,可否通过,应该征询全国民意作为理由,突然解散了议会。

选举的结果,因为政府利用有利的选举法并实行干涉、收买,因而与党政友会获得了绝对多数,于是原内阁用强权实行了“依靠多数的暴力政治”。普选运动仍继续发展,工人、学生、市民的示威队伍与警察队发生流血冲突。然而7月的临时议会又否决了普选提案。使工人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地主的议会是靠不住的,普选运动从此趋向低潮。

原首相一方面以工人群众的“过激思想”为武器威胁军部和枢密院,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它们。最显著的例子是1921年(大正10年)10月海军大臣出国期间,原首相以文官而兼任“海军大臣事务监理”,没有设临时代理海相。多少给军部大臣武官制以打击。陆军虽然极力反对,原敬则以“攻击军阀的舆论很激烈”为辞,抑制了陆军^①。

^① 《原敬日记》,大正10年10月5日记。原敬威吓元老和枢密院说,如果不支持他,他就要利用群众。这样的典型例子,大正9年8月5日的日记上也有。

这可说是舆论的胜利，但其成果则使资产阶级政治势力进一步加强了。

另一方面原及其一党坚决反对民主主义，赞美“暴力政治”，然而原于1921年11月被一青年暗杀。在民主主义运动发展时期，发生反民主的暗杀事件，这不单是原个性傲慢所招来的灾祸，也是他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凶暴地镇压人民的反响。

社会主义同盟、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 战后经济危机以来，在政府与资本家反动攻势之下，先进工人更加战斗化，开始抛弃了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议会主义。但是还没有指示群众以正确的阶级的政治方针。而大杉荣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深入工会干部之中，东京印刷工会就是他的急先锋。认为不仅普选运动，就连一切的政治斗争也都无用。工人必须团结在自己的工会周围，采取“直接行动”、罢工，而且尽可能使之暴动化，为了保卫生活和自由，不得不破坏现在的秩序。劳动总同盟友爱会本部的棚桥小虎、麻生久(1891—1940)一时也染上了这种思想。1920年10月在大阪举行的友爱会全国大会上，

关东的直接行动论与关西的普选论发生对立。大会上虽未通过取消普选要求的议案，但自此以后工团主义也扩展到关西。

然而，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先进工人与知识分子趋向社会主义的也日渐增多。布尔什维主义^①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也渐趋激烈。但在争论中，从1920年夏天起，以山川均（他最初是工团主义者）等社会主义者为中心，展开了团结一切“反资本主义势力”以组成工会的活动，并获得了友爱会、矿工联盟、东京交通工会及其他工会一部分干部、新人社、晓民会等学生团体以及工团主义者的赞成。其结果于同年12月10日在东京召开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大会。全国申请参加同盟者达三千人。

这个同盟没有章程、纲领，主张不明确，思想不统一，也没有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核心。因之它不可能发展为革命的政党，但先进工人和社

^① 所谓“布尔什维主义”，当时在日本还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并与工人密切联系而付诸实践。他们还没有超出赞同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范畴。但是阶级对阶级是为争夺政权而斗争的思想，是由他们广泛地传播的。

会主义结合起来,第一次走上政治斗争,这一点是具有意义的。先前走向工团主义的友爱会的棚桥、麻生等看见这种情形,不久就退出同盟,到1921年才唱“回到工会去”,企图把群众拉回到改良主义道路上去。政府、统治阶级对同盟非常警惕,成立大会开会不久便被解散。到1925年5月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事先被政府禁止,继而连社会主义同盟这一组织也被解散了。

同年6月下旬起神户川崎、三菱两造船所三万余工人掀起了斗争。要求组织“横断工会”(统一公司各部门的工会而成为单一组织)的权利、集体谈判权、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提高工资与改善待遇等。由贺川丰彦(1888—)等领导,神户地方的各工会也与之共同斗争。怠工、罢工坚持达四、五天之久。川崎斗争是我国劳资纠纷中第一次宣布由工人接管工厂。但是这次大规模阶级斗争也被军队和拔刀的警察以及国粹会极端凶暴的恐怖主义所破坏了,竟至有人遭警察刺死。对此,斗争的指导部既没有坚决组织反击的斗志,也没有这种力量。自始至终未超出合法主义范围,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同盟的被解散和川崎、三菱斗争的被暴力镇压下去，就使无政府主义者气焰增长了。6月关东劳动组合同盟中的总同盟友爱会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而退出总同盟。以后无论是关东或关西由于干部思想立场的不同，统一战线都普遍地发生了分裂。无政府主义派高喊将知识分子驱逐于工会之外，其实他们自己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者从反对无政府主义派的立场出发而支持了友爱会。友爱会的一部分干部也有浓厚的协调主义思想，但总的说来逐渐走向了战斗化。1920年大会便去掉“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的“大”字，1921年8月的大会上又删去“友爱会”，只称为“日本劳动总同盟”。当时会员约有两万五千人（同年底全国工会会员为十万两千人）。

当时只要工人组织工会，即使是改良主义的性质，也会被政府和资本家视为犯罪的行为。这时的工会也多半具有临时罢工委员会的性质，多半是由于斗争的需要而组织工会，随着斗争的失败，工会也就瓦解了。又工会干部的变动也很

大，因之虽说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对立着，但会员们对此并不关心，只是干部间的对立而已。

群众自发地要求结成统一战线，其结果，1921年5月由四十九个团体，尽管是协调主义的，结成了统一的日本海员工会。从1922年（大正11年）春起，在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无论是总同盟或工团主义派都抱有大联合的愿望。因之各工会便组成“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9月30日举行成立大会，但大会上围绕着组织问题，发生两种对立意见：总同盟派（两月前成立的，地下共产党支持它）主张所有工会合并起来，组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组织；无政府主义派则主张各工会保持独立性的自由联合体。双方正面冲突，以致决裂，失去建立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机会。以后工团主义趋向衰落，社会主义则继续向前发展。

日本农会的成立 工人的激烈斗争和战后经济危机以来农村的贫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从1918年起租佃纠纷已逐渐增多，到1921年便飞跃地发展起来了。

1920—1922年租佃纠纷的主要要求为临时

减免地租，废除“进米”^①，反对提高地租等。以这种扩展于全国的租佃纠纷为背景和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农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爱知县地主团体“农事协会”所编的《纠纷概况》（大正10年）中关于纠纷的原因就曾举出除“佃耕的不合算、城市需要劳动力、歉收等等”“经济原因”之外，还有“要求人格的平等、不劳而获的不合理、尊重耕种权等”“思想原因”，以及“同外界接触中受到学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指导、劳动团体的支援”，等等（黑田寿男、池田恒夫合著《日本农会运动史》）。即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农民日益广泛地、深刻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关系之中，和城市工人直接间接的联系增多了；同时，在寄生地主制矛盾加深的条件下，农民斗争也必然发展起来。

① 进米：日本封建时代，土地税都征收贡米。正税之外，征附加米若干，作为搬运中的损耗。其数量各地不一致，有正税外每包附加三合者，有每三斗五升附加两升者，也有每五斗附加四升者。名称亦不一样，有进米、延米、口米之别。土地税改收现金后，地租仍收实物，进米在全国佃租制度中继续存在。——校者

第21表 租佃纠纷的发展

	租佃纠纷件数	参加佃农数	佃农协定数
1917年	85件	—	—
1918年	256件	—	88
1919年	326件	—	84
1920年	408件	34,605人	352
1921年	1,680件	45,898人	681
1922年	1,578件	125,750人	1,114
1923年	1,917件	134,503人	1,534
1924年	2,206件	134,646人	2,237

以这种发展为前提,1922年(大正11年)4月我国在贺川丰彦、杉山元治郎(1885—)等基督教改良主义者领导之下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农会“日本农会”(简称“日农”)。有来自大阪、兵庫、冈山、广岛、岛根、香川、爱媛、爱知、富山、群馬、福岛、宫城、新潟等地的六十九名代表参加成立大会。

宣言中谈到:“因为田园也终于被资本主义所侵蚀,以致造成短工、农业工人和佃农的痛苦。我等农民以互助友爱精神走上解放道路。”其主张(当前的要求)中,除“耕地社会化”一句含糊词句外,并没有涉及土地问题,甚至没有明确提出确立

耕种权的要求，只提出“确立佃耕立法”。这可以说是友爱会在农村的翻版。完全没有提出国家、天皇及地主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农民的直接敌人（不仅如此，连身为大地主的伯爵有马赖宁〔1884—1956〕在农会建立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它是改良主义的农会，但农民已开始有全国性的团结组织，就是农民斗争的质的发展。到1923年2月日农第二次大会时，支部已达三百个，会员超过一万人，开始发展为战斗性的农民组织。第二次大会上已经看不到伯爵和那些讲人道主义的教授们。

全国水平社的成立 全国性的团结和斗争组织，在被歧视的特殊部落民中也出现了。政府和统治阶级对于米粮暴动中发挥了革命力量的特殊部落民感到恐惧，便在“同情”他们，主张使他们与一般人民“融洽”，“改善部落”等名义之下，为了拉拢部落的上层分子到统治者这边来，而拨出了一点经费。但是觉悟了的部落群众，不想依靠从上而来的“恩惠”或“同情”，而要依靠自己的团结力量来恢复人的权利，争取生活的安定和提高。俄国革命解放了帝俄时被压迫、被歧视的民族，也给

部落的进步青年以影响。并有人向佐野学(1892—1952)等社会主义者和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请教,也有人出来组织农民协会,进行斗争。

这样,由奈良县的西光万吉、阪本清一郎等发起,于1922年3月创立了全国水平社,在京都召开成立大会,有来自全国的特殊部落民两千人参加。大会宣言以“我们散在全国的特殊部落民团结起来!”为开头语,内容充满了悲壮文字,排斥廉价的同情与和解,要以部落民自己的力量争取解放。运动的方针是对一切歧视性的言论和行动,立刻给以“彻底的反击”。

领导水平社的人们也做了被歧视的“特殊民”和歧视他们的“普通民”这一现象的俘虏,把工人、资本家、统治者和人民,所有特殊部落以外的人都一律视为敌人,不能看清利用封建身分残余的天皇制以及它的支柱半封建地主制和资本主义才是根本的敌人。但是当这些一向无知无识和悲观失望、忍受极端侮辱和极端贫穷的人们,一旦觉醒了而大声怒吼“我也是人”的时候,首先向所有歧视他们的人猛烈地冲上去,也是很自然的趋势。水平社立刻扩展到全国各特殊部落中。组织发展之

快，远远超过农会和工会。最初所采取的彻底反击的办法——可以说是对敌人“感性认识”的阶段——很快地便纠正过来了。第二次大会（1923年3月）已经决议在农村特殊部落中建立农会，与地主对抗。于是废除身分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正确结合已经萌芽了。

妇女运动的发展 青鞮社被破坏后，暂时停止活动的男女平权运动，从1919年起也重新开展起来了。这时平冢明子、奥梦梅绪（1895—）、市川房枝（1893—）等发起修正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禁止妇女加入政党、参加政治讲演会）的运动。1920年（大正9年）3月组成“新妇女协会”。协会的主要力量放在修正治安警察法运动上面，但也提出了扩充女子高等教育、男女同学、保护妇女、妇女参政权等其他要求，并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奈良等地设立支部。更在同年秋季出版机关杂志《女性同盟》，发行达两千册。大战以来在公司商店中服务的劳动妇女逐渐增多，同年成立“妇女事务员协会”、“打字员协会”等组织，在关西则产生了关西妇女联合会。这些虽然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但从此可以见到日本的小资产阶级妇女

也已经不甘心做封建的“贤妻良母”，开始团结起来争取平等权利了。

1921年在基督教妇女矫风会中建立了以久布白落实为中心的“日本妇女参政权协议会”。由于妇女运动的高涨，1922年的第四十五届议会修改了一部分治安警察法，妇女仅取得参加政治集会的权利。新妇女协会在第一次胜利后便突然解散了。干部同志间的不和虽也是原因之一，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干部间思想的对立，有的要求和女工、社会主义者联系，有的反对。协会解散后，分裂为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妇女组织^①。

和这些资产阶级的男女平权运动不同，1921年4月由山川菊荣、久津见房子、堺真炳等参加“社会主义同盟”的妇女约四十名，组成名“赤澜会”的社会主义妇女团体。该会激烈地攻击新妇女协会运动是资产阶级议会主义。赤澜会于1922年3月解散，增加一些新的会员，改名“八日会”以纪念3月8日国际妇女节。该会虽然和总同盟的妇女活动家山内美那子等取得联系，但还没有在

^① 井上文子写的《日本妇女参政权运动》一文，最近就将在适当的历史杂志上发表。

无产妇女群众中展开活动。原因一方面是警察压迫得很厉害，连单纯的商量事务的集合也有困难。另一方面，该会的行动还不能符合妇女群众的情绪和当前的要求。尽管如此，她们不怕警察，勇敢而大胆的行动，鲜明的社会主义主张所给社会的影响是与过去的“青鞞社”不同，促进了妇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日本共产党的成立 以工人阶级为先锋，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阶层争取生存和平等的斗争发展起来了，有组织的群众和国家权力发生正而冲突，通过激烈的斗争经验使他们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这种无产阶级的成长，必然会结成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因而从1921年起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如堺利彦等的“无产社”，山川均、德田球一（1894—1953）等的“水曜会”，市川正一（1892—1945）等的“无产阶级社”，高津正道等的“晓民会”等便是。

这时共产国际为求远东一切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团结，1921年着手准备远东民族大会（远东地方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第一次会议）。大会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代表日本出席

的有以前从美国到莫斯科的片山潜和由日本国内来的德田球一等。会议决定建立日本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同年7月15日由片山、德田、野坂、山川、堺等组成不为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法律所束缚的秘密组织日本共产党^①。同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正式承认日本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堺为第一任书记长。

共产国际支部日本共产党虽然尚未成熟，而且幼弱，犯了一些错误，发展也极端困难，但是它的成立、存在和微小的发展，不仅在我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就是在日本人民的历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意味着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以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为目的的组织。明治时代的自由党虽曾进行了光辉的革命斗争。但它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党，不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推翻一切剥削阶级、根绝剥削、争取建立劳动人民自己政权的党。1901年（明治34年）的日本社会党虽然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

^① 据市川正一在法庭上的陈述，他是1923年1月入党的。

目的的第一个党，但关于国家的政权问题，除了希望天皇制的民主变革以外还未提出明确的要求。日本共产党和这些有原则性的不同，但又继承了这些以及以前日本最优良的革命传统，是为了把政权交由无产阶级掌握，推翻天皇制、地主制、资本主义，废除一切剥削和专制而建立起来的。日本的无产阶级已经不仅是历史的动力而是作为历史的指导力量开始成长起来了。

第二，它是日本工人阶级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必然产物。明治以来工人阶级的成长，特别是俄国革命和米粮暴动后发生的本章所述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的发达必然产生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并产生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先锋队。这一规律日本也不例外，因而统治阶级的凶暴镇压和党本身所犯重大错误，能使党一时完全和群众隔离而被搞垮，事实上日本也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却不能完全和长期地摧毁它，更不能消灭它。日本的统治阶级虽是世界上拥有最彻底的、最残酷的镇压组织和具有最巧妙的离间和挑拨的经验，也不能消灭它。它虽然还幼弱，但不是代表日本人民垂死的、行将消逝的过去而是

代表日本人民正在发展中前景有无限光辉的未来。

第三，由于日本的革命运动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有机的一环，因而意味着我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确立了。日本的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为了完成革命，保证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以及无限的发展，从它的阶级觉悟开始时起，从日俄战争前起，就是一直走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参照本书第 226、296 等页）。现在则在组织上也确立了，达到了质的飞跃发展。

共产党拥有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其中明确指出日本的国家机构是“封建残余仍居优势”、“国家机关掌握在一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集团手中”，为了推翻这个政权，不仅工人、农民，也能动员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必须不断地揭露他们的局限性来利用他们。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为了完成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必须和农民结成同盟，提出废除天皇制的要求，领导争取普通选举权的斗争。

作为当前的要求，提出废除天皇制、十八岁以上男女的普通选举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各种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提高工人生活的各种要求。在农业方面明确提出“无条件没收天皇、大地主、寺庙的土地归国有”、“给贫农以土地，特别是佃农过去用他自己的工具耕种的一切土地，不作为私有财产而交给他们”，即提出革命式的废除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要求把土地交给农民，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农民斗争的方向。又在国际关系方面揭示了停止对外国的一切干涉，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撤兵和承认苏联。

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 这个短短的纲领草案虽然对于天皇制的规定还暧昧，并且也有其他缺点，但对于日本的革命运动说来，则成为真正的指针。可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认真进行争取普通选举权和废除天皇制的斗争。在这个期间全部党员被逮捕了（1923年6月），草案遂没有成为党的决议。因此就妨害了党的发展。

然而共产党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工会、农会、水平社、急进的青年、妇女、学生中间去了。共产党首先为粉碎工农战线中的工团主义和宗派主义，

由山川均写了一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①在1922年8月号的《前卫》(1922年1月创刊)上发表。

文章的要点是：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只是头脑中“否认”资产阶级政权而不想与之斗争并打倒它是错误的。又指出为使“先锋队”与“本队”结合起来，和争取群众的支持，必须重视群众的当前利益、局部的胜利。这一走向政治斗争、深入群众的主张，得到进步势力的衷心支持，予工团主义者以重大打击。在“方向转变”之后，工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学生运动也同样发展起来了。

第22表 工会的发展

	工 会 数	工会会员数
1918年	107	不 明
1919年	187	不 明
1920年	273	不 明
1921年	300	103,412
1922年	389	137,381
1923年	432	125,551
1924年	469	228,278
1925年	457	254,262
1926年	488	384,739

(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第一回)

^① 但无论在“方向转变论”中，或者他所写的与此有关的其他论文中，对于政治斗争的敌人的统治权力，都未作分析，也

从1922年秋天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工会法案、租佃纠纷调停法案等“三大恶法”的全国性斗争。因之五十余工农团体统一组成“无产者同盟”，并组织“反对三恶法全国工会同盟”。1923年（大正12年）2月10日东京、大阪、京都、野田（千叶）等地同时举行反对恶法示威游行，迫使政府撤销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五一节之外，全国同时举行示威游行，这还是第一次。此外，要求承认苏联（共产党成立前，1922年五一劳动节曾提出此口号）的运动也广泛地展开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救济俄国饥荒运动也得到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的广泛参加，并获得成绩。年青的党在反对干涉苏维埃革命的斗争中光辉地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下面叙述）。

共产党就这样地获得了先进工人的支持，并从他们中间锻炼出渡边政之辅（1899—1928）和国

沒有指出斗争的战术及其具体政策。即对于当前群众性政治问题——普选问题，也沒有指示任何实践方针，只作评论式抽象的阐述。这不仅是山川个人思想上、政治上的幼稚和错误，也是当时全党的幼稚。

领伍一郎(1902—1943)那样杰出的革命家。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天皇制的最可恶而最可怕的东西了。

朝鲜民族的独立革命 经过俄国革命和米粮暴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即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个主要矛盾加深到产生了共产党。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了。

1919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最大殖民地朝鲜的人民发动了高呼独立万岁的革命起义。前一年10月朝鲜总督府已经完成了“土地调查”，即完成从朝鲜人民手中夺取土地，培植日本人半封建地主的基本事业(参阅本书第282页)。寄生地主增加两倍，自耕农减少而佃农增多(占全农户的38%)。地租原为收获额的三分之一，现在高达40—50%。朝鲜民族资本的发展完全被阻塞了。日本的统治和剥削，给朝鲜人民带来的苦痛更加难以忍受了。

义兵斗争失败之后，朝鲜人民在国内外继续进行民族独立的斗争；随着民族痛苦的加深，斗争更加激烈。当时俄国的革命给予朝鲜民族以光明、

希望和勇气。侨居西伯利亚的朝鲜人当然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他们曾组织自己的部队，或则与俄国人、中国人一道反抗派来干涉革命的日军，为了保卫苏维埃和朝鲜民族的独立而拿起武器来。

东京的朝鲜留学生也从1918年底起，展开了独立运动。他们在1919年2月8日召开的朝鲜独立大会的宣言中说：“俄国不是以前的侵略主义的俄国了，而是基于正义和自由正在建设着新的国家，中国也成了新的国家，因此，日本拿俄国或中国的威胁为吞并朝鲜的借口已经不成立了。”

侨居于中国的朝鲜人中间，也成立了独立运动的组织。

朝鲜国内则有小地主、天道教徒等领导的独立运动。在日本统治下呻吟的朝鲜农民群众对它予以内心的热烈支持，这是民族斗争的主力。

国内外的这些民族运动从1919年1月起开始合而为一。同月合并前就受日本迫害的废帝高宗(李大王)死了，传说是被日本政府所毒死。于是便决定在3月1日高宗安葬这天，举行独立革命大起义。当天在汉城召开了数千人的市民大会，发表独立宣言。宣言的起草者都是宗教家（天道

教十五名,基督教十六名,佛教两名)。但因他们不敢出席群众集会而向总督府自首,市民大会便由学生及其他人士来领导^①。出席大会和参加李大王葬礼的市民合流,变成五十万人的大示威。

独立万岁的喊声立刻轰动了朝鲜全国。朝鲜二百三十二郡二岛中没有人被逮捕的只有五郡一岛,但那些地方并非没有发生暴动。几乎是赤手空拳的朝鲜人民,在六百十八个地方和日本军队展开了八百四十七次战斗。有七千九百零七名朝鲜民族的勇士被杀死。汉城、釜山、仁川等城市中工人举行罢工、商店实行所谓“撤市”的罢市。

日本军队和警察对此进行了最残酷的镇压,竟发生了把全体居民驱入教堂内浇火油烧死的惨事。这样经过三个月主要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游击战斗在朝鲜国内仍未停止。流亡在间岛、上海、西伯利亚的朝鲜革命家仍继续进行独立运动,一直没有停止。

三·一斗争由于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未成长起来,无产阶级也不成熟,不能提出土地革命等

^① 山边健太郎:《关于三·一运动》,载《历史学研究》杂志184、185号。

具体要求以组织群众，以致被日本强大的武力镇压下去了。虽然如此，它成了朝鲜民族为争取独立和民主主义而进行新斗争的开端。以后，劳资纠纷、租佃纠纷逐渐增加，学生运动高涨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了。到1924年便成立工农总同盟、青年总同盟、妇女同友会，并在这一基础上，1925年组成了朝鲜共产党，1926年被承认为共产国际支部（《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

同化政策 朝鲜愈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不稳的殖民地。日本政府为了怀柔朝鲜人民，改朝鲜总督的武官制为文官制，改宪兵警察为普通警察，并着手兴修水利、改良耕地、建设工业。又实行了“同化政策”，强制朝鲜人说日语，教授天皇主义的日本“历史”。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日本统治朝鲜、剥削朝鲜的基本政策。1917年的宪兵警察机关数为一千七百五十九处，1921年则增为两千七百七十一处，压制着朝鲜人民。为了统治朝鲜而支出的军费，1920年时超过1919年的两倍。土地改良是为了解决日本在米粮暴动中暴露出来的食粮危机，使朝鲜人增加米粮的生产，把它劫往日本。因

而朝鲜产米愈多，而朝鲜人消费的米反而愈加减少了^①。

第 23 表 朝鲜米的生产量与消费量

	米的生产量	朝鲜境内每年每人的消费量
1912年	1,160万石	78升
1918年	1,370万石	60升
1933年	1,630万石	41升

(根据细川嘉六:《殖民史》)

又所谓工业建设不过是废除公司令，把关税制度与日本关税法划一，使日本资本无限制向朝鲜发展而已。朝鲜民族资本则永远成长不起来。

台湾人民的斗争 台湾人中间，也展开了新的民族斗争。

1918年起，留日台湾学生组织“高砂青年会”，在台湾人中间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一基础上，1921年展开了设立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林献堂等则乘机建立台湾文化协会，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机构。总督府于1923年禁止台湾要求

^① 表中所列消费量，包括在朝鲜的日侨消费量在内。由于日侨逐年增多，所以1918年、1933年朝鲜人的实际消费量，比表中所列更要少得多。

设置议会的运动。但是运动并没有停止。1924年以后在中国民族革命发展的刺激下，台湾的民族运动也发展起来。又从这时起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也开展起来了。1919年起台湾的总督也改为文官制了。

中国的五四运动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战后更加激烈化、组织化了。1919年4月凡尔赛和会拒绝中国要求，将山东省旧德国利权交给日本。北京学生起而反对，5月4日揭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遭受到段祺瑞政府的暴力镇压，从此展开了有名的五四运动。

全中国的学生、商人、工人群起响应，6月3日上海全市举行罢工，以沪宁铁路工人为首，数万工人罢工，从此运动的主力 and 领导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转折点。当大战中西欧资本放松对中国侵略的期间，中国的纺织、面粉等民族资本发展起来，工人数目比战前增加了三倍。工人是为了摆脱外国帝国主义、中国

卖国政权(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强烈要求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开始受到俄国革命影响,而与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了。

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民族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了。其先锋队共产党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也于1921年建立起来了。中国革命完全从过去连孙文也屡屡陷入的模糊——对帝国主义的错误评价,没有充分发挥工、农的革命力量并加以组织——中摆脱出来。把反帝革命的矛头指向了日本和英国,并渐渐集中于日本。二十一条和以后日本所强迫推行的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日本自己造成而发展为致自己死命的矛盾。

华盛顿会议 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英间的矛盾对立,随着大战终结而愈加尖锐化。美、英总想设法使日本缩回大战中它在中国任意扩张的势力并由自己取而代之。实际上,战后中国的进口贸易中,日本的输入比率在急剧地减

少,而美、英特别是美国的输入则增加了。美国在战争中曾暂时抑制着本国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战后则尽力煽动,以致排斥日本移民的热潮较大战前更加激烈。1920年12月,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全面禁止日本移民买地和租地的土地法。日、美双方都大肆进行“日美战争为期不远”的宣传(以后排斥日本移民更为激烈,1924年7月实施了等于禁止日本移民的移民法)。

英国也于1921年5月通知日本日英同盟到期将自然无效。

第24表 中国进口总额中,日、英、美所占比率

年 度	美 国 和菲律宾	英 帝 国 (香港①除外)	日本帝国 (包括殖民地)
1911—1915年	8.9%	19.1%	19.7%
1916—1920年	14.5	15.1	32.8
1921—1925年	16.7	15.8	26.9
1926—1930年	16.3	14.9	28.2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算出。坎德罗维奇:
《中国争霸战和太平洋》)

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了美、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国

① 香港是被英国占领的中国领土。——编者

等九国海军裁军和关于远东问题的会议（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不外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向远东扩张势力而召开的。会议规定美、英、日的海军主力舰比率为五、五、三，以限制各国主力舰的数量。从这一点可以知道美国的思想是：即使现在远征太平洋也能与日本作战，同时，英国也不象过去那样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军国。日本虽不满意这个比率，因无实力只得屈服。

根据这个协定，使日本建造中的主力舰也被迫废弃了。这就是给造船、钢铁等依靠军备扩张的日本重工业以重大的打击。政府给造船、钢铁等十三个公司以共计两千二百万元的“损失补偿费”。所谓“损失”即假如不实行裁军就会接受政府的订货而获得利润，现在不能接受订货的“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中所受的打击比“裁军”更加严重的就是缔结“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它否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和垄断地位。日本在凡尔赛会议所获得的原来旧德国在山东省的利权被迫交还给中国。而且在门户开放及其他美名下规定英、美、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得

以共同剥削中国、统治中国。英国又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正式宣布废除日英同盟。

日本在远东更加孤立了。

西伯利亚干涉战争的惨败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除了革命前帝国主义的三个主要矛盾之外，又加上了和苏联敌对的矛盾。这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更为尖锐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依靠天皇制权力对国内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实施残暴的压制，才能维持其存在，因而对人民任何微小的革命运动也是最害怕的。但是苏联鼓励了朝鲜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对日本国内革命运动的影响也逐年在加强着。

于是日本在1920年1月英国等撤退了其西伯利亚干涉军之后，继续进行干涉战争。当它失去了救援捷克军的借口后，便发表声明：为了保护侨民、维持远东和平和自卫等三个目的而防止过激派势力东进，继续驻兵西伯利亚（1920年1月14日）。但仅一个月之后，便把驻兵目的改为保护侨民、保卫朝鲜满洲和确保西伯利亚交通的自由。象这样露骨的谎言，连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也感到不满。

本来一部分产业资产阶级对于这次干涉也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无益的战争，曾加以反对；而小资产阶级进步派则从开头就反对干涉。例如《大阪朝日新闻》在干涉战争开始前就起而反对，《东洋经济新报》杂志1918年（大正7年）7月25日号上发表《应承认过激派政府》的社论，反对干涉。又在出兵后同年8月15日号上指出出兵是干涉他国内政而加以反对，其后也是不顾警察的压迫，继续反对干涉，主张承认工农俄国。在野党的宪政会也认识到干涉必然失败，又鉴于舆论的强烈反对，乃从1920年春起开始主张停止干涉。

政府军部为了继续干涉，在1920年春大肆宣传庙街（尼哥来佛斯克）过激派屠杀日本侨民^①。

① 所谓庙街事件事实如下：1920年12月间，在黑龙州的日军，比其他地方的日军更为残酷地屠杀居民、烧毁住宅、凌辱妇女、掠夺财物。因此，就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富人，也从内心怨恨日军。各地游击队终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纷纷起来反抗，迫使日军撤退。庙街的日军也失败了，与石田领事同向游击队投降。这时日军曾杀死游击队的和平谈判代表两次，并挖掉代表的眼珠、烧鼻子，或将脊梁骨切成小块。到第二年春天，日军发动反攻，5月庙街的游击队后撤。当他们撤走时，枪杀了被俘的反革命派俄人富豪和日军一百二十二名。政府和军部把这件事称为“庙街惨剧”、“过激派的鬼畜行为”，大肆宣传。以后日苏

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又派军占领了庙街对岸的北库页岛。该岛有丰富的石油、木材和渔场，日本垂涎已久，只等机会。

无论政府与军部怎样热中于干涉，到底敌不住为保卫自己的革命祖国而奋斗的苏联军民。加之日本士兵对于这种非正义的战争，也不感任何兴趣，士气极端低落，军纪也松弛。其中竟出现了倾向于过激派的兵士（《续日本宪兵》）。日本侨民中也有象佐藤三千夫——宫城县登米郡登米町出身——那样为保卫俄国革命而牺牲生命的人物。1922年5月片山潜赴西伯利亚宣传，号召日本士兵放下武器回国。

日本国内从1922年春起，在共产党的鼓动下，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展开了要求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的有组织的斗争。五一节工人提出承认工农俄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两星期后英国工会向总同盟发出号召，为了不干涉俄国，工人应该

恢复国交谈判时，日本全权代表开头曾提出庙街事件，要求赔偿；但被苏联代表越飞驳倒，狼狈撤回要求。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在贵族院中也说，庙街事件是“日本无理驻兵必然引起的”。（参阅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二册）

起来作国际的共同斗争。日本工人响应这一号召，以总同盟为主力，1922年6月在东京成立“对俄不干涉同志会”，展开了要求立即从西伯利亚撤兵、立刻与俄通商的群众运动。议会中的在野党与进步议员主张即时撤兵的言论也愈加强烈了。

又日本这样固执地驻兵西伯利亚也加深和美帝国主义的对立。

事到如今，日本也终于不得不撤兵。1922年10月才完全撤退。这次武装干涉整整费时四年零两个月，花费七亿六千万日元临时军费，使七万三千名军队困厄于西伯利亚的荒野和森林中，是各国干涉军中败退得最惨的。虽然继续占领着北库页岛，但到1925年5月也毫无所得而被迫撤退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找机会挽回这一失败，乃着手准备着更大规模的对苏战争。

国内阶级对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以及和美、英帝国主义的对立，在这战前三大矛盾之外，现在又加上和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使先前三个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这些矛盾又互相发生影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无论是在本国或后方，无论是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全面地加深了。

第五节 议会政治和劳动阶级

超政党内阁的再起与裁军 首相原敬身遭不测之后，本来是原内阁藏相的高桥是清（1854—1936）任首相，并继承政友会总裁，蝉连了前任内阁。不久由于高桥首相和一部分政友会干部企图改组内阁，致发生内讧，内阁内部不一致^①。因此高桥内阁便于1922年（大正11年）6月全体辞职了。

关于后继首相，元老推荐原内阁的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1861—1923）大将。加藤因在众议院中没有支持他的势力有所踌躇。政友会看清了如果加藤不组阁，则政权将落到众议院第二大党宪政会手中，为阻挠起见，乃与加藤约好，无条件地支持他。加藤得到这个诺言之后，便以官僚势力和贵族院为基础，组成了新内阁。米粮暴动虽有日本式的局限性，却实现了政党内阁。但由于居

^① 不统一的原因是由于失掉了大头脑原敬之后，党的领导人中间争权夺利，同时，高桥在经济政策上主张紧缩方针（大财阀的要求）和文部大臣中桥德五郎、铁道大臣元田肇主张继续原内阁的政策方针，发生了对立。

关键地位的政党，本质都这样坏，所以不能建立起政党政治。

宪政党和国民党反对加藤友三郎内阁，唱“宪政常轨”，高喊展开“护宪运动”，但他们没有接受群众的要求，致力于发动群众。而参加工会、农会组织的群众也没有象两年前普选运动时那么起劲。工会虽然逐渐摆脱了工团主义影响，但在政治上还未成长到这样的程度——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而进行斗争。

加藤内阁根据华盛顿会议（加藤本人担任全权代表）的决定，不仅缩减了海军的主力舰，并决定在这任及下任内阁期间大肆裁减陆军（官兵合计六万三千二百人，马一万三千四百匹，约裁减五个师）。但同时增加补助舰艇，把旧舰重新加以改装，陆军则增机关枪队、重炮队、航空队，并充实了无线电讯器材。因而裁军在预算上所节约的经费，陆海军合计不过七千零九十九万元。而且节约下来的钱用于增加养老金和遗族恤金以及兴修水利、整理港湾、产业奖励费、偿还公债等，都付给官僚、军人和大资产阶级了。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增加义务教育费中的国库负担额，并不能减轻人

民大众的负担。

这与其说是裁军，不如说是将军费中人事费及马匹费变为新式武器的费用，即改变为直接成为重工业资本家利益的军备费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军备性质有了变化，与其平时保有庞大的非生产的军队，不如减少其费用，以加强非常时能总动员的产业和科学技术基础，对于将来的战争更为有效。这种所谓“国家总力战”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日本也采用了这种做法。

这种“总力战”的军备从帝国主义立场上来看是更加合理的军备。但以职业军人的立场来看，裁减兵员就是难以忍受的。不过由于第一，有国际的压力（根据华盛顿条约美、英帝国主义的压力和世界人民对于和平与裁军的要求）；第二，正如原内阁时代迫使军部承认文官兼海军大臣事务监理同样，国内反军阀的舆论非常强烈；第三，由于大战中确立起来的垄断资本——支配着重工业——也要求更加合理的军备——当时他们没有忘记因裁军而少赚的部分，要求国家补贴——，所以军人们不得不忍耐。

山本内阁和大地震灾害下的白色恐怖 一般

产业资产阶级也想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犬养毅解散国民党，又吸引一些无党派的议员，组成了“革新俱乐部”（1922年11月）；钟渊纺织公司经理武藤山治（1867—1934）以大阪为中心，团结轻工业资本家，组成“实业同志会”，就是这种表现。革新俱乐部成立时，有会员四十五名，提出了实行普选、废除军部大臣的资格限制、裁军、和工农俄国缔结通商条约以及为了中小资本家的利益整顿税制等主张。实业同志会反对政府与大政党偏袒重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保护政策，主张实行以产业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政策。他们虽然和财阀、垄断资本有一定程度的对立，但是为了实现其主张，不积极地与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结合，光耍政治手腕，想以声东击西的方法对付政友宪政两党，甚至时而与官僚势力勾结，所以没有获得发展。

加藤友三郎内阁于1923年（大正12年）8月因首相病死而全体辞职，继由萨摩海军军阀巨头山本权兵卫大将再度组阁，他是由于第一次护宪运动和西门于事件被推翻的内阁首相。革新俱乐部的犬养毅以从内阁中推进普选为理由，竟泰然

自若地参加了内阁。

在山本内阁组阁期间，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关东地方发生了大地震，引起大火灾，东京横滨等关东主要城市化为焦土。房屋损失达六十九万四千间，死亡及下落不明者有十万六千人，受重轻伤者五万二千人，经济上的损失（大藏省推断）达一百亿元。这时政府比救济灾民更重要的是以防止“财界的混乱”为名，尽全力救济大资本家。

特别是政府以维持治安为借口，施行一部分戒严令，宪兵大尉甘粕正彦利用这混乱时机，不经审判形式，也没有正当理由，惨杀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和他的妻伊藤野枝（1895—1923）以及偶然在他家中的—一个年仅七岁的亲戚小孩。又龟户警察署没有任何借口，搜查素来以革命的劳动运动据点而闻名的南葛工会本部，逮捕了工团主义者平泽计七（1889—1923）、理事河合义虎（1902—1923）——共产青年同盟创立人之一——及其他革命工人八名，由警视厅办公室主任正力松太郎（1885—）和军队联系后，全部被军队惨杀了。

内务大臣水野鍊太郎（1868—1949）于9月1

日深夜(2日拂晓)从千叶县船桥海军无线电信局向全国颁发指令说：“朝鲜人、中国人、社会主义者、赌徒及流氓之类尽放火掠夺之能事，各地应严加防备。”政府与警察就说什么“不法的朝鲜人”为了报复日本人，在向井内放毒呀，在抢劫、放火、暴行呀，等等，这样的散布无稽的谣言，使惊慌的灾民，杀害了三千余名无辜的朝鲜人^①。水野曾任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残暴地压制朝鲜人，以致心虚胆怯，患着恐怖病，不知何时会遭到报复。这不只是水野个人的恐怖，而是所有压制殖民地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内心的不安，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行动上罢了(志贺行雄：《日本革命运动史上的人们》)。

政府深恐虐杀朝鲜人会引起国际舆论的攻击，到9月5日才公布告示说：“迫害朝鲜人，违反

^① 水野内相是惨杀朝鲜人的主谋者，政友会干部之一。小泉策太郎所著《护宪运动释义》(1924年1月发表)中也有记载。“水野、赤池(浓)因为长期在朝鲜总督府居要职而深遭朝鲜人怨恨，所以调回国内后，仍作恶梦。……地震时，惊惶失措，导演虐杀朝鲜人惨剧的主谋者是谁呢？而水野内务大臣(清浦内阁)、赤池警察总监仍安然无事，乃欺世之行也。”(小泉申三：《日本经济变革论》)

‘日鲜同化’政策，而且‘传到国外也决不是好事’，望各慎重。”但是，这个告示没有明确指出朝鲜人根本没有不稳的行动，不要为流言所惑；相反地却说：“如朝鲜人有不稳的举动，应速报告担任取缔的军警”，给人以朝鲜人似乎有“不稳行动”的印象。政府一方面用这张告示来为自己作辩护，表示政府曾出告示禁止杀害朝鲜人；另一方面因为政府对于受灾人民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济措施，想将人民的不满尽力转移到对朝鲜人的怀疑与仇恨上而去。

甘粕大尉后来形式上虽受审判，但所谓审判也不过是做把戏，掩饰他的行动是根据宪兵司令部的方针，假装完全是个人的犯罪行为。甘粕表面上虽被处以监禁十年的徒刑，实际上三年就出狱了。后来做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在中国东北活动，继而做伪满洲国的高官。杀害河合等人被认为是在戒严中无法避免的事，凶手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白色恐怖并不只是统治阶级因大震灾于惊恐之余的偶然失措。政府早就探知日本共产党的存在，震灾以前，即同年6月间就已对共产党员

实行大逮捕，并大肆宣传为“第二次大逆事件”；“不逞之徒如此有组织地蠢动，实我国光荣历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在工人阶级建立革命先锋队开始走上政治斗争时，便决定发动全面攻势，把它扼杀在摇篮里。碰巧发生震灾，给政府实行上述恐怖以绝好机会。

纯真的青年难波大助对政府的暴虐行为，满怀激怒，于同年12月17日在东京虎门附近谋刺摄政^①裕仁亲王（现在的天皇）未果，当场被捕，立即处死。

由于虎门事件，山本内阁全体辞职。

护宪三派和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 山本内阁一方面尽白色恐怖之能事，另一方面则用约期实行普选、予工会以选举工人代表参加国际劳工会议的权利，以及其他微小的改良政策来拉拢工会和农会的干部，企图使之与战斗分子分裂。总同盟以及其他工会的工人贵族与根据职制产生的一部分干部便上了圈套。因为共产党事件的被告中有总同盟分子，他们已经有些惊恐，再加上以后震

^① 大正天皇患脑病，完全变成了低能，1921年11月25日皇太子任摄政。

灾中统治阶级所实施的残酷恐怖政策，致被吓倒，乃与共产党及左翼势力分手而被政府、资本家伸出来的魔手——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甜头所吸引住了。1924年2月总同盟大会声明采取议会主义。其他工会也相继发表了同样声明。日本农会也站在议会主义的立场要求普选。而左翼也只喊勿受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欺骗，但还没有成长到这样的程度：不但不为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所欺骗，并能利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同时，向群众揭露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欺骗性与局限性，展开争取民主主义的单独斗争。这就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了。

山本内阁全体辞职后，再由故山县有朋直系の官僚巨头清浦奎吾组阁。清浦内阁以贵族院の研究会^①为基础，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称之为“特权阶级内阁”，并且说在这种时代组织这样开倒车的内阁只有加剧阶级斗争而予以反对。

政友会的高桥总裁等反对清浦内阁，而床次竹二郎(1866—1935)一派则支持清浦内阁，认为

^① 研究会是伯、子、男爵中互选の议员团体，为贵族院中的最大团体。

说它是特权阶级内阁的才是加剧阶级斗争。这种对立是由高桥内阁末期两派的对立发展出来的。高桥派主要和财阀以及与财阀有联系的大地主勾结；反之，床次派则勾结官僚、一般地主以及资产阶级代表等一切反对高桥派的人。该党终于在1924年（大正13年）1月分裂，政友会议员的过半数（二百七十八名中的一百四十九名）以床次为总裁，组成新政党，名“政友本党”，而成为清浦内阁的唯一与党。

宪政会、政友会与革新俱乐部三派结成统一战线，自称为“护宪三派”，向民众揭示了打倒特权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枢密院、整理行政、财政等政策。上述的工会农会也予以支持。护宪三派在全国各地热烈地举行讲演会，示威游行。清浦内阁便解散议会，虽以警察力量和巨额选举资金——由满铁以及其他殖民地公司供给——援助政友本党，5月，选举结果，三派统一战线仍获得了绝对优势^①。

^① 宪政会一百五十四人，政友会一百零一人，革新俱乐部二十九人，三派合计二百八十四人，政友本党一百十四人，其他小会派以及无党派六十六人。

清浦内阁辞职，1924年6月11日成立了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三派联合内阁。过去议会的多数派常常是看政府或元老眼色的官制多数，而护宪三派内阁是政党违反现政府的意旨，即以自己的力量第一次在议会取得多数，并掌握了政权。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民主主义发展的高峰。它不是议会或宫廷所策划的政变，而是发动群众的人民斗争的胜利。只是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攫取。这意味着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大资产阶级与军部一样，在天皇制权力和机构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同时，也意味着支持天皇制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垄断资本处于优势了。也可以说是天皇制从1900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天皇制，经过大约二十年的过渡时期，变成了资产阶级地主的的天皇制。这便是日俄战争后民主主义运动的当前的总结。

普通选举法和治安维持法 1925年（大正14年）3月29日，护宪三派内阁在第五十届议会上通过法案，取消纳税额的限制，给年满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以选举权、三十岁以上的男子以被选

举权。此案遭到枢密院、贵族院、政友本党等种种阻难；最后，对生活上受有各种救济者，或是住在同一市、町、村至选举日期前不足一年以上者，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才获得通过。即始终保留着财产的限制，损害了普选的基本精神。三年前加藤首相本人也主张说，所谓普选，如果不是“独立生活者”，就不能给予选举权。政友会在政府党时代就曾反对普选。由此可见，无论政府或是护宪三派都无意坚持原案。

普选案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虽然通过了，但对于贵族院则几乎未能作出任何改革。因为根据贵族院令，它的组织是由它自己规定，不经它同意就不能改革。因而如果想认真改革它，须有修改宪法的决心，而毫无这种念头的三派内阁，只能在该院中增加学士院会员与多额纳税者的议员数；减少华族议员，使华族议员和敕选议员数目大体相等。至于枢密院的改革只减少枢密院的谘询事项，以扩大内阁的自由行动，这当然不成问题。关于军部大臣的武官制和参谋本部的独立性丝毫不能触动。即天皇制的重要部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修正。从这任内阁到1932年（昭和7年）犬养政

友会内阁被右翼恐怖势力推翻为止，一般惯例虽是由众议院的多数党组阁，实行所谓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制。但它依然不能触犯军部大臣，也不能与枢密院对抗，并非真正的政党内阁、议会政治。

三派内阁与政府党一方面通过普选法；一方面为了不使它被工人、农民利用议会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于是镇压一切民主运动，制定治安维持法，并即日付诸实施。规定禁止一切“企图变革国体以及否认私有财产制度”的结社和运动，违反者处十年以下的徒刑。众议院中反对这个法案的仅有革新俱乐部五人，实业同志会四人，中正俱乐部^①六人，无所属二人，共十七人。贵族院仅有一人（侯爵德川义亲）而已。

政府说这个法案不是镇压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只是取缔共产党的法案。但是政府提出本法案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下列情况：枢密院看到普选法案有即将在议会通过的形势，于是提出

^① 中正俱乐部系 1924 年 5 月成立的议员团体，由财阀以外的大资本家及其代言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成。1925 年 5 月第五届议会后不久，一部分加入政友会，一部分则与革新俱乐部一部分会员合流——当时革新俱乐部已经解散，其主流并入政友会——，组成新正俱乐部，1928 年 1 月解散。

下列要求作为承认普选法的条件：“实施普选的结果，有诱致思想恶化的危险，政府必须严加取缔，进行适当的有力措施，努力防止弊害”。政府才根据这个宗旨作为和普选法不可分割的一体而公布了治安维持法。

因而政府提出的原案中有“变革国体或政体……”，表明有镇压人民一切反政府运动的意图。又本法案是曾被否决了的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的变形，从这一点看来也可以了解它的本质。即令这个法律的目的只是镇压共产党，那么，只要是共产党无论怎样镇压也可以的话（正如震灾时杀死河合、大杉那样），统治者自己认为可恶的人都可以扣上一顶“共产党”、“赤色分子”的帽子而予以镇压。事实上，从此以后的日本的历史，无论是和平运动，或稍微带有自由主义的言论，都遭治安维持法镇压。

治安维持法和1882年（明治15年）的集会条例、1890年（明治23年）的集会和政社法、1900年（明治33年）的治安警察法，都是连贯的，但在实质上与这些不同，它是适应阶级对立的发展情况，即适应全体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

下展开政治斗争的新镇压法案。

裁军和垄断资本 这个内阁又以陆相宇垣一成(1868—1956)裁减四个师而著名。然而“裁军”只是裁减了三万六千九百名官兵和五千六百匹马而已,只有加藤友三郎内阁裁减的陆军兵员的半数,而且节省下来的经费都用于战车队、航空队以及其他军事近代化上面,根本没有能够节约军费。宇垣陆相在日记中写道:“‘裁军’实际上第一是比要求裁军的舆论抢先一步而充实军备;第二使之了解裁减军队之后,地方经济会发生困难,而不再提出裁军要求;第三是为了打下军民一致的基础。”

宇垣在实行所谓“裁军”——适应总力战,改为与垄断资本利益能够调和的军备——的同时,规定学生必须受军事训练,分配现役陆军军官到中等以上学校去任教官。又在各町村设置青年训练所,规定受过训的人,可将他服兵役的年限从两年减为一年半,以此为诱饵——强壮男子服两年以上的兵役是农家所最苦痛的——半强制地对学学生以外的一切青年施以军事训练。宇垣以这种制度使军队能掌握“二十余万现役军人、三百余万复员军人、五六十万大中学生、八十余万青少年”。以

这支力量“作为平战两时辅助天皇的中枢”，“统帅大权不仅是在国家非常时期指挥军队，而且是支配人民的权力。为适应目前形势而考虑发动这种大权”等（《宇垣日记》），准备了可怕的军部独裁体制。

加藤友三郎内阁以来的裁军，在经济上，对日本产业实行了军事的重新整编，不外是强化这方面的垄断资本，特别是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的统治力量。以后内阁虽有更迭，但这个政策却被一贯地继续下去。因此日本虽然苦于萧条和国内市场的狭窄，工业生产则以重工业为首，继续发展着，其发展速度比战后美国还要快。政府改革关税法，改革制铁奖励法，予钢铁业以特别保护，利用外资扩大电力事业，以及对硫酸、染料、甘油等化学工业（战时立即转变为炸药工业）的援助，说明垄断资本和国家的结合有了新的发展。

这期间，资本的积聚集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一时达百数十个的钢铁业，至1927年（昭和2年），生铁业只剩七个公司，钢材业则为二十二个公司。电力工业以东京电灯为首的五大电力公司完成了对电力的垄断。三井所支配的公司数，大

战前连同直系旁系共有十二个公司，三菱合资公司的直系旁系事业公司也与三井略同。但至1928年（昭和3年）三井支配九十七个公司，三菱支配着六十五个公司（大岛清：《日本危机史论》下）。

随着财阀对全部产业统治的加强，所谓“三井的政友会，三菱的宪政会（后日的民政党）”这两大政党和财阀的勾结也更加紧密，而不和财阀勾结的资产阶级政党则逐渐削弱，出现了所谓两大政党对立时代。

相对的稳定和币原外交 三派的结合在第五十届议会结束后便破裂了。政友会解除了高桥的总裁职务，选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为后任总裁，采取了反对加藤内阁的态度。革新俱乐部瓦解，大部分加入政友会。三派联合内阁辞职，成立了宪政会单独的第二次加藤内阁（1925年8月）。不久，加藤首相病死，若槻礼次郎内相任首相，继承前任内阁（1926年1月）。

这时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被镇压下去，1924年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的、局部的稳定时期。黄金本来是国际货币，大战中各国都禁止出口，1919年美国最先解除禁

令，从1924年到1927年之间，除法国和日本外，各国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并解除黄金出口禁令。世界贸易逐渐恢复了。

与资本主义体制相对的稳定并存的，有苏联的巩固与发展。它在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后，正在稳步地进行经济建设。因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安定关系。1924年2月，英国最先承认苏联，并缔结了通商条约。法国、意大利也与苏联签订了同样的条约。

日本资本主义因与半封建的地主制有特殊结合而造成国内市场异常狭窄，内部矛盾特别深刻，以及战后进一步向中国市场发展受到阻碍，再加关东大震灾等恶劣条件，所以没有美、英那么稳定，以致大战末期实施的禁金出口也未能解除^①。

^① 在美国解除禁运黄金出口法令时，日本在国外也存有黄金十三亿元，当时本可以实行黄金出口解禁，但由于日本统治阶级坚持继续武装干涉俄国革命，需要储存现金；又因准备大战后参加瓜分中国的竞争，想尽量增多国内现金。这样从帝国主义政策出发，终于未能实行黄金出口解禁。以后为挽救1920年经济危机以来的萧条，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加上关东大震灾以后入超激增，黄金存底日益减少，失去了解除禁运黄金出口法令的机会。

尽管如此，当世界进入相对的稳定期以后，在这种好景况影响下，如向美国出口的生丝增多等等，对日本有利，使日本资本主义也多少呈现了稳定。这种情势就是所谓协调外交基础之一（其二为国内的民主、和平舆论的压力）。所谓协调外交，即从第一次加藤内阁到若槻内阁期间，以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1872—1951）为代表所推行的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金融上从属于美、英垄断资本，另一方面则为了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又有与美、英对立的两面性。币原等就是所谓英美派。

协调外交第一，是1925年1月和苏联恢复邦交，缔结通商条约，继而从北库页岛撤兵；第二，是对中国的政策，较之寺内与原两内阁的露骨干涉，多少缓和一些，采取了一方面与英美帝国主义协调，另一方面逐渐扩张的政策。尽管如此，在必要时仍不辞以武力向中国扩张。加藤首相就是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人物。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工农中间，特别是在华中、华南地区工农中间的影响增大了。在中共与苏联都有了发展的影响下，1924年1月孙文领导的国

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和中共合作、和苏联友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采取扶助工农、耕者有其田以及节制资本等政策，开始发展为革命的国民党。

1925年2月到5月日本资本在青岛、上海经营的纺织厂中，中国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起见，向工人开枪，杀伤了以共产党员为首的工人十数名。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学生举行大示威游行，抗议这种暴行，租界的英国警察向示威队伍开枪，死伤十数人，并逮捕数百人（五卅惨案）。从此中国的反帝民族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象暴风雨般地高涨起来。上海、广州和香港的中国工人举行了空前的大罢工，为了镇压起见，加藤、币原当政的日本政府和英美“协调”，派遣了军舰。

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外国的干涉并未屈服，组织革命军，并建立革命政府于广东，奠定了以后北伐——征伐北方军阀——和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在北方，日本以奉天军阀张作霖为走卒，支持他从华北向长江流域扩张。1925年10月，在英国支持下的军阀孙传芳，将张的军队逐出华中。当时

华北的军阀冯玉祥与广东国民党政府妥协，在北京攻击奉军。另外张的部下郭松龄得到冯的援助，在东北举起叛旗。对此，日本于1925年末派遣陆军部队赴沈阳援助张军击败郭军，又于1926年3月派遣舰队到大沽炮击冯军。币原协调外交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共产党的解散决议和重建 西欧各国的相对稳定，是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主义领袖以分裂工人，作为镇压革命运动的一种重要方法而造成的。我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日本共产党内由于第一次大逮捕，以及震灾时的白色恐怖，发生了波动。当时居党领导地位的赤松克麿(1894—1955)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主张“科学的日本主义”。山川均则认为在日本组织共产党为时尚早，主张须俟工人觉悟提高，运动相应地自然成长之后再组织共产党，而唱解散论，取得了书记长堺利彦等绝大多数的赞成，于1924年3月通过了解散日本共产党的决议案。

但是共产国际没有承认这个决议。1925年1月，在上海召集党代表会议，制定关于重建的纲领。纲领中批判了日本共产党过去的领导者的思

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的、唯心的、抽象的理论，以及党不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上，而是基于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等错误，并强调指出，必须积极地参加群众为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与日常的经济要求而进行的一切斗争。

解散派脱离了党的重建运动，渡边政之辅、市川正一、德田球一等组织了党的重建政治局，1925年9月出版了合法的机关报：《无产者新闻》；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发展工厂内的党细胞组织和群众团体内的党员核心组织，并领导群众团体，加强对工会、农会、水平社以及学生团体的影响。以在共产国际援助下进行的这些活动为基础，1926年12月召开了第三次大会，日本共产党重新建立起来了。

党的重建是日本革命运动的巨大成果。但过去反对山川的解散主义而这时取得领导势力的是由福本和夫（1894—）代表的、极端宗派主义的理论^①，这给党和工农群众的斗争带来了很大灾难。

^① 福本在《马克思主义》杂志1925年10月号上发表了《关于无产者团结的马克思原理》之后，很快地上升到领导者的地位。

根据福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的过程”，因而必须急速组织先锋队领导革命；为此，首先应进行彻底的理论斗争：使具有纯粹的革命意识的分子从不纯的分子中间“分离开”之后，由革命意识纯粹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中培植革命思想。这个理论是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因为群众运动即或思想不同，如果当前的要求相同，应为其相同的要求而进行共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以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

工人战线的分裂 一面镇压，一面以普选及其他皮鞭与糖饴并用的政策，使日本劳动同盟的干部铃木文治、松冈驹吉（1888—）退回到友爱会时代的立场。他们企图将左翼势力驱逐出总同盟。他们甚至于扬言说治安维持法也是促使稳健工会运动发展的必要法律，根本不想动员总同盟与这个恶法展开斗争。

由于在总同盟的工会中左派势力很大，右翼干部一时虽未能达到其驱逐左派的目的，但终于在1925年3月——议会审议治安维持法案时——大会上，操纵大会的右翼干部，无视大会的民主原则，无理地将共产党员渡边政之辅领导下的二十

五个工会（一万二千五百人）开除出总同盟之外。被开除的各工会又加入了新的工会，于5月组成了“日本工会评议会”。至此，总同盟完全分裂了。这时两派的势力，总同盟拥有三十五个工会一万三千人，评议会则有三十二个工会一万二千人。

总同盟的分裂是继大联合因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而失败之后的第二次劳工战线的大分裂。从此以后日本的劳工战线分裂为左翼（在共产党影响之下）和右翼（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影响之下）而固定下来，对资产阶级的好处是难以估计的。

这种分裂虽然是总同盟右翼干部所引起的，但左翼也犯了很大的错误。左翼的错误，正如渡边政之辅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所指出，把“群众和先锋队的任务混淆”了。渡边说：“所谓工会，当然是依据工人现实生活的具体利益问题而结合的工人群众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不问出身、主义、主张、政治见解等的异同，可以说是不把这些当问题的组织。”然而当时的左翼受下列错误理论（福本主义）的影响：即日本的资本主义虽然发达较迟，但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合流，处于急剧没落的过

程,它的客观条件必然产生政党混合型的工会。想要工会担负政党所应完成的任务。这样,就不能避免分裂。要想工会具有共产党所应完成的任务,因此虽不愿分裂,企图把总同盟作为战斗性的工会而统一发展,然而却又和右翼干部“机械地对立着,其结果反而坠入右翼的谋略中,引起群众团体的分裂”^①。

日本工会评议会 评议会摆脱了右翼干部的牵制,在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刚成立不久,在五卅事件时就曾动员会员进行对华不干涉斗争(总同盟认为五卅事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民族斗争,不应参与)。此外,评议会又邀请苏联工会代表赖普塞来日本,不顾官宪的猛烈镇压,组织了欢迎赖普塞的斗争。

在评议会领导下,1926年(大正15年)掀起了以小说《没有太阳的街》而闻名的共同印刷公司的罢工、滨松乐器公司的罢工,为日本劳工运动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当时资本家和警察也使用了暴

^① 渡边的《我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当前的任务问题》发表于《马克思主义》杂志1928年2月号。载希望阁出版的《战略问题要项》。

力团以残酷的恐怖行动对付工人，但是评议会组织了民主集中制的斗争团，并私设防卫队和秘密领导部等新的斗争组织，长期领导斗争。滨松斗争坚持达一百零五天，共同的罢工也有六十七天之久，终因力尽弹绝而失败了。

这中间，评议会势力逐渐增长，1927年3月第三次大会时，已组织五十九个工会，有三万五千零八十名会员。会员不仅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的工人中也建立了工会。真实地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这一点是日本劳工运动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不过在组织大企业的工人方面，开展得还不够好。这不仅是评议会，而且也是革命运动的最大弱点。资本家一致采取了各种手段使评议会不能伸入到大企业中去，时而组织总同盟或比它更为改良主义的工会，作为对付左翼的防波堤。因为评议会乃至共产党和这个防波堤机械地对立着，所以没有能进一步利用它。

日本农会的战斗化和分裂 农民战线比劳工战线发展较迟，但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途径。租佃纠纷的战术也采取了示威运动、反抗地主收回土地的共同耕种、反对地主扣押青苗的共同收割

等，不怕同地主、官宪冲突，进行了斗争。纠纷的次数也逐渐地增加着，1924年为一千五百三十二次，1925年两千二百零六次，1926年两千七百五十一一次。其要求则从暂时的减免地租发展到了永久降低地租30%，确立耕种权。

1924、1925年在新潟县木崎村、香川县伏石、熊本县郡筑、冈山县藤田村等地发生了全体村民和警察队冲突的大斗争。木崎村为抗议镇压，小学生实行罢课，甚至建立了木崎无产者小学校。

地主方面也在1924年底组织了“大日本地主联合会”与农会对抗。护宪三派内阁制定了租佃纠纷调停法（1924年12月实施），规定地主对于土地和地租米的绝对所有权，努力保护地主。又制定自耕农创设维持补助规则（1926年5月实行）。它虽然具有由国家扶助佃农购买土地变成自耕农的美名，然其实际目的则为了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由于佃租纠纷频频发生，不仅纠纷地区的水、旱田跌价，即一般的地价也有下降趋势，自耕农创设维持规则是维持地价并使地主有利地出卖土地。此外又给一部分上层佃农以取得土地的希望，分裂佃农阶层，起了使农

民思想趋向“稳健”的作用。

关于自耕农的维持创设，从保证天皇制军队的忠实的兵士来源着想，早在1890年已为官僚、军部所重视。第一次大战后农民斗争的发展，使他们更加痛感到有此必要^①。但只是在不与大地主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来推行的。

农会在走向战斗化的同时，也具有政治性，并和国际上有联系。1923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农会（农民国际）成立大会，有在苏联的片山潜和来自日本的大西俊夫代表日本出席。第二年农民国际寄给日本农民以指导性的书信，号召日本农民团结起来和城市工人结成同盟，为摆脱地主的压迫、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日本农民运动开始有国际性的联系，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① 《原敬日记》1920年（大正9年）10月21日记有原首相和山县元老的有趣谈话，两人谈到大家都说日本国小人口多，这虽然是日本向国外扩张的最好借口，但是“实际上我国内地容纳人口的余地甚多，不愁人口过剩。从前些时候工业稍趋繁荣，立刻就感到人员不足，便可知道”。两人又认为获得良兵的最好办法是增加小农，但“这多少有些困难，就是大地主的反对；原因是大地主担心失掉佃户，因而，关于这方面的安排，必须慎重考虑。”这种大地主本位的思想，不限于原与山县两人，以后的政府——包括资产阶级内阁也都是——一样。

随着日农成为战斗性的组织以及共产党对它影响的加强，另一方面总同盟右派干部也积极对日农右派干部进行工作。这里由于左翼掌握着领导权，1926年（大正15年）3月的第五次大会上右翼的平野力三（1898—）等一派便退出组织。以后他们组织了“全日本农会同盟”，这是农民战线的第一次分裂。

身分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结合 全国水平社的斗争，最初不切实际地主张彻底反击歧视他们的人，但行不通了。因为这样做会使一般人对水平社发生恐惧心理，反而使歧视思想更加发展，因此逐渐引起了水平社的注意，从而对此进行了批判。同时，共产党的影响渗透到特殊部落的工人和半无产者青年的中间。左翼青年组织了全国水平社青年同盟（以后的全水无产者同盟），指出特殊部落的敌人不是受统治阶级分裂政策欺骗的一般人民，而是现在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主张水平运动应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它和全水第一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干部发生了对立。同时，在全国水平社的内部也发生了无政

府主义派，和共产主义派相对立。在1926年的全国水平社第五次大会上，由于与上述各种对立妥协，在纲领中加上了这样一项：“因为我们知道歧视观念存在的根源，所以必须在明确的阶级意识上展开运动”。这以后，水平社内部的抗争益趋激烈，但左翼终于掌握了领导权。

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 进步的学生运动也发展起来。原敬内阁曾扩充大学与高等学校，而日本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给予这些毕业生以足够的职业和地位，便成了学生急进化的基础。1922年（大正11年）11月，东京、京都及其他地方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学生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联合起来，组成“学生联合会”。1922年5月早稻田大学学生进行反对“军事研究团”的斗争，1925年从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开始，全国各学校发生了反对军事教练的斗争，和工会、农会、进步教授等结合起来，具有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意义。

政府害怕“学校的赤化”，1925年12月到下一年在全国大肆搜捕“学联”中活跃的学生，有三十八名学生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提起公诉。

妇女参政运动也从男子普选权的实现而获得

希望，愈益高涨起来，震灾后的妇女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东京妇女联合会和妇女参政权协会，于1924年11月向广大妇女团体发出呼吁，建议组成妇女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后改为妇人选举权获得同盟），于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便统一起来了。不过资产阶级运动和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妇女运动则互相对立着。

当时，无论是总同盟或评议会中虽设立了妇女部，但实际上并未重视。妇女活动家虽想做促进女工社会觉悟最初步的简单工作，也没有得到工会男干部的任何实际援助，相反地，却硬给一些不适合妇女群众实情和要求的“高调”口号。就是对于下述政治研究会的纲领草案中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和保护妇女等各种要求，起初也以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予以否定。尽管当前妇女的要求，无论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或无产阶级的立场，几乎是完全一致，然由于大家只固执政治见解的不同，没有能为争取实现要求进行实际的共同斗争。

无产政党的结成和分裂 群众运动虽然苦于战线的分裂，但各方面都在成长着。普选给工农

群众的政治发展以机会，使工会、农会等出现了建立工人、农民政党的活动。1924年6月普选法案通过前，形形色色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评论家、社会运动家组织了“政治研究会”，开始准备建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政党”。

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纲领，确定了如下方针：一方面认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党只有一个共产党，不承认这以外的无产政党，另一方面则积极参加现时进行的无产政党运动，“在与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进行激烈斗争中增强共产主义势力，把无产政党运动争取到共产党一边来”（市川正一：《日本共产党斗争小史》）。通过真正工、农，群众的自发运动，建立“阶级的无产党”，并在其内部建立共产主义分派。以后评议会一成立，便积极进行支持政治研究会的活动。因此政治研究会的左翼很快地取得支配地位，右派便退出了。

这时由日本农会提议，于1925年6月在多数工农团体参加下召开了建立无产政党的筹备会。从此以后创立无产政党的运动便发展起来了。然而这一时期，共产党影响下的左翼团体——日本

工会评议会、全国水平社、青年同盟、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政治研究会——和以总同盟为中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右派，展开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经过种种的转变，由于总同盟根本不想和左翼组成一个党；因而左翼虽然一再让步，仍然制造借口，企图分裂。结果暂将评议会和总同盟除外，于1925年12月1日组成了农民劳动党。政府预料它会发展为“阶级的无产党”——实质上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三小时后便下令解散了。

以后总同盟等右派掌握了领导权，左翼在战术上采取了消极态度，1926年3月5日组成了劳动农民党。掌握其领导权的是总同盟和日农的右派干部，他们虽想坚决不允许左翼团体入党，但一般党员为争取统一战线，提出“门户开放”的要求。这时左翼在争取群众孤立右翼干部上取得成功。总同盟以及其他右翼干部眼看劳动农民党的门户开放势在必行，便于10月25日宣布脱党，使党再度分裂。

右翼退出后的劳动农民党，于12月5日由大山郁夫任委员长，以左翼三团体及日农的大部分党员为基础重新建立了。破坏了无产政党统一的

最右翼，于12月5日由安部矶雄任委员长，以总同盟为基础，建立了“社会民众党”（简称社民）。中间派则以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日本劳动组合同盟（日本工会同盟）^①为主，由麻生久任委员长，组成了“日本劳农党”（简称日农）。

统一的无产政党终未得实现，全国性政党也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另外又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无产政党。此外工会、农会、无产妇女团体、文化团体等各个战线上也都发生了分裂，并固定化了，大大地削弱了工、农阶级的革命力量，使统治阶级大为高兴。但如果把1925年以后和以前相比较，工、农革命的成长无论是在组成人数上或阶级觉悟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右派或中间派的策划分裂，从另一面来说，是斗争发展中的产物。尽管一部分干部右倾，但随着经济萧条，群众则日益急进化了。

^① 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是1926年1月由东京机械业工会、关东针织业工会等不满意东京总同盟的工会和关西大阪铁工工会以及其他工会共二十个工会联合组成的。是阪本孝三郎独裁的工会。日本工会同盟则为总同盟和评议会的中间派的联合组织，以棚桥小虎为会长，于1926年12月建立，实权则掌握在细谷松太和加藤勘十（1892—）等手中。

第七章 经济危机

第一节 金融危机和中国革命

金融危机的爆发 1924年以来，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期间，日本资本主义较过去也多少趋于稳定。但这种稳定，无论是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很脆弱。仅仅继续了两年多，1927年（昭和2年）^①春日本资本主义便陷于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又同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更是加深。国内工农运动尽管具有战线分裂的大弱点，却日趋激烈，群众逐渐左翼化了。

1920年经济危机以来，日本经济由于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各种救济政策，缓和了危机的打击，但这样做，反使矛盾更加深刻化了。以台湾、

^① 1926年（大正15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死，摄政裕仁亲王即位，改年号为昭和。

朝鲜两银行为首，很多银行都拥有巨额呆账。1925年政府为挽救由入超造成的汇价低落，向美国输送黄金。当根据这种需要被迫改通货膨胀政策为紧缩政策时，物价立刻低落，公司的利润率也开始下降了^①。以致基础薄弱的公司、银行开始动摇。

1927年(昭和2年)3月，若槻内阁的藏相^②在议会中谈到有关整理震灾票据^③问题时，透露出有不良贷款的银行有濒于破产的危险。从此金融界便更不稳定，同月15日，东京的渡边银行、赤地

① 1925年初的物价指数(批发)为二二五，1926年底则降至一七八。工业公司的利润率则从1925年上半期的17%前后降至1926年下半期的11.6%。(井汲卓一：《最近的经济情势和经济危机》，载《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

② 片冈直温。

③ 所谓震灾票据是支付地点为震灾地区的期票，震灾当时在震灾地有营业所的工商业所开的期票，或是以震灾地工商业为付款人的期票，震灾前已由银行贴现的。有这种票据的银行，因付款人受震灾，无力支付而遭受损失。因而政府命令日本银行对持有震灾票据的各银行，予以重贴现。日本银行因此所受损失，由政府补贴一亿元。并规定整理票据截止日期为大正14年(1925年)9月30日。但到期后震灾票据的整理仍未结束，若槻内阁乃将期限延长至1927年9月底，并向议会提出法案，再给日本银行补贴损失追加费一亿元《震灾票据善后处理法案及其他》。它的真正目的在救济台湾银行和铃木商店，因为震灾票据多通过铃木商店，集中在台湾银行。

储蓄银行被迫歇业。继而东京的中井银行于19日歇业，东京、横滨的中小银行都濒于危机。银行提存、歇业与公司破产的风潮，波及全国。为了救济这些银行，日本银行，仅数日间放出非常贷款竟达一亿日元以上，但仍无效。到4月3日在台湾起家的铃木商店破产，以致贷给铃木商店以巨款的台湾银行受累——拥有在台湾发行纸币权的半官半民大银行——也濒于破产。

铃木商店因在台湾经营糖与樟脑等和台湾银行有特殊关系，第一次大战中大加扩充，支配着六十几个公司，势力之大，几足和三井抗衡。但战后一蹶不振，专靠台湾银行贷款维持。台银恐铃木破产会连累本身也破产，连续地依铃木希望，给予信用贷款，总数达三亿五千万元之巨。但铃木最后还是不免破产，立刻使台银也濒于危机。

政府为拯救台湾银行，和枢密院商议，欲以紧急敕令由日本银行贷款给台银，并由政府拿出两亿日元以补贴日银因此所受的损失。但枢密院以发布此种敕令违反宪法为理由，予以拒绝，若槻内阁被迫辞职。

因此，台银总支行全部陷于歇业，大阪的大银

行近江等三银行也歇业了。危机继续扩大，并加深着。21日连天皇有存款的东京第十五银行也歇业了。22、23两天，全国银行、信托公司一律歇业，股票也开始下落，22日交易所停拍，金融危机达于极点。

田中内阁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这样混乱中更换内阁是很少见的。在此以前，即1927年1月，本来政友会曾和政友本党联合，企图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但若槻宪政会总裁(首相)邀政友会、政友本党两党总裁会谈，表示在这次议会结束后内阁即辞职。以此欺骗在野党，使之撤回不信任案。然而若槻在会期中把政友本党笼络过来了，议会结束后仍不打算辞职。于是政友会和支持它的枢密院、三井财阀等资产阶级，便以金融危机作为倒阁的最好手段。

台银救济敕令案一旦被否决，金融危机将更加严重，这一点枢密院顾问们也是清楚的。而该院竟敢冒极大危险而推翻若槻内阁，并不是为了维护宪法，也不是反对救济台银。而是认为若槻内阁对中国革命干涉不力，企图建立更加积极干涉中国革命政府——最适合此任务的政友会总

裁田中义一陆军大将正等着这把高椅坐。

金融危机、台湾银行陷于困境的原因之一，也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关。1919年台银在中国的投资达两千五百七十六万元，其中包括一部分西原借款。因为大部分是政治性投资，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几乎已无收回可能，成为该行经营困难的重大原因。不仅台湾银行，整个日本资本主义，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大战后美英势力重新向中国扩张而陷于困难了。例如向中国出口的棉纱，从1922年的九千一百五十五万四千元减少到1926年的两千四百九十八万七千元。但另一方面，日本纺织业资本在中国有所发展。然而中国工人对日本纺织业资本的斗争，正是前述五卅惨案和以后中国革命的导火线。五卅惨案以后，由于中国的反帝斗争暂时集中于反对英帝国主义，英国对华贸易激减，日本商品则乘机获得相当发展，等到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向日本时，日本贸易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容易想象得到的。

不仅贸易问题，日本的统治阶级也最怕中国革命把日本帝国主义北进的据点中国东北也统一起来。认为必须设法防止中国革命，免得给朝鲜

和台湾的民族运动以影响^①。

1926年7月中国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各地农民、工人的起义支援下，10月已占领了武汉，11月在这里建立起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联合的国民政府。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这时已阴谋和英美帝国主义勾搭。1927年3月日本金融危机前不久，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工人总罢工的支援下占领上海全市，继而又占领南京。民族革命的火焰已扩展至日、英、美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了。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连做日本走卒的军阀张作霖也有被打倒之势。

对于中国革命，若槻内阁曾与各国共同进行干涉，但在华的纺织资本家们对于政府没有对侨民实行“现地保护”，非常愤慨，军部当然也不满足。伸入华中、华南的日本资本属于三井财阀的势力，三井财阀又因若槻内阁是和自己的竞争敌手三菱勾结，没有充分保护自己在中国的“权益”，

^① 枢密院顾问伊东已代治在审查紧急敕令案的会议上攻击若槻内阁时也曾说：“实际上中国革命给和中国接壤的朝鲜与原为中国领土的台湾的民族运动以很大的影响，政府对于这点估计不足。”

深表愤怒，政友会代表它的呼声。纺织资本家的政党“实业同志会”也和三井——政友会站在同一立场。此外，当台湾银行陷于危机时，三井银行收回了数千万元短期贷款，加速了台银的倒闭。这也是三井打倒铃木商店的手法。铃木商店是三井在台湾和南洋的最大竞争者。

这些势力联合起来，以枢密院顾问伊东已代治为首，为了加速积极干涉中国革命起见，推倒若槻内阁，建立了田中政友会内阁。

处理危机与财阀 4月20日成立的田中内阁，以紧急敕令规定从22日起停止提存三星期，其间政府令日本银行放出二十一亿九千万元贷款。继而召开临时议会，通过为救济台湾银行及其他银行由日本银行给与特别贷款；日本银行因此所受的损失，五亿元以内由政府补贴。这样，金融危机的处理才暂告结束。这次金融危机中，歇业银行有三十六家，一年内恢复营业的十五家，其余或则解散，或则与其他银行合并。

通过处理危机，与国家资本相结合的大银行的垄断势力，显著地加强了。由于银行的合并，1927年中有四十八行，1928年中有二百六十五行

被整理了。以致全国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总额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银行和第一银行，而且它们的垄断势力，正在与年俱增。

第 25 表 全国商业银行存放款
总额中五大银行所占比率

	存 款	放 款
1919年	25.0%	24.9%
1921年	24.5	22.9
1923年	19.5	17.2
1925年	24.2	21.3
1926年	23.7	21.6
1927年	30.6	25.6
1928年	32.8	26.2
1929年	33.9	28.2
1930年	35.7	31.1
1931年	38.2	32.6
1932年	40.4	35.8

(根据《日本财阀及其解体》)

工业的垄断也显著地发展起来。纺织业方面，大日本、东洋、钟渊(三井)、富士(三菱)、日清(根津)五大公司居统治地位。制麻业则统一

在帝国制麻(安田)公司内。水泥业有浅野、小野田(三井)两公司。造纸业有王子(三井)、富士、桦太工业三公司,以后合并为王子公司。制糖业则有台湾(三井)、明治(三菱)、大日本(藤山)三公司。面粉业有日本(三井)、日清(三菱)两公司。煤炭业方面,三井系九个公司、三菱系四个公司、贝岛系两个公司、古河两个公司、安川系、浅野系等六大资本系统垄断了全国产煤的62%,其中三井、三菱两财阀占70%。此外,如硫酸、人造丝、电力、私营铁路等方面也都确立了四大财阀的垄断势力。

出兵山东和东方会议 田中内阁决定了处理金融危机的方针后,便急于推行它本来的使命“对华积极政策”,以干涉中国的革命。

当时,中国革命正进入了新的阶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所屈服,在上海发动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的政变,继而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对立。英美帝国主义者积极援蒋,以大批炮舰恐吓武汉政府和人民。而工人和农民则支持武汉。刘少奇等领导的工会,为防备反革命的阴谋,曾加

强武装纠察队^①；农村方面以湖南省为中心，毛泽东等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运动猛烈地发展起来了。

然而，在武汉政府的领导干部中，也有人企图和反革命妥协。中共书记陈独秀认为毛泽东等主张的土地革命，会使国民党害怕，破坏国共合作，而加以反对，因而阻碍了农民群众革命力量的发展。其间反革命势力增大。7月武汉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等和蒋介石通谋，屠杀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武汉政府也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开始了白色恐怖，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至此，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便告破裂。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各省由于毛泽东、朱德等的努力，组织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解放区——当时称为苏维埃区——，并建立起工农红军。

① 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利用他窃据的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务，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枝弹药，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编者

田中内阁在战略上抓住了国共分裂的机会，5月28日以“保护侨民”为名，派了两千军队（第一次出兵山东）往山东省。目的是阻止国民革命军进攻徐州，以保护华北的军阀政权。当时日本的行动，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帝国主义者对反革命有共同的利益，在华北想使日本火中取栗。

继而从6月27日到7月7日，政府召集外务、陆海军省官员、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以及有关中国的外交官于东京，举行“东方会议”，决定了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在这次会议的召集和讨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为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1883—1932）。他青年时代受三井物产公司中国支店的培养，后来又在中国亲自经营矿山以及其他事业，是三井系的资本家，和军部有联系，为政友会选出的议员，打倒若槻内阁他也出了很大力气，田中内阁成立后，担任田中兼外相下的政务次官，成为事实上的外相。他正是具有这样经历的人物，适宜于做牵线工作，使垄断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党勾结起来。协助他的有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1883—1959）、驻沈阳总领事（后为外务次官）吉田茂（1878—）。

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中略）的决心”。

在公布的文件中，尚且这样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的意图，而会议中的秘密部分必更加具有侵略性就可想而知。传说田中首相曾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上奏折给天皇（1929年年底曾在中国杂志上发表，传遍全世界），其中有“欲征服中国，必先打倒美国势力，与日俄战争大同小异。然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其中并详述了侵略中国的步骤、方法。这

个文件是否东方会议所决定虽不能确定，但它和以后日本的行动完全一致。

炸死张作霖 帝国主义者虽已经这样作好阻止中国革命的准备；但在中国内，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内战愈趋激烈，国民党以全力围攻共产党，推迟了向华北的进攻；再加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攻击，以及日本国内发生了反对干涉中国革命的人民运动，有此种情况，1927年8月，政府便暂时撤回派往山东的军队。然而到了1928年春，国民党北伐军再开始行动时，政府又以保护山东侨民为名，从国内急派一个师团和铁道队、通讯队往济南，同时，又加派驻华北第九师团的一部分和铁道队、通讯队前往（1928年4月，第二次出兵山东）。继而在5月3日日军向刚进入济南的国民军挑战（济南惨案），大肆宣传，说中国军“虐杀”日本侨民，5月9日又从满洲加派了一个旅团去，从本国加派了一个师团去（第三次山东出兵）。

尽管在日本如此的援助之下，仍旧挽回不了反动军阀张作霖的失败。因而田中内阁于5月18日发表声明：“当战乱波及满洲时，帝国政府为了

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同时，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移驻沈阳，完成占领中国东北的姿态。日本强迫张作霖停止在华北毫无希望的战争，赶快撤回满洲，巩固地位。张作霖虽不是日本所预期那样驯服的鹰犬，终因战败被迫于1928年6月4日退回东北。他的专车到达沈阳附近时，在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上校等的策划下被炸毁，张亦被炸死。

河本等因为张作霖不唯命是听，计划炸死他，同时，日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占领中国东北全部要地，建立“独立”的“满洲国”。但是关东军首脑部认为时期尚早，而没有这样做。只能算是三年多以后“满洲事变”的预备演习。政府对这事始终保密，并宣传说张的列车为革命派所炸毁。在野党在议会里虽把它作为“满洲某重大事件”而提出来，做攻击政府的材料，但他们也不是根本反对干涉中国革命。政府和军部都只认为河本等的过早行动有欠高明，没有严格地处分所有的责任者，只把河本一人编入预备役，不久，并选他为满铁的首席理事。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是为侵略中国，任何行动也不会被处分。它鼓励了青年军官们的

好战心和侵略欲。

干涉中国革命、侵略中国东北，并不单是军部好战派所能发动。从田中内阁成立以来一直到这时候的整个侵略过程，天皇、枢密院、元老、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都不反对，仅仅对炸死张作霖认为太笨而已。所有统治阶级集团，一致在准备走以后满洲事变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对于日本的出兵，就是在国共内战中，中国的工人、学生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起而猛烈抵抗。日本向中国的输入，1927年和1926年比较，从三亿四千万两减少到二亿九千四百万两，日货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率则从27.31%减少到25.74%。对于棉纱和棉织品的打击尤大。因为从1929年度起实行新关税率(对日本的差别关税)，出口商都抢先运货物往中国，日本的对华输入虽有增加，但仍不及1926年，其比率比前年更降低到24.89%。

五卅惨案以后，中国的反帝主要目标，暂时从日本转移到英国身上，但在出兵山东后再转到日本身上。美英很快就抛弃了旧军阀，巧妙地和蒋介石、南京政权勾结起来。日本则不改变旧政策。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因父亲被日军杀害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以及本身民族良心的发现,不顾日本的威胁,1929年底挂起“青天白日旗”,和国民党政权合流。此外,日本三次派兵往山东,并发表确保满蒙的声明,以致连默认第一次出兵的美英也向它提出抗议。

日本国内“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也蓬勃地开展起来了(下面叙述)。

田中内阁的根本使命“干涉中国革命”就这样彻底地破产了。

第二节 工农运动的发展

劳资纠纷和工会 田中内阁作为侵略主义的推进者而被推选出来,不但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对于国内革命的、进步的运动也较前任内阁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手段。解雇、降低工资等资本家的攻势越来越激烈。因为金融危机,自1926年以来不断地增加的失业人数更加多起来了。

反抗这种攻势的工人罢工、怠工次数与参加人数,也如第26表所列,1927、1928两年中比前

一年减少了^①。但另一方面，坚持罢工的日数却延长了，参加坚持斗争到十一天以上的工人数和参加斗争全部人数的比率，1926年为36%，1927年为52%，1928年为41%。这说明了不顾严厉镇压而积极战斗，觉悟提高的工人增加了。这一点，也表现在工会组织逐年增加上面。

第26表 劳资纠纷的增加

	罢工 总次数	参加人数	实力斗 争的纠 纷次数	参加人员	工会数	会员数
1925年	816件	89,387人	293件	40,742人	457	254,262人
1926年	1,260	127,267	495	67,234	488	284,739
1927年	1,202	103,350	383	46,672	505	309,493
1928年	1,013	98,278	393	43,337	501	308,900
1929年	1,408	171,668	571	77,281	630	330,985
1930年	2,284	190,300	901	79,824	712	354,312
1931年	2,415	152,161	984	63,305	818	368,975
1932年	2,159	118,137	870	53,338	932	377,625
1933年	1,859	112,516	598	46,787	942	384,613
1934年	1,893	120,307	623	49,478	965	387,964
1935年	1,849	102,554	584	37,650	998	408,662
1936年	1,945	91,570	546	30,857	973	420,589
1937年	2,126	213,622	628	123,730	837	359,290

(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第一回)

1927、1928两年的主要斗争有 1927年5月龟

① 1928年(昭和3年)的罢工次数和工会会员数都比前一年稍微减少，想必是由于同年3月15日以后全国性大镇压(下面叙述)的打击关系。尤其是工会和工会会员的减少，显然是日本工会评议会被解散的结果。

户东洋洋纱工厂五千人的斗争，6月大日本纺织南千住工厂三千人历时一个月以上的罢工，同月以小樽运输工人为中心的全体工人的罢工，7月南海电(气)铁(路)的罢工，8月开始的以芝浦制作所鹤见工厂为中心的京滨(东京横滨)工人历时四个月的斗争——反抗依照京滨地方重工业资本家团体“六乡会”的协定而解雇工人，在评议会领导下建立了京滨地区的工厂代表会议——。1927年9月到1928年4月，野田酱油公司员工及其家属历时二百七十大天的大斗争，1928年日本海员工会反对日本船主协会的斗争(三百五十二艘轮船，停航四日)等。

这些斗争，大部分是评议会、总联会或总同盟以及其他工会所组织、领导，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与工会有关系。尤其是评议会指导部，认为工会必须成为共产党的后备军，要求工会会员应具有与共产党员同样高度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抓住工厂中的各种问题，鼓动斗争。而且它的目标是要将一个工厂的罢工扩展为该产业部门的全体罢工，进而推向全产业的同盟罢工，以及从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然而实际上连同一产业的全体

罢工也没有作到。

农民运动和水平社及其他运动 租佃纠纷也由于官吏以“租佃关系调整法”为武器强制干涉，次数减少了。但其要求重点则逐渐从减免田租转到保证耕种权上面去了。这是农民自发地要求土地革命的表现。

农民斗争以佃农和地主的斗争为基本，同时，也有“村民大会”、“农民大会”的形式，提出有关村民生活的各种问题，有了全体农民和地主、资本家统治体制作斗争的幼芽。青木惠一郎写的《日本农民运动史》中曾列举 1927 年这些“大会”斗争，在北海道、秋田、宫城、新潟、长野、千叶、三重、奈良、兵库、冈山、岛根、香川、福冈各县共发生了三十七次。斗争内容包括：反对米麦检验、确立耕种权、永久减免地租、反对扣押青苗、救济灾害、降低电费、反对提高电车票价、贷给购买肥料的资金等项向地主和垄断资本家的经济要求，以及改革区政、改革村政、农会民主化等反对农村统治体制的斗争。从这种广泛的斗争中农民的先进分子于进一步开始和国家权力作政治斗争。劳动农民党与共产党的影响也波及农村了。

第 27 表 历年租佃纠纷与佃农协会的发展

	租佃纠纷次数	参加佃农数	佃农协会数	协会会员数
1925年	2,206件	134,646人	3,496	307,106人
1926年	2,751	151,061	3,926	346,693
1927年	2,053	91,336	4,582	365,332
1928年	1,866	75,136	4,353	330,406
1929年	2,434	81,998	4,156	315,771
1930年	2,478	58,565	4,208	301,436
1931年	3,419	81,135	4,414	306,301
1932年	3,414	61,499	4,650	296,839
1933年	4,000	48,073	4,810	302,736
1934年	5,828	121,031	4,390	276,146
1935年	6,824	113,164	4,011	242,422
1936年	6,804	77,187	3,915	229,209
1937年	6,170	63,246	3,879	226,919

(根据《土地改革始末概要》)

第 28 表 租佃纠纷要求内容的变化

	减免地租	确保耕作权	其 他
1925年	87%	7%	6%
1926年	83	11	6
1927年	72	20	8
1928年	65	25	10
1929年	63	29	8
1930年	50	40	10
1931年	53	38	9
1932年	40	47	13

(根据《土地改革始末概要》)

随着斗争的激烈化，无产政党的分裂也在农会方面出现了。1927年(昭和2年)支持日本劳农党的“全日本农会”(全日农)与支持社会民众党的

“日本农民总同盟”从日农中分裂出来。日本农会成为支持最左翼的劳动农民党的农会。日农本来最有力量，但它也因1928年3月15日的镇压左翼而遭到重大打击。其后，日农和全日农在5月间合并，重新建立了全国农会（全农），拥有会员十万人。可惜不久也发生了左右的分裂。

在水平社中左翼也有了发展，特殊部落的工人、农民加入工会、农会的也增多了。特殊部落农民是农会左翼中最坚强的成员。反对差别待遇的斗争也发展为废除华族制度、反军国主义、反天皇制的斗争了。例如1926年到1927年福冈联队士兵掀起的反对歧视的斗争，把取消对水平社士兵的歧视作为保证士兵人权要求的一部分，以促进士兵的觉悟，和工会、农会共同进行了工农群众大规模的反军国主义斗争。

很快地便发展为拒绝野外演习士兵借宿民家与退出复员军人会、青年团、处女会、青年训练所等天皇制统治人民、训练人民的机构的斗争。军部当局为了镇压起见，对领导这一斗争的全国水平社中央执行委员长松本治一郎（1884—）等捏造毫无根据的阴谋爆炸福冈联队的谎言，无辜地将

松本等判处三年徒刑。

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 这时期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群众基础也确立起来了。1921年(大正10年)创刊的《播种人》杂志就是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开始。但它还不过是少数进步知识分子的运动,以“反资本主义、反军国主义、国际主义”等模糊立场而出现的。虽在震灾时为反动势力所摧毁,但1925年6月又创刊《文艺战线》,同年底则出现了以文艺战线同人为中心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

至此,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在文化战线上开始结合起来了。但为福本主义的“分离结合论”所害,文化战线上也发生了分裂。1927年6月,共产主义派的“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和退出它的“劳农艺术家联盟”发生对立,而后再分裂为左右两派。继而在1928年5月,左翼统一起来组成“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简称Napf)^①,并出版了机关杂志《战旗》。于是Napf便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中心了。1929年1月Napf的各专

^① Napf系Nippon Artista Proletarian Federation的缩写。——译者

门部成为自己拥有全国性组织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剧场同盟、美术家同盟、音乐家同盟、电影同盟，Napf 被改组为这些团体的联合组织“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团体协议会”（也简称为Napf）了。

Napf 中间以作家同盟和剧场同盟最为有力，它和资产阶级文学演剧相对抗，具有创造与普及新的艺术的实力。《战旗》几乎每期都被禁止发卖，但仍有自己的发行网推广销路。创刊时的发行份数为七千册，半年后超过一万册，1930年1月则达两万册。如和大资本出版社发行数十万册的群众娱乐杂志比较，虽微不足道，但学术杂志普通发行数大约两千—三千册，《中央公论》和《改造》等发行数万册，与此比较，仍居中间地位。

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和共产党的发展 概观上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运动，和过去相比较，有了显著的进步。即第一，更多的群众走向左倾，走向战斗化了^①；第二，更加有组织了，罢工或租

^① 群众的战斗化从下述事实可以窥知：野田酱油公司的罢工斗争，虽是由改良主义者劳动总同盟（工会联合会）负责人松冈驹吉领导，三千多名职工反抗警察、国粹会以及其他强暴力量，坚持达二百十八天之久。为期这样长的罢工斗争，野田以前没有过，野田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没有过。

佃纠纷都是在工、农会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准备和斗争；而且罢工不仅是为了提高工资等经济要求，为了保卫工、农会的斗争也增多了；第三，成为群众性的思想、文化斗争了；第四，群众不仅进行维护日常生活利益的斗争，而且已经发展为政治斗争。它也和过去的普选运动同样，不是追随着资产阶级政党走，而是反对它，团结在自己的无产政党或共产党的周围，展开了政治斗争。

各无产团体于1926年10月开始的解散议会、立即实施普选的请愿运动，连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被卷入了。1927年1月三党党魁举行会谈，决定停止政争的理由之一，就是由于他们肯定了在这种群众运动高潮中，解散议会，再行选举，对统治阶级是不利的。

无产群众的单独的政治斗争，也表现在对华不干涉运动上面。1927年(昭和2年)2月，当日本政府即将干涉中国革命的时候，劳动农民党发动了反对干涉中国革命、立即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运动。继而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向日本的工人、农民和各无产政党发出声明，希望给以积极的援助。劳动农民党立即响应，并号召日本劳农党、

社会民众党也一道进行不干涉斗争。日劳、社民都曾响应，但到了3月，社民党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已显然分裂时，便发表了支持国民党反共的声明。田中内阁成立后第二天，即4月21日，各无产政党和团体组成了“对华不干涉同盟筹备会”，同年的五一节提出了“对华不干涉”的口号。

当政府第一次出兵山东时，尽管政府已经出兵，社民党却说：“假使日本政府有干涉的事实”，便予以揭露。日劳党虽倡坚决反对出兵，但对于实际的群众行动并不热心。又日劳党声明不过问中共和国民党分裂的事情。劳农党则支持国共合作的政权，和评议会、日农、全水、无产青年同盟一起，利用讲演会或在《无产者新闻》以及各团体的机关报刊上继续进行要求撤退中国派遣军的宣传。其力量虽很微弱，而且也没有能够为反对干涉而组织罢工，但它已经不只是少数干部而是群众国际主义思想提高的表现，这一点是具有意义的。

群众这种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同时，群众觉悟的提高又促进了共产党的发展。这期间，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福

本主义和在群众团体背后活动的错误。至于彻底明确这一点,并确立党的方向则在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关于日本的纲领”(1927年纲领)以后。

1927年纲领确认日本的政权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规定当前的日本革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直接转化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当前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下列各项:防止帝国主义战争、不许干涉中国革命、保卫苏联、殖民地完全独立、废除君主制,给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以普通选举权、废除寄生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

1927年纲领彻底批判了山川主义和福本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粉碎了解散主义,规定了党必须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不是在群众团体背后活动,党应公开地在群众中间进行自己的活动。纲领中虽然对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天皇制还分析得不够,给它们的评价过低,但是日本共产党却以此奠定了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工厂的细胞被组织起来,1928年(昭和3年)2月1日创办了秘密的机关报《赤旗》,党公开出现在群众面前。

普选的实施 在国内由于人民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在国外由于干涉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底田中内阁便开始动摇了。

以前，若槻内阁辞职后，政府党的宪政会便在1927年6月和政友本党的主流合并，组成民政党。总裁为出身于财政官僚的滨口雄幸（1870—1931）。建党宣言中写道：“体现一君万民的大义，依照全国民意，期望彻底实行责任政治”，此外则满缀着民本主义的辞句。但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党，而是三菱财阀及其系统下的垄断资本家掌握领导权，与具有资产阶级因素的大地主阶级结成同盟，再加人从政友本党中来的地主、官僚系议员而结成的政党（政友本党派以床次为首，不久，又回到政友会，因为他们只追求利禄，所以不管谁都可以与之离或合的）。这样的政党也不得不以民本主义的辞句为装饰，说明当时民主舆论的强烈。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的垄断资产阶级已有在口头上表现民主态度的雅量了。

民政党看到田中内阁声誉低落，1928年（昭和3年）1月在第五十四届议会上提出不信任内阁案。无疑地这是容易通过的，所以政府不敢付

诸讨论，便先发制人解散议会。结果，第一次实施众议院男子普通选举法。各无产政党也都提出了候选人。共产党选任很多党员为劳动农民党候选人，利用选举，号召人民“打倒天皇制”、“建立工农政府”、“不许干涉中国内政”。警察对政友会的任何违反、收买行动都不予限制，对民政党的竞选运动则大加干涉，压制各无产政党的选举运动，尤其是对劳动农民党，拘留了该党所有的活动人员，几乎每天搜查该党选举事务所，该党举行讲演会，则立刻下令解散，疯狂地加以压制。

尽管如此，结果，政友会当选者共二百十九人，未超过半数，民政党当选二百十七人，无产各派则有八人（其他无所属资产阶级小会派合计二十二）人当选。无产各党当选者中，社民四人^①，劳动农民党二人，日劳和地方无产各一人。无产各党得票合计七十七万一千票，其中十八万七千票属于劳动农民党。

^① 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当选人西尾末广于1948年（昭和23年）6月1日在众议院“非法财产交易委员会”中作证说，他从第一次普选时起，就和陆军有密切关系，接受了因承包陆军建筑工程而发财的资本家大林义雄为“防止赤旗风暴”而送给他的选举资金。

三·一五镇压 在选举中，说明了人民是如何厌恶田中反动内阁，以及人民中间的先进分子是如何支持共产党。不仅田中内阁，整个统治阶级都战慄了。政府于3月15日黎明在一道三府二十七县内逮捕了千数百名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后有四百八十四名被提起公诉）。继而下令禁止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等左翼三团体的结社。

政府更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法案，加重过去治安维持法的处罪，将原来规定徒刑十年的最重刑改为死刑以及其他加重处罪。以劳动农民党议员山本宣治（1889—1929）为首，很多议员曾加以反对。议会外的工人、农民组织固然不消说，连美浓部达吉等自由主义的学者、评论家也起而反对用暴力压制思想。因而议会不得不暂时延搁。于是政府便在议会闭会后，以紧急敕令付诸修订。同时，强化特别高等警察。以凶恶闻名于世的日本秘密政治警察“特高”的全盛时代便从此开始了。

曾以“连绵阴雨后的晴天”来欢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的美浓部教授便叹息道：“看到近来日本的政治情况，不禁使我们感到政治黑暗时代的来

临”^①。正象普选法和治安维持法具有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同时通过一样，普选第一次实施和治安维持法第一次在全国引用以及修改也是同时进行，这并不是偶然的事。

不久，共产党在逃出警察魔掌的市川正一、渡边政之辅等努力之下在全国内恢复起来，年底，《赤旗》也复刊了。被破坏的合法群众团体中的无产青年同盟，立刻重新建立为合法的新青年同盟筹备会。此外，工会方面也拟以原加入评议会的各工会的地方协议会为基础重新建立，但也遭到了禁止。结果，在1928年12月秘密地召开了“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筹备会^②，全国的左翼工会开始团结起来了。据说当时参加组织的人员约为一万二千人。

劳农党的重建问题和四·一六镇压 关于重建劳动农民党，发生很多问题。从共产党的立场看，原认为在共产党之外建立左翼政党是错误的。

① 1928年4月30日《东京帝国大学新闻》上发表的论文，载《现代宪政评论》。

② 筹备会之后正式成立大会之前，因1929年4月16日的大镇压，成立大会一时不能召开，因而把这次筹备会视为成立大会。（渡边彻：《日本工会运动史》）

在建立劳动农民党时，共产党之所以采取积极态度，乃由于建立无产政党的群众运动正在顺利发展中，共产党也不肯放过这机会，想尽可能争取这个党作为共产党的合法活动舞台，以达到其原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民主和生存的统一战线的目的。特别是1927年发表纲领，确定党公开地直接地在群众中活动的方针之后，重建象过去那样的劳动农民党将犯严重错误。三·一五后不久，对这一点尚未认清，就在和共产党未取得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以大山郁夫委员长为中心，进行了劳动农民党的重建工作。当时铃木茂三郎（1893—）等反对新党再以“工农政府”为基本纲领，7月退出，另外建立了无产大众党。大山等虽然组成了“工农党”，但仅仅三日就被解散了。

以后，大山等虽策划组织新党，但这时共产党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是“阶级的群众的唯一的无产政党”，如在共产党之外另建左翼政党，必然成为和共产党对立的组织，便用最尖锐的形容词骂大山等为阶级叛徒，反对建立新党。反对新党是对的，但没有对支持新党的善良群众进行他们所能接受的亲切而耐心的说服——过去对成立劳动农

民党采取协助态度而现在反对新党，其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应当对他们坦率地充分说明。但大山等终于在11月组成了“工农党”（不到一年党内也有人认为毋须建立这样的党，以河上肇为首，掀起了解散运动）。

铃木等的“无产大众党”，在同年12月和日劳党、日本农民党以及地方无产政党合并，成为“日本大众党”。但不到半年，1929年5月又分裂了。合法无产政党即社会民主主义各政党的离合集散甚为频繁，这里不准备一一叙述。社民党虽比较“稳定”，但它对于多少具有左翼倾向者陆续予以开除，成了总同盟干部与工人贵族的地盘，纯粹反共的议会主义的政党。

这一时期，也在继续加紧镇压共产党。1928年10月6日，党书记长渡边政之辅在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回国途中，在台湾基隆港上岸时，遭警察袭击，中弹身死。继而1929年3月5日旧“劳动农民党”选出的议员山本宣治——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忠实地执行共产党的指示在议会中奋斗——在东京旅馆中被法西斯青年暗杀，举行工农葬时，参加葬礼的工人当场被逮捕。

这是更大的暴风雨的先声。4月16日，再在全国追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不屈的革命家市川正一就是在这时被捕的。

三·一五和四·一六以及中间的搜捕（1928年10月国领伍一郎等被捕），使过去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家、有经验的领导者，几乎全部牺牲了。使日本革命运动不能得到积累经验的继续一贯的领导，因而受了很大的阻碍和创伤。但是共产党没有屈服，新的干部相继产生，站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前列，为了反对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战争，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和生存而继续斗争着。

第三节 经济危机

滨口内阁和协调外交 田中内阁推行了露骨的军国主义与反动政治，以致连培养天皇制官僚最高机关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也叹息说是黑暗政治时代。然而缩短了田中内阁寿命的也正是这种黑暗政治。因为炸死张作霖的作法过于笨拙，田中内阁遭到内外的攻击，于1929年7月全体辞职。田中借枢密院和军部的力量，以反议会

主义的手段，推倒若槻而组阁，但是他的垮台，不是由于议会通过不信任案，而是由于宫廷和军部的不信任，这就暴露了日本议会政治全盛时期的实质。

代之而起的是滨口雄幸的民政党内阁。外务大臣为币原喜重郎。这任内阁以协调外交、紧缩财政、产业合理化、黄金出口解禁为基本政策。

因为前任内阁露骨的军国主义政策完全失败了，接手的无论是谁也不得不采取稍微缓和的政策，币原外交就是顺应这种舆论而形成的。尽管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非常不得人心，但在1930年（昭和5年）2月的总选举中，民政党却获得了压倒的多数（二百七十三名）。这主要原因，虽由于处在政府党的有利地位和和金融资本大力援助下有雄厚的选举资金，但与政友会内阁的军国主义比较，这任内阁表面上的“和平”政策得到人民的支持，也有关系。

这时期，世界上要求裁减军备与和平的呼声普遍高涨。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也为这种舆论所迫，避免军备过大，造成财政困难；更由于各国相互钩心斗角，想尽可能地裁减对方的军备，使本国军备

处于相对的优势。1927年日、英、美三国在日内瓦又举行海军裁军会议。这次会议由于三国无意妥协而告决裂。

次年,1928年8月,美、英、日、德、法、意等主要国家在巴黎缔结了关于解决国际纠纷不诉诸战争,并“各用其人民的名义庄严宣言”^①抛弃以战争作为行使国家政策的手段,国际纠纷不问其原因如何,只以用“和平方法”解决的条约(非战公约)。当时田中内阁也在条约上签了字(另一方面很快地违反了非战公约的精神出兵山东)。

到了滨口内阁,1930年2月起在伦敦召开了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日本政府派若槻礼次郎为首席全权代表,财部彪(海军大臣、大将)为副,出席会议。日本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大型巡洋舰保持对美十比七的主张,同意十比

① 民政党抓住“用人民的名义”几个字,认为这“违背日本的国体和宪法”,攻击政府,并煽动右翼,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国体问题成了政争的工具,与治安维持法的规定镇压变更国体运动有关。政友会反击民政党说,这个党名就是违反国体思想的表现;而反国体的“民政”党,则攻击政友会政府为违反国体。两党都给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后来的“国体明征(正义)”运动开辟了道路。因为有这种攻击,政府在批准非战条约时,以“人民的名义”不适用于日本而采取了保留态度。

六及其他和美英妥协的方案。海军军令部坚决反对这种妥协，以关于兵力的决定，不得统帅部的承认而擅自规定，是干犯天皇大权的行为，攻击政府。枢密院也倡同样的论调。

然而滨口内阁，坚决予海军和枢密院以反击，终于签订了这个条约（4月），并由天皇批准（10月）。这在当时日本政界说来，需要很大的勇气。众议院中的压倒多数和垄断资本的支持，鼓励了滨口内阁。滨口首相不久被军部煽动的法西斯蒂青年狙击（11月），并因伤致死。

这一点，虽然意味着天皇制内部的垄断资本家利用反军国主义的舆论，政治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但这也正由于对手是海军——和财阀尤其是与三菱财阀关系很深的海军——滨口内阁才能做到这一步；对于陆军则丝毫不敢触动。

紧缩和合理化以及黄金出口解禁 为了导入美英资本，协调外交暂时是必要的。对于减轻直接军事费，以积累近代军备基础的产业资本也是必要的。它和滨口内阁所谓紧缩财政合理化以及黄金出口解禁三位一体的财政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为了紧缩财政，政府对于前任内阁所编制并已实施的昭和4年度（1929年4月—1930年3月）预算（总数十七亿七千四百万元）也改编成紧缩了一亿四千八百万元的实施预算。昭和5年（1930年）度的预算，比前一年度的实施预算再紧缩了七千余万元，并停止了既定计划内规定发行的八千五百万元公债（1931年度预算更加紧缩，岁出总额订为十四亿七千万元，为最近数年内的节约预算。紧缩预算所节减下来的部分，主要用为偿还公债的基金，几乎没有减税）。这种收缩通货政策，压低了物价，提高了公债价格——国债的40%以上掌握在普通银行手中——，其目的是为了积累资本，储备黄金解禁的基金。

作为政府“紧缩”开支的一部分，1929年10月计划将月薪百元（年俸一千二百元）以上的官公吏、军人的薪金减低10%。对此首先起而反对的是检察官和推事。可见他们也不满意减薪。又在1931年（昭和6年）5月，打算将中央、地方的全体官公吏以至小学教员的薪金津贴一律减低10%，并进行人事的整编。国营铁路、邮电的四十万工人群起反抗。而上述那些检察官、推事却立刻准备

好镇压体制。由于国营企业工人的斗争，这次减薪终于将月薪不满百元的除外，并规定人事整编也只限于自然淘汰。

政府的减薪和人事整编，加速了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裁员的攻势。所谓产业合理化，就是以裁减工人、提高劳动强度，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资本主义各国自从进入相对的稳定期以来，都实行这样的合理化。滨口内阁也企图把过去屡次实行过的再系统地彻底地加以强化。也就是将中小企业整编为替垄断资本加工，不肯就范的就只有走向破产。合理化的结果，例如纺织业，每万纱锭的女工数，1929年为二百十九人，1930年为一百八十九人，1931年则为一百六十九人，这样的逐年减少着。裁减大批人员，同时，并降低工资。

黄金出口解禁是以紧缩和合理化为前提的，并进一步推广了它。黄金解禁虽是垄断资本家渴望已久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得实现（参阅第六章第五节）。尤其是黄金解禁必然会从通货膨胀政策转变为紧缩——通货收缩政策，这样一来，会给因通货膨胀政策而挽回危局的财界以打击。因而在黄金解禁之前，必须通过垄断资本对财界进行

适当程度的整理。

1927年的金融危机就经过这种“整理”，巩固了垄断资本对金融和产业的统治体系。因此，已可以实行黄金出口解禁，毋须再担心它会给垄断资本以打击。以财政寡头为首，几乎所有的垄断资本家都一致这样主张：必须趁早从通货膨胀转入通货收缩政策，降低物价，增加出口，开辟导入外资的门径，促使公债上涨，进一步整理财界。

滨口内阁根据垄断资本家的要求，1929年（昭和4年）9月，事先宣告从明年1月11日起实行黄金出口解禁。为此，乃实行了收缩通货和合理化。政府虽然也清楚地知道这会给一般人民造成很大的苦痛，但藏相井上准之助（1869—1933）却欺骗人民说：“为了大局不得不暂时忍受痛苦”。

世界经济危机 由于收缩通货，加速了经济危机的来临，严重的萧条袭击了城市和农村。正在这时，1929年10月美国从证卷交易所开始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的稳定，原来充满着矛盾。它是用通货膨胀和合理化、加强对本国工人以及殖民地、落后地区人民的剥削而造成的。因而在

稳定期失业者就不断增加，使殖民地人民陷于贫穷衰落。加之，那里的民族资本成长起来了，开始和帝国主义发生竞争。即在稳定期生产力发展的背后，市场在相对地逐渐缩小。而且面积占地球六分之一拥有一亿数千万人口的苏联脱离了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市场更加缩小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市场的矛盾，在稳定时期反而增大，终于不得不爆发了。

美国在第一次大战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欧洲各国输出庞大的资本和商品，沉醉在“永远繁荣”的幻想中。经济危机爆发前七个月，胡佛就任总统后还说这样的梦话：“目前贫困正在逐渐消灭”。与此相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在1927年12月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预见到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说：“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从生产增长，贸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范围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仍旧相当固定的情况中，——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从局部

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①

果然从 1928 年起世界经济显明地呈现了生产过剩的苗头。1929 年 10 月世界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立刻弥漫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战后资本主义相对的稳定告终。生产激减如下：

第 29 表 经济危机中生产的激减

	苏 联	全部资本主义国家
1928年	79.4	93.7
1929年	100.0	100.0
1930年	129.7	87.1
1931年	161.9	73.1
1932年	184.7	62.2
1933年	201.6	61.7

(根据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史》)

从 1929 年到 1933 年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与危机前的繁荣期比较，煤的生产量减低

^①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234 页。

了41.7%、铁79.4%、钢铁76.3%，棉花消费量减少了31%。德国和英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后退到1896年和1897年的水准。物价平均比经济危机前降低了50%，远远突破了过去经济危机史上的下降率。

第30表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指数
(1913年=100)

	1929年 危机前最高数	1932年 危机的最低数
全部资本主义国家	150	84
美 国	182	81
英 国	104	70
德 国	108	51
法 国	144	92

(根据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史》)

深刻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世界农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的货币、信用危机，无异火上添油，使之更加严重了。1931年9月，英国被迫取消了金本位制。世界贸易从1929年到1933年缩减了三分之一，股票价格在同一时期内平均降低到30%以下。而这些事情凑在一起，使经济危机引起了过去发生危机时所不曾有过的世界性的货币

贬值、停付外债、资本输出激减等现象，它又使危机深刻化、持久化了。

数千万失业者流落街头，劳动条件也极端恶化了。在美国，危机前估计有一百六十万失业者，1933年则超过了一千四百万人，其间，实际工资减低到50%以下。农民、殖民地人民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价和增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当失业群众携着盆子排着长队去领救济面包的时候，另一方却烧毁了大批小麦。

日本的经济危机 这种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已经濒于危机状态的日本资本主义受到根本的动摇。1931年(昭和6年)3月工业生产指数和1929年同一时期比较，煤从三三六减少至二九二，棉纱从一七三减少至一五六，生丝从二〇七减少到七六。贸易方面，从1929年6月到1931年6月，输出总额剧减了37.3%，输入总额剧减了40.3%。1931年6月批发物价指数和1929年同时期比较，五金从一一八点三激减至七一点九，纺织品及其原料从一七五点三激减至一一七点六，粮食从一六四点七激减至九九点六，其他食品从二〇五

点六激减至一五三，总平均则从一七四点五激减至一二〇点四。暴落得特别激烈的即依靠美国市场的生丝，从1929年最高价的一千四百元降低到年底的一千一百八十元，1930年，尽管政府实行了担保贷款一亿零五百万元，努力防止价格降低，但从年初的一千一百元到10月跌到五百元，仍降低了50%以上。

第31表 银行、公司资本额增减表

(单位:百万元)

	新设、增资	减资、解散
1926年	1,448	773
1927年	1,305	754
1928年	1,288	891
1929年	1,152	596
1930年	731	935
1931年	796	836
1932年	540	551
1933年	1,327	733

(根据《帝国统计年鉴》)

经济危机使中小资本家受到牺牲，使工人遭受最大损失。基础薄弱的公司相继破产。1930年被解散的公司有八百二十三家，减资的达三百十

一家。从股本额来看，1930年至1932年减资解散的比新设增资的还多些。

工人的工资有如第32表所列，定额工资(固定日薪)和实际工资(包括加班费及其他增加的工资)都降低了。女工尤甚，实际工资降低得更加显著的是大部分雇佣女工的纺织业和缫丝业。这是由于遭受严重危机，资方将其损失转嫁到女工身上的关系。例如钟纺，1930年工资虽减低了10%，而股东仍然得到28%的高额利润。

第32表 定额工资和实际工资的指数
(1928年=100)

	总指数		男		女	
	定额工资	实际工资	定额工资	实际工资	定额工资	实际工资
1929年	98.6	130.9	98.6	102.6	97.4	96.4
1930年	96.2	98.7	96.2	97.3	94.0	87.4
1931年	91.3	90.9	91.5	92.0	87.9	77.4

(根据《金融事项参考书》前引《日本危机史论》)

一个成年男工日薪约一元五角到两元，工作八小时甚至十小时以上。但只要能找到职业，还算幸运。由于中小企业倒闭、大企业实行裁员，就是根据政府统计的失业者，1930年6月调查人口

七百万中，完全失业者就有三十九万五千人，1932年7月七百二十万人中就达五十万五千人。实际上失业“归农者”（因失业回农村，事实上是失业者）的数目从1930年到1932年估计就有三百万人。

**第33表 经济危机时期
东京批发物价指数的变动**
(1926年=100)

	平均物价	米	生丝	棉纱	铁	煤
1927年	94.9	93.4	84.5	94.3	95.3	107.3
1928年	95.5	82.1	31.2	100.8	102.8	103.5
1929年	92.9	77.1	80.7	98.8	103.9	100.0
1930年	76.5	67.4	53.1	62.7	76.5	81.9
1931年	64.6	48.9	36.7	53.3	61.4	81.9
1932年	68.1	56.1	41.5	60.0	76.5	77.1

(根据《日本危机史论》)

与经济危机同时，又发生了农业危机。1930年春夏间，随着生丝的暴落，蚕茧也开始暴落，蔬菜一直在暴落着。10月2日发表第一次米的预计收获量为六千六百八十七万石（比过去五年平均增加12.5%）之后，米价急剧下降，次年的定期米价格已从7月最高价的每石三十元零三角暴

落至十六元（比同年每石成本的二十七元八角还降低了十元），至10月底则下降到十四元，出现了惊人的贱价。于是便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丰收饥馑”。农产品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差尤为悬殊，如以1926年为一〇〇，从米、生丝、棉纱、铁、煤的价格指数中就可以看出米和生丝价格低落之剧和恢复的迟缓了。

1931年（昭和6年）由于东北、北海道的大歉收，一般农民的惨状真非言语所能形容。逃亡、饿毙、全家自杀、偷盗抢劫、出卖女儿等事不绝于耳。农民为饥馑所迫，在降雪期即将来临之前，去山野挖掘蕨菜根，将马铃薯、葛粉、糠拌在一起，作为日常食品，勉强维持生命。竟发生没有饭盒——不论是麦饭或甘薯——的缺食儿童，偷窃小朋友饭盒的惨事。

日本的农业危机蔓延到朝鲜去了。朝鲜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粮食供给地被强迫种稻，即典型的殖民地型的单一作物栽培（Monoculture）。现在朝鲜米的输入，和本国农业发生尖锐的矛盾。1934年（昭和9年）朝鲜终于停止了1920年以来强迫施行的米谷增产计划。既无土地、又无职业，

种了稻自己也吃不到的朝鲜农民，大批地流浪到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方面。他们为了寻求生路而来日本，又遭受侮辱、迫害。朝鲜国内农民愈益贫困化，离开土地，走进山中去做火田民^①的年年增多，1928年有三万四千户，1937年则达二十八万户。

经济军事化的方向和地主制的变化 经过经济危机，垄断资本的统治力量愈益发展。卡特尔从1929年的二十一个，1930年增至三十一个，1931年又新建立二十三个。在钢铁、缫丝、啤酒、北洋渔业、汽车工业等部门中则发展了托拉斯——比卡特尔更加厉害的垄断组织。政府在产业合理

^① 原始时代地广人稀，农民最普通的耕种方法，即放火燃烧野草、荆棘、树木，就地播种作物，不知施肥。《晋书·食货志》上有“往者东南草创人稀，得火田之利。”白居易《东南行》中也有“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之句，可见我国古代亦系用火田法。日文“畑”字，亦起源于火田。但火耕对土地的破坏力很大，数年土地即荒瘠，不能再种，所以农学书上称为“掠夺农法”，早已摒弃不用。日本并吞朝鲜后，强夺民田，租税又奇重。朝鲜人民不堪压迫，只好逃往山上做火田民。数目逐年增多。他们秋季烧山，翌春解冻后，土地潮湿，动犁翻土，进行播种，主要作物为粟、荞麦、玉蜀黍、薯类等。不锄草施肥，荒瘠后，另找适宜于火耕的土地。过自给自足的流动生活，常以野果、草根充饥，其惨可知。——校者

化的名义下强力推行卡特尔，并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中小工业的工业协会法、对出口业的出口协会法。重要产业统制法是以国家权力强化大财阀对主要产业的统制力。根据这个法律，1931年8月设立了统制委员会，由官僚、贵众两院议员以及垄断资本家组成。连《每日新闻》也批评它是“吃小虫以养活自己的大虫”。“如果批评统制委员会为资本家的御用机关，想亦无法分辩”。

这样结成的卡特尔，也是由“大虫”中的“最大虫”——大财阀掌握着领导权，制定价格协定、生产限制协定、输出协定等，企图摆脱危机。尤其是为了维持价格严格限制生产。比以前任何经济危机时期，产量都大大地减低了。而且减产期也比过去都长，过去至多也不过半年或十个月，这就是两年以上也不能恢复生产的主要原因。

卡特尔化的过程，同时也开辟了经济军事化的途径。滨口内阁的协调外交和裁军，它本身就意味着产业、经济的军事化，建立“总力战”体制的基础。田中内阁所设立的内阁直辖的资源局，到滨口内阁时才开始实际活动，其设立的宗旨，是充分认识到偏重兵力的国防观念已经落伍，现在的国

防已不是单单讲军事，而是国力对国力的斗争。为此，于是实行对资源的统制运用，后来发展为企划院——战争经济参谋本部。又滨口内阁成立之初，便继承了前内阁的计划，在京都、大阪、神户地带举行国家总动员演习，进行了战争产业动员、空袭下维持军需生产以及军需品筹措、运输的训练。

在“紧缩财政”下，陆海军的绝对数虽多少减少了些，但其经费在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则增大了。此外，贸易虽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受了重大打击，但在输入贸易中有关军需费所占比率，1928年时为39%，而1929、1930年则增长到41%（土方成美：《财政史》）。重工业则侧重于战车、舰船、飞机、汽车的生产及其基础的建设。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开始前不久，三菱飞机制作所刚刚完成了国产重轰炸机的生产。以国产战车等装备的机械化兵团，也是在1931年夏天建立的。立刻能转化为炸药、毒瓦斯制造的化学工业、人造肥料、染料工业等，尽管在危机中仍有了发展。而这些产业都受到上述统制法的统制。

垄断资本家就这样利用经济危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国家权力，以牟取最高利润，并加强

他们自己对产业界的统制力。

以危机时期为分界线，农业方面的生产关系也多少发生了变化。

农户总数，以 1932 年（昭和 7 年）的五百六十四万二千户为最高峰，1933 年起每年在减少着（1940 年五百四十八万户）。其中经营不满五反的农户，从危机之前连续下来，愈益减少着。经营五反以上不满一町的农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多少有些增加，但以 1932 年的一百九十三万三千户为高峰，以后则迅速减少（至 1941 年止减少了二十八万五千户）。又经营两町以上的农户——原来就少——继续减少着。只有经营一到两町的农户，从 1932 年到 1941 年增加了二十二万八千户（由一百二十四万三千户，增至一百四十七万一千户）。

关于土地占有情况，以 1932 年为分界线，五反以上至三町的各层农户增加了。（在这以前，五反以上不满一町的数量增加了，一町以上也同样是减少了）。把这和一到两町经营的增加联系起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寄生地主制的停滞，土地占有的分散，就更加显著，可以看出中农比以前更加

增加了。这种倾向是随中小地主很多收回出租土地改为自己经营而来的，因而以中小地主为对象，围绕着确保耕种权，到处发生了租佃纠纷。

经营一到两町农户的增加，并不是说这个阶层的经营具有稳定的发展性。这种经营，几乎主要是依靠家族劳动，遇歉收时，家族生活降到极低的程度，才能勉强维持，如果再进行扩大经营、增多雇工、增加投资等，就经不起经济变动。

农家自给自足的经济愈益破坏了。肥料也须购买以硫酸铵为主的速效性化学肥料，现金支出也就随之增多；另一面，以增多现金收入为目的栽培蔬菜、水果、饲养家畜家禽的也增多了，即农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更进一步加深，但与两町以上的经营没有增加所明显表现的情形一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极困难的慢性农业危机下，使农民的负债日益加重。

第四节 总危机的加深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当资本主义各国陷入经济危机时，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没有危机

的忧虑，生产力在飞跃地发展，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了工人、农民、一切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

帝政时代的俄国，本是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加上从帝政末期到革命后受了长达七年的大战、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战争的破坏、以及经济封锁的创伤，困难达到了极点。苏联就是从这种困难状态中出发的。1921年，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除缴纳实物税外自由出卖剩余的农产品，并在一定程度内，允许私人资本的工商业活动。资本主义各国看到这种情况，非常高兴。以为社会主义不过是空想，俄国也不得不退回到资本主义。但是由于经济基础部门的基本生产手段、大企业、矿山、交通机关、银行、国外贸易、土地等已经变成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所有，又有与农民结成了巩固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来领导经济建设，使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压倒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残余。

新经济政策时期至1925年告终。1926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经济进入全面确立的阶段。因此，从1928年起实

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正当资本主义世界为经济危机所苦的时候。它远远超过计划，四年零三个月便胜利完成了。以1929年为一〇〇，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到六三，相反，苏联上升到一八五。

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跃进为赶上英国，成了欧洲第一工业国，仅次于美国而为世界第二工业国。大多数企业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同时，农业也基本上社会主义化了。富农阶级被消灭，农民贫困的根源也永远消灭了。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都获得了胜利。继而从1933年起，胜利地进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时期，同时，也就是人们都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时期。这对资本主义各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斗争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和鼓励。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化 欧洲的工人运动，以1926年英国煤矿工人的同盟罢工为先声，奥地利、德国、法国等相继进入新的高涨时期，

随着经济危机，斗争更加激烈化了。特别是德国，由于凡尔赛体制被战胜国压榨，和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也最大，革命运动便发展起来了。1930年9月大选中，德国共产党获得了四百九十万票。为了压抑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希特勒率领的国社党(纳粹)在德国以及美英垄断资本家的援助下壮大起来了。

西班牙自1930年的工人斗争以来，革命运动获得很大的发展，1931年4月终于推翻王政，建立了西班牙共和国。

1930年3月共产国际所号召的反失业斗争日，美国也举行了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反失业大示威游行，参谋总长麦克阿瑟(后日的日本占领军美军总司令)所指挥的部队用刺刀和催泪弹镇压游行队伍，发生了搏斗。

殖民地、半殖民地连相对的稳定也没有出现过，——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相对的稳定是由于加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从经济危机时期起，反帝的民族斗争更加高涨起来。

英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从1929年

2月起，工人、农民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大罢工、示威游行。12月底，印度最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全印度国民会议派，根据领导者甘地的提案，通过了独立的决议案。在英国当局残酷的镇压下，印度的独立运动虽暂时转入低潮，但从1931年起，运动重新高涨起来。1932年英国实行逮捕甘地以下八万人的狂暴镇压。在这激烈斗争中，印度工人阶级的先锋、全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领导核心、印度共产党在1933年底诞生了。

在法国的殖民地越南，1929年越南共产党建立起来了。以共产党为先锋，1930年2月，在安沛掀起大规模的反法起义，在胡志明领导下，组成了反帝民族统一战线。

北非的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势力增大，1930年在开罗、苏伊士、塞得港等地掀起了反英暴动。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斗争中，对于以后的世界历史特别是日本历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中国。关于中国的民族斗争当在下面叙述。

纳粹独裁的建立 面临这样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的时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面加强它的

反动统治,同时,帝国主义间关于重新分割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也更激烈了。而且同时,所有帝国主义共同仇视苏联。在这种国内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斗争以及反苏斗争中,采取激烈攻势的是危机特别深刻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

德国垄断资本家为了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争取重新分割市场和殖民地,1930年至1932年期间,给最凶暴的法西斯蒂党^①的纳粹党开辟了扩张势力的道路。德国共产党从1932年4月以来虽屡次向社会民主党提议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每次都被社会民主党所拒绝。不过这个提议却在工人群众间得到了反响。结果各地都出现

^① 法西斯主义出自意大利语 Fascio (团结)一词。1919—1920年时,意大利以工人阶级为中心,掀起了强大的革命运动,意大利的资本主义濒于崩溃。这时墨索里尼在军部和资本家的支持下,建立“Fascio di Combattimento”(战斗团)党,以暴力破坏革命运动。1922年终于夺取了政权。以后数年内,完成了墨索里尼及其率领的法西斯党的专制暴力独裁,完全否认议会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的实质就是当民主形态濒于不能继续维持统治的危机时,垄断资本集团中最反动的、最排外的、帝国主义分子实行露骨的暴力独裁。自此以后,对于具有这样实质的统治体制叫做法西斯主义,以法西斯主义为宗旨的运动叫做法西斯运动。德国的纳粹独裁是最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如上,但其表现形式各国不同。

了反法西斯的统一行动。1932年10月大选中，纳粹党虽仍居第一位，但一下子失掉了二百万票，社民党也减少了七十万票，与此相反，共产党则增加了六十万票，共得约六百万票（约为纳粹所得票数的一半）。

德国的统治者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趋向共产主义，为了阻止起见，认为过去利用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已经不够应付，“需要建立军事独裁”^①。于是在1933年1月底，总统兴登堡便任命希特勒为首相。希特勒政府在2月27日晚上，自己放火烧毁国会大厦，捏造谎言说是共产党暴力革命的信号，在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借口下，以总统紧急敕令解散共产党，并停止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

到了这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及其领导下的劳动总同盟的领导者仍然拒绝进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反纳粹势力的统一斗争。他们认为只要不和共产党站在一条线上，高喊反共，希特勒政府就会允许自己存在。但是希特勒在破坏共产党

^① 德国资本家团体“德国工业联盟”机关报（1932年9月）的话。引自巴姆·达德的《法西斯主义论》。见井上、铃木、小此木合著《日本现代史》。

之后,接着也破坏了社会民主党和总同盟,并进而禁止纳粹以外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

纳粹虽然在口头上玩弄社会主义的辞句,欺骗群众,但一开头便视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为正面的敌人而加以迫害,更猖狂地诽谤苏联,公然要掠夺苏联领土,露骨地表现了德国垄断资本的要求;同时,并以担任美英及其他世界垄断资本反共反苏的先锋来求得支持。纳粹党取得政权后并未作任何社会主义的事业;相反地,它强调着“全体主义”(不是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德国全体人民的利益)或“公益优先”等美名,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而使人民遭受损失。

在反共反苏的同时,纳粹猛烈地攻击凡尔赛体制,利用苦于凡尔赛体制的民族感情,驱使德国人民走上军国主义和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美英期待纳粹的军国主义指向反苏战争,容忍纳粹破坏凡尔赛体制。纳粹宣传说:“唯有日尔曼人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认为现在德国的苦难,是犹太人造成的。把反犹太主义和反苏反共及反凡尔赛体制的宣传结合在一起,残酷地迫害德国犹太人。其实这不过是转

移德国人民对垄断资本的不满而已。纳粹统治期间被虐杀的犹太人达六百万人。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作家托马斯·曼只因为是犹太人的关系，也遭纳粹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

纳粹就这样的压制德国人民，欺骗德国人民，重整军备，扩充军事工业和强行经济军事化——获得美国垄断资本的援助——。以1934年合并奥地利计划为首（当时失败了），不断地破坏凡尔赛条约，公然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

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者一方面加紧残酷地压制经济危机下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另一方面于1930年确立了对北非的黎波里地方的统治。仿照纳粹实行经济军事化和备战。1934年第一次侵人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日本抢在其他一切国家之前，1931年9月就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这将在下一章叙述。

美国的新政和渥太华会议 当日本、德国、意大利猛烈进行侵略战争时，美国和英国的垄断资本家虽然也加强了反动统治，进行备战，但由于它利用在世界上的金融支配和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和日、德、意比较，还保持着民主的

外形。

在美国，1932年秋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罗斯福当选，推行了新政。内容虽含有社会政策的因素，但本质上是用国家的强权进行为垄断资本谋利益的统制经济。由于政府决定工资、工作时间和对劳资纠纷实行半强制的调停，加强了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根据这种新政策，1934年，美国重要公司的利润比1933年增加64%。但是人民生活几乎没有好转，工人运动从1934年至1935年空前高涨。

对外方面，罗斯福政府于1933年11月承认苏联政府，其目的在以对苏贸易求经济利益；同时，牵制在远东已开始侵略中国的日本，使日本和苏联对立。又对于中、南美各国实行所谓“善邻政策”，改变过去那种露骨的军事压迫政策，以资本的力量把英国势力从中、南美驱逐出去，企图独霸美洲大陆的市场和资源。另一方面，在1934年的预算中，将军事费增加到平时的最高额，加强反苏宣传，对于日、德、意的侵略政策，则期望他们攻击苏联，镇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在和美国垄断资本利益不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助长其

侵略。

英国统治阶级对人民未作任何让步。他们在加强对本国工人的镇压。同时，1932年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召开大英帝国会议，加紧剥削广大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迫使做经济危机的牺牲品，并提高对帝国属领以外各国货物的进口关税。此外，英帝国主义从1917年起，一贯是世界上反苏政策的总司令。英国统治阶级扶助法西斯主义国家，并援助世界一切反苏、反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 帝国主义各国，无论是日、德、意或美、英、法虽然在反苏反共以及反民族斗争上面是一致的，但是一方面拥有广大市场和殖民地的（英、美、法）要求维护现状并进而扩大；而另一方面感到市场和殖民地不足的（日、德、意）则要求重新分割，它们互相高筑关税壁垒，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经济圈等，因而加深了相互的对立。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第一次大战后更加不平衡了，例如日、美、英三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和输出发展的速度，如下表所列，有了很大的不同，以日本的发展为最快。但是日本帝国主

义，没有美国那样广大的国内市场和对全世界的金融支配力量，也没有英国那样的广大殖民地，因而强烈地要求海外市场 and 殖民地。这样就走上侵略中国，加深了和中国民族的对立，和英、美的对立也尖锐化了。围绕着中南欧和非洲的市场，德、意和英、法间也和日本与英、美间同样发生了冲突。

第 34 表 日、美、英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

	工业产值指数			输出额及其指数(单位百万美元)		
	日	美	英	日	美	英
1913年	100	100	100	311(100)	2,448(100)	2,556(100)
1925年	222	151	87	910(293)	4,819(197)	3,734(144)
1929年	297	170	99	969(312)	5,157(211)	3,549(139)
1936年	450	150	115	463(149)	2,416(99)	1,297(49)

这样，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立加深了，军备竞争激烈了，——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 35 表 日、英、美直接军费(公布部分)的增加
(1912—1913年=100)

	日	英	美
1928—1929年	259.1	147.0	235.7
1932—1933年	343.9	133.3	238.7
1934—1935年	471.9	147.1	278.1
1937—1938年	706.2	374.0	325.0

(根据瓦尔加、孟德里逊著，堀江邑一译《关于帝国主义战后的新资料》)

第八章 中日战争和 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第一节 侵略中国东北

劳资纠纷和共产党 在经济危机下，日本的阶级对立也尖锐化了。三·一五和四·一六的连续大镇压，虽然使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受了很大的创伤，但由于滨口内阁的紧缩政策、产业合理化政策以及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使遭受损失的劳动群众争取生存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1929年的劳资纠纷有一千四百二十次，1930年增为两千二百九十四次，参加人员达十九万人以上，打破过去的最高纪录。1931年发生两千四百一十五次，参加人员达十五万四千余人。其中有1929年底到1930年的东京市电车工人的两次罢工，以及横滨船坞、芝浦制造所等的大规模斗争。此外，工会组织较晚的纺织工业中，也连续

发生反对合理化、反对裁员的激烈罢工。

东京市电业局的工人，于1929年6月组成了“东京交通工会”（东交），会员达一万五千人，是当时最大的工会。1929年12月，东京交通工会掀起了反对降低奖励金和停止定期增薪的斗争，6日实行罢工，但由于工会干部怕镇压而发生动摇，屈服于警厅的调停，7日复工。以后批评工会干部的呼声高涨，全协系的左翼势力增大了。1930年4月，重新掀起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举行为期五日的全市电车、公共汽车完全停车的大罢工。与此相呼应，东京、大阪、横滨的电车、汽车工人也展开斗争！开始了全国同一产业部门的共同斗争。

这次斗争也是由于右翼干部的妥协活动和警察的凶暴镇压以及青年团破坏罢工、代行开车等而陷于困难。与此相反，左翼虽勇敢忠实地进行了斗争，但因号召对叛徒施以坚决的红色恐怖，或破坏电车、汽车等，致被这些极“左”的口吻所驱使，未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斗争终于失败了。

在市电罢工的同时，钟渊纺织公司东京总公司以及大阪、淀川、京都、兵庫各分厂以女工为主力，约一万名工人一齐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反对

公司把经济危机的损失转嫁在工人身上，一下子将工资降低 40% 而引起的。罢工曾波及岸和田以及其他纺织厂，虽然很可能发展为纺织业全国性的斗争，终因工会干部被镇压所压服，或为金钱所收买而失败了。

钟纺斗争失败后不久，6 月东京龟户的东洋洋纱工厂两千六百名女工掀起了反对缩短作业来代替裁员、歇业的罢工。这个工会虽属于工会同盟系统，但全协也争取了一部分女工。她们的团结和斗争力很坚强。她们被解雇回到农村中去也无法生活，因此，虽然警察和暴力团用日本刀袭击她们，依然坚强抵抗，在龟户街头几乎演成“市街战”。街上居民也支持她们的斗争，附近的大岛制钢、城东电车以及其他工人也起而与之共同斗争，发展成为地区同盟罢工。斗争达两个月之久，因工会领导者在凶暴镇压越来越紧的时候，停止了示威游行和在龟户召开的群众大会，以及叫女工离开宿舍分宿于工会干部家中等，使斗争力量分散，终于惨败了，工会也被摧毁了。

失业者的斗争，最初也是自发的，但从 1931 年（昭和 6 年）夏天起，在东京以职业介绍所为单

位，建立了失业者的组织；同年底，大阪也出现了同样的组织。

经济危机时期的工人斗争不仅次数和参加人员增加，而且斗争有时越出一个公司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产业部门。这一点，也说明了阶级斗争新的发展。随着垄断资本生产的积聚和集中，工人的斗争必然也相应地带有联系全国同一产业的性质。产生产业别工会组织的客观基础就在于此。此外，斗争一开头就受到警察的镇压，工人被迫不得不与他们抵抗。不仅全协，连中间派的日本工会总联合会也于1931年1月主张工人必须有自卫团。

共产党看见工人的急进化，同官宪激烈冲突，有同盟罢工的可能性，以及下面所述农民斗争的急进化，和1929年11月高知县沿岸渔民两万人反对大资本用轮船拖网捞鱼破坏他们的生活，而包围县府三天要求禁止等情形，便错误地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尽管遭到四·一六的镇压，而共产党却在7月重新恢复组织，机关报《赤旗》也复刊了，表现出有那么强的实力。但是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者几乎

全部被捕，而缺乏经验的新干部，必须重新展开斗争。因此，由于领导没有连续性，不能对过去的成功和失败进行严肃的自我批判，充分接受其教训。例如，党和群众团体不应混同起来，二者必须有正确的关系。渡边政之辅在三·一五之前不久，已经在他的自我批判论文中明确指出，然而四·一六以后群众团体的领导者方面几乎没有接受这一教训。党内的民主主义也没有确立起来。

因此，1930年前半期，由于共产党对于当前的情势有了前面所述幻想的评价，在战术上便犯了“左”倾。在只争取到极少数工人的情况下，就号召全产业同盟罢工、武装起义以及红色恐怖等。这就削弱了党，使党脱离群众。这种错误从1930年5月起才进行自我批判。在领导方面自我批判之先，全协内部已经展开反对“左”倾的内部斗争，但反对派于6月组织了以全协刷新同盟为名的分派。不久，同年8月，红色工会国际对于全协予以正确的批评（日本11月发表），逐渐纠正了错误，刷新同盟也解散了。尽管如此，但未能从根本上改正，而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也没有步入正轨。因而共产党未能消除工农运动中的分裂。

农民斗争 在农村,阶级对立也尖锐起来了。租佃纠纷 1929 年有两千四百三十四次,1930 年增为两千四百七十八次,1931 年则达三千四百十九次,1932 年也发生了三千四百十四次。但是每次参加的佃农数则从 1929 年三三点七人减少到 1931 年的二三点九人。这就意味着斗争已扩大到以中小地主为对象。对农村中小地主的斗争,不外是对农村传统秩序的斗争,因之不易发动,但却突破了这种困难。

同时,租佃纠纷也受到官宪残酷的暴力镇压,农民也被迫实行了暴力自卫。1929 年 8 月在秋田县前田村的六十户佃农,在确保耕种权的斗争中,他们和家族子女一起,与警察进行了四天的斗争,双方都有数名重伤。从 1930 年到 1931 年,又出现了十余次流血租佃纠纷。栃木县阿久津村的减轻地租斗争,开始于 1931 年秋,第二年 1 月,农民袭击地主的暴力团“大日本生产党”,杀死五人,重伤十二人。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有一百零九名农民却被以杀人罪及其他罪名判处徒刑。这次斗争是由全国大众党和劳农党(劳农党、日本大众党在 1931 年合并的党)的党员领导。

不仅佃农，自耕中农也有了波动。在长野、山梨、山形等地，以蚕丝为中心提出勾销债务、免除税款及其他要求，召开了农民大会。此外农会和产业公会等地主、富农的团体也向县府、国家提出了救济农民的要求。

农民这般困苦，走向斗争的逐渐增多，这一事实，成为农会发展的绝好条件。尽管如此，但农会并没有把农民群众的切实要求做基础统一起来，反而加深了分裂。全国农会内部从1929年起支持合法无产政党还是支持共产党的论争激烈化了，全农本部则被合法派所控制。反对它的左派，主张革新全农，至1931年11月终于组成了“全农内革命的对派”，拥有自己的书记处和运动方针。它以后称为“全农全国会议派”（全会派）。事实上全农已经明显地分裂了。

全会派的运动方针（1932年1月决定）中自认为是“农村中唯一的革命组织”，虽把共产党和农民混淆起来，但它在农村中的活动，是一切农民组织中最积极而忠实的。全会派不仅是佃农的组织，而且是以半无产者的贫农为主体的一切劳动农民的组织；不但进行租佃斗争，也提出了解放山

林,获得食粮、借款、税款、肥料费、电灯费等问题,及其他农民的各种要求,并根据各种要求分别成立临时组织,进行了斗争,这种斗争称为农民委员会活动。

农村中反对身分差别的斗争,也是农民委员会活动内容之一。特殊部落聚集着农民和农村劳动者,早就成为左翼农民运动的据点,全农全会的支持大多数也在这种部落里。因而全会的中央委员中,也是多数为全国水平社的活动家,全会和全水几乎形成一体了。

市民、学生、文化运动 经济危机使城市的中间层也非常衰落。他们也掀起了要求降低地租、房租、水费、煤气费、电费,确保土地房屋的租赁权等保卫生存的运动。

学生就业非常困难。1930年度毕业的大学生同时能够就业的不过10%。学生大批左翼化了,尤其是优秀生。全国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中,都公开或不公开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一个例外。从1929年到1931年因要求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和学校的民主化而举行罢课的事,曾盛极一时。文部省则与警察厅合作,致力于

学生的“思想善导”，企图把学生的注意力转向到体育运动和电影上面去，甚至认为性的放荡也比赤化要好些。

以工农运动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急进化为基础，从1929年到1931年无产者文化运动也异常发展。这一运动中心的Napf，于1931年11月发展为无产者文化联盟。资产阶级出版的杂志《中央公论》、《改造》等大部分篇幅是左翼人士的文章。此外又翻译出版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主的多数马克思主义原著。

在无产者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出现了小林多喜二(1903—1933)写的《离乡地主》、《蟹工船》、《工场细胞》等著名小说，野吕菜太郎(1900—1934)写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等创造性的著作。

殖民地的民族斗争 和日本帝国主义国内的阶级斗争同样，殖民地的反帝斗争也高涨起来了。

在朝鲜，1929年11月，由于光州的日本学生侮辱朝鲜学生，爆发了朝鲜学生的反抗运动。到1930年便发展为全朝鲜学生的反日斗争，一百九十四校五万四千人(占朝鲜学生大部分)进行了四个月的斗争；并且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1930年1月朝鲜釜山纺织工厂因要求禁止民族差别待遇和殴打举行罢工。以此为首，汉城、仁川、大丘、平壤、元山、咸兴各地的罢工都和宪兵、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为三·一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斗争。

朝鲜农民的租佃纠纷也增多了。租佃纠纷的参加人员1930年达一万人以上。1931年发生了数千佃农反抗八木农场、不二农场等大地主的斗争。此外，1928年以来，永兴、瑞川及其他各地也时时发生农民暴动。

朝鲜共产党由于被镇压和内部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1928年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势力，然而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们并没有停止战斗。以1930年5月30日间岛爆发的反日暴动（间岛五·三〇暴动）为契机，在中朝国境地带发展了武装游击斗争。当时金日成还是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少年，担任东满洲特别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开始组织抗日游击队，已经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金日成将军略传》）。

台湾的民族运动也同样地高涨起来了。1930年11月，中部山岳地带的雾社居民一千五百人因

日本警察凌辱妇女而激起愤怒，发生暴动。总督府不仅派地面部队，甚至派飞机烧毁部落，才把暴动镇压下去。雾社起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台湾人民的生活。因之起义尽管被镇压了，台湾人民的抵抗并没有停止。

关东州是日本在中国的殖民地，作为统治中国东北的桥头堡而巩固起来的。在这里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东州委员会，抵抗日本的连续镇压，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从1925年到1930年，关东州管辖地区内的工人运动最为激烈，据记载罢工有二百九十次，参加人员达五万二千四百八十一人。

日本帝国主义心目中的中国东北 中国东北的抗日运动比日本既有的殖民地的反日斗争更加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的对外投资，除殖民地投资外，70%集中在中国东北。这里又是日本棉纱、棉制品、机器工具等工业品最重要的输出市场，也是大豆、杂粮及其他农产品的供给地。特别是随着日本重工业的发展，作为铁、煤、铝的原料供给地具有极大的意义。政府、军部宣传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发展为帝国主义，必

须要统治中国东北。然而由于经济危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和剥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深刻的农业危机也波及中国东北，受到地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三重剥削的中国东北农民是异常贫困的。因之农民斗争不断发生。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加强，工人、贫农、佃农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全东北各地也展开了反封建、反日的斗争。

在群众斗争发展的推动下，统治中国东北的军阀张学良也更加反抗杀害他父亲的日本帝国主义。他利用日美两帝国主义的对立，在美国资本的援助下，计划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修筑与大连对抗的葫芦岛港，以破坏日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由于这些事情，1930年南满铁路的收支开始出现了很大的赤字。

日本帝国主义因经济危机正认为中国东北对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的时候，而中国东北的情况却与日本的希望恰好相反，这是日本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他们想现在就占领中国东北。来解决经济恐慌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外的危机。他们不仅

希望在经济上独霸中国东北这个庞大的市场和资源，在政治上、军事上，也认为有占领的必要。

原因是：第一，中国东北处于日本攻击苏联的最好位置上。日本军部自干涉俄国革命战争失败以来，经常是把苏联作为第一个假想敌国，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其中规定占领中国东北是第一重要阶段。尤其是在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中国、朝鲜革命运动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威胁，更想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对苏的有利战略形势，同时，切断中国、朝鲜和苏联的联系。

第二是打算把中国东北作为压抑中国革命的据点。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中国内战更趋激烈。蒋介石对江西苏维埃区反复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日本侵略主义者以为这种情势，是占领中国东北建立扼杀中国革命立足点的最好机会。

备战和右翼 侵略中国东北使之完全变成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诞生后就决定了的目标，远在1931年（昭和6年），已经不单单是军部急进派的要求，资本家、地主、政党、政府都有同样的要求。滨口内阁虽然比田中内阁采取了稍微和缓的对外政策，但如上所述也推行了战争经济，并对反

对战争的共产党以及在它影响下的各种势力施以比田中内阁更为严厉的镇压。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提出公诉的 1929 年有四千零九十二人，1930 年增为六千一百二十四人，1931 年则达一万名以上。这表明了左翼势力的增长，同时，也说明了滨口内阁是如何扩大解释治安维持法，施以凶暴的镇压。政府彻底追究左翼，也助长了右翼的战争狂。

然而当 1930—1931 年的时候，关于把中国东北变为殖民地的问题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即 1931 年以武力占领，还是不使用武力进行。尽管根本上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但对当前的具体策略有些不同。滨口内阁虽然进行备战，却采取后一条道路，这是不合右翼和军部急进派的胃口的。他们要求推行大规模的积极的战争政策；而滨口内阁却不顾海军军令部的反对，签订了伦敦条约，更激起了右翼和军部的不满。1930 年 11 月，右翼一青年暗杀了滨口首相。这是右翼伸张势力的第一步。当时军部内的法西斯分子以“改造国家”，即树立军部独裁政权和进行侵略战争为目标，组织了阴谋团体“樱会”。1931

年3月，樱会的将校和右翼勾结，连龟井贯一郎（1882—）等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包括在内，计划发动政变，建立以宇垣陆相为首的军部政权（三月事件）。

这个阴谋被军部首脑们认为不用政变也可以达到目的的想法所阻止了，但事件完全保密。因为首谋者未受到任何处罚，更加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不但这样，与樱会有关的将校，很多人调充关东军（配置于关东州和满铁沿线的日军）的参谋等职，担任放火的角色。他们认为燃起侵略的凶焰是自己的任务，与盘踞中央要职的伙伴们通谋，计划挑起战争。

此外，在政府与政府党（民政党）中，内相安达谦藏（1864—1948）和中野正刚（1886—1943）等一派，从1930年底以来也策动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

这期间，日本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已经能够制造重轰炸机、战车、高射炮。近代战争所必备的经济动员计划的准备也有了进展，施行资源调查法、产业动员演习等，完成了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准备。陆军于1931年7月发表军制改革案，包

括增强飞机、战车等近代装备及增兵朝鲜等重要事项。同年春天,又举行了轰炸机滨松、大连间直航演习。夏天改革关东军的配备,完成了战斗的准备体制。

此外,政府和军部为了把人民引向战争,大肆煽动所谓“生命线满蒙的危机”,但这个危机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关东军制造了中村大尉事件(把日本军事侦探在蒙古内地被匪贼杀害,宣传说是被中国军所虐杀)和万宝山事件(在军部策动下发生的朝鲜移民和中国农民的冲突),几乎每天宣传着,好象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都有濒于被中国人杀害的危险。1931年8月,陆军大臣南次郎(1874—1930)大将在师团长会议席上训示说:“军人干预政治是当然的,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

占领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沟南满铁路路轨,硬说这是中国军干的,立即攻击中国的兵营。同时,按照预定计划向满铁全线展开进攻,次日已经占领了沿线全部城市。三日后,林銑十郎(1876—1943)大将指挥下的朝鲜军越过

国境前往增援^①，控制了南满洲。内阁会议立即通过支付朝鲜军军费。对外国一面口头上表示不扩大，行动上则积极地扩大了战争。

关东军继续向北部满洲进攻，过去谴责日本的国际联盟和美国，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日军北进会威胁苏联，所以期待它继续北进而予以默认。了解到各国只是口头上谴责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日军，乃转变方向，于12月向锦州地区进攻，至次年1月初占领了全部中国东北。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1932年(昭和7年)1月，乘着占领中国东北成功的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争。由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上海市民，抗日运动特别激昂，因而在这里拥有基地的日本纺织业资本家和外交官、军部都希望派大军来上海镇压。恰恰这时有日本僧侣被中国人打伤，日本便以此为借口，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1月28日，日本海军向中国

^① 朝鲜军的越境出兵，虽说是出自司令官的“独断”，然而这个擅自出兵扩大战争的林大将，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反而被赞扬。

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退上海周围的中国军队,同夜,便向租界周围的中国军队进攻。但是防守在这里的中国十九路军得到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市民、学生的热烈支援,不顾蒋介石政府的镇压,燃起抗日烈火,进行了坚强的战斗,因而使陆战队陷入困境。于是又陆续增派了陆军三个半师团的大军去上海,日军虽受了很大损失,却未能从海军阵地前进一步。再加各国在那里存在许多权益,因而受到各国的干涉,5月日本和中国缔结了停战协定。

“满洲国”和对苏关系 这期间,日军在满洲各地利用当地的卖国军阀与大地主组织了“自治委员会”,1932年3月使“满洲国”脱离中国“独立”。迎清朝最后一代皇帝溥仪为“执政”,这个“独立国”当然就是日本的傀儡。

这时国际联盟派遣了以英人李顿任团长的调查团来中国东北,进行了调查,但其报告书中一方面承认日本的行动为侵略;另一方面却强调中国东北的“赤化威胁”,建议使之脱离中国,建立自治体。这就是英国绥靖政策的表现。它想把中国东北作为攻击苏联的基地和对付中国革命的堡垒,

对于日本的占领作事后承认。美国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市场,但另一方面却期待日本反苏、反共。中国内部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全力攻击江西的中共地区,没有抵抗日本。当十九路军和人民在上海进行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担心抗战会变成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出而阻止。

这些条件,有助于日本的行动。日本政府于1932年9月,承认“满洲国”^①,并与之签订日满议定书。议定书由下列两条组成:一、“满洲国”无条件承认日本国和日本人民过去在满洲所有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二、为了共同防卫起见,允许日军在“满洲国”内无限制地无条件地驻屯。依此,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满洲国”在名义上是独立国,实质上则完全是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

继而日军又于1933年(昭和8年)2月,借口东部内蒙古的热河也是“满洲国”的领土,从三方面进攻该省,一周间便全部占领了。为了更进一步侵入华北,并占领了万里长城上有战略意义的

^① “满洲国”于1934年3月宣布改为“帝政”,定名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在皇帝的宫殿中设立日本“天照皇太神宫”分庙。卖国“皇帝”,连拜神也得拜日本天皇的祖先。

各重要关口。

美英看到日军的行动和他们所期待的相反，没有北进攻击苏联，专巩固它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并形成了进而侵入华北的局势，乃开始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在日本进攻热河前不久，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并根据李顿报告书，通过了把中国东北作为各国共同管理的自治领，劝告日军撤退的议案，有四十二票赞成，只日本一国反对。日本乘机退出了国际联盟，这无异向全世界宣布“纵使日本陷于孤立也不停止侵略中国的决心”。

关于主张承认“满洲国”与退出国际联盟，民政、政友两党都比否定政党政治的政府和军部更为热心。政党本身虽还没有进而去挑起战争，但对于已开始的战争不努力使之尽可能地局部化，迅速停止，相反地比军部更为热中于战争。他们只是对军人的专横感到不愉快，并不反对战争。

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的同时，也完成了侵略苏联的准备。1933年（昭和8年）3月17日枢密院会议上顾问们提到要考虑断绝日苏邦交时，荒木陆相答以陆军已有充分对苏作战的决心和准备。

同年6月起，日本为夺取苏联利权的中东铁路进行了各种挑衅，但这些都为苏联的和平外交所粉碎。1935年3月终于签订了移交中东铁路的满苏(实际上是日苏)协定。

第二节 争取生存、和平 和民主的斗争

五·一五政变 战争一旦爆发，军部和侵略主义者便恣意横行。满洲战争开始后不久，三月事件的主谋者——军部和右翼一派又计划发动倒阁的政变。这次打算拥立军部的法西斯首领、以主张对苏强硬闻名的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相，拟出动驻东京的军队，于1931年10月中旬起事(十月事件)。然而这一次也由于内部意见的分歧而事前停止了，但和三月事件同样，对于主谋者桥本欣五郎(1889—)、长勇(1897—)二人仅给以徒有其名的“轻谨慎”的处分。这事，对全国人民也完全保密。

日本在中国东北挑起战争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1日，在经济危机极其严重的当中，英国

终于停止了金本位制。很多国家相继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日本也势必要再禁黄金出口。这时，预料到再禁黄金出口会引起日元汇兑价格的低落，三井、住友等财阀纷纷购买美元，仅三个月其总额就超过了两亿日元。财政紧缩和通货收缩的时期已经終了。滨口死后，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内阁虽仍打着财政紧缩和协调外交的招牌，但它已经变成毫无意义而且感到棘手。

若槻礼次郎内阁尽管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但由于反对派的攻击与党内的不统一，不得不于12月11日全体辞职。代之而出场的是以犬养毅任首相的政友会内阁。荒木中将任陆相，书记官长则为东方会议以来以推动侵略政策著称的森恪。内阁成立当天就宣布禁止黄金出口。购买美元的垄断资本家以此获得巨大利润。

战争爆发和新内阁成立后，军部的政治势力增大了。看到这种情势的桥本中校、长少校认为不经政变也能够实现军部独裁和侵略中国，从此便放弃了政变计划。他们很多人后来成为陆军内的统制派。然被他们鼓动起来的一部分青年下级军官，仍没有放弃发动政变建立军部独裁的想法。

他们成为后来的皇道派。此外，茨城县的和尚井上日召、农本主义者橘孝三郎等利用落后的中小农民和城市中间层对于财阀及其走狗——政党所抱的深刻不满，企图把他们引向热中于战争和军部独裁。当时，财阀们购买美元，那样露骨地违反人民利益，贪图巨利，以及1926年以来在政党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无数贿赂事件、官僚的贪污横行，这种种引起了人民的激烈不满。虽然扫除这种腐败政治的唯一方法，只有彻底实行民主，但由于政府与政党都一味压制民主，因而使法西斯主义者能够把人民对于腐败政治的愤怒导向否定议会和政党政治方面去。实际上军部和法西斯主义者才真正是腐败的魁首。

1932年初，井上日召率领的“血盟团”，相继暗杀了民政党的最高领袖之一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财阀最高首领团琢磨（1858—1932）（血盟团事件）。犯人当即被捕，并立刻明白血盟团的全貌和它与军部的关系，但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政府从2月至4月，则尽全力于彻底拘捕共产党、共产青年同盟、全协、无产者文化联盟的会员及其支持者。右翼却没有受到警察与宪兵的任

何阻挠，因而得以悠悠然进行其所谓“一人一刀”的计划。5月15日，一部分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犬养首相官邸。老首相对暴徒毅然道：“说了就明白”。他们怒斥“不用多嘴！”同时，便射杀了首相。另一部分军官则袭击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当夜橘孝三郎领导水户的爱乡塾生等又袭击变电所，但都失败了。

以犬养内阁为最后，日本式的“政党内阁”时期便完结了。陆军公然反对政党内阁。海军大将斋藤实（1848—1936）在军部指导下组织了包括官僚和政党代表的“举国一致内阁”。其中军部及与它有联系的“革新官僚”——法西斯官僚的势力增大了。内阁虽然以“救济农村”为重要政策，但光喊农村“自力更生”而努力于扶植产业协会，并没有为贫农、佃农实行任何措施。只是缓和中农、富农的不满，拉拢他们，使之成为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的支柱。

经济军事化的进展 九·一八事件爆发的同时，日本经济的军事化也迅速地推进了。犬养内阁时在高桥藏相领导下就开始实行增发公债以充

战费的军需通货膨胀政策，斋藤内阁也继承了这一政策。因此，军需资本家获得了巨额利润，军需生产急剧上升，日本经济也很快地摆脱了危机。工业生产指数如以1929年（昭和4年）为一〇〇，1931年（昭和6年）下降到九二，1936年（昭和11年）为一五〇，1937年（昭和12年）则达一六九，有了显著增加（美国在1937年才达一〇三）。特别是军事重工业的发展最为突出。1930年日本工业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率为三八比六二，1937年则转为五八比四二。

“满洲国”成立后，政府、军部便宣传“日满经济圈”、“日满经济一体化”。其实不外是把满洲经济完全置于日本垄断资本统治之下。军部虽曾进行“不让财阀进入满洲”等迎合人民反财阀气氛的宣传，但实际上在军部保护下，垄断资本最初就通过购买“满洲国”国债、满铁的增资和改组而插足进来，后来则直接投资，向全满洲发展，获得了最大利润。日本资本在满洲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但这也不外是为了侵略苏联和中国建设兵站基地而已。建设铁路主要也是根据战略上的需要。又架设了布满全满洲的军用电线。这些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变为中国社会主义化的工具,真是历史上莫大的讽刺。

这时朝鲜也在宇垣总督领导下,在北部建设大发电所,并利用它建设重工业、化学工业。其目的完全是作为对大陆的兵站基地而巩固朝鲜。朝鲜人民则被迫在这些工业中从事奴隶劳动。根据总督府的统计,1935年的工厂工资,日本工人男工为一元八角三分,女工一元零六分,而朝鲜工人则不到半数,男工九角,女工四角九分。

反战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人民群众并未被军国主义者和政府的宣传所迷惑,从下述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开战后不久,以满铁董事为理事长的“满洲青年联盟”,来日本内地鼓动战争,其中东北班,在驻满日军主力第二师团的根据地仙台举行讲演会,但遭到听众的奚落,没有人听讲演(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纪传》)。此外,自由主义者中间也涌现了很多反战分子。在这些为维护和平、保卫人民生存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中表现得最勇敢最彻底的就是共产党。无论在1927年的纲领或1931年4月的政治草案中都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把反对侵略战

争作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两个月，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透露了日本最近将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争，并组织了反战的斗争。到战争开始后，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团体便把争取日常经济要求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结合起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在京滨地区提出了“反对满蒙战争”、“退出满洲中国”等口号，召开了工厂代表会议，并在各地组织了反战示威。1932年向东京和大阪炮兵工厂举行了勇敢的反战示威，又拚命地把以水兵为对象的《高桅》和以陆军士兵为对象的《士兵之友》的反战宣传杂志送到军舰和兵营里面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个月，社会民众党书记长发表声明，公然主张保卫满蒙权益，积极支持战争。劳农大众党最初虽明显地采取了反对战争的主张，但是，由于做它的基础的京滨和阪神的造船、金属工会的干部和总同盟、海军劳动联盟等的干部抱同样见解，认为退出满蒙是忽视劳动群众的现实利益而支持战争，终于放弃反战主张。继而在1932年（昭和7年）社会民主党和劳农大众

党合并，组成社会大众党。其纲领为“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尊重国体”即尊重天皇制，这样，就不但不反对战争，必然会积极支持战争了。

日本的产业结构几乎完全军事化了，由于军需工业的繁荣——它最后虽是扼杀工人，但暂时给工人饭吃——，工人也能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在战争初期军事繁荣正在上升的时候，鼓动群众的反战斗争特别困难。这也是很容易把合法无产政党和工会的干部拉到主战方面去的客观原因。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和全协奋不顾身地坚持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可以说是代表日本人良心的对于日本人民的贡献。但是由于共产党没有把社会民主主义的腐化领导者和在它影响下的群众正确地区别开来，把他们称之为社会法西斯蒂；或机械地提出“保卫苏联”、“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打倒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的内战”等口号；对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和平主义也没有给以正确的评价，认为他们是天皇主义者，所以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同伙。因而尽管共产党自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没有想把人民群众这种纯朴的和平

要求组织为统一战线。

一九三二年纲领 从1931年至1932年左翼有了空前的发展。共产党以工厂细胞为基础扩大了党的组织，全协也渐渐在大工厂内建立起基地。工会会员从1930年8月间的四千人，至1931年底正式登记的就有一万人，增加一倍半，在它影响下的人员至少也达五倍。在全协领导下东京地下铁路和岩手国营铁路工地的斗争，是在警察和暴力团袭击下坚持进行的划时代的斗争。1932年的五一节，反映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据说参加者达战前的最高峰。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尽管遭到连续的镇压，1932年4月起改为秘密出版的活字报，每五日出一次。

1932年5月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1932年纲领）。它最正确而具体地指出了日本革命运动的战略和战术。

第一，这个纲领正确地评价了日本的封建残余，必须以打倒天皇制作为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明确地指出当前的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工农联盟中中农的

积极作用。

第二，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斗争的决定性意义。即预见到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战争会很快引起新的世界战争，指出了把一切斗争和反对战争与天皇制的斗争结合起来加以开展的重要性。

第三，强调指出了党的活动必须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重要性，重视为了这点的组织和活动，并对组织和活动各方面都给了明确的指示。

这个新纲领对共产党及团结在它周围的工人、农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并给予了信心和勇气。

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 共产党虽然遭受了无数次的重大打击，但却积累了革命的经验，批判了错误，开始有了正确的纲领，正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1932年（昭和7年）10月，在全国各地又有以党中央为首的一千五百余名共产党、共青团、全协人员被逮捕了。1933年2月，以大阪地方为中心，又同样有一千五百余人被逮捕。对于被捕者的拷问，本来就很残暴，现在更加凶狠了。在天皇名义下的拷问，比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或江户

时代奉行所的拷问还要残酷得多^①。因此共产党的领导者岩田义道（1888—1932）、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等很多人被杀害。又在10月这次的搜捕中，共产党干部上田茂树（1900—1932）等被警察逮捕后就永远没有消息了。

警察派出的密探和特务，很巧妙地打入党内，想从党内进行破坏。有的竟成为党的干部，组织了抢劫银行的暴力团，造成人民对共产党的恐怖心。又分别巧妙地用收买和拷问等方法，使之出现“脱党”的叛变者。三·一五以前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佐野学和锅山贞亲（1901—），1932年6月在狱中声明“脱党”之后，出现了很多脱党分子。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组织，接二连三地遭到迫害，从1933年春天起渐趋衰落。同年5月，党中央由野吕荣太郎等重新建立起来，但至11月

^① 政府、警察厅以及法院都经常否认有拷问等事实。但是小林五郎所著《特高秘录》为特高警察领导人安培源基所推荐，书中也承认“警察在练武场上把女人衣服剥光，进行侮辱；为了免留伤痕，用包有胶皮的粗铁丝做拷打刑具；为了不使被拷问的人昏过去，不断用冷水灌鼻孔等。”事实上绝对不止这些，还有许多更残酷的方法。

野吕也被捕，1934年2月拷打致死。这时全协和全农全国会议完全被摧毁了。虽然共产党进行了顽强的恢复党的斗争，但都遭到了镇压，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叛党分子，或被特务所探知，党员相互间的信赖也薄弱了。1935年2月《赤旗》也停刊了。共产党已不能进行全国性的组织活动了。

迫害自由主义 不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受到了迫害。1933年(昭和8年)4月，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1891—)的自由主义刑法学说^①被文部大臣鳩山一郎视为违反国体的红色学说，强迫泷川教授辞职。京大法学部教授会群起反对，以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为首，许多大学学生掀起了维护大学自治和学问自由的斗争。担心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很多知识分子也支持了这一斗争。但终于被政府无理地镇压下去。这就是学生运动的最后一波。

当自由主义也被镇压时，社会大众党却安然

^① 泷川学说的基本论点，例如说日本刑法中规定妻子有通奸罪而丈夫没有，是不妥当的，被认为是破坏日本的家族制度，进而危及国体的思想。

无事。原因是社会大众党的领导者更加向军部献媚了。例如1934年(昭和9年)10月,陆军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建设“国防国家”的名义下,主张树立军事法西斯主义体制。连政友会、民政党都认为不妥当,而社会大众党的领导者却公然支持陆军。总同盟及其他社大党领导的工会干部也都号召会员积极支持战争。1934年9月,以总同盟为中心组成了“日本工会会议”,采取了“同胞相爱、有福同享、尊重国情”等比过去友爱会还落后而且是法西斯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水平社暂时仍然健在。全水的左翼从1930到1932年,也提出了无视被歧视身分现实存在的不合群众实情的方针,认为水平社这种身分组织,把被歧视的群众斗争,束缚在身分的圈子内,是阻碍阶级觉悟的有害组织,乃予以解散,将特殊部落的农民编入农会,工人编入工会。但1932年起开始批判了这种错误,并展开了“部落委员会活动”——这是全农全会派所拟定的农民委员会活动中适用于特殊部落的部分。

1933年春为了反对高松地方法院对特殊部

落青年不公平的判决^①，全水从6月到11月，在全国展开了激烈的反抗斗争，并举行了全国特殊部落代表要求取消不公平裁判的请愿示威运动，动员了三万余人。这时特别以复员军人为示威的核心，把反对歧视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在这次斗争胜利后，保卫生存和平等权利的斗争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从1934到1935年，三府三十三县拥有一千一百余支部，一时特殊部落民的60%受它的领导。最被虐待、最贫困、最受痛苦的人们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之中，其反抗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并不是偶然的事。但从1936年起也进入低潮了。

第三节 侵人华北和二·二六事件

中国的抗日运动 到1933年初为止先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和热河省的日军，同年5月越过长城，侵人华北，逼近京、津。国民党政府对此未作

^① 香川县某特殊部落青年，因与部落外的女子自由结婚，被女方家长告以诱拐罪。高松地方法院承办这案件的检察官和推事，都认为该青年身为特殊部落民，对女子“隐瞒他的身分”，构成了犯罪条件。

任何抵抗,继续命令东北军撤退,并在5月底派代表到塘沽和日军缔结停战协定。协定中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长城线以南的河北省东北部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对中国来讲,是卖国的协定。

东北沦陷,签订塘沽协定,接踵而来的丧权辱国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起而抵抗。签订塘沽协定时,察哈尔省南部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同盟军,有当地武装人民和华北各地的学生参加,为了收回领土,进攻热河省。然而国民党政府军队却和日军共同夹击,并将它的领导者逮捕枪毙。同年11月,以在上海奋战的十九路军为中心,在福建省建立了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军队缔结了抗日停战协定,主张共同抗日,也被国民党政府集中兵力摧毁了。

抗日运动尽管这样地受到国民党政府一系列的压迫,却渐渐地扩大到全国了。抵制日货是战术之一。这种斗争不断地发生,因此日本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中国市场被缩小了。除中国东北外,中国进口贸易中日本所占的比重,1933年为之激减,其后虽稍有恢复,直到1937年和中国进入全面战争,始终不能恢复到1932年的水准。

自从中国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各地蜂起，1933年统一起来，组成了强大的抗日人民军。随着满洲经济的军事化和对人民掠夺的加强，中国人民的反抗也激烈了，各地都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继续进行斗争。其中有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人民武装游击队，在高度国际主义精神团结下也参加了对日作战。日军为了与游击队作战所用兵力比占领当时增加了好几倍，但仍感“治安恶化”。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经营，未能象预期那样顺利进行。

侵入华北 战争开始后，国内经济一时呈现了军需繁荣现象，到1935年（昭和10年）再陷于深刻的危机。随着军费支出的增加，财政赤字也激增了。军需原材料进口的增加，使贸易收支恶化。为了弥补它，资本家在政府保护下，利用极低的工资和汇价实行棉制品等倾销输出，因之加深了和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和英国的对立。当时由于贸易上的赤字，使原料的输入发生困难，特别是资金非常缺乏。

战争导致战争，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本，为了

榨取和统治它，便需要粉碎中国民族的抗日斗争；而且战争经济也需要新的市场和扩大资源。1934年（昭和9年）4月，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1887—）发表了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不许外国干涉的声明（天羽声明），暴露了将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1935年5月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1882—）向国民党政府驻华北代表何应钦提出要国民党军和党机关撤出河北省、禁止抗日运动等要求，强迫他承认（何梅协定）。同时，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1882—1948）和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也缔结了同样的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这样完成了准备工作之后，1935年11月，日军首先在根据塘沽协定成立的非武装地区建立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委员会改名为政府），把它作为第二满洲国。自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国民党军撤退后，11月日本又强迫留下来的军阀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仿照冀东政府，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想把整个华北从中国割裂开来，并建立傀儡政权。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屈服。

12月9日，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北京学生，举行了反日示威大游行。委员会成立这天，即12月16日，不顾军队的镇压，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运动立即波及全中国，连二十九军的士兵也起而参加。宋哲元在群众的压力下，也对日本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不肯唯日本之命是听了。

又在这件事之前不久，即11月间，国民党政府在英国使节李滋罗斯的指导下改革和统一了币制。英国曾要求日本协助这一改革，日本由于坚决要把冀东和冀察分割出来，因而反对中国币制的统一，但改革却获得了成功。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逐渐完成了民族统一，说明了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割裂出来的日本政策已失去了成功的物质基础。

日本的侵略，使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愈益高涨起来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 这以前，在江西省根据地击退了国民党政府军四次围剿的共产党和红军，从1934年10月起，为了北上抗日，实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历尽艰难困苦，进入陕西

省,在这里建立坚固的根据地。在长征途中,1935年8月发表了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的八一宣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的侵略,激怒了中国人民,全国沸腾起来,响应共产党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热潮,各个地区、部门相继成立了抗日救国会,1936年5月,组成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而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运动则加以无情的镇压,11月,逮捕了以救国联合会领导者为首的约数千名活动家。但运动更加扩大了。

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进攻共产军集结在陕西省西安。1936年12月拘禁前来督战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抗日(西安事变)。国民党政府在何应钦等亲日派操纵下,准备立刻发动进攻张学良军,但共产党为了组成统一战线,极力斡旋。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获得释放。在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国民党军队也反对和共产党打内战的情势下,1937年3月,国民党同意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便成立了。

二·二六政变 当日军对华北进行一系列的侵略时,国内的统治体制在军部和右翼的推动下,

走向了法西斯化。

曾在光天化日之下，胆敢组织党徒杀死一国首相的五·一五政变的犯人们，连主犯也只处以数年徒刑的轻罪。军部姑且不论，就是政府、议会、报馆虽然都认为这班家伙的手段可恶，但却众口一辞，说他们爱国之志可嘉。这就说明了官僚与政党不是和右翼对立的。于是暴力主义者更加得势，恣意横行了。1933年(昭和8年)7月发生了右翼团体和一部分军官阴谋发动政变的神兵队事件，1934年(昭和9年)8月有以士官学校为中心的军官、学生的政变阴谋(士官学校事件)。

1934年7月斋藤内阁因垄断资本家争夺帝国人造丝公司的支配权，阁僚中有人受贿(帝人事件)，被揭发后，全体辞职。由海军大将冈田启介(1868—1952)继任首相。

1935年(昭和10年)春，军部右翼大肆攻击自由主义的宪法学者、帝国学士院推荐的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天皇机关说，不仅是第一次大战以来学说的主流，也是政府公认的理论。现在则认为是有损天皇尊严，是反国体的议论。这时，复员军人会整个组织被动员起来，展

开反对机关说的运动，军部、右翼则与之相呼应。当美浓部在贵族院阐明机关说的正确性时，有很多议员鼓掌称赞，虽获得很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但军部、右翼、复员军人会的反对运动极为猛烈。政府终于前后两次发表“国体明征”（正义）的声明，正式否定机关说。美浓部被提起公诉，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当时已经不象泷川事件时那样，为了维护学问与思想的自由，能举行有组织的斗争。天皇机关说的被暴力摧毁，意味着民本主义运动以来日本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滴成果也被消灭了。

这时，陆军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派阀对立尖锐起来，同年11月，皇道派的一军官暗杀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1884—1935）。神兵队事件和永田事件的公审，都成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舞台。杀人犯受到一切统治势力的称赞。这样就造成了另一种空气。终于酿成如下事件：1936年（昭和11年）2月26日，步兵第一、第三连队、近卫步兵第三连队、野战重炮兵第七连队及其他部队中队长级以下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部下官兵一千五百人发动叛乱，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

锭太郎(1874—1936)、重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1867—1948)。冈田首相也遭袭击，他的堂弟被错认为首相，致遭杀死，他得幸免。驻丰桥的部队企图袭击在兴津的元老西园寺，未遂。另一队袭击牧野伸显(1861—1949)于汤河原旅馆，牧野也侥幸逃脱。

叛军军官是在10月事件以后仍未放弃政变计划而伺机的人们，得到北一辉(1883—1937)、西田税(1901—1937)等的指导。他们占领了陆军省、首相官邸，向陆军大臣提出八项要求^①，内容不过

① 他们向陆军大臣提出下列八项要求：

一、把这次改变导向“昭和维新”，并须将起事宗旨奏明天皇；

二、毋使皇军自相残杀，即不镇压叛军；

三、逮捕宇垣等反对派；

四、罢免统制派军官^②；

五、为了威镇苏联，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

六、召各地皇道派军官来中央，安插职位；

七、维持叛军现在的位置；

八、立刻召集在京叛军同志于陆相官邸，进行协商。

② 当时陆军内部有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统制派盘据军部内，有林銑十郎、宇垣一成、杉山元、东条英机、永田铁山等人；皇道派主张武装政变，有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建川美次、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平野助三郎、桥本欣五郎、相泽三郎等人。——校者

是实行“昭和维新”、“威压苏联”、给该派阀以地位、逮捕或罢免反对派等争权报复的要求而已。青年军官们从五·一五事件以来虽曾以激烈的言辞攻击财阀，畅谈农村的惨状，主张救济农民，但到了发动大规模叛乱时，他们的要求和行动，则根本没有攻击财阀和救济农民。他们所说的“维新”不外是建立皇道派武力独裁和战争体制而已。

他们所信奉的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内容是主张根除一切阶级斗争，规定私有财产每家限制在一百万元以内，私人资本则限制在一千万元以内。千万元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国营，用全国力量，使日本将来成为“君临”“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特别认为夺取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是日本的权利）。依当时的货币价值，限制个人财产在一百万元以内，在“百万富翁”为数极少的日本，实质上等于没有任何限制，对资本一千万元的大公司予以保证，这样，垄断资本对整个产业的统治，能在国家名义下理想地完成。这样便根绝了一切阶级斗争，人民在“复员军人团会议”和天皇任命的官吏压制下，被驱上战场。这才是理想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关于土地问题，他们也承认时价十

万元以内的土地私有，认为小地主和佃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不管崇拜它的青年军官们的主观想法如何，他们所要建立的体制，不外是为垄断资本和军部服务的军部暴力独裁而已。这可以称之为军部法西斯主义或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即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因此，他们的领导者北一辉能从三井财阀的最高首领池田成彬(1867—1950)处获得巨额生活费。

他们之所以要杀尽元老、重臣，不是因为这些人和垄断资本有联系，而是由于这些人阻碍皇道派的独裁，并阻碍依照他们的希望扩充军备。枪杀老练的财政家高桥藏相就是具体表现。高桥精通国家财政，深知如果照军部大臣的要求，支出军费，则财政不久就将完全破产，毅然反对军部要求，竟遭杀身之祸。

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陆军首脑部最初只称叛军为“蹶起部队”，打算接受其要求。经仔细考虑，认为如果容许擅自使用部队，破坏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于是主张镇压的主张占了优势，第三天才名之为叛

军,予以镇压。这样,叛乱军官所期待的法西斯主义体制便由统制派军阀来实现了。

冈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垮台后,由原驻苏大使、前外相、右翼团体玄洋社社员、热心反苏的广田弘毅(1878—1948)组阁。负叛乱责任的陆军曾言明要实行“肃军”,其实不过是统制派对皇道派的压制,而人民所要求的“肃军”,即根绝军部干预政治,不但没有实现,相反地军部对政治的支配力更加强化了。广田内阁连大臣的人选也都得听从军部的指挥,其政策就是按军部要求的所谓“庶政一新”、“广义国防”。此外作为军部肃军的交换条件,则恢复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因此,军部更加确实地能制内阁的死命了。

二·二六事件时,东京曾颁布戒严令,到7月18日叛乱被镇压后仍未解除。戒严令下的临时议会制定了不稳文书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法西斯法律。从这一年起,五一节被禁止,陆军工厂中的工会也被禁止。在这样加强压制人民的同时,把经济也改组为准战时体制了。

1936年(昭和11年)8月,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以“稳步地向海外

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等为根本国策。因此,应“充实国防军备”、“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备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提携”,“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南洋方面(印度尼西亚方面)求日本民族的、经济的发展”。这是第一次具体表明了除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外,还想侵略南方以至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实行了空前的大规模扩军。陆军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以大规模充实空军和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为中心。海军继同年初退出裁军会议之后,制定了宏大的造舰计划(包括大和、武藏等世界最大的军舰)。

与扩军同时,在“广义国防”的口号下强制推行了大规模战争的一切准备工作,例如:为取得军需资源而振兴贸易、扩充军需工业、奖励航空事业、海运事业、统制电力、军国主义教育等。以军备为首,这些广义国防措施所需的巨额经费,由实行空前的大增税和增发公债来补充。军部推荐入阁的马场铨一藏相(1879—1937) 1937年度编制了三十亿元以上的预算,达前一年度的一点三倍

余。于是高桥藏相拼命想保持的财政上最低限度的健全性也丧失了。

“广义国防”、“庶政一新”实现了叛乱军官们在死刑台上希望的第一步，不外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法西斯主义和人民阵线 法西斯化的日本于1936年11月，和纳粹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条款表面上是规定日德两国共同防卫共产国际的活动。秘密条款则附有日德两国任何一国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另一国在苏联背后不给以安全感。次月，日本和意大利缔结日本承认埃塞俄比亚为意国领土，意大利承认“满洲国”的协定。在防共协定成立前一个月，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名为柏林、罗马轴心的政治同盟，至此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已经以反苏、反共为纽带，互相结合起来，分别展开对其邻近各国的侵略。

纳粹于1933年掌握政权，1935年吞并了萨尔区，公然宣布重新武装，1936年初进军莱茵区。1935年英国和它缔结海军协定，承认德国的重新武装等，采取绥靖的态度帮助它。美国的垄断资本则在经济上援助了纳粹的重新武装。

意大利也在 1935 年 10 月，开始侵略东非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1936 年 5 月就把它并吞了。这时，资本主义各国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去阻止，放任意大利的侵略。美、英、法的垄断资本家为了使法西斯国家的矛头指向苏联，一面继续采取这种绥靖政策；另一方面则为了对抗日、德、意重新分割殖民地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法国的法西斯势力也抬头了，1934 年 2 月杜迈格在法西斯势力支持下组成了内阁，推行了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准备。对此，法国工人阶级以共产党为先锋，进行了反法西斯的同盟罢工。7 月，社会党和共产党缔结了统一行动的协定。继面社会党、共产党、急进社会党、总工会、知识分子团体等于 1935 年 7 月 14 日法国革命纪念日举行了争取“自由、工作、和平”的大示威游行斗争。于是正式建立以工人阶级的统一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即人民阵线。1936 年 6 月，人民阵线各党在大选中获胜，成立了以社会党的里昂·勃鲁姆为总理的人民阵线内阁。

西班牙过去虽已推翻君主制，但共和政府中

受外国资本援助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甚大，并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对此，1934年9月，在共产党的努力下统一了工人战线，10月举行带有武装起义的全国同盟罢工斗争，以对抗建立法西斯独裁的阴谋，并粉碎了这一阴谋。1936年1月，以工人的统一为基础，组成了左翼各政党的人民阵线，在同年3月的选举中获胜，组成了阿沙尼雅人民阵线内阁。

然而，西班牙从人民阵线胜利时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教会、军部等反动势力便和德、意勾结起来，为了建立法西斯独裁，准备实行反击。1937年7月前参谋长佛郎哥指挥下的军队发动叛乱。群众为保卫人民阵线政府，团结起来在各地击溃了叛军。但是这时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开始给佛郎哥以大规模军事援助。英、法、美政府则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放任德、意对法西斯势力的援助，并给佛郎哥以精神上、政治上的支援。只有苏联和各国人民援助西班牙人民，为了自由和民主奋不顾身地和法西斯大军搏斗。西班牙人民和国际反法西斯义勇军，对于在德、意军事援助下占压倒优势的叛军，进行三年间的英勇斗争，最后

终于失败了。

共产国际为了抗拒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风暴，1935年7月第七次大会号召全世界的爱好和平和民主的人们立即组成统一战线。大会的主要报告人季米特洛夫指出：“法西斯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猖狂的进攻；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法西斯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最恶毒的敌人！”^①。

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战胜法西斯主义，“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即以此为开端的事，就是要把各工厂的、各县区的、各省区的、各国的、全世界的工人都组织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建立行动统一。”^②而只有在这个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这种统一战线战术，是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经验之大成，同时，也是给予各国共产党、工

^{①②} 参看《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5—46页、第62页。

人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主义人民的伟大教训。从此以后人民阵线在各国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了。

日本的人民阵线的斗争 在日本，人民对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不满高涨起来，也进行了争取人民阵线的艰苦斗争。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一周前举行的大选，右翼政党虽提出了很多候选人，但其得票仅为总选票的2%，只有六人当选。与此相反，社会大众党获得了总选票的6%，当选者从五名一跃增至二十四人。又过去一直以压倒多数而自豪的政友会，因为它的侵略主义为人们所不满，减少了将近二分之一选票。这说明了人民对于军部和法西斯主义的不满。二·二六事件就含有对此实行反击的因素。而二·二六事件和其后加强了的法西斯政策，使人民的不满更加高涨。

从1936年后半期起到1937年，准战时经济的矛盾已鲜明地露出来了。军需重工业虽发展起来了，但铁、煤、石油、橡胶、锡等基本物资发生严重的不足，建设资金也感到缺乏。虽然继续增加棉制品等的倾销输出，但也无法改善贸易收支。为

了打开这种危机，乃以滥发货币、计件工资制、临时工制等减低工资办法，加强对人民大众的剥削。又国内生产人民需用物资的工业，无情地被牺牲而转换为战争经济。

这样的事情使劳动人民和中小企业家的生活状况恶化了。九·一八事变成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尽管是暂时的，出现了繁荣气象。然而战争经济很快地便进入破坏人民群众甚至于中产阶级生活的阶段了。例如军需生产只有牺牲民用生产才能上升，人民的消费物资便越来越少了。

这种情况，激起了人民对军部的不满。而在政友会和民政党中间，也有人反映了人民的不满，并批评了军部。1937年（昭和12年）1月的议会上，政友会的滨田国松（1867—）对寺内陆相公然指责军部干预政治。滨田的演说博得了很多人的喝采。军部大怒，不满意广田内阁仍留有政党势力的残余存在，乃予以推翻。其后任命前陆相、朝鲜总督宇垣一成组阁。陆军反对，并以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为武器，使组阁陷于不可能（如不是现役武官制，预备役大将的宇垣也可以兼任陆相）。这时人民都同情宇垣。宇垣自己也承认人民之所

以同情他，就是变相地攻击军部的横暴（《宇垣日记》）。

继而由另一前任陆相林銑十郎大将组阁。林打着“祭政一致”的神灵附体的招牌，仿照纳粹的计划，建立一国一党的法西斯组织。3月底，突然解散了议会；但选举的结果，支持政府的昭和会、国民同盟惨败，仍然是政、民两党居多数。特别是社会大众党一跃出现了三十七名当选者，获得占总票数10%的选票。又日本无产党（同年1月成立，为不满社大党的合法左翼）的加藤勘十由东京第二区推为候选人，获得了全国最多的票数。这说明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对于只打着招牌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抱着希望。同时，也表明了反军、反法西斯的人民感情是如何扩大了。又从1936年下半年起到1937年前半期，如上所述，全国爆发的生活困苦的工人、农民的斗争次数，较经济危机时期还多。尽管工会被堕落的干部所把持，参加的人数1936年也超过四十二万人，达战前的最高数，1937年也仍然接近四十万人。

在这以前，冈野（野坂参三）、田中（山本悬藏）两氏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精神所写的联名

信，于1937年2月在莫斯科发表了。信中指出：现在日本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军部”，“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危險中拯救日本人民的道路，只有以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为基础的伟大人民运动”，“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把全体劳动人民统一起来，反对军部、反动和战争”，共产党员应加人社大党、总同盟甚至进而参加官办青年团，把群众争取到反军、反法西斯方面来，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党本身的加强和大众化。

然而日本的人民阵线，终于未能实现。

第一，和冈野信中所想象的不同，日本的共产党已经没有有组织的活动力能成为人民阵线的核心；各个分散的共产党员间，也几乎处于断绝了联系的状态。第二，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不过7%左右，而且工会干部半数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会几乎全由他们把持，想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成为人民阵线的基础已经是极端困难。1936年初，合法左翼工会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1934年成立）和东京交通工会，曾向社大党和总同盟提议组成“人民阵线”，但被

拒绝。即或成功，也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各派的共同斗争，不能说是人民阵线。但连这种共同斗争也被社大党拒绝了。此外，全评等不能把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统一起来，而只停留在与干部间进行交涉。这种做法，也是与“人民阵线”无缘的。第三，因而日本的人民阵线不得不从几乎没有主体条件的状态（虽然群众发生动摇）下出发，但在天皇制不断地追究和镇压下，即使是极小的活动，一开头就被摧毁了。

在这种状态下，当时推动人民阵线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1937年（昭和12年）7月随着对中国开始全面侵略战争，镇压更加严酷了。共产党员固然不消说，就是全评、日本无产阶级以及支持它的理论家都纷纷被逮捕（下面叙述），在日本连类似人民阵线的组织也不能出现。

第四节 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全面战争的开始 当林内阁遭全国人民的反对被迫下野后，陆军自己没有正面出台的勇气 and 责任感。6月30日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文麿

(1891—1945)任首相。他具有光辉的门第，居五摄家之首，从古以来就和皇室有深厚的关系；携着以天皇为轴心，把军部、官僚和人民结合起来的使命而出台。组阁后三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1884—1948)便向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战来考虑，在目前中国的情势下，必须立即给国民党政府以打击。这是鉴于西安事变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认为必须趁早击溃。

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在北京西南郊外芦沟桥演习中，以头上有枪弹飞来为借口，向中国军进攻。当地宋哲元等中国军的高级军官，害怕丢掉华北地盘，避免冲突，完全接受了日军的要求，撤退军队，就地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7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参谋本部的要求，决定立刻从国内向华北派兵，命令近畿以西的全部陆军待命出发，并发表派兵的声明。同时，召集政界、财界、言论界的代表请求协助，作好正式作战的准备。政府这种敏捷而强硬的态度，非柳条沟事件时所可比拟，表明本国执政者比当地派遣军更早就有了发动战争的充分准备和决心。

日军在华北加强力量后，7月28日同时向北

京、天津周围进攻，次日已占领附近一带要地。8月13日，日本海军在上海又重新挑起战争。次日政府发表声明说：“为了膺惩中国军的凶暴，采取坚决措施”。并决定向华中派遣陆军，开始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国人民进行爱国抗日斗争。继面为了全面抗战，向国民党作出重大让步，建议合作。8月25日，发表了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号召博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工人、农民、市民、学生以及士兵们在爱国热情驱使下，纷纷参加了抗日战线。蒋介石希望和日本妥协，继续命令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撤退，也不派增援部队。但是士兵不顾军官的妥协态度，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京津的学生们参加义勇军，在京津地区陷落后，为了进行游击战而走进农村。上海方面的中国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杉山陆相（1880—1945）曾对天皇吹牛说，只要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日军数个师团被阻于上海一隅达三个月之久。在中国人民团结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在9月底正式承认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农红军在华北改编为八路军，在华中则改编为新四军，走到抗日的最前线。9月八路军在山西省平型关的第一战，便使日军遭受了一个旅团的大损失。

战争的扩大和各国的态度 日军遭到中国军意外强烈的抵抗，继续增派新兵，1937年中一共向中国派了十六个师团，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华中方面11月派一个兵团在杭州湾登陆，才算打开了战争的僵局。以后日军向南京进攻，于12月占领。日军进入南京时，曾屠杀俘虏以及市民男女老幼共数万人，尽放火、掠夺、奸淫的能事^①。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后，苏联立即于8月与中

^① 仅在南京市内就有数万市民被屠杀。很多妇女是在被强奸后杀死的，有数万市民是用机枪集体射死，或连船一起沉在河中，以及推在大坑中用汽油烧死。（《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审录》第2卷；爱德加·斯诺：《亚洲的解放》）这和一般在战场上个别士兵的暴行性质不同。日俄战争时也有过个别士兵的暴行，但象南京屠杀这样的事不曾有过。与此性质相同的事，第一次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发生的。其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遭美军反攻被迫从马尼拉撤退时，对市民的暴行，也和进入南京时一样。帝国主义军队面临着民族坚强的抵抗时，为了威吓起见，便实行这样的残酷行为。纳粹在占领地区也曾实行有组织的大屠杀，比日军还厉害。

国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与此相反，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态度。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条约会议上，要求采取共同行动阻止日本侵略的，只有苏联一个国家，而且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以美国为首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国家，都打算瓜分中国，保障日本的资源和市场，使日本的侵略矛头指向反苏、反共方面。这些国家，尽管如此，在表面上却还是攻击日本的侵略，而意大利则于11月加入日德防共协定，更进而承认“满洲国”，表明了支持日本的态度。德国则劝蒋介石停止抵抗，作为中日间的调停人，企图获得瓜分中国的一份。南京陷落前，德国驻华、驻日两大使便开始了和平斡旋。

日本政府和军部，都以为占领南京后，中国有组织的抵抗便会结束，所以不大重视德国的调停。并在交涉期间，建立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北京。南京陷落后，近卫首相于1938年（昭和13年）1月发表声明：“嗣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象，期待新兴政权的成立与发展”。这个声明不是出自军部的要求，是由外务省计划，取得近卫首相

以下政府要员的一致赞同而发表的。

然而南京陷落后，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不但没有低落，激于南京大屠杀等的愤怒，更加高昂了。国民党政府也迁往汉口，加强了继续抗战的体制。对日本表示绥靖态度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随着日军战线扩大到华中，威胁自己的权益，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了。而日军占领南京时，曾击沉美舰巴纳号，并给英舰雷的巴德号以损害，这种无益的挑衅，更是加深了和其他国家的对立。

战争的长期化 这样，日本把自己拖入长期战的泥沼中。1938年初，日军为了连结华北和华中的战线起见，又派大军发动徐州战役，但在台儿庄又遭失败。到这时，派遣到中国广大战场上的日军，达二十个师团。陆军总兵力从开战前的三十万增加到一百万，并进行召集预备役，规模之大，为九·一八事变时所无。从国内的各个机关、企业以及农村陆续征派出征兵士。大规模战争一开始，紧接着便直接威胁了人民的生活。

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出乎意料之外，再加上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困难，政府和军部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和意见分歧。陆军原想不动用准备对

苏作战的关东军兵力，只用其他兵力在短期内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从台儿庄战役时起，这打算已经行不通了。因此，政府和陆军方面也产生了对立的意见：一派以陆军省为中心，坚持扩大中国战争；另一派以参谋本部为中心，主张尽早结束中国战争，准备对苏作战。

1938年（昭和13年）5月，近卫内阁实行改组，陆相为台儿庄的败将、不扩大派的板垣征四郎（1884—1948），外相为宇垣一成，藏相兼商相则为三井财阀的领导人池田成彬。改组的方针，一方面寻找机会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另一方面则计划推进由垄断资本家领导的战争经济。

然而7月间，驻朝鲜日军在临近朝鲜的苏满国境张鼓峰（哈山湖）地区，曾越境进攻苏联。当时正是英、法对德绥靖政策达最高峰的时期，日本也期待攻击苏联，以获得英、美的绥靖。但是由于红军的反击，越境日军遭到重大打击，这一企图失败了。宇垣外相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交涉，也因陆军的反对，未获成功，宇垣辞职。

1938年秋，日军想一下子结束战争，在中国战场，用了二十四个师团的大军，约合当时总兵力

的70%以上,进攻国民党政府迁都地点的汉口和广东,并予以占领。国民党政府再迁至重庆,虽其内部出现了汪精卫等投降分子,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抵抗更加猛烈。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军后方不断地进行游击战;在沦陷区内,则以猛烈攻势,扩大解放区。因此日军只能保持点与线,并且为了确保这些点与线,不得不使用庞大的兵力。在占领汉口和广东后,日军已经没有继续进攻作战的余力。战争进入第二阶段^①。

迫害和抵抗 随着战争的开始,同时,反动统治也加强了。开战后两个月,政府于1937年(昭和12年)9月1日,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人民灌注“八纮一宇”的征服世界的思想(1938年起改称“兴亚奉公运动”)。同年10月,设立“内阁参议”制,网罗三井的池田成彬、三菱的乡诚之

^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1938年5月指出抗日战争为“持久战”,并预见到其全部过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的日本方面的战略进攻,中国方面的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日本方面的战略保守,中国方面的准备反攻时期;第三阶段又是以运动战为主的中国方面的战略反攻,日本方面的战略退却时期。这一分析的正确,在战后今天,看得非常清楚。

助(1867—1942)及陆海军、外交界、政党等各派阀的代表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政府最高谘询机关。继而在11月,设立了大本营,作为最高统帅机关,直属天皇。为了谋军事、政务的联系,设立了“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

如上所述,政府一面在谋求团结统治阶级的一切势力;另一面,1937年12月借口阴谋组织人民阵线,逮捕了日本无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的有关人员四百余名,并下令解散这两个结社。当时司法省以“现在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有成为培育共产主义温床的危险性”,公然宣布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也予以镇压。到1938年(昭和13年),东大教授大内兵卫(1888—)等经济学者的集团也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连曾任文部省学生“思想善导”工作的自由主义者东大教授河合荣治郎(1891—1944)也以违反出版法被起诉,他的著作也禁止发行。批评战争的东大教授矢内原忠雄(1893—)也被大学解聘了。另外,从1937年夏天起以出狱共产党员春日庄次郎(1903—)为中心的集团,为了重新建党,在关西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团”,继续进行活动,但1938年

全体被逮捕。以后共产主义者小组的革命运动，虽仍然拼命地活动着，但刚一萌芽便被摧毁了。

在战争开始前不久的选举中，社会大众党受全国希望和平的人民所拥护，一跃当选三十七名议员，现在则认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是为了“根绝共产化”，“日本民族的圣战”（该党运动方针），站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最前列，号召“勤劳报国”。日本劳动总同盟在1937年10月的全国大会上宣言“期望根绝同盟罢工”。全国水平社也开始倡“一君万民”的论调。农会也定出了法西斯方针。虽然这些组织的领导者处心积虑，指望通过赞成军部“革新政策”，誓言协助战争，而保持其组织，但不管其意图如何，客观上总是使群众成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而已。1938年7月在政府的强迫和社大党干部的参加下，建立了产业报国会，工会也渐次被吸收到产业报国会中。总同盟虽然事实上已“产报会”化了，却仍然保持着工会的形式，到1940年（昭和15年）7月也被下令解散了。同年9月底，产报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起来，会员达四百十八万人以上。

火灾如果不在刚刚烧起来这一瞬间扑灭它，

等到扩大之后就晚了。日本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开始时，不能以一切反战势力的统一行动扼止它，因此便被从战争拉向战争，为法西斯主义和神秘的天皇主义所压倒。但是，虽然在这样苦难的日子里，日本人民在近代日本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理性的立场，仍然活在人们的心中。

以经过数年、十数年痛苦的监狱生活仍坚信历史的进步和工人阶级的胜利决不屈节而坚持斗争的市川正一、德田球一等为首，有着很多革命家。另外，在工厂或矿山努力劳动，同时，对在一起工作的工人灌输革命思想的工人运动家也不在少数。也有人在农村中和大家一起研究生活问题，努力于农业技术的提高，或在组织新的共同作业过程中，渐渐使农民具有和过去不同的新的思想方法。

知识分子中间，尽管经常地受到警察和宪兵的监视，也出现了象宫本百合子（1899—1951）那样的作家，不断地以“远大理想”鼓舞青年。也还有许多无名的男女青年成立小组相互鼓励，坚持理性和人道主义。被驱逐于讲坛之外不得不守沉

默的自由主义教授们，在今天不自由的——物质上、精神上——生活上，毅然坚持其学说和思想。此外，象物理学者汤川秀树(1907—)等，对国家划拨巨额预算的军事科学，理也不理，而专心研究科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有过世界性的贡献，并提高了日本民族声誉。

各种各样的人们从事形形色色的斗争，并没有集结在一起，只是各以自己的手法，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但是这些斗争，才正是战后日本重新建立为民主国家的基础。

国家总动员 为了充实因扩大战争而需要的庞大兵力、资材、军用品，实行把国内经济转向战争的总动员。1937年10月建立了企划院，作为总动员的参谋本部。压抑民需工业，将资本、劳动力、物资等都投入军需工业，除实施重要产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之外，陆续制定了输出人临时措施法、临时资金调整法等统制法规，加强了对整个经济部门的统制。

1938年(昭和13年)3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作为这些国家统制法规中的最高法规，另外，又制定了国家管理电力法。总动员法给了政

府以绝大的权限，从资本、劳力、物资以至出版等所有一切方面，都能随时无条件统治或动员。当它在议会表决时，近卫首相虽曾言明“在中国事变中不直接行使”，但两个月后，其中一部分已经实施。1938年7月实施了其中第六条，将工人的雇佣、工资、劳动时间等都置于国家统制之下。即不是由每个资本家，而是由国家权力来强制剥削，以保障垄断资本的最高利润。经济上的法西斯体制，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经济的统治，有时由官僚担任，也有时由卡特尔的支配者直接担任，但都是用这种统治和动员，使军需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庞大的军费投入军需工业部门，牺牲其他一切，在国家的保护和援助下，使生产上升了，各公司都增资数倍，贪取更高的利润。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将其重心完全转向军需生产。他们从战争中得了多么大的利润，将在下面综合叙述。

近卫内阁全体辞职 总动员体制是牺牲日本人民群众的生命、自由和生活而奉献给天皇制和垄断资本家。但是这样也没有达成他们所谓“完成圣战”，也不能挫折或削弱中国的抗战意志。随

着征服中国的失败愈益明显，统治阶级内部，以1938年5月近卫内阁改组以及后来政府与军部的内讧为开端，发生了新的动摇和危机。为了打开这个危机，近卫内阁想寻求新的对华政策。

攻占了汉口和广东之后，1938年11月3日，首相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它一方面表明征服中国的意图；一方面则修改了先前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象的声明，说是如果国民党政府能支持东亚新秩序，“日本政府当然不会拒绝”，来招引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派。

然而在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称为“近卫三原则”的对华政策。（一）中国停止抗日；（二）中国承认“满洲国”，订立“日华防共协定”，允许在特定地点驻扎日本军队；（三）给日本人在全中国各地和中国人同样的居住营业权，“特别是在华北和满蒙地区的开发和利用上给日本人以极大便利”。如中国同意则可以和平。其第二项意味着如果国民党政府停止和共产党的抗日合作，日本将帮助国民党政府进攻共产党。

这政策使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投降派动摇了。在国民党政府中力量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以

前就和日本有勾结，这时则利用近卫声明的机会，逃出重庆。蒋介石也动摇了。他们代表中国封建大地主和特权财阀，害怕国内的共产党和人民，比害怕日本帝国主义还厉害。但是汪精卫的叛变，激怒了中国人民，投降派反而难于出头露面了。

近卫在改组内阁失败后，由于无法掌握战争命运而待机下台，于是便趁着拉出了汪精卫的机会，1939年（昭和14年）1月全体辞职。接着出现了右翼团体“国本社”的首领以法西斯主义者闻名的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1867—1952）所组成的内阁。

第四篇 日本帝国主义 主义的崩溃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 大战和日本

第一节 欧洲战争的爆发

苏联的和平政策 当日本和德国在东西两方挑起战争并扩大侵略的时候,与之对抗的,即为建立国际和平战线而奋斗、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中心势力的苏联。

苏联从 1933 年起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而且提前完成了。该计划的胜利完成,使苏联的工业生产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七倍以上。私营工业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工业中唯一的制度。农业集体化也完成了。从此苏联站在人类进步的最前列,进入了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任务是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地发展、改善,来满足社会上不

断地增长的物质要求与文化要求。因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需要和平。苏联的对外政策始终一贯地致力于保卫和平、加强和平。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相对抗，在非侵略国间建立对抗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这便是苏联基本的对外政策。

苏联于1934年9月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对外政策的第一步骤。苏联在国联中，揭露日、德、意的侵略行为，提议建立与之对抗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则主张给以经济封锁等，想把这个软弱的国际组织，作为和平工具，尽量加以运用。又作为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一环，和各国分别缔结了一些反对侵略的重要条约，例如1935年5月和法国，同年同月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3月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互助条约，1937年8月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等便是。而且苏联对于抵抗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而勇敢战斗的各民族（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中国）始终给以大力的支持。

慕尼黑协定 但是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拒绝集体安全保障，他们孤立苏联；同时，尽最

大努力使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矛头指向苏联。1937年11月,英国政府在向希特勒表示了容忍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之外,还建议组成英、法、德、意的反苏的欧洲同盟。因此,得势的纳粹德国,便于1938年3月侵入奥地利,强制合并。苏联曾提议召开应付这种扩大侵略的国际会议,但被英国拒绝。

继而希特勒于1938年9月,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方。于是围绕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关系,使列强处于抉择的歧途上:以集体安全保障防止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还是拒绝集体安全保障,使法西斯主义加倍侵略呢?

苏联表明为了维护集体安全保障、阻止法西斯侵略行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根据互助条约,具有和德国战争的决心。意大利声明完全支持德国。这时英国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并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使捷克政府废除和法国、苏联缔结的互助条约。9月30日英、德、法、意四国在慕尼黑会议,不让当事者的捷克参加,并完全不顾苏联,缔结了协定,决定将苏台德地方交给德国。美国也表示了支持这个协

定的态度。

慕尼黑协定，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对法西斯实行“绥靖”政策的最高峰，本质上是英、法、德、意的反苏协定。战争的玩火者展开了全面的进攻。1939年3月，德国征服了捷克全国，并在北方从沿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手中夺取了默麦尔港。法西斯意大利则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继而德意两国订立了军事同盟（1939年5月）。

英法对德宣战 随着纳粹进行着一连串的露骨侵略，英、法人民要求集体安全保障的呼声也高涨起来了。英法政府装作顺应人民的要求，1939年3月同意苏联提议的关于组成英、法、苏、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六国和平战线的谈判。但是英、法的态度是帝国主义典型的欺骗外交。英、法在这次谈判中对苏联既不约定给予任何援助，还想利用苏联对抗德国；另一方面，则威吓德国，企图驱使它进攻苏联。因此，英、法在和苏联谈判的背后，还和希特勒政府进行着牺牲苏联、瓜分世界的秘密谈判。

正当这时，1939年5月起，远东方面日军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诺门坎地区，以关东军的

精锐掀起了不宣而战的**对苏蒙战争**（诺门坎事件）。此外，德国又和日本进行了将防共协定更向前推进进一步的军事同盟谈判。苏联如再因循不决，眼看将陷于被帝国主义国家东西包围的危险。它知道不能和英、法结成反法西斯的军事协定，8月在东方展开了歼灭入侵日军的作战；同时，在西方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8月23日）。以此打击了英法的反苏阴谋，暂时拖延了德国的对苏进攻。以后苏联所进行的强化防卫体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胜利，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纳粹虽把苏联作为最主要的侵略目标，但为了达到目的起见，制定了首先夺取波兰，掌握西欧的工业力量，而与英、法决战的方针。于是纳粹便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不久，即1939年8月1日，以机械化部队大军，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发动了对波兰的侵略战争。9月3日英、法以援助波兰为名对德宣战。

世界大战 由日本、意大利、德国发动并予以扩大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法西

斯三国分别单独对其邻近的弱小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侵略，而被侵略民族也分别地进行了民族解放战争。这时所有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都还未加入战争，还不是世界大战。但到德国和英法开战，继而意大利加入德国方面参战（1940年6月），便成为英法对德意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世界战争了。日本和德、意进行军事同盟谈判（后而叙述）。美国虽尚未参战，但积极地准备加入英、法方面。英、法（美）对德、意（日）的战争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都是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但是英、法、美方面只要和被三个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有提携，就蕴藏着可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因素。又在第二阶段，被三个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各国人民激烈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仍在继续进行。

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仍希望德国转向反苏战争，所以对于德国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没有得到英、法援助的波兰遭德国进攻，立刻便失去了战斗力。

苏联为防止战争危险迫近国境，并为解放1920年被波兰夺去的原属苏联的领土和人民，而

进军波兰领有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并予以合并。又和沿波罗的海三国签订了互助条约。更向芬兰提出改定国境的建议。因为芬兰政府与纳粹有勾结，而列宁格勒，又处于芬兰边境长距离大炮射程之内。芬兰在纳粹军部指导之下，建造了攻击苏联的坚强基地。苏联乃提出建议愿以两倍的领土与列宁格勒附近的芬兰领土相交换。

苏联的行动虽不外乎是防止希特勒侵略的对策，但英、法则攻击苏联的行动。芬兰政府由于与纳粹勾结，并得到英、法的支持，因而向苏联挑衅，1939年11月底便爆发了苏芬战争。英法政府将苏联开除予国联之外；同时并给芬兰以大量武器弹药。美国、意大利也都援助芬兰。美、英、法、意间公然进行了反苏共同作战的谈判。由于这时苏芬间已媾和（1940年3月），这些发动反苏战争的计划都失败了。

在英、法策划反苏战争期间，德国完成进攻作战的准备，1940年4月，侵入丹麦和挪威，5月侵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英法军几乎不战而退，6月法国投降。在法国投降前不久，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加入战争。

由于法国的投降，英国便直接受到侵略的威胁。1940年9月英国以取得五十艘陈旧的驱逐舰为交换条件，允许美国在西半球的英国领土建立空军基地。这一方面表明了英帝国主义的软弱化和对美国的从属化；同时，另一方面也表示了美国垄断资本更将积极地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

第二节 三国同盟和新体制

三国同盟的谈判和进攻苏联 当1914年(大正3年)第一次欧战爆发时，日本的统治阶级把它当作“天祐”，满心欢喜；1939年9月第二次欧战爆发时，日本的统治阶级对于他们自己当主角所制造出来的世界情势，反而感到“复杂离奇”，惊惶之余，竟而胆怯了。第一次大战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对于大战的爆发，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利用了列强的战争，从中找到摆脱慢性萧条的生路。与此相反，第二次大战，日本却是第一个放火者。因为它最先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摆脱经济危机也比其他国家早，并在各国正苦于萧条时，工业生产已得到飞跃的发展。正因如此，所有帝国主义国家

刚才开始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战争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了，而这次战争又是它自己发动的。不但没有余力有利地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立，反而成为列强对立与世界战争的最大中心国之一了。

从1938年中起，当时近卫内阁为了打开侵略中国的僵局，应德国的建议，打算把日、德、意三国的防共协定改为军事同盟。谈判中，德国预料到和英、法的战争，乃要求不仅将苏联，而且将英、法也作为对象，而日本的海军和外务省主张只以苏联为对手，陆军则主张全部接受德国建议。近卫内阁在未作出结论中辞职。继任的平沼内阁曾前后召开七十次首相和陆、海、外、藏五相会议，谋求意见一致。

这期间，日军于1939年2月占领了南中国海的要地海南岛，继而宣布菲律宾西方的无人列岛为日领（名新南群岛）^①。这些行动具有完成封锁中国和向南方建立新侵略据点等两个目的。这点，更是加深了和美国的对立。

不久，日军又进一步开始了新的冒险，1939

^① 即中国南沙群岛。——编者

年5月，关东军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诺门坎发动对苏蒙的战争。侵略苏联原为日本一贯的基本方针，建立“满洲国”就具有准备对苏战争的因素。因而在巩固满洲后，便接二连三地满苏国境挑起争端，或要求苏联移交中东铁路等，反复地对苏挑衅。1938年又发动了张鼓峰事件。诺门坎战争是这些一连串挑衅的高峰，并已超出单纯国境纠纷的规模。在这个战场上用了一万五千余关东军精锐部队。一方面对外作为对苏大规模的试探战；另一方面对内则推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并希望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进一步的绥靖政策。但在8月，日军为苏蒙的机械化部队所歼灭，死伤一万一千名，达总兵力的73%。

正在这时，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三国同盟的交涉被打断了。于是军部和政府都为之茫然。平沼内阁发表了欧洲情势“复杂离奇”，找不出应付方针的这一国际政治史上空前笨拙的声明而全体辞职。由陆军大将阿部信行(1875—)组阁。这时欧洲大战已经爆发，关东军虽然新派了两个师团到诺门坎，准备反攻，但由于得不到德国的支持，又完全没有能继续战争的自信，乃于9

月 15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诺门坎战争时，日军“防疫供水部”在水源地撒播了霍乱、伤寒、鼠疫等细菌，使得这些传染病流行，因而获得军部的特别奖状。以后，日本在哈尔滨南方设立了名为“满洲二五二〇二部队”（通称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所本部，并在北满设支所四处，诬指中国人、俄国人等两千余名为间谍，加以非法逮捕，供作实验的牺牲品（秋山浩：《准备了细菌战》，载《文艺春秋》1950年8月号）。

长期战下的各种矛盾 阿部内阁以不参预欧洲战争，以所谓“处理中国事变”，即尽全力侵略中国为方针。但是这个内阁所能做到的只是准备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其无能的情况连陆军也感到棘手，乃迫使他辞职。

1940年（昭和15年）1月海军大将米内光政（1880—1948）组阁。同年3月汪精卫建立“国民政府”于南京。然而中国人民完全没有支持他。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更加猛烈了。八路军从1940年8月起动员四十万大军向华北的日军阵地展开了三个月的进攻（百团大战）。

日本不仅未取得任何军事上的成功，且加深

了其经济的、社会的矛盾。1938年世界危机的再发，给日本的出口贸易以打击。贸易上的实际赤字增大了。1939年愈益痛感基本物资和电力的不足。连筹措“开发满洲”把中国东北建设成为兵站基地的资金也发生困难。在中国占领区内，日本资本虽以华北的“华北开发”、华中的“华中振兴”两大国策公司为首，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但这也不能解决战争长期化的经济困难。

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如以1937年为一〇〇，1938年减为九八，1937年回升为九九，1940年激减为八六，1941年则为八四，并被强迫从事长时间劳动。全部工业军事化的结果，1938年八十万民需工厂工人和五十万商店的业主和店员合计一百三十万人变成了失业者。他们不久便作了军需工业的“临时工”，在最坏的条件下从事劳动。

由于通货膨胀，物价继续上涨。政府虽颁布了价格停止令，其实只不过冻结了工资。生活物资不仅上涨，而且极端缺乏，黑市和公定价格相差悬殊，一般人日益难得买到黑市物品了。早在1938年起就禁止纯棉制品在国内批发，因之包括

纯棉织品的衣料和日常必需物资的缺乏愈益严重，如火柴、烟草、砂糖等也都很难买到。

第 36 表 战争时期国内产米量

	耕种面积	总产量	每反产量
1937年	3,217千町	66,320千石	2.072石
1938年	3,220	85,869	2.045
1939年	3,193	86,964	2.160
1940年	3,178	60,874	1.915
1941年	3,182	55,088	1.731
1942年	3,164	66,776	2.110
1943年	3,110	62,887	2.022
1944年	2,979	85,559	1.965
1945年	2,893	39,149	1.353
1946年	2,804	61,386	2.189

(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第一回)

此外，食粮，特别是米深感缺乏。有如上表，战争自开始以来，国内的种稻面积、总产量、每反收获量都在逐渐减少着。尽管受气候影响有丰收和歉收，但大体上是走向下坡。

然而由于军用米的需要急剧增加，朝鲜和台湾米也因当地的军需和军需工业工人的需要增加，运往日本的米在减少着，所以 1940 年便发生

了食粮危机。政府的对策是从 1939 年起,强迫农民将米卖给政府(义务交售制)^①,并禁食白米、奖励代用食等,但主食的缺乏仍日趋严重。

由于生活如此恶化,尽管工会、农会都被摧毁,一切的自由都被剥夺,但仍然没有消灭纠纷。有如下表,1939年劳资纠纷的参加人员又增加了。

第 37 表 战时中劳资纠纷与租佃纠纷表

	劳 资 纠 纷		租 佃 纠 纷	
	件 数	参加人数	件 数	参加人数
1936年	1,945	91,570	6,804	77,187
1937年	2,126	213,622	6,170	63,426
1938年	1,050	55,565	4,615	52,817
1939年	1,120	128,294	3,578	52,904
1940年	732	55,003	3,165	38,614
1941年	334	17,285	3,308	32,289
1942年	268	14,373	2,756	33,185
1943年	443	16,694	2,424	17,738
1944年	296	10,026	2,160	8,213
1945年	256	164,585	1,127	—

(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第一回及《土地改革始末概要》)

① 日本战时颁布食粮管理法,农家所生产的米、麦、杂粮、山芋以及山芋的茎、叶等除留自家消费量外,均须照规定价格卖给政府,如有违反,处三年以下徒刑或三万元以下的罚金。战后逐渐撤销,仅保留米一项,亦于 1956 年改为预售制度,由政府先付预售奖励金给农民,不再用政治权力收购农产品。——校者

南进政策 统治者不是以停止战争为摆脱这一切困难的途径,反而是进一步扩大战争,侵略东南亚。马来半岛、婆罗州、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地产的橡胶、石油、食粮、锡等物资,日本垂涎已久。占领海南岛的目的之一,就是夺取其丰富而优良的铁矿。

早在1936年(昭和11年)8月广田内阁时就曾拟定了初步的“南进”国策,并将台湾总督由文官改为武官制。等到和中国进行了三年的全面战争之后,“南进”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起死回生的唯一途径了。1940年(昭和15年)荷、法两国在德国进攻下投降,英国濒于危机,这种情势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南亚“前进”以绝好的机会。日本政府立刻提出了无理要求。首先迫使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答应禁止经由该地向中国运送物资,并在实施监视的名义下,派日本军事代表团进驻该地。继而向英国提出禁止经由缅甸向中国运送物资的要求。英国答应停止运送三个月。

日本又要求荷属印度尼西亚当局供给它大量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以及用日本资本开采油田,并派民间和政府的代表往荷印进行谈判。代

代表团中间也包括有军事专家。

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政策，和拥有菲律宾做殖民地、并对东南亚市场非常关心的美帝国主义发生了利害冲突。美国政府采取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压迫的一连串的措施。美国在日美通商条约满期的同时，便宣布废除该约（1940年1月），对于运往日本的重要原料与军需资材实行统制（7月），更将废铁、石油也列入统制项目之内（9月）。日军在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后不久，美国政府又借给中国两千五百万美元（9月）。

第二次近卫内阁和三国同盟 米内海军大将内阁对于海军所主张的“南进”虽进行了准备；但对实行南进会造成和美英对立的激烈化，已感为难，更不敢冒险依照陆军的要求与德国订立同盟而和英美作战。连打开国内经济难关的办法也想不出来。海军内阁如此因循，陆军非常不满。1940年6月使陆相畑俊六（1885—）辞职，以不提出后任人选的办法，搞垮了米内内阁。但是陆军也没有接掌政柄的自信 and 责任感。这时很显然无论陆军、海军、重臣或政党的领导人等所有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和派阀完全丧失了信心，谁也没有责任

感。大家不知所措，同时都互相责骂，推卸责任，虚张声势，把国家引到灭亡的边缘，引到与世界为敌的战争中去了。

统治集团这种竞相不负责任的结果，再由“臣民”中和天皇关系最深的枢密院议长、公爵近卫文麿组阁。当时近卫仿照纳粹和法西斯的办法，为了建立“举国的政治体制”，拟组织新政党。军部想利用它作为屏风；旧政党和官僚都蜂拥加入新党，以期保持势力。

但近卫也胸无成竹。组阁之前，曾和拟定的陆相东条英机、海相吉田善吾（1885—）、外相松冈洋右（1880—1946）会谈，确定新内阁的方针如下：（一）加强战争经济体制；（二）加强日德意轴心；（三）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这期间“充实不至被苏联打败的军备”（即完成进攻苏联准备的意思）；（四）“积极采取措施”，将东南亚英、法、荷、葡的殖民地划入“东亚新秩序”之内；（五）关于第四点，具有坚决排除美国武力干涉的决心；（六）为了完成征服中国起见，进行“彻底的作战”和完全封锁中国；（七）灌输尊重国体的思想，建立团结全国人民的新体制。

简言之，不外是决心发动后来的“大东亚战争”而已。根据这个方针，新内阁又开始了一年前中断了的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谈判。这回是日本积极主动，想与德国结盟，给美国以军事压力。担心美国参战的德国同意进行谈判。1940年（昭和15年）9月29日，日、德、意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表面上规定当美国、德、意或日本发生战争时，三国立即共同与之作战。字面上规定同盟条约不影响三国和苏联旧有的关系。然而正象同盟成立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并没有放弃共同侵略苏联的本来目的。德国里宾特洛甫外相和日本的松冈外相都确认这个条约也是反苏同盟。

新体制 当近卫内阁成立时，从7月到9月间，各政党都象“赶公共汽车”那般争先恐后地自动解散了。其中最先解散的就是社会大众党。

近卫组阁后，放弃了一国一党的新党方案。他认为如果一国一党的党魁当了首相，便无异“幕府”的复活——骑在天皇头上的实力者——，非常不妥当。于是近卫等在1940年10月建立了不作为政党，连军人、官僚也能参加的结社“大政翼赞会”（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翼赞会本部、支部的

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社会法西斯头子以及妇女领袖等，包括统治阶级各界各层代表或走卒所构成。本部总裁由首相担任，支部长则任命都、道、府、县知事担任。此外，在中央和地方，仿照法西斯的职业代表协议会建立了“大政翼赞会协力会”，议员也是由总裁、支部长任命。关于翼赞会的性质，在1941年（昭和16年）2月曾正式宣布为“政府的辅助机关”。

作为翼赞会的最下层组织，建立了邻组制度。这是根据1940年9月的内务省令，作为政府辅助机关在全国建立起来的。“邻组”是由近邻十户左右组成，邻组上面在村设“部落会”，在町设“町内会”。通过这个制度，政府以各部落、各街道上的恶霸为走卒，对全国人民进行监视、统治以及动员。这是比幕府时代的五人组制度更为严密而凶狠的压制人民的组织。

人民不仅在居住地为邻组制度所束缚，在工作地点也都被编入各种“报国会”中。工人加入“产业报国会”，农民被强迫编入“部落常会”和“农业实行协会”中。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米粮，也是按部落单位分派。这和德川时代以村为单位征收租

税相同。男女青年被拉入“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妇女被拉入“国防妇女会”和“爱国妇女会”（后合并为“大日本妇女会”）中。兵役适龄者，纵令一次也未曾被征入伍，也都被编入“复员军人会”，施以定期的军事训练。对于知识界，则在1940年10月成立的内阁情报局和翼赞会文化部指导下，分别建立了言论、文学、演剧、美术、音乐等部门的报国会。没有加入这些组织的著名的文化人仅少数具有高度节操的人士。

贵众两院的议员们，起初被放在翼赞会议员局里。然而议会是立法机关，翼赞会不过是行政辅助机关，把议会议员列入于翼赞会下面的一个机构中，尽管议会仅仅是形式上允许存在，毕竟有欠妥当。1941年9月把它改为和翼赞会不同的翼赞议员同盟，继而又于1942年（昭和17年）5月改名为翼赞政治会。但实质上不外是翼赞会的“议员局”。不过是表示似乎日本仍有民选议员的装饰品而已。

在实行“政治新体制”的同时，“经济新体制”也建立起来了。在产业和金融各部门中建立“统制会”，在由纳粹直接输入的“公益第一”的名义

下,不外是以国家权力,保障垄断资本最大利润的体制而已。几乎所有的中小工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由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不能改编的就被消灭)。这不只是消灭中小工业,而是通过改编方式对它们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使我国垄断资本攫取暴利的一种手段。就资金和资材的使用效率及制品规格的统一这方面来说,这种做法是对国民经济的很大损失,也是战争经济的一个弱点。但对于资本家说来,既然赚钱就是他们的最高目的,他们也就保留了日本资本主义长久以来的这种方式——让中小企业对工人、学徒进行半封建的剥削,然后大资本再剥削中小企业。

新体制正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完成。人民为这个体制所束缚,在“实践臣道”、“尽忠职务”的口号下,全国人民一切的自由和人权完全被剥夺了,变为天皇的奴隶,垄断资本的奴隶,被驱向战场。

第三节 苏德开战和日美开战

日美谈判和日苏中立条约 日本以美国为敌

和德、意结成三国同盟之后，日美冲突便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政府对抗三国同盟，马上声明援助中国和英国，并取消向日本输出废铁的许可制，加以全面禁止（1940年10月）。另外美国又给中国政府以一亿美元的贷款。英国继而也给中国政府以一千万英镑的贷款（1940年12月）。一度被封锁的滇缅公路，基于美国的要求，三个月期满后，恢复通车。近卫内阁在完成南进的准备之前，欲调整日美关系，于1941年（昭和16年）1月，先是非正式的，继而从4月起正式和美国进行谈判。

非正式谈判时，美国方案中提出了美国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就是中国东北以外的地区，以撤兵为条件，也承认日本有经济特权以及为“反共”而产生的军事的政治的特权。并援助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侵略，采取极端“绥靖”的方针。然而到了正式谈判以后，美国放弃了这样的方针，将重点移到原则性问题和讨论日本从中国撤兵的问题上面。美帝国主义也是为了争取准备战争的时间。因为日美双方都是这样的态度，所以谈判只是拖延时日而已。

日本早在 1941 年 1 月底就已决定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建立进攻新加坡和其他南方地区的军事基地，利用两年以来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国境纠纷，在泰国也取得建设军事基地权。而一年前开始的和荷属东印度的谈判，由于荷属东印度当局的一再让步，如果日本只想取得石油及其他重要物资的话，谈判是会达成协议的。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想统治荷属东印度，乃令派往该地的代表故意不使谈判达成协议；并在 6 月片面地停止谈判，发表了日荷谈判决裂的声明。这正是日本代表团中军事专家绘成了荷属东印度军事地图的时候。

近卫内阁又依据既定方针，想暂时谋北方安全，企图调整日苏邦交。谈判顺利。1941 年 4 月 13 日松冈外相在莫斯科和苏联莫洛托夫外长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日苏中立条约。

德国侵略苏联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七十天，德国突然进攻苏联。以前，德国在占领法国之后，原想进攻英国本土，但由于担心后方的不安全和粮食、石油的不足，不敢进行登陆作战；掉转方向，从 1940 年 10 月起，开始了巴尔干战争。这是

对苏战争的准备，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1941年4月起，德国又威压芬兰，把它作为从北方进攻苏联的基地。继而在5月，纳粹副总统赫斯为了对苏作战想和英国谈和，飞往英国。

苏联政府早就看透了纳粹的计划，在纳粹进行巴尔干战争之前，1940年6月就要求罗马尼亚归还1919年干涉战争时夺去的苏联领土；7月北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苏联，巩固了对德防卫体制。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拒绝同纳粹谈和。原因是：第一，正当英国人民痛恨纳粹，对于反纳粹力量最大的苏联，抱着很大信赖和期待的时候，任何一个政府也无法突然和纳粹和好，使纳粹进行反苏战争；第二，英国首相丘吉尔等过于低估了苏联的力量，认为如果现在援助纳粹进行对苏战争，纳粹会很容易取得胜利，害怕它再反过头来攻击英国，乃期待通过支援苏联，使德苏两败俱伤。

纳粹就在未和英国取得和平的情况下，6月22日，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便以四百万大军，在苏联西部国境全线展开进攻。同

一天,英国政府发表了支持苏联的声明^①。第五天美国政府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继而在7月英、苏签订了军事协定,8月美国也声明给苏联以武器援助,1942年1月1日与德、意交战中的苏、英、美、法等盟国二十六个国家发表了不单独媾和的共同宣言。

苏联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苏联和英、法、美的联合,尽管英、法、美仍然具有帝国主义的成分,而第二次大战的性质却为之一变。从帝国主义间的大战,转变为以苏联为主力、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战争。被法西斯主义奴役的欧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以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都和苏联的卫国战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大战进入第三阶段。

^① 美国援助苏联也和英国同样,是在人民反纳粹斗争的压力下与企图苏、德两败俱伤的两个前提下出发的。民主党上院议员杜鲁门(后来做总统)在苏德开战第二天曾公开说:“如果我们看见德国会胜利时,我们就帮助俄国,而当我们看见俄国会胜利时,我们就帮助德国。总之,要让他们互相残杀,杀得越厉害越好。”(《纽约时报》1941年6月24日记事。引自哈歇尔·梅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分析》)

苏德战争和日本 刚刚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的松冈外相和陆军，看见突然出击的德军向苏联领土内迅速推进时，主张立即进攻苏联。近卫首相和海军主张等到德国确有胜利把握，日本能确保东南亚以完成战争准备之后，再进攻苏联。二者都把日苏中立条约看成一文不值。本来日本就是为了争取完成准备侵苏的时间而签订此约的。

终于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延缓对苏进攻，秘密完成侵苏准备，等到德苏战争进行到对日本有利时，即进攻苏联。

根据这个决定，日本以“关东军特别演习”（关特演）为名，实行了日本陆军史上空前的大动员。关东军的兵员，约增加到七十一万人，几达过去的两倍，陆军现有的战车和飞机，大部分集结在满苏国境上。

日本以大军威压苏联，企图不战而夺取西伯利亚、北库页岛和堪察加。根据8月4日（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决定向苏联提出下列要求：

当前的要求是（一）撤消远东海防；（二）不得将苏联远东领土割让、出卖、租借或提供军事基地与第三国；（三）苏联和第三国（英、美）的军事同盟

适用范围不得涉及东亚，以及不得和第三国缔结以日本为敌的同盟；（四）停止援助中国；（五）保证北库页岛日本的利权事业等。此外则依“种种情况”提出：（一）签订渔业条约；（二）收买或割让北库页岛；（三）租借或割让堪察加；（四）租借、割让黑龙江以东的苏联领土或非武装化；（五）使苏联其他远东领土的全部或一部非武装化等要求。

由于苏联军民挫败了德国的闪电战，使日本没有提出这些要求的机会。但当苏联处于生死关头，日本以大军牵制远东的苏军，使之不能调往西部战线；又如定出上述侵略目标，这些事件本身已使日苏中立条约成为一纸空文了。

日美开战 在决定暂时延缓侵略苏联这次御前会议上，政府和大本营作出了下列决定：当前以全力向东南亚扩张，为了达到此目的“不辞与英美一战”。由于松冈外相盲信德国在数周内就会完全征服苏联，并能立即迫使英、美屈服，坚决主张立即进攻苏联，也不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不但要求美国承认满洲国，并且在承认日本过去一切对华政策和既成事实之外，劝告重庆政府停止抗战，即事实上使重庆政府向日本投降。而美国也在谈判

过程中愈加表现了强硬态度，根本否认过去日本的行动。

近卫等虽想使日美谈判达成协议，但根本没有考虑过在原则上采取与松冈乃至陆军省不同的路线，以与美国妥协。只是由于松冈事事都刺激美国，因而为了免他的外相职务，内阁便一度全体辞职(7月16日)，随即又出而组织了第三次近卫内阁。外相由预备役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藏相为住友财阀的小仓正恒(1875—)，其他商工、铁道、邮电等经济阁僚都是垄断资本家担任。多少有点理性又是知识分子的近卫和善于精打细算的大资本家们不象军人那般狂妄，也不象松冈那般粗鲁，对自己所挑起的战争要走上最后一步时反而感到踌躇。虽然为时已晚，他们也不是肯为阻止走这最后一步挺身而出的人物。

7月23日，第三次近卫内阁一方面继续和美国谈判；一方面则威吓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允许日军进驻该地南部。28日便实现了，作为占领全东南亚的前进基地。假如政府真正想和美国妥协，就不会这样对美挑战。美、英看清了日本的战争决心，便实行反击，25日英国废除了日本和英国、

印度、缅甸的各种条约,26日美、英两国冻结其领土内的日人财产,美国并决定向中国政府派遣军事顾问。28日荷属东印度也宣布冻结日人财产,废除石油协定。从此迅速地完成了对日A、B、C、D阵线^①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对抗措施。

这时日美谈判事实上等于决裂了。以后的谈判不过是双方争取备战时间的骗局而已。欺骗的双方,美方远较日本高明。罗斯福总统巧妙地挑动日本,使日本先开火。日本在9月6日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无达到目的的希望时,则决意立刻与美、英、荷开战。

到了10月,美日谈判仍毫无达成协议的迹象。东条陆相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则不愿负开战的责任,主张继续谈判,终于以不能压制东条等开战论为理由,向天皇呈请全体辞职。天皇听从内大臣木户幸一(1889—)^②的意见,批准

① A. B. C. D 即 America (美国)、Britain (英国)、China (中国)、Dutch (荷兰)的缩写。

② 木户的证言说,天皇和他之所以主张任命东条为首相,其目的在把东条放在负首相责任的地位上,使他认识到开战的无谋,以压制军部的开战主张。如果这是事实,天皇和木户是何等极不负责任的卑鄙之徒。而且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

近卫辞职，并任命东条为首相。天皇完全成为战争的推动者。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12月上旬向美、英宣战。日美谈判虽在继续进行，但决定它不得影响备战。

12月1日，天皇正式决定开战，美国政府也预料到最近日本可能突袭珍珠港，并加以提防。

1941年12月8日，天皇和他的政府、军部不经宣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了对美、英的疯狂战争。同一天日本海军突袭了珍珠港，陆军在马来亚半岛登陆，另有陆军航空部队轰炸了菲律宾的美国空军基地。数小时后才正式宣战。日美两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对太平洋和中国的支配权，三十余年的对立，终于爆发为大规模的战争了。

长就曾写道：“天皇逐渐趋向开战论，就是近卫内阁辞职的原因。”木户的日记中也提到，天皇屡次询问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关于与美、英、荷开战是否有胜利把握？并表示如能取胜，就开战。

第十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

第一节 战局的转变

初战的胜利 开战当时日本陆军地上部队约20%左右,计十个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团,航空部队约二分之一左右,计七十个中队,派往南方作战。以陆军的机械化部队为首的最精锐兵力十三个师团和二十四混成旅团及航空部队五十六个中队,驻屯中国东北,伺机进攻苏联,二十一个师团和二十个混成旅团及十六个空军中队置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挥之下。即日本陆军主力仍担任对苏、对华作战。海军当然是全力投入南方战场。开战时拥有舰队船三百九十一艘(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吨)、飞机三千二百零二架,与临时征用船只一百八十万吨。此外,有建造中的舰船八十八艘(约三十七万吨)。

继最初突袭成功之后，开战后第三天即 12 月 10 日，日本海军基地航空队在马来海歼灭了以号称不沉的最新型战舰“威尔斯亲王号”为旗舰的英国东洋舰队的主力。这证明拥有足够数量的基地空军比没有充分空军保护的舰队优越。这一点，在战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日本自己并没有了解其意义）。西太平洋的制海、制空权，完全归于日本了。

到 1942 年 3 月止，日军占领了香港、马来、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菲律宾的大部分、缅甸的仰光以南；又拿下了以关岛、威克岛两岛为首的中部太平洋各岛屿，更远达俾斯麦群岛的拉普尔。5 月初太平洋美陆军最后据点吕宋岛巴丹半岛的科累奇道尔要塞也被攻陷，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逃往澳大利亚。

对旧式的、空军力量极为不足的、少数殖民地守备军，突然进攻，所以能轻易地获得胜利。军部与政府都被这种胜利冲晕了头脑；大多数人民也随着有军舰进行曲伴奏的胜利播音而欢呼，做了疯狂的军国主义的俘虏。

中途岛和瓜达康纳尔岛的战败 但在这种热

狂中，黑暗的阴影也悄悄地来临了。1942年（昭和17年）4月18日，东京遭到由航空母舰起飞的美国空军第一次轰炸。所受物质和人命的损失，虽极微小，但它所给军部和人民精神上的打击却很大。军部为了保卫本土，感到有确保南方占领地外围的必要，乃将战线扩大至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中途岛、阿留申群岛一线，当初未曾预定的作战地区。这是超出了日本作战能力，特别是超出飞机、舰船和供给力量的作战。

勉强进行作战的结果，5月初珊瑚海海战中，日本海军第一次吃了美国舰队的败仗。继而在6月，日本海军主力进攻中途岛时，为美国基地和海上机动部队的空军所击溃，失掉了四艘航空母舰、两艘重型巡洋舰。

中途岛的败仗，没有发表；相反地，仍然大肆进行胜利的宣传，说占领了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吉斯卡两岛，或说在新几内亚作战，不久即可攻下摩勒斯比港等。然而在南方从1942年8月起，以美军为主力的盟军，在日军最南方前线的瓜达康纳尔岛开始反攻。9月新几内亚作战也陷于僵局，不得不放弃对摩勒斯比港的进攻了。

瓜达康纳尔岛的攻防战继续到1943年2月。该岛对日军并不具有必须占领的战略意义，而大本营在这次争夺战中，却陆续投入了可能调动的陆海空军。但不是一次派出大军，而是陆陆续续补充少数兵力，每一次又都被歼灭了。作战方法极其笨拙。因之在这次战斗中，第一次失掉了两艘战舰和其他驱逐舰以上的战斗舰艇三十八艘，不仅使日美舰队力量逆转，美空军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也居绝对的优势。于是两个师团以上的日军地上部队，被盟国登陆军击溃了。它在兵数上虽居劣势，但空军居压倒的优势，又有无限的供给力量。日军则完全没有接济，在战斗、饥饿和疾病的侵袭下，几乎全被歼灭了。

关于这次败仗，大本营发表说瓜达康纳尔岛的部队“转进”了，但是人民则了解到这是最悲惨的失败。军部不坦率地承认战败，反而更失去了人民的信赖。初期的军国主义热狂，很快地便消沉下去了。

大本营之所以固守瓜达康纳尔岛，是担心失掉已经占领的地方，即使是一个小岛，也会降低士气，并失去人民的信赖，但结果，反而招致了更坏

的后果。

瓜达康纳尔岛之战以后，日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也采取和瓜达康纳尔岛完全同样的战法，想固守任何一处，并陆续投入少数兵力，终于被击溃了。1943年（昭和18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1889—1943）大将在西南太平洋上空指挥作战中遭美机攻击战死。北太平洋方面，1943年5月，阿图岛为美军夺回。日军两千五百人全部战死或自尽。开始了所谓“玉碎”的悲剧。仅吉斯卡岛的守军于7月下旬安然撤退。

大陆战场 太平洋战场的形势虽然发生变化，但日本陆军主力仍然被牵制在中国大陆上。日本既与美、英开战，同时企图赶快征服中国，以便投全力于太平洋战场。又当时由于蒋介石政权已不将主力用于抗日，而是放在进攻中共军和解放区，日本便乘机计划扫荡解放区。结果，在1942年中，日军使华北的八路军从四十万人减少到三十万人，解放区从一亿人口缩小到五千万人口的地区。在华中，1942年5月也展开了新的作战，占领了浙江、江西两省的飞机场和重要地区。

日军进攻解放区实行极端野蛮的三光——烧

光、抢光、杀光——政策。但是中共和人民并不沮丧。中共在抗日战史上最艰苦的斗争时期，也进行了提高党员质量的新的运动，象铁一般地巩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因此从1943年春起，重新恢复并扩大了解放区。夏天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完全取得联系，在南北相接的全线上展开了猛烈的游击战。1943年9月，华北日军以大部队对中共军展开了正面攻击，但战斗三个月遭受很大损失而败退。

斯大林格勒之战——世界战局的转变 当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和盟军的地位开始转变时，欧洲战场上进行了决定第二次大战命运的斯大林格勒的攻防战。1941年6月，突然袭击苏联的纳粹大军，三个月就包围了列宁格勒，进抵莫斯科附近。但是希特勒的闪电战，被共产党领导下为保卫祖国而紧密团结起来的苏联人民所挫败了。

希特勒改变了攻击目标，1942年春起，将主力投入南部战场，7月包围了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占领了它，就可以控制俄罗斯联邦的动脉——伏尔加河，切断俄罗斯的两大大工业基地，乌拉尔和乌克兰的联系，并可以从

侧面进攻莫斯科。德军虽然几乎完全占领了此城，但1942年11月红军转入反攻，包围了德军。1943年1月底德军投降。

苏军消灭了全部德国最精锐部队三十三万人。这不仅是苏军从法西斯侵略下保住了祖国而是从法西斯压迫下拯救了全人类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红军的胜利，给世界的法西斯以重大打击。日本完全丧失了进攻苏联的机会。日本军部一向对德军所抱的绝对信赖也被推翻了。和日本同样，集结大军于苏联国境的土耳其也放弃了进攻苏联的念头。“斯大林格勒”一词成为指导并鼓励一切民主主义者走向胜利的代名词了。它特别鼓励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法西斯占领地区各民族的抵抗运动更加猛烈了。

1943年3月德军虽又在南方发动攻势，但在7、8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被苏军粉碎。从此苏军在全线转入大反攻。

意大利投降 当德军主力被牵制于斯大林格勒的1942年11月初，美国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盟军在北非登陆。1942年5月，当苏军一手扼住法西斯大军进行最艰苦战斗的时候，美、英曾和苏

联约以同年在西欧登陆，开辟对德的第二战场。然而以英国首相丘吉尔为首的英、美统治集团，希望德、苏两败俱伤，没有实践诺言。他们不是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而是进行了确保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掠夺意大利殖民地的战争。北非战争至1943年5月以美、英、法盟军^①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北非战争胜利的盟军，7月——乘德军在东部战场的库尔斯克发动最后的大攻势的空隙——窥伺意大利本土，在西西里登陆。

1943年3月，意大利北部各地工人为改善待遇的大罢工获得胜利，斗争更进而发展为争取和平和自由，打倒墨索里尼的斗争。站在反战、反法

^① 法国本土于1940年6月被德军占领，在维琪树立以贝当元帅为首的德国傀儡政权。然而国内以共产党为先锋，一切爱国人士——不管是信神的或是不信神的——展开了各种抵抗运动。1943年5月各抵抗团体统一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此外戴高乐将军等则流亡英国，继续坚持抵抗德国。北非法属殖民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虽由维琪政府派达兰将军统治，但当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时，达兰背叛维琪，协助英、美。于是围绕法属北非的统治权便发生戴高乐派和达兰派的对立。1943年1月戴高乐终于胜利，将法属北非置于他的统一支配之下，因而以北非为基础的法军，成为盟军的一部分。

西斯前列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迅速提高了。这种情势使意大利王室、大资本家们了解到墨索里尼政权已无法压制人民。他们想依靠美、英维持自己的统治，乃于7月25日逮捕了墨索里尼，任命巴杜格里奥将军组成新政府。

在人民压力下，反动的巴杜格里奥政权不得不逮捕墨索里尼，解散法西斯蒂党。意大利政府于9月3日秘密向盟国投降，至8日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时始行公布。德军立即占领罗马以北地区，并救出了墨索里尼。纳粹的残暴恐怖统治在意大利横行。意大利从基督教民主党以至共产党等爱国势力，统一起来，组织国民委员会，展开了英勇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一边已经完全崩溃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和开罗宣言 苏联及盟国方面，在军事上给法西斯以重大打击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发动了攻势。

1943年6月，共产国际鉴于新的世界情势，宣布解散。这对于粉碎法西斯的欺骗宣传——“各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走卒”，“苏联以共产国际进行世界革命”等谰言，具有重大作用。这有助于苏

联和盟国，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民主力量的统一行动。

意大利投降后，11月盟国举行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发动对日政治攻势。即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的蒋介石在埃及开罗举行了以对日战争为主要对策的会谈，并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主要内容为：三国坚决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剥夺日本自1914年以来所掠夺的太平洋上的一切岛屿、中国东北、台湾及其他强占中国的一切土地，归还中国，朝鲜独立。

开罗会议后一周，丘吉尔、罗斯福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议。这时斯大林答应美英的要求，表明结束对德战争后参加对日战争的决心。日本当然是不知道的。

改变战略及其失败 轴心崩溃了一边，给日本战争指导部以很大的打击。日本的最高战略本来就没有自信，而是想利用最初的战果，完成“长期不败的体制”，以等待德、意的胜利而与之相呼应。由于西南太平洋方面日军的失败、中国战场的艰苦局面、德国对苏战争的彻底失败、再加上意大利的投降，于是它的最高战略便完全垮台了，于

是在1943年（昭和18年）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新的“战争指导大纲”。将千岛、小笠原、内南洋、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地区划为“绝对国防圈”，将过去的“确保地区”缩小到这个圈内，并在美、英进攻至此以前，尽全力充实以空军为主的战斗力量。

然而这一方针，已迟了一年有余^①。美军的先锋已逼近西部新几内亚和内南洋了。现在才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但彼我现有力量已相差太悬殊，而在生产力方面，日本的战争经济体系已濒于崩溃（下面叙述）；与此相反，美国的巨大军需生产力，正从这时起，飞跃地发展起来。

美军从1943年11月起，孤立拉普尔、新几内亚的三十余万日本陆军，直接进攻中部南洋。日本根据战略转变，刚着手防守时便受到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攻击。1943年11月到1944年1月，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泰拉瓦两岛、马绍尔群岛的魁泽林、罗奥特环礁被美军占领，内南洋最重要基地的特路克岛基地也被粉碎了。该地日军的舰船、

^① 参阅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四卷第二章。同书第二、三、四章是由井上和藤原执笔的。

飞机全被击毁，守军全部战死。

缅甸战场，从1943年10月起，在北缅甸以中国军为主力的盟军也开始反攻了。大本营为稳定因太平洋方面的败仗而动摇的士气，从1944年3月起，无谋地想积极进攻印度，开始向英帕尔地区进军。但是制空权已在敌军手中，供应也接不上，全军三个师团终于在7月初，因饥饿和败仗，几乎全被歼灭。

东南亚各民族的抗日民族斗争 这时东南亚日本占领地各民族都有组织地展开了抗日民族斗争。其中以印度支那（越南）的民族斗争发展最早，并且最强而有力。1941年日军进驻该地南部不久，越南人民便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以共产党为中心、各民族革命势力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越盟），使抵抗日本的斗争进一步发展起来。并在各地建立了救国会。1944年越盟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

在缅甸，德钦党右派的昂山起初想利用日英两帝国主义的对立，争取独立，曾和日本勾结。左派的德钦·丹·东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在1943年底建立了抗日组织。此外又出现了几个抗

日民族革命团体。迫使日本的英帕尔作战失败原因之一，就是缅甸民族的抵抗。1944年，抵抗各派统一组成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AFPFL）^①。昂山等于1945年3月也率领缅甸国军反抗日本，参与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这就成为日本失败后缅甸争取独立的根基。

印度尼西亚很多革命家都想利用日军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共产党和一部分社会党是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马来也以共产党为先锋，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当日军侵入菲律宾时，共产党就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顾日军的严厉追究，在各地建立了抗日团体。1942年3月统一组成抗日人民军。抗日人民军没收民族叛徒的土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解放区，并以此作为抗日根据地。

日本失败后，东南亚各民族都取得了独立，今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卒宣传说，“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各民族的进步战争，这是多么厚颜无耻的胡说。今天东南亚获得真正独立国家的领导势力，都是在抗日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从这一事实

^① Anti-Fascist People's Free League 的缩写。——译者

来看就很清楚。

第二节 战争经济和人民生活

军需生产的总动员 太平洋战争开始的同时，经济各部门都军事化了。

财政支出从 1941 年度(昭和 16 年度)的一百六十五亿元增至 1944 年度(昭和 19 年度)的八百六十一亿元，达五倍以上。虽然其中直接军事费仅从一百二十五亿增至七百三十五亿元，但这一时期的支出，没有一块钱不是与军事有间接关系。这样庞大的开支，是以国债、增税、所谓“从南方各国借款”以及从其他占领地掠夺来的东西来供应。将这样从日本人民和殖民地及占领地榨取来的巨款，毫不吝啬地拨给了军需资本家。为此，曾在金融上采取一些措施，但这些都是强化大银行的垄断，保证给予国家指定的军需公司以无限制的放款。

原料、资材也是依靠掠夺日本人民和亚洲各民族。战争初期的胜利，使日本取得了东南亚的广大资源，特别是石油、锡、橡胶、铁矾土等库存

品，立即由占领地运往本国。然而对于占领地的重新开发则几乎没有动手。根据开战前（1941年11月）政府的方针，在占领地以“迅速取得重要资源和保证作战军的需用”为第一。因此，对当地人民明确规定了“不可避免的重压，必须使之忍受”的掠夺政策，所以没有长期的开发计划。这种政策彻底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抗。夺走了现成东西之后，对很好的资源，却不予以充分的开发与利用。

在本国不仅对不直接生产武器与军需物资的工业不供给原料与资材，并破坏不能转化为军事生产的机械和设备，作为废铁，供应军需。最后，桥上的栏杆、学校的钢窗、甚至帐钩等金属品都被征用了。

劳动力的征用也很彻底。男子被强制从事于军需工业者到1940年共为五万三千余人，1941年则一跃而重新征用了二十六万人，1942年、1943年急剧增加，1943年底累计达一百三十二万人以上。这是最高峰，1944年新征用了约二十三万人，不到前一年的三分之一。于是从1943年起，便扩大征用范围，已部分地开始动员中等以上学

校的学生和妇女，教育完全陷于停顿。学生变成白白干活的军事奴隶，教师成为奴隶的监督者。连小学高年生都被动员了，在城市则到工厂帮工，在农村则帮助粮食生产。学生劳动者至战争结束时达三百万人以上。未婚女子通过邻组被编成“女子挺身队”，其数目至1945年（昭和20年）3月达四十五万人以上。

这样还认为不够，曾将朝鲜、台湾、中国等殖民地、占领地的人民和包括美国、英国人在内的俘虏运往日本国内，从事开矿、军事土木工程等最艰苦的名符其实的奴隶劳动。其中人数最多的为朝鲜人，仅集体被运来日本的，从1939年到1945年间就达六十六万七千余人。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垄断资本的巨大利润 依靠这般惊人的掠夺和彻底的动员，使武器的生产量从1941年的五十一亿元（改为按1945年的价格计算，下同）增长到1942年的六十七亿元，1943年的一百零八亿元，1944年的一百五十六亿元（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特别从1943年起，把飞机和船舶列于超重点工业中的特别重点，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国

内生产总指数从 1941 年的一一七（以 1937 年为一〇〇）增至 1944 年的一四四，只增加了 23% 强，但其间飞机生产则从两千六百六十四架增至两万八千三百九十二架，达十倍以上。新造船只吨数，从二十六万吨增至一百五十八万四千吨，达六点一倍以上。另一方面，生活资料，如棉织品在 1941 年虽然已减少到约当 1937 年的四分之一而为十一亿一千六百万平方米，1944 年则更进一步，约减少为七分之一，仅仅有一亿四千九百万平方米（当然这些棉织品也大部分供应军需，给一般人民消费的很少）。

由于军需工业的发展，日本的工业比重增大了。在日本整个经济中，工业部门的比重增大，其中尤以机械工业、金属工业、化学工业的比重的增加为显著。现在无论到日本任何地方去旅行，从火车的窗户可以看见到处都是大工厂，大部分是战争中建立的，日本掌握了制造各种机械的技术，能够制造美英在开战时还不能制造的高级工作母机。

工人的数目激增了。根据政府发表的数字（五人以上的企业），从事矿工业的工人从 1941 年

(昭和 16 年)底的八百万人增至 1944 年(昭和 19 年)2 月的一千万人。工人的比率也发生了变化。战争中重工业工人和轻工业工人的比率倒转过来。重工业工人占全体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二以上。特别是从事造船业、航空工业、武器生产等机械工业的工人占全部产业工人的半数以上。

第 38 表 产业工人构成变化表

部 门	1936年(年底)		1944年(2月)	
	工人数	%	工人数	%
重工业	977千人	37.6	5841千人	70.6
金属加工业	247	9.5	836	10.1
机械工业	457	17.6	4392	53.1
化学工业	273	10.5	613	7.4
轻工业	1615	62.4	2421	29.4
纤维工业	1028	39.7	824	10.0
食品工业	165	6.4	364	4.2
其 他	422	16.3	1233	15.2
合 计	2593	100.0	8262	100.0

(根据1936年工厂统计表、从 1944 年内阁统计局数字算出)

同时，垄断资本也高度发展起来。中小企业由于 1943 年 5 月的企业整备令，改编为替垄断资本加工，不肯改编的则被迫歇业，设备当作废铁，

业主和职工则被征用。资本总额达一千万元以上的公司在股份公司总资本额中所占比率，从 1937 年的 57% 增至 1945 年的 70%，特别是武器生产等重工业更大规模地进行生产集中。拥有一万人以上的大工厂很不稀奇。

银行也大规模地进行合并。1944 年，商业银行的数目从战前的二百四十五行激减至八十八行。帝国(三井和第一合并而成)、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银行垄断了存款总额的 70%。而从 1944 年(昭和 19 年)1 月起制定了军需企业只能从指定银行取得通融资金的制度，大银行和各军需公司的结合被国家制度化了。

四大财阀加强了对产业的支配，有如下表。

第 39 表 实收资本总额中四大财阀
所属公司所占比率(%)

部 门	1939年	1941年	1946年
金 融 业	22.5%	25.2%	49.8%
重 工 业	14.6	18.0	32.4
轻 工 业	7.0	7.5	10.7
其 他	6.1	5.7	12.9
全 产 业	10.4	12.0	24.5

(根据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编的《日本财阀及其解体》)

以四大财阀为首的垄断资本，在战争愈趋恶化，人民的宝贵生命牺牲愈加增多的时候，获利愈厚。他们以增加生产为名，从国库攫取定货款、补给金及其他各种名目的巨款，并以极低的工资，几乎是无报酬一样，剥削着国家源源送来的工人和学生。

定货款是厂家接受军需品的定货，还未动手生产前由政府预付的款项。资本家收下定洋，往往在合同上规定的产品还未交清一半，又接受新定货和定货款。又如煤炭业当公定价格低于成本时，其差额由政府“贴补”煤炭资本家，但因成本是由煤炭垄断资本家决定，他们便完全虚报高额“成本”，贪取不正当的贴补金。因此 1941 年每吨两元的贴补金到 1945 年每吨高达四十五元。如果政府所发的贴补金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要求，他们就不管战场上正在怎样失败，故意降低生产，或专挖劣质煤。就这样的以挽救这种人为的“煤炭饥荒”作借口，从国库再取得各种补助金。飞机生产和造船及其他一切工业也都采取与此类似的各种手法。

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实际有多少，表示真相的

统计数字是被隐瞒着。如举出过小评价的一、两个数字来看，钢铁部门中，1930—1934年的平均利润率为3.7%，股息为2.6%，而1941—1944年的平均利润率为11.1%，股息则为7.3%，都增加了两倍。而且资本金也增加了数倍，钢铁资本家的利润会比战前增多十几倍。又根据日本全国法人公司公布的利润数字，如第40表所载，1944年达1936年的五倍以上。

第40表 全国公司利润增加表

	利 润	增 加 率
1936年	14亿元	100
1937年	21	150
1941年	48	343
1942年	53	379
1943年	63	450
1944年	71	507

(1936年是根据1939年版的《东洋经济年鉴》，1937年以后是根据1947年版的《时事年鉴》)

军事监狱中的奴隶 垄断资本家就这样获取了暴利，他们和军人、官吏等侵吞国库的金钱，穷奢极欲，尽情享受；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则被他们敲骨吸髓，变成整个日本军事监狱中的奴隶。

宪兵和警察偷听人们在电车或澡堂中的闲谈。报纸、杂志、广播等除了进行政府、军部的虚伪宣传外，什么也不讲。新闻报道中的“闷热的午后”也被认为说明了气候，有利于敌机而遭到禁止。

杂志虽较报纸直到最后还多少进行了反抗，但1942年（昭和17年）8月号和9月号《改造》杂志登载了细川嘉六（1888—）的论文，被认为宣传共产主义，作者和编者全被拘押，以后便捏造了一连串的“共产党重建”事件。1944年（昭和19年）6月《中央公论》、《改造》两大评论杂志全被命令停刊了。到战争末期，过去曾进行左翼活动现在不积极煽动战争，光守沉默，就被认为反战主义者而遭逮捕。作家宫本百合子、唯物论哲学家户坂润（1900—1945）都是这样被捕的。户坂终被折磨死于狱中。

电影和演剧也完全成为“鼓励士气”的说教场了。但为了看这种电影去排队买票，却被宪兵叱骂为“非国民”，甚至发生过被迫从事军事工程劳动的事件。体育比赛只有摔角、剑术、游泳认为是国粹的，军事上也有用处，备受奖励，棒球则斥为

“敌性”的东西而受压迫，其用语“stroke”也被改为“好”、“ball”改为“糟”，而且到1945年以后，完全被禁止。

人民沉默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娱乐也不可能了，不是被征召入伍，就是从事奴隶劳动。工厂、矿山的工作时间，通常是十二小时，一个月也没有休息日，每天工作十五小时以上也不算稀奇。用于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条件上最低的限制也没有了。妇女被驱使从事矿坑内的沉重劳动，童工也被强迫从事深夜工作。

成年男工的实际工资，据统计，如以1937年（昭和12年）为一〇〇，1944年（昭和19年）便降低到六九，又因为被强迫储蓄、购买公债，所以实际拿到手的比这还要少。过去吃两碗饭才勉强能活下来，现在缩减到一碗，这不是生活比战前降低了一半，应当说是已经活不下去了。同样，战时的工资也已经不是工资了。

生活资料，一般人民除了微少的配给品以外，什么也买不到。据政府统计，如以1937年为一〇〇，1944年，衣料便降低到一〇点五，蔬菜为五八点六，肉为二二点二，砂糖则为一七点八，这是全

国人民的总平均，除去官吏、军官、资本家和经营这些物资的商人，以及军事工业中特殊的上级工人外，一般人民几乎买不到衣料、肉和砂糖，蔬菜则连战前的五分之一也吃不到。

农业的衰落 给人民生活以致命打击的是农业的破产、粮食的空前缺乏。粮食的增产，曾为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部分，陆续向农村发出命令。但是，第一，身强力壮的男子被征去当兵和从事军需生产，——1940年到1944年有一百万男子从农村拉走——给主要依靠人力劳动的日本农业以重大打击；第二，农业资材、特别是化学肥料激减，配给量从1941年到1944年氮减到五分之四，磷酸减到四分之三，钾减到十分之一。1945年，化学肥料几乎完全没有了。日本农业过去靠速效性化学肥料提高了单位产量，没有化学肥料，收获自然激减。农业机器不足，碾米作业又缺乏动力燃料，也使生产低落了。

政府的对策，除了指定农业必要人员和派学生帮助之外，只是高喊奖励生产的空话，并没有具体办法。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在保证劳动力和资材的

同时,为鼓励农民的生产情绪起见,还必须根本改革工地制度与粮食义务交售制度,并实行合作化和输入农业机械。然而从根本上消灭天皇制固有物质基础的半封建地主制,是政府与统治阶级所不曾想过的。政府仅仅在1941年(昭和16年),实行给交售粮食的农民(自耕农、佃农)每石五元的生产奖励金,使地主卖给政府的价格和农民的卖价有差别。关于实物地租,除留给住在农村的地主食用外,都由生产的佃农代为交售,款项归地主所有。

这种义务交售制度给寄生地主以重大打击。但不这样做,不能抑止农民的反抗,也就不能征收到粮食。因而为了延长地主制度的寿命,这一点,地主不得不忍受。虽说政府收购农民的米价比收购地主的价格高,但这价格也不能补足成本并使之得到很大利益。只是在收购粮食制度上给农民的条件相对地较地主优厚,因为农民是米粮的主要交售者,要给他们一种满足感,实际上国家极力压低价格,尽量多从农民手中夺取粮食,作为保持战时食粮和低工资的基础。

农民的地位不但没有提高,形式上仍站在和

德川封建统治下一样。第一，开战后不久（1941年12月27日），以农业生产统制令为首，政府公布了各种统治条例，强制农民种稻、麦、山芋及其他政府指定的作物，再没有种植有利作物的自由。养蚕业几濒于破灭，桑园面积从1930年（昭和5年）的七十一万四千町步、1941年的四十九万四千町步激减至1945年的二十四万二千町步。桑叶产量减少尤甚，从1941年到1945年减少到三分之一以下。苹果、橘子等正要成长到资本主义经营的果树栽培也被迫停止了。种植白菜、西瓜，以及饲养牛、猪、鸡等也不过是为供军用进行最小限度的生产而已。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被彻底阻止了。

第41表 商业性农产物消长表（实收数）

	橘 子	苹 果	卷 心 菜	西 瓜	肉 类
	千贯 ^①	千贯	千贯	千贯	吨
1936年	75,743	32,180	—	123,963	133,786
1941年	139,244	54,017	132,673	61,610	108,056
1945年	73,999	17,227	61,440	5,656	22,232

（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第一回）

① “贯”为日本重量单位，合3.75公斤。——译者

这样，愿意种的被禁止，强迫种植以稻、麦为首的四十余种作物，而且不顾产品的成本，以廉价强制收购。农民完全变成农奴。这种强制种植和义务交售的分配，都是以部落为单位，缴纳也是由部落负连带责任。这一点，和封建时代完全一样。大、中地主阶级掌握村的权力，为国家权力的最基层，把一切负担都推在一般农民身上。他们类似昔日的庄屋或名主。一般的地主都暗中收实物地租。指定农业必要人员，是同封建领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作法具有类似的意义。

当然，封建领主的压制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压制，整个的阶级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受到这样压制和剥削，既无人手，又无肥料，一向成为日本农业主体的中农也破产了。很多农民变成只从事自家用粮食的生产，农业经营如第 42 表所示，变得极为零散。

从 1941 年 8 月到 1944 年 8 月，农户总数尽管从五百四十一万一千户增至五百五十三万六千户，增加了十二万五千户，而其中的专业农户，则从二百二十四万四千户减至二百零六万七千户，减少了十七万七千户。日本的农业破产了。政府

虽然强制农民生产米粮,但到 1942 年米粮生产终于不能维持了。

第 42 表 按经营规模来划分的农户消长表

	1941年(8月1日)		1946年 (4月26日)		战时中的增减	
	千户	%	千户	%	千户	%
5反以下	1,783	(33.0)	2,233	(39.2)	+450	(+25.2)
5反—1町	1,623	(30.1)	1,786	(31.3)	+163	(+10.0)
1町—2町	1,461	(27.1)	1,337	(23.5)	-124	(-8.5)
2町—3町	333	(6.2)	211	(3.7)	-122	(-36.6)
3町—5町	118	(2.2)	77	(1.3)	-41	(-34.7)
5町—10町	50	(0.9)	38	(0.7)	-12	(-24.0)
10町以上	20	(0.4)	13	(0.2)	-7	(-35.0)
计	5,388	(100.0)	5,695	(100.0)	+307	(+5.7)

(根据《日本农业年报》第一集)

饥饿的人民 当国内粮食生产破产的时候,朝鲜、台湾米的“移入”和从南方的“输入”都由于生产的激减和运输的困难,有如第 43 表所示,有时竟不可能。然而食粮在军用和军需生产方面的需要一直在激增。一般人民的食粮被减少到仅能活命。主食从 1941 年(昭和 16 年)4 月起,实行了成年人一日量二合三勺(三百三十克)为标准的定量配给制,但从 1942 年(昭和 17 年)度起,这二

合三勺也不完全是米，还掺有大麦和山芋了，米也从半春米改为二分春米，1944年（昭和19年），干菜和橡子面包也被列入主食。投降前不久即1945年（昭和20年）7月，减低至二合一勺（三百克）。说是一千零六十一卡路里，其实把山芋皮和大豆皮的卡路里也计算在内了。米已经是轻易吃不到的了。鱼和蔬菜的配给当然更谈不到了。德川时代经常发生大饥馑，但没有过象1944—1945年那样有计划地使全体日本人民挨饿和营养不良。

第43表 米的生产及输入、移入量

	内地生产量	输入量	从朝鲜移入量	从台湾移入量	计
1941年	55,088千石	8,744千石	5,235千石	1,702千石	70,769千石
1942年	66,776	5,588	—	1,638	74,003
1943年	62,887	—	3,500	1,300	67,687
1944年	58,559	—	1,421	151	60,131
1945年	39,149	110	—	—	39,259

（根据《日本统计年鉴》第一回）

少年和青年的身体，在身高、胸围、体重方面都急剧减低（数字省略）了。1941年每一千日本人死亡率为一五点五二，1944年为一七点六六，1945年加上空袭被害死亡率实达三〇点一五（战

死除外),日本人民终归陷于生存也困难了。现在很多人回想起来,对于竟能平安无事地活下来,不能不有所感慨!

第三节 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马利亚纳群岛的失陷 1944年初夏,日本和德国的失败已毫无疑问了。欧洲战场上苏军于1944年1月解除列宁格勒的包围,至5月几乎将德军完全驱逐于本国领土之外,更以破竹之势西进追击败走的德军。法兰西、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西欧、中欧纳粹占领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抵抗运动,益趋激烈。一直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美英首领,也害怕起来:如果由苏军和以各国共产主义者为中心的人民抵抗运动打倒纳粹,并解放欧洲的话,战后美英帝国主义就将失去在欧洲的势力。美英终于不得不在1944年6月6日,派大军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日本占领的特路克岛被攻陷,伊姆梅尔战斗暴露它陆上战斗也完全无力。就是在华北,它也失去了进攻能力。仅从1944年4月起,以十三个

师团大军开始展开打通大陆的作战——大规模的作战，想控制京汉、粤汉、湘桂各铁路，从陆路将满洲和新加坡联结起来，摧毁在华美空军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并建立基础，万一南方和本土的海路被切断，也能在大陆上进行长期作战——表面似乎顺利，仅以此自慰。但只占领了毫无斗志的重庆政府军所防守的要地，不能保住重要的铁路线。1944年5月，虽打通了南部京汉线，而北部京汉线一带的中共军和民众展开猛烈的游击战，夺回了很多占领地。

6月11日，美军对东京以南三千公里的马利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发动攻击。大本营在特路克岛战败以来就预料到这一点，并集结了可能调遣的陆海空军，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至7月6日全岛终为美军占领。这时虽也曾强迫士兵和居民“玉碎”，但剩下的一千零六十二人却向美军投降了。又在这次战斗中，很多日本侨民，父母、子女、夫妇相抱从断崖跳海，或用手榴弹自杀。日军曾枪杀了不自尽的人们。

继而关岛、突尼安岛经激战后也被美军占领。塞班、关、突尼安三岛上立刻建立起一些飞机场。

11月24日美军B29超重轰炸机七十架已从这些基地起飞,空袭东京。

东条内阁的垮台 马利亚纳的陷落,使人民的情绪大为沮丧。东条英机首相兼陆相、军需相,曾将他清早偷看民家垃圾箱的大幅照片,以“察民情”为题,登在报纸上,沾沾自喜,但至1943年(昭和18年)底这样作法已经不能引起人民对他的尊敬了。在特务政治下,人民公然说出“击落英机”这句影射的口号,以表示内心的不满。

在人民不满的情况下,以重臣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反东条派也开始活动。当1944年3月战况愈益恶化时,以谋统帅(军事)和国务(政治)的统一为名,东条兼任参谋长,被讥笑为东条副官的岛田海相,也兼任军令部总长,名符其实地建立起东条独裁。然而这决不能做到军事和政治的统一,只能使人民的反东条情绪益加高涨。

丧失塞班更加使人民不满。重臣们的反东条运动也益趋猛烈。特别是出身海军的冈田启介等,在海军不满东条独裁的情绪支持下,积极地进行了活动。经过种种谈判之后,东条内阁被迫于7月18日全体辞职。

在推翻东条内阁之后，没有一个政治家肯毅然起而肩负国家危局。陆军、海军、文官乃至重臣等都相互推诿责任。终于由陆军大将小矶国昭（1880—1950）任首相，海军大将米内光政以副首相身分担任海相。

全线败退 小矶内阁成立后两个多月，即10月12日，美国机动部队开始袭击台湾。联合舰队空军实行反击，至15日止在台湾海面展开了大规模空战。日本没有给敌人主力以任何损害，然而大本营却根据前线的报告发表说，歼灭了敌人的机动部队，自己也这样信以为真。一向欺骗人民的军部，这时自己也不知自己说的是真是假了。

美军继而于10月20日，在菲律宾群岛的雷伊泰岛大举登陆。小矶首相称雷伊泰岛为太平洋战争的天王山^①。大本营欲举联合舰队的全力与之决战。然而完全无制空权，对于敌情也没有正确判断的能力^②，至27日止丧失了世界第一艘超大型战舰（七万吨）“武藏”号以下很多战斗舰艇，

① 天王山即丰臣秀吉战胜明智光秀的决战场，借喻整个战争决定胜败的战场。

② 大本营相信在台湾海面的海空战中真正歼灭了美军的机动部队，没有预料到雷伊泰战斗中美军有大机动部队参加。

遭到打击而败退，已不成其为联合舰队了。这时海军航空部队开始派出用战斗机载炸弹撞敌舰而自爆的“特别攻击队”（特攻）。以后，“特攻战术”成为日本陆海军的最重要的但是无益的“战法”了。特攻队员中很多都衷心相信，并认为是光荣的牺牲，足以永垂青史，而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们是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仅仅这一点就完全表明了蹂躏这些青年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不人道和无能了。

尽管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而大本营却为夺回雷伊泰岛派出了五个师团的大军，但他们大部分都在尚未登陆前被击沉了。菲律宾方面的日军，在雷伊泰失去主力，尚未获得补充之前，1945年1月，美军大部队便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日军几乎未加抵抗便退出马尼拉，被赶到山岳地带，在这里遭到菲律宾抗日人民军的袭击，连吃的东西也找不到，流落于丛山峻岭中，四十万大军陷于最悲惨的饿死境地了。在退出马尼拉时，绝望的日军屠杀了大批非武装的市民，这和南京屠杀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被视为人道之敌的一个例证。

日军在丧失菲律宾前后，从1945年（昭和20

年)2月到3月,缅甸的日军也遭到了中国、印度、英、美联合军从三方面进攻,其后方又遭到缅甸国军的袭击,——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领导下起而反抗的——5月初仰光也被夺还,三十万日军只剩下了三分之一。

中国方面,由于蒋介石政权愈加集中兵力进攻中共军和解放区,比对日作战还要积极,美国也从1944年8月起公然转为不是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采取抑制中共成长的方针。这虽大有助于日军,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日益猛烈,在接二连三的局部反击中使日军受到很大损失。1945年初解放区遍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等十九个省,共计拥有一亿的人口。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和抗日战争的具体方针。在结语中毛泽东说:“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事实上的确也为时不远了。

战争经济的崩溃 当日军在战场上全军大败的时候,国内的战争经济也全部崩溃了。武器特别是船舶和飞机的生产,如上所述,1944年(昭和

19年)达最高峰。但煤、铁、钢、铝等基础物资的生产,以1943年为高峰,1944年便逐渐在激减着,全年生产退到和英美开战那一年的水准了。工作母机的生产从1944年起也走向了下坡,生产总指数从1944年的一四四(以1937年为一〇〇)降低到1945年的五七。飞机和船舶的生产在1945年也急剧下降了。

由于彻底掠夺了人民和东亚各民族的资金、资财和劳力,全部投入军需生产,而这些生产物又都消耗于战场上,必然破坏国民经济再生产的基础。因而首先缩小非军需生产,其次缩小制造武器的基础物资的生产,最后,武器生产也只有走向破灭了。

此外,这种掠夺政策,必然激起人民和占领地人民的不满,从这一点说来,生产也必然下降。

再加上资本家的贪欲是以获得最高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象上述煤炭工业那样,故意降低生产。

更由于陆军和海军,无论是在占领地或是国内生产部门,或是政府内部,事事都在对立着,都是不管对方如何,争先将自己需要的东西拿到手中。多余的也绝对不肯互相通融。陆海军的对立

以及与双方勾结的垄断资本的对立、竞争，连在一起，更加激烈了。这就使贫乏的资金、资材浪费达到极点，加速了生产的低落。

为调整陆海军的对立，综合统一生产计划，1943年（昭和18年）9月撤消了企划院和商工省，设置了军需省。但是军需省根本没有管辖陆海两省的造船与兵工厂的权限。省内各部、局的要职，首先考虑陆海军的均衡来确定，也没有想组织真正而有效的一元的军需生产。

本土遭到空袭 塞班被美军夺取时，任何人都预料到本土将遭受空袭。然而政府、军部却没有采取任何防空措施。不仅如此，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公然扬言“因为本土变成了战场，应杀死老幼和病弱者。这些人不能和日本共存亡”^①。根据这一想法出发，乃强迫城市老幼妇女“疏散”，但

^① 高松宫秘密情报员细川护贞所著日记《情报没有上达天皇》一书中，1945年6月11日一节内所载中部司令官语。又同书中1944年12月16日一节内载冲绳军参谋长长勇命令县长说，因为岛民是作战的障碍，叫他们全部到山岳地带去自谋生活（生死听其自然）。写出这些事实作为攻击军部材料的细川和他们的首领近卫等也根本没有想办法保护人民，而是在谈论着：如果人民遭受更大的折磨，那末我们自己掌握政权，事情也就容易办。

是政府对于疏散人员行李的包装和运送未予任何帮助。

就这样地疏散了一千万老幼妇孺。不论是被疏散的人或是容纳疏散的人，生活习惯各有不同，都挤在狭小的屋子里，其中99%是不到三天就因为饮食、孩子及其他一些琐事而不睦。亲戚、兄弟之间，既不能公然吵架，也不能都用金钱解决，就这样地充满暗斗，加深了彼此的痛苦。

尽管如此，在当时母子能一起疏散，还算幸运。贫穷的工人，因为作不到这一点，只有把在学的孩子们交给教师带领，疏散到农村去。孩子们在农村的寺庙里，整天饿着肚子，晚上想妈妈而啼哭。仅东京以下五个府县疏散小学生就达三十一万四千人。其中很多儿童由于父母兄弟姊妹都被炸死，变成了孤儿。政府只是以“疏散”为名，赶走了这些累赘，并没有为人民采取任何防空措施。各个家庭都各自挖了名为防空壕的窟窿。强迫人民进行“防空训练”，以传递水桶来作为消灭燃烧弹造成的猛火的办法，它的无效，谁都很清楚。这不是真正的防空训练，而是使人民奴隶化的训练。

美机 B29 型成群飞到没有防备的市民的头上

上,1944年中主要轰炸军事工厂,但1945年3月9日黑夜空袭东京,开始以烧夷弹和凝固汽油弹(napalón)轰炸民房。这一次有十万市民被烧死。从此几乎每晚八时起就有一个日本城市被烧毁。东京遭四次大空袭,人口七百万的大城市变成废墟了。

这完全是极不人道的滥炸,专想炸死人民和烧毁房屋。飞机场、军事工厂和重要铁路等反而不轰炸。美机甚至烧毁完全没有军事意义的市镇。这种残暴空袭的最高峰就是原子弹轰炸。这样有九百万人的家园和生活用具被烧毁了。日本战灾总额的70%是一般民房、学校和医院的损失。

厌战和反战 人民的耳、目、口完全封起来了,在“维持国体”、“防止共产主义危险”等谎言和压制下,被拖入战争,沉醉在“皇军赫赫战果”中的人,也逐渐明白了真相。大多数人民内心都充满着厌战情绪。

日本国内虽然整个成了军事监狱,工人的罢工并未中断。1941—1944年间有一百三十次罢工,有五万三千四百四十三人参加。

公开的斗争,虽然不可能,但消极的抵抗则遍及全国。其中最突出的为缺勤率的异常增大。据调查,中岛飞机太田工厂1940—1942年三年间每年9月1日到11日的缺勤率数字,1940年为12.8%,1941年略同,1942年则达14.8%。据1943年10月厚生省的调查,重要工厂的缺勤率为14.2%,其中新征用者则为17.1%,工人一万人以上的工厂的缺勤率为14.8%,甚至达24.5%。而且缺勤率随着战局的不利,人民生活的极端恶化,愈益增大。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的缺勤率为20%,在开始遭空袭后实达49%。造船业在投降前一年从24%增至52%,飞机工业则从21%增至51%。(柯亨:《战时战后的日本经济》)

军需工业最重要部门中,有半数的工人缺勤。这虽不是有组织的运动,而是自发的个人消极抵抗的综合,但给战争经济以致命打击,成为结束战争的重要力量之一。

怠工的情况也广泛地出现了。在工作时间内,避开宪兵的监视睡觉者更不必说,甚至有出去钓鱼的人。拿工厂的工具和材料作私用品是很平常

的。缺勤和怠工虽有腐蚀工人的一面，但在当时不得不作这样的抵抗。此外，更进一步出现了积极的故意制造不合规格的次货的情况。有些飞机工厂中曾设法揭发次货的制造者，但没有找到。

租佃纠纷也没有停止。1941—1944年间的租佃纠纷有一万零六百四十八次，参加的佃农达九万一千四百二十五人。农民一般的抵抗方法是对于义务交售制采取消极态度，不努力培植交售用的作物，专心耕种自己消费用的。这样的农民逐年增多了。

政府想尽最大可能把人民驱入战争，人民则只肯在最小限度内行动。1943年（昭和18年）7月的全国警察部长会议上，内务大臣曾叹息说：“人民有消极被动的心情”。同年10月行政监察使的报告中谈到，就是在监督工人组织最完备的三菱重工业名古屋飞机制造所也有这样的情形：“实际上，下级现场监督员害怕员工的反抗，对于严守纪律的要求，有所踌躇。”

反战的情绪，在上述“击落英机”等隐语中也表现出来了。人民都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对于出征或征用，表面上祝贺，背地里则又哭又

怨。有的女学生竟投稿说：人民消瘦，皇后却胖起来了。

前线的士气也低落了。这表现为伊姆梅尔作战时，师团长违抗军司令官的命令，塞班出现千多人的投降者。装病、反抗、侮辱长官等违反军纪的情形，无论哪一个中队也不算稀奇。1943年初在山东省西北馆陶的守军竟发生士兵暴动，队长以下的军官好不容易才逃到邻县（《太平洋战争史》第四卷）。

反战同盟 在华日人有组织地进行了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38年底（昭和13年）在华北前线被俘的十名日本士兵，在八路军的援助下，组织了“觉醒联盟”。其后在华北数处都建立起同样的反战组织。1940年夏，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冈野进）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接着，教育日本俘虏与号召日军士兵反战的运动，便迅速地开展了。

1942年（昭和17年），这些反战组织统一为“日本人解放同盟”。以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为其主要目标。同盟的活动逐渐发展起来，参加的日本士兵也逐渐增多了。1944年

(昭和 19 年) 该同盟又改组为拥有更广泛政治纲领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当时的参加者已达千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数字。此外, 从 1940 年(昭和 15 年)底起, 又建立起教育日本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投降时的学生数有二百五十人。这些人冒着危险走上前线, 用传单、扩音器、书信、慰问袋、电话等种种方法, 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的呼吁。

反战同盟——解放联盟斗争的意义, 过去一般人过于轻视了。日本的知识分子, 深深知道尊敬法国和意大利的抵抗运动, 而对于我们本国同志, 在战场上冒着生命的危险, 和本国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事实, 甚至不想知道, 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不能因为在这个联盟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强烈的打击——象法国人的抵抗所给纳粹的一样——之前, 日本帝国主义就垮台了, 就轻视这个斗争的意义。它虽有这样一个好条件即中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直接援助, 但另一面不知几时会被日军抓住枪毙, 比在日本国内更危险的情况下, 对前线士兵进行反战工作, 这事, 不仅需要最大的英雄主义, 还需要政治上的熟练和能力。而前

线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斗争，是由于日军内部和国内人民中间，尽管是不自觉的厌战，反战的情绪在逐渐扩大；帝国主义战争和日本人民利益的矛盾也在日益扩大而且加深的缘故。解放联盟指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

人民中间这样高涨的厌战、反战风潮，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它成为推动一部分统治阶级进行和平活动的最大力量。这一点，将在下节叙述。战争中的厌战是很普遍的现象，而积极反战还不过是刚刚萌芽，这里所蕴蓄的对于和平、民主和安定生活的强烈要求，成为战后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力量。

第四节 投 降

雅尔塔会议和德国投降 第二战场开辟后，德国迅速走向崩溃了。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在全国抵抗委员会领导下举行起义，先于美英军从德军手中解放了巴黎。8月中法国全部解放。美英军于9月中旬攻入德国境内，1945年2月进抵莱茵河线。至4月西欧各国全部从纳粹统

治下解放出来。墨索里尼于4月28日在意大利北部为爱国游击队捕获,被处死刑。

苏军追踪德军西进,援助东欧各国爱国反法西斯人民的抗德斗争,9月解放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10月解放南斯拉夫,1945年2月解放匈牙利,4月波兰、奥地利最后也解放了。

面临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阶段,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苏、美、英三国领袖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除决定了关于德国、波兰、南斯拉夫等问题之外,并对战后建立和平机构问题作了重要的决定。即在1944年10月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上就曾决定建立“联合国”,作为保障战后和平的机构。雅尔塔会议又决定设立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核心机构。以苏、美、英、法、中五大国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重要问题的决定,采取五大国一致的原则(五大国各拥有否决权)。

苏联为了使联合国不至于象过去国际联盟那样,变为英法的世界政治工具、反苏机关,要求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美国不愿自己的行动自由受拘束,要求否决权,英国为了防止它的帝国主义利益

受到侵犯，也从内心里赞成否决权。这样，美英和苏联同意否决权的目的虽各有不同，但因为美英方面也还具有这种想法——五大国在反法西斯主义和争取和平方面是能一致的，因此，五大国的否决权被通过了。根据这个原则，联合国便在德国投降后的6月26日成立了。

雅尔塔会议，对于日本作了最重要的决定。即苏联在结束对德战争以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其代价是美英同意将日俄战争中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取的南部库页岛归还苏联，承认千岛群岛为苏联领土，承认关于旅顺、大连及北满、南满铁路的苏联利权。这是根据美国的强烈要求而决定的。美国害怕日本在中国东北、朝鲜拥有庞大的后备军力，并依此在本国决战。为了减少美国牺牲，而早日结束对日战争，认为无论如何，也需要苏军从中国东北攻击日军。因此，不惜给苏联以任何代价。激烈的反苏主义者麦克阿瑟也迫于军事上的需要，最热心要求苏联参战。

根据雅尔塔协定，盟国的对德战争有了很大的进展。英美，特别是英国，想在苏军之先占领柏林，使纳粹只向英美投降，暗中援助纳粹军，企

图延长它和苏军的战争。希特勒也进行了最后的策动，想只向英美投降，离间英美和苏联，可能则使二者冲突。

但是这些策动都被苏军的迅速进军和各国人民打倒法西斯的要求所粉碎了。4月28日苏军单独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4月30日希特勒在听到苏军炮声中自杀于柏林。5月2日苏军先于美英军占领了柏林。8日德军向苏、美、英、法军无条件投降。

投降前的酝酿 意大利法西斯蒂首先灭亡，现在，日本军部所盲信的德国纳粹也垮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美军夺还菲律宾后，于1945年2月19日以大机动部队在马利亚纳基地空军的掩护下在马利亚纳和日本之间的硫黄岛登陆。美海军登陆的总数约六万人（外有马利亚纳基地空军和机动部队）大规模进攻。日本守军约两万三千，孤立无援，在栗林中将率领下进行拼死的战斗，最巧妙地利用地形进行奋战，歼敌约两万人，使美海军遭到空前的损失，终因寡不敌众，至3月17日全军覆没。战况之激烈，在太平洋战史上当推第一。

美军占领该岛后，将日本本土划入战斗机的行动半径之内了。3月25日美军已开始在冲绳的庆良间群岛登陆，4月1日在冲绳本岛也登陆了。日本在冲绳战中用两千三百九十三架飞机进行特攻，虽击沉了美国舰船四百零四艘，但未能击沉航空母舰、战舰和巡洋舰。战舰“大和”仅仅率领几只驱逐舰，只带单程燃料，连空军的掩护也没有，实行了“舰队的特攻”，但在到达冲绳前，4月7日中途遭美空军击沉。联合舰队事实上已覆没了。6月22日冲绳的地上部队也全被歼灭。除损失九万军队之外，一般人民的牺牲达十五万人。甚至由女学生组成的“娘子军百合部队”，也全被歼灭了。这个悲剧预示了“本土决战”时一般人民的命运。

到这时候，大本营仍坚持“一亿玉碎”、“本土作战”，并着手组织国民义勇队。本土有正规军二百二十五万，飞机七千架。然而这支军队连手枪和刺刀都不齐全。大本营只是盲目地叫喊以“七生尽忠的信念”坚决“维护国体”，然而他们已深受“民心松弛”与“不良思想”的威胁。

与这种“本土决战以维护国体”的主张相反，

以近卫文麿、冈田启介、若槻礼次郎等一部分重臣为首的各集团，认为现在只有结束战争，才是维护国体——天皇制的唯一途径。近卫在1945年2月14日向天皇提出的建议书说：

“战败虽有伤国体，但英美的舆论尚未达到要求改变日本国体的地步。因此，如果仅仅战败，在国体方面还不必过于忧虑。最堪忧虑的是随着战败可能发生的共产革命。目前苏联势力向世界各地蔓延，各国共产主义势力也有所扩大，使美英感到头痛。苏联的世界革命意图，对东亚也一样，现在延安以从莫斯科来的冈野为中心，组织了日本人解放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台湾先锋队等联系，向日本进行呼吁。

反过来看看国内，促成共产革命的各种条件日益具备着。即生活的贫困、工人力量的增大、对美英的敌忾心；另一方面则有亲苏情绪、军部内一部分人的革新运动、和随之面起的所谓新官僚运动、以及正在幕后操纵他们的左翼分子的暗中活跃等”。

近卫在第二次组阁之前，认为少壮军人的作法虽然不对，但他们从五·一五事件以来所走的方

向，正是日本所必须经过的途径。现在他却极力说这些少壮军人就是最危险的共产分子。这不仅表明了他们那么害怕革命，疑心到处都是共产分子。实际如前节所述，厌战、反战的思想那样广泛地存在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已经为人民所唾弃，濒于瓦解的危机了。他们由于害怕本国人民，企图利用美英统治者正在破坏苏联与各国反法西斯人民势力的统一，想早日向美英投降，以拯救天皇制和资本主义。

两个战争目的 美英统治者和苏联的战争目的根本不同。苏联是以保卫祖国、从世界上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为目的；美英统治者是以打倒帝国主义竞争者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并夺取其遗产为目的。因而他们在当前只要共同敌人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力量还存在一天，便能够和苏联以及各国反法西斯势力合作。但是随着世界战局变为对反轴心阵营有利，苏联作为反轴心战争的主力，它的威信和力量日渐增大；共产党又是各国抵抗运动的主力，它的影响力越来越深。于是美英帝国主义者就想削弱苏联和各国的反法西斯势力。为了这点，美英在欧洲，特别是英

国统治者作了些什么；美国的对中国政策从 1944 年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前面业已谈到了。在菲律宾，美军在夺回吕宋岛后，便对抗日人民军反复地展开了讨伐战。

近卫等很早就了解这些情形。他在 1943 年（昭和 18 年）4 月的备忘录中提及他和南京伪政权首领陈公博——地位仅次于汪精卫——的谈话。其中谈到蒋介石的密使曾来南京政府，说美英为了把日德两国作为在东亚和欧洲对抗苏联的堡垒，不希望日德完全崩溃。站在蒋介石立场，现时不能立刻和日本媾和，为了将来，愿在目前暗中取得谅解。陈谈话的内容，是和美英统治者以及蒋介石的根本政策一致的。

罗斯福总统曾致力于和苏联协调，不幸 1945 年 4 月突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德苏开战时，公言要使苏德两败俱伤才好的人——升任以后，美英统治者和苏联的分裂，更加激烈化了。

美国政府从 1944 年春起开始研究处理战后的日本问题。关于天皇制，美国统治层中的一派，视天皇、重臣、财阀等为“稳健派”，想利用它，主张保存天皇制；另一派则主张为了使日本民主化，必

须废除天皇制。美国舆论则支持后者。但随着国务院内反苏势力的增强，保存天皇制派便占有有力地位。

杜鲁门政府成立后不久，德国投降，因而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即将参加对日战争了。美国统治者当前的急务，就是想在苏联参战之前，迫使日本投降，以阻止苏联在远东势力的增大，防止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民族革命与苏联结合。于是美国政府决定了保存天皇制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的方针。并从德国投降起，就对日本的“稳健派”进行了暗示这一点的劝降广播。

波茨坦公告 日本的统治层中向美国投降的主张也愈益有力了。4月5日，美国在冲绳本岛登陆后的第四天，小矶内阁全体辞职，原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在重臣的一致推荐下组阁。暗中指望结束战争。德国投降后，6月初，政府曾请求苏联斡旋，想对美英有条件投降。但遭苏联拒绝了。因为要求日、德、意无条件投降是盟国坚定不移的约言。如果日本的战争贩子一个也不革职，照旧掌握军政大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是要求斡旋有条件投降，不如说是要求斡旋“停战”，无论苏

联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作不到的。

7月25日美、英、中国代表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会议上决定了对日的公告，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军立即无条件投降，并提出了盟国的条件。条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驱使日本人民走向侵略战争的权力和势力必须永久剔除。

(二)在日本建立和平、安全及正义的新秩序之前，盟国占领日本。

(三)实施开罗宣言，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

(四)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后，允许士兵重返家园，从事和平生产的生活。

(五)盟国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盟国俘虏的人在内，将依法律严加惩治。日本政府必须将所有妨碍日本人民恢复并增强民主趋势的因素予以消除，必须确立言论、宗教、思想的自由，尊重基本人权。

(六)允许日本维持和平经济，但能重整军备的工业不在其内。

(七)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及根据日本人民自由

意志建立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政府后，盟国占领军当即撤退。

这个公告可以说是世界民主、和平势力的对日纲领。起草者为美国国务院，在草案中，上述条件的第七款(公告的第十三条)，在日本必须建立和平政府之下，附有“得以包括现在天皇统治下的立宪君主制”字句，但在提交波茨坦会议前删除了。波茨坦公告，苏联外长也参加了审议并予以承认。美国政府起草它的意图，已如上述，想在苏联参战前以此使日本投降，但为了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承认，不敢明言保存天皇制。

投降 接到波茨坦公告后，政府、军部担心是否能保存天皇制，而不知所措。铃木首相终于在7月28日发表了“不加理睬，只有完成战争”的谈话。这样为了保存天皇制，日本人民不得不忍受无法形容的苦痛。因为拖延投降期间，而遭到了8月6日和9日的原子轰炸^①。

^① 投原子弹的当天，美国向全世界作了示威广播。8月9日重庆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评论中有这样几句：战争的目标是破坏日本军国主义，不是破坏日本人民。……科学的成果不能用来破坏人类，必须用来为人类造福。(引自史沫特莱著、阿部知二译《伟大的道路》下册)

当日本投降前，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的参战日期愈加逼近了的时候，美国统治者着慌了。他们想如何能在苏联参战前，给全世界以美军决定了日本投降的印象，尽管在军事上完全没有必要，竟于8月6日，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显然，这是有意向无原子弹的苏联示威。以一颗原子弹，残忍地伤亡了二十余万非战斗人员。今天虽已事隔十年，因当时遭受放射能而发病死亡的，仍不断发生。

原子轰炸虽给日本的统治层以很大震惊，军部的战意还没有因此消失。然而8月9日午前零时，苏联根据和盟国的约定参加了对日战争，并加入波茨坦公告，关东军全线败退。

苏联参战，使日本统治阶级都陷于绝望。这时铃木首相、东乡茂德外相(1882—1950)、米内海相、和近卫及其他重臣等。才最后下了结束战争的决心。陆相阿南惟几(1887—1945)等一派固执在本土决战、主张在大陆进行长期抗战的根据也垮台了。

9日清晨，美军又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真正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一瞬间，死亡了七万

以上的市民。

从这一天起反复地召开了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内阁会议、枢密院会议。这时已不是投降与否的问题，而是争论接受波茨坦公告，是否附条件、附什么条件等问题了。结果，8月10日清晨，政府通知盟国，在“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的国家统治权的谅解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此，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于12日答复说：“从投降时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应服从盟国总司令的命令”、“最后的日本统治机构，根据波茨坦公告，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来决定。”

围绕着这个答复，政府、军部又费时三天，进行了这样是否能保存国体的争论。其间美军的大空袭，昼夜不停，烧毁无数房屋，死伤无数人民。政府与军部终于在8月14日决定就这样投降。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害怕苏联的对日发言权会迅速增大。总之，苏联参战，促使了日本提早决定投降^①。

^① 今天，攻击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乘日本战败的机会对日宣战的人们，如果想起8月15日战争结束时，即或对战败感到沉痛，但因战争结束而喘了一口气，就不会攻击苏联的参战。假若苏联不参战，日本的投降还会延期，日本人民的痛苦和牺牲会加速度增加。又如能想到苏联参战，加入波茨坦公告，参

8月15日正午，天皇发表投降广播。侵略中国东北以来，达十四年的非正义战争，以史无前例的亡国惨败而告结束。8月30日盟国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东京附近的厚木飞机场着陆。日本全国迅速地被美军占领。9月2日在美国米苏里号军舰上，日本代表正式向整个盟国包括苏联的投降书上签字。

大战的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以不断的战争，给东亚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损害和苦难，真无法形容。南京和马尼拉事件，使我们日本人无法分辩。垂死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上就极其野蛮，象日军这样无数的暴虐行为不过是从中产生的恶果之一而已。

日本给东亚各民族的损害，不是用金钱所能补偿的，只有使日本变成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才

加占领日本，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占领政策，对于日本人民——更不用说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说来，苏联参战真正有利，没有一点坏处。

而且，攻击苏联背信进攻日本这句话，本身就不成立。日苏中立条约事实上早被日本彻底撕毁了。德苏战争开始后，“关东军的特别演习”姑且不提，日本曾用各种方法和德国通谋，妨碍苏联的对德作战。

能在本质上来补偿它！尽管如此，日本所给予的物质上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对中国，给了中国多少生命上的和物质上的损害，现在中国虽尚未提出准确的数字，但根据战争结束第二年1946年（昭和21年）当时南京政权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纂的材料^①，从1937年至1943年仅6年间，中国因抗日战争造成的损失，军人战病死伤者五百六十二万人，日本占领地区一般人民被杀伤者一百三十五万人，因空袭而死伤者达七十六万人，财产的损失为一百五十四亿二千七百零八万五千元（战前法币），资源的损失为一百三十九亿八千九百九十七万七千元。战前1936年的每百元法币约合三十美元，如依此换算为美元，约为八十八亿二千五百十二万美元。把它和现在对菲律宾的赔偿为五亿五千万美元，或现在日本国家预算二十八亿美元左右相比较，给中国损害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由于我们未能阻止本国统治者非正义的战争，不仅给别国人民以如此的损害和痛苦，骂我们

^① 这个数字是周锡卿氏在从北京寄给井上的私信中告知井上的。

日本人为“文明和人道的罪人”；而我们自身也不得不忍受我国历史上空前的苦痛和耻辱。

凡是战争，即使是正义的自卫战争，也没有不悲惨的。然而正义的战争，付出的牺牲和苦难可以由其伟大的目的来补偿。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即便是胜利结束，也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任何利益、幸福和光荣。这一点，中日甲午、日俄以及第一次大战等战争的结果已表明了。何况以失败而告终的非正义战争，除了给人民带来悲惨和不幸之外，别无他物。以特攻队员为代表的每个人民崇高的牺牲，客观上是与他们临死时所希求和坚信的不同，不是为了“大义垂青史”而献出生命，不外是作了天皇制和大资本家们野心和贪欲的牺牲品。还能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

漫无止境地扩大战争，把既是民族精华，又是一家希望所寄和赖以生身的身强力壮的男子相继征去当兵。后来连少年也半强制地参加少年航空兵或少年战车兵。投降当时约有七百二十万人被征入伍。即每两家多一点就有一人被征去当兵。有一家三男全被征去当兵。结婚第二天丈夫就被拉上战场的新媳妇也不在少数。其中又有几人能

安然而归呢？

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阶段的战病死伤者约十七万二千人，从1937年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开始，至战败投降为止，军人、军事人员及附属人员的战病死亡者约二百三十三万人，下落不明和仍旧留在外国者（1956年当时）为六万三千人^①。另外领取残废军人抚恤金的军人、军事人员负伤者有三十万九千人^②，共计达二百八十七万四千人。如拿这个数字和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日本全国总户数一千四百七十三万二千户相除，每五点〇九户就有一人直接在战场上被打死或病伤。又后方人民遭空袭及其他直接战灾而死伤者至少有六十六万八千人^③。因而军人、军事人员及其他人民直接因战争以致伤病死亡的

① 根据1956年（昭和31年）3月15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厚生大臣所发表的材料。他并且声明说：在下落不明和留居海外者中可以确认有四万五千人还活着。这照例又是捏造谎言，说他们是被苏联扣留着。

② 根据经济安定本部的调查。（《日本统计年鉴》第一回）

③ 同上。这个数字比实际数目少得多。例如据这个统计，广岛县全部受害人数为十四万七千余人，但根据广岛市政府1950年的推测，该市因原子弹死伤的就有二十四万七千人。后者比较接近实际。

合计起来，实为四户多一点就有一人遭牺牲。

国家财富因战争而遭受的损失，达六百四十二亿七千八百万元，相当于1935年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34.4%)。其中因本国遭空袭，舰炮射击及拆除建筑物而损失的房屋为二百九十八万户，受害者达九百万人，家财、用具的损失，按当时公定价格计算约为九十五亿五千八百万元，金币、贵金属等的损失达七十八亿六千四百万元（经济安定本部调查）。同样的家园被烧毁，对于富豪说来，只是损失了一点财产，对于一般人民说来，则名符其实地变成街头流浪者，过着非人的生活。大资本家们，尽管是战败，但由于如上所述，发了横财，损失几乎完全落在一般人民的身上。

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剥夺我们祖宗三代所争取来的自由，把人民作为一大军事监狱中的奴隶，破坏文化，终因不可避免的失败，连民族的独立也失掉了。非正义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祸。

忍受这种损失和苦痛，使日本活下去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日本人民自己正确实行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并使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也严格执行这

公告。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了，而日本国家和日本人民则是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盟国所提出的“我们的条件”而投降的。因而盟国方面也有遵守波茨坦公告的义务，但是占领日本的主要军队是打着盟国旗帜的美军。美帝国主义根本不想遵守波茨坦公告。这样，日本就产生了比战败更惨的悲剧。

结 语

第二次大战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上带来了最大的最惨痛的牺牲和破坏。

在大战中牺牲的或成为残废的总数实达八千万人以上^①，这个数字约当法英两国本国人口的总和，或日本的全部人口。大战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大，现在还没有算出，据美国某学者计算，除中国外，全交战国的直接战费总额达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亿美元。这个金额超过了北美合众国战前1937—1938年度岁出预算(七十三亿二千万美元)的一百五十七年份的总计。

如果过和平生活，够世界第一大国过一世纪

^① 莫洛托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举的数字。此外，根据罗马教皇厅1945年11月发表的数字推断，军人、市民的死亡数为两千三百万人，负伤为三千四百四十万人，合计为五千七百四十万人。这个数字过小估计了各国人民的牺牲，特别是苏联、中国及纳粹占领下各国人民的伤亡。(参阅井上、小此木、铃木合著《日本现代史》上卷)

半以上的巨款，用于破坏与杀伤上面，数年之中，使世界上最发达的广大地区和文化荒芜了。相当于一个或两个最进步国家的全体居民的人口被牺牲或残废了。

第二次大战，除给人类造成了生命和物质的损失，以及用文字和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上的损失之外，它使世界历史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上所述，这次大战有三种性质：（一）被侵略民族反抗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二）法西斯轴心和英、法、美及其他帝国主义集团间双方面的帝国主义战争；（三）与苏联反抗法西斯轴心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战争相结合的世界民主势力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一阶段（1931年9月—1939年8月），属于（一）种性质；第二阶段（1939年9月—1941年6月），与（一）性质的同时发生了（二）种性质；第三阶段（1941年6月—1945年8月），（一）（三）合而为一，居主导地位，但（二）种性质并未消失。而在第三阶段末期，随着法西斯轴心失败迹象日趋显明，美英等帝国主义集团有了转化为反苏、反共战争的可能性。

具有如此复杂性质的战争结果，简言之，就是

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胜利，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的失败。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关于大战后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飞跃发展及其在世界上指导地位的逐年加强，毋须在这里赘言。东欧各国在苏联从纳粹及其国内走卒压制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永远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向社会主义迈进。此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也飞跃地发展起来了。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成为整个帝国主义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败退的开端。尤其是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十四年民族解放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由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力量空前壮大起来。而企图代替日本统治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卒蒋介石一派，被逐于中国大陆之外，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五亿以上人口的大中国永远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这是继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大跃进。

北朝鲜和原法属印度支那北半部(越南)，也

变成社会主义体系国家之一了。

这样,从欧洲到亚洲,人口十亿,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面积占地球陆地的四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十六),自古以来,文明发达的广大地区,变成了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体系。战前只有苏联一国,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中,现在世界上则有和资本主义体系并存的社会主义体系。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仅中国和北朝鲜及越南永远脱离资本主义,而亚洲、非洲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以及其他各国也都获得独立,其他各民族也都展开了激烈的民族独立斗争。

1939年全世界面积的66%、人口65.8%为殖民地、半殖民地,1950年则分别减少到58.4%和43.7%。取得独立的各民族,虽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以印度为典型,反对一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加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关系。

以上事实,反言之就是帝国主义的衰退。战前美、英、日、法、意、德六大帝国主义中,日、德、意三国由于战败,从帝国主义列强的舞台中退下来。

法帝国主义也不如战前那么强大、英国也削弱了。只有美国成为比战前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称霸。但总的说来，由于资本主义支配领域的缩小，统治力量的动摇，以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和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立即想发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体系的战争来解决这个矛盾，组织了军事集团，将国家财富的大部分投入军费，加紧剥削人民，压制人民。因而必然引起各国内为争取完全独立、民主和国际和平而斗争的各种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社会主义各政党——的力量，空前发展起来。

即世界资本主义因第一次大战而陷于总危机，第二次大战更加深了它的危机，进入总危机的第二阶段。

占领体制下的日本 在战后的世界中，日本因战败而失去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被束缚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占领体制下，已成美国的属国。

原来美国对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它在亚洲和太平洋是美国最大的竞

争对手——，使它成为美国的属国，夺取它的遗产。这一点，美国在1945年9月22日公布的“初期对日占领基本政策”中，就表明了下面这样的占领政策的“最终目的”：

（一）保证使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以及对世界的威胁。

（二）建立尊重他国权利，必须支持表现了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的美国的目的是，并且是和平而又负责的政府。

美国希望这样的政府：即尽可能地符合于民主主义的自治原则，盟国不应该把得不到日本人民自由意志支持的政体，强加于日本。

若从这个文件里剔除其中的外交词藻，看看它的根本宗旨，其最后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变成忠实的属国，不负责依照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那样改造日本，建立为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因之上述文件，又明确写出，为达到这个“最终目的”，采取“利用”天皇制的方针。

但是由于第二次大战的基本性质是国际民主势力反对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斗争，所以美国的胜利，也是国际民主势力胜利的一部分，因

而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一开头就完全撕毁这个势力的共同纲领——波茨坦公告。其次，由于日本人民战前已经发展起来的和平民主主义传统的复活，再加长期战争中被无理压制着的人民对于和平、民主和生存的强烈要求，战后，空前高涨起来，因而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作一定的让步。第三，美国为了把日本改变为上述那样的属国，必须给日本的统治阶层以一定的打击，因此，认为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波茨坦公告和日本的民主势力反而有利。

这样，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后也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波茨坦公告发布民主政策的指令。人民以这些指令为武器，在国际民主势力援助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获得了主权在民与和平主义的新宪法，组织政党、工会、农会等的自由，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一连串的重要改革。

但是这种改革，不是由日本进步人民自身来实现的，而是由占领权力及其属下的统治者来进行，本来就不彻底，后来竟被阉割了。其间美国巧妙地达到了把日本属国化的目的。正式占领继续达七年之后，在1952年4月28日，日本和美国与

它的同伙及其仆从国家所订媾和条约生效后，形式上取消了占领，日本变成了半独立国家。因此，人民虽然获得了进一步推进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然而签订这个不完全的片面媾和条约的同时，由于被迫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我们仍然在美军“留驻”的名义下，事实上被占领着。我们国土被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压制我国，侵略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的一大军事基地。我国经济在这十年间成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攫取最高利润的源泉之一，又成为美国加工订货的地方。我国的教育、学术、文化也日益美国化了。

日本近代史的分期 我们日本人民苦斗达一世纪的历史结果，竟变成外国帝国主义的属国，这是谁也不曾梦想到的。我们怎样到了这步境地？我们是否有力量恢复独立，建立民主、和平和繁荣的祖国？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撰写此书。这里，我们回顾全书，研究一下日本近代史的基本特征。

如序言所示，从幕末到第二次大战战败为止的历史，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明治维新时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至1873年止。(二)资本主义确立期——1873年至1900年。(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1900年起至1918年止。(四)进入总危机并加深时期——1918年起至1937年止。(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期——1937年起至战败止。

这五个时期，和一般以统治体制的变迁为基础的划分不同，原因是本书不是以统治体制的变化而是以近代日本基本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为基础。这样的划分是因为日本至战败为止，不曾有过以日本民族和外国统治的矛盾为基本的时期，所以以日本国内基本阶级对立的变迁为基础。根据这种观点分为上述五期。关于叙述各时期的基本对立、各种次要对立、二者的结合形式及其全部变迁，等于概述本书全文，这里没有可能，只能举出各期的基本对立阶级。

第一，明治维新时期，以封建领主阶级和一般本百姓、小前(封建的隶农)的对立为基本，小手工业者、城市无产者和农民同样，始终是和领主对立的。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成为主力，而一方是封建的剥削者，另一方面是和领主阶级对立的地主、资

产阶级及因种种关系成为改革派的一些武士出身者则利用农民斗争完成明治维新。结果：（一）推翻幕藩体制，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绝对主义的统一国家；（二）实现了人民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三）局部地将农民从封建的土地领有制下解放出来，建立了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四）奠定了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五）确立了日本从欧美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地位下摆脱出来的方向。

第二，资本主义形成期，是以集中过去领主阶级权力又加上了新因素的天皇制（以半封建的地主阶级为固有基础，大资产阶级为支柱）和已由隶农变为半隶农的自耕农为主力的自耕佃农及无产阶级的对立为基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和没有特权的资产阶级曾领导农民等进行了自由民权斗争，但未获胜利。结果，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走向寄生地主化的倾向居支配地位。地主和佃农的斗争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迅速尖锐起来。这个时期，日本变成了军国主义国家，以中日战争为转折点，从基本上受欧美列强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仍然从属于欧美而同时又压迫朝鲜、中国、拥有殖民地的国家。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发展起来，在一切阶级对立中升居支配地位是 1900 年前后的事，而统治权力——天皇制从过去的主要依靠半封建的地主阶级变成了依靠地主和资产阶级二者了。因而以此为分界线，进入第三个时期。这时期，日本从属于英帝国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以前，变成了帝国主义，进行了日俄战争，其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此同时，垄断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发生了轻微的对立。

第四个时期，开始于 1918 年的米粮暴动。基本的对立阶级虽与前一时期无甚变化，但其对立尖锐化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被压迫阶级中的领导地位确立起来了，同时，垄断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压倒了地主阶级。因而这个时期的后半期，继佃农和地主的对立，做工农民和垄断资本家的对立居于重要地位。

第五个时期，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全体人民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对立成为客观上的基本对立，但前者的主要组织完全被天皇制法西斯所粉碎，斗争成为无组织的、自发的了。这中间，人民被迫从战争驱入战争，忍

受一切困难和压制，同时也蓄积了革命力量。

日本近代史的特征 以这种基本的对立发展起来的日本近代史具有一些最显著的特征。

第一，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文明国家，把自己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已展开争取近代自由和人民民主权利的革命斗争，在这方面也是走在亚洲其他各国的前列。此外，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日本也是先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亚洲各民族中是站在进步的最前列。

第二，近代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速度，确实值得惊异，不能以一般后进国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所出现的现象来说明。日本以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百年的历史，不但在资本主义的确立过程中，就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超过了美国（参阅第六章第一节、第七章第四节）。一般的说法是没有铁和煤就没有资本主义。日本虽多少有点煤，但无铁矿。它不是所谓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也发展了近代产业，现在仍然在发展着。

这样异常迅速发达的动力是什么呢？日本迅速的军国主义化，掠夺邻国，和在国内利用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任情剥削，这无疑地对于资本的积累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促使日本资本主义发达的基本力量，基本动力是在这以外，军国主义不过是利用它而已。

这种力量就是日本人民从过去到近代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水平，民族各成员的生产能力、创造力、组织力、勤勉，及其他的综合。

简言之，它可以说是“民族的生命力”^①，这种

① “民族的生命力”的说法似乎是唯心的，甚至神秘主义的。恩格斯在“就波兰问题批判拿破仑三世等人所谈的民族原则”的论文(1866年)中写道：“比较强大的民族，由于具有较大的生命力(Great vitality)而能克服了较大的障碍。至于一个民族的生命力(vitality of a People)以及它的欧洲意义，——这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什么也不算；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罗马尼亚人，在‘民族原则’看来，他们与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稳定的民族生命力(unimpaired national vitality)的意大利人，有着同样的意义”(这是荒谬的)^②。(参阅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二》)承认民族的生命力不是错误的，而把它神秘化那才是错误的。

② “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第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

生命力,由于日本从封建闭关下解放出来,和近代世界连结在一起,从先进国家吸收很多养分,以及从封建割据走上统一的国家,不但获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也获得了言论、学术、思想等的自由。使人民逐渐进步,更增加了劲头。

第三个特征,是尽管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各种封建的因素仍顽强地残存着。这一点为其最大特征。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是如何地纠缠着,在全书中已阐述了,较容易理解,这里不重复了。

第四是封建天皇制继续掌握政权。封建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纠缠,使国内市场异常狭小这一最基本的因素加之处在列强猛烈侵略亚洲的情

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6—177页。——编者)

况下,就诱发了这样一个条件,即日本不能不奋发图强,使近代日本一开始便走上极端军国主义的道路。而且近邻各民族近代的发展较迟,以致日本占了容易侵略的历史的地理的便利。欧美各国与远东远隔重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交通、军事的发展程度下,不能从本国立即派大军前来,而日本在远东独占最大的军事力量。这一点,使日本较易发展为帝国主义。

1874年已开始远征台湾,继而以武力强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1882年和1884年在朝鲜制造纠纷,1894—1895年发动中日战争,1900年成为帝国主义联军的主力,镇压义和团,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五年之后即1910年合并朝鲜,1914年加入第一次大战,1918—1925年止进行干涉俄国革命的战争,1927年和1928年出兵干涉中国革命,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直到1945年8月投降止,没有一天停止过战争。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中设立了“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以来,到1931年3月止,“战费特别会计”用种种名称(或称“临时军事费”,或称“临时事件费”,或称“临时军费清理费”)继续存在。同年9月,九·一八事

变发生后,直到 1945 年投降为止,预算上又编入“临时军事费”。投降后犹用“终战处理费”的名称,继续存在。

象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史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这不是由于日本民族好战,也不是由于土地狭小人口众多^①,乃是由于前面说过的特殊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然而因为是个后进国家,具有受先进列强压迫的一面。这一点,便被利用为宣传与教育的借口,把日本军国主义说成是正当行动。再加上战争接着战争,使日本经济结构变成了极端的军事型。虽然非正义的战争在本质上只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不幸和悲惨,但能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这两种情况,阻碍了人民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和反战思想的发展。

第五,封建的、军事的资本主义和寄生地主制及在这二者上而的天皇制,恣意进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所看不到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此,人民展开了不断的斗争。

^① 参阅本书第六章第五节第 472 页注文所引用的《原敬日记》。

这时，统治阶级在人民学习先进国家人民的斗争经验之前，就学会了先进国家统治者的经验，并采取了对策。统治的手段、方法与装备，也都较人民的组织为早。例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工人还不到一万人，政府已经仿照法国在刑法中订有所谓工业妨害罪、禁止罢工的规定。警察遍布于任何深山和遥远的孤岛。电信、电话、铁路，首先是供军队、警察使用的。广泛地普及教育，同时又用教育敕谕加以严厉的统制。

尽管处在这种最新式的残暴统治的机器之下，人民还是非起来斗争不可，不然就活不下去。不过他们的斗争总是在萌芽以后进一步组织起来的时候就遭到残酷的镇压。自由民权斗争就是这样被摧残了。资产阶级中途放弃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便落在无产阶级肩上。无产阶级面对着复杂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个课题，从1900年前后萌芽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运动，都因1921年的幸德事件被窒息了。第一次大战后恢复并重新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因遭到无数次毁灭性的打击，1937年便又消沉下去了。

在抵抗这种镇压而继续斗争中，用现在的话来说，又经常发生“左”倾的偏向。如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后阶段、日俄战后幸德等的直接行动主义，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共产党事件等，都是例子。这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事者阶级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因与上述这样的统治阶级为敌，在一定程度上，难免这种遭遇。

这样，我国近代史上，虽有革命的斗争，但没有过胜利的经验。同时，运动不是有组织地一贯地继续发展下去。

第六，但不能视近代史为单纯的失败史。我国近代历史中也贯串着不断的进步。在社会结构上面，虽说封建残余仍广泛而强韧地存在着，但也逐渐被削弱和缩小了。封建残余制核心的寄生地主制在第一次大战后逐渐削弱了。封建天皇制不得不于1890年披上立宪的外衣，1924年不得不给男子以普通选举权。“即使在反革命时期，历史也不是停滞不前的。”^① 在天皇制法西斯疯狂的压迫下，工业结构高度化了，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

^① 列宁：《世界政治的转变》，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74页。

阶级的数目显著地增多了，阶级团结也坚强而扩大了，给战后斗争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这是不能忽视的一面。

日本人民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斗争，虽然遭到无数次失败、停顿，但每当其主要领导阶级发生更替，便有进一步的发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一次被破坏的争取民主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初期起，便以新的气势发展起来，尽管有日本的局限性，却实现了议会政治。1911年因幸德事件而中断的社会主义运动到1918年再起时，已与过去不同，有了质的飞跃。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组织性也加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前半期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斗争，虽然是无形的，以工人阶级为首，对人民的思想却起了重大影响。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中仍继续活着。

结语 我们经历了具有这种特征的近百年历史，战败后，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空前高涨也决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占领军在温室里培植起来的，而是日本人民的历史本身所创造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工人运动才开始有

组织地发展起来。日俄战争后签订和约时，出现了火烧东京全市警察机关的市民斗争，嗣后的罢工也与战前有质的不同，规模变大了，也变得更激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尚未结束时便发生了遍及全国的米粮暴动，其后工人、农民、市民、妇女、学生等争取民主、和平和生存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都飞跃地高涨起来。这是由于人民在资本主义飞跃发展的各个时期与其矛盾尖锐化的客观基础上，肩负非正义战争的重担，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的关系。即使是第二次大战前，几次为期迅速而且是日本打胜了的战争之后也是如此。何况战争达十四年，使日本人民陷于惨败的第二次大战之后，日本人民具有数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斗争的质、量都飞跃地发展起来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然而过去的日本是独立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则沦为附属国了。卖国的统治者，没有“民族”这个坚强的、永久的统一性武器，这是属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

此外，世界史的条件完全不同了。国内外的反动统治者陷于深刻的危机中。进步的人民，同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主义各国的人民，不用说，固然紧密地团结着；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亚、非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各阶级也紧密地团结着。特别是亚洲的形势早已一变，成为旧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可能的历史的地理的条件完全丧失了。亚洲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而成为帮助进步日本人民发展独立和民主运动的伟大力量了。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和平民主、繁荣的祖国的斗争，如果不遭到不可挽救的失败或犯错误，即使经历任何艰苦或暂时的失败，也必然会获得胜利。

新版后记

我们合写的《日本近代史》上卷出版于前年年底，下卷在去年春出版。当时出版社和作者有个共同愿望：想把它并成一册，印刷排版方面能更便于阅读，装订也耐用而美观。但为了尽量减低书价，让它能和更多的读者见面，所以才不顾装订上的不便，分成上下两卷，用小丛书体出版。

经过了一年多的今天，各地很多读者来信，认为分成两册，使用很不方便，希望并为一册，装订得更好，并附上索引，年表也应再详细些，便于查对，并附外国历史事件，以便对照。因此，为了满足读者要求，又出版了并成一册的新版本，虽然书价略有提高。

新版本和旧版本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仅仅在形式上和叙述上作了如下的改善：

(一)改正了旧版本中一些校对上的错误。

(二)改正了叙述体例上的不统一。例如,旧版本对于人名虽是采用第一次出现时附上读法注音和生卒年代以后不再注明的方针,但事实上并不统一,新版本则统一起来了。

此外,关于人名、地名的注音,也较旧版增多了。或许这是多余,但本书幸承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人士阅读,因而考虑到为这些读者的方便。

(三)还有一点和内容有关,即对于字句和文章的表达也略有改动。注意修改了旧版本中不正确或不清楚因而引起读者误解和疑问之处。这是由我改正的。

(四)新版本附上了索引^①,年表也作了很大的修改。索引承合同出版社编辑部代劳,年表则由本书著者之一藤井松一君执笔。

上面就是和旧版不同之处。如果读者对本书记述发生疑问或有意见,请以新版本为标准,希望参考新版本。然新旧版除字句上的差异外,没有其他重要不同。

^① 原中译本没有索引。——编者

本书刚出版时，关于研究现代史的方法问题，文艺评论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人士曾在新闻杂志上热烈讨论，史学家也参加了这场论争。现代史的方法论成了去年争论的中心问题。在论争中，本书也成了批判的目标。

假如是为了求得真理的批判，无论怎样尖锐，即或完全无视本书的优点和对学术上的贡献，单夸大它的缺点，也无不可。然而，有的“批判”不是为了究明真理，而是专从社会上所赞许的著作找点毛病，借此作自我宣传；或者是基于思想上、政治上乃至派阀上的对立，吹毛求疵地找缺点、错误；不，如果能够找出缺点和错误，还是好的，甚至于连这一点也未作到，只因为写有不合己意的事，或是写法不合己意时，便说是为奉承共产党而歪曲历史，或说是没有认识矛盾的能力，也就是低能等类似漫骂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曾占去年对本书“批判”的大部分。对这些，我们认为没有理睬的必要。

如果不是这种“批判”，而是为了理解日本近代史的规律，有助于解决日本人民当前的课题，以及关于本书对事物认识上或理论上的缺点和错

误，都希望给予指正和批判。

井上清

1957年6月15日

关于近代史的方法问题，我在京都日本史研究所机关刊物《日本史研究》31号上发表了《关于近代史的方法》一文，又在《思想》杂志1957年5月号特辑《历史》上发表了《研究现代史的关键问题——历史唯物论者的反省》，作为我对我的批判者的反批判和自我检讨，读者如对该问题有兴趣，即请参阅。

年 表

凡 例

一、本年表包括 1837 年“大盐领导的暴动”起至 1945 年“投降签字”止的历史。

二、本年表分三栏：第一栏为公元年代，括号内为日本年号，第二栏是日本的历史事件，第三栏是外国的历史事件。

三、最前面的时期，根据“前言”的时期划分，共分为五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开始年代用黑体字表示。

四、日本史上的月日，在 1872 年（明治 5 年）12 月采用阳历以前，仍用阴历，旧俄历则改算为阳历。

五、重大事件特别用黑体字表示。

六、日期不明以及根据事件的性质或日期不能肯定者以“——”代替月份，放在每一年的最后部分。

第一时期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37 (天保 8)	2月	大盐平八郎领导暴动。		
	6月	生田万暴动。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38 (天保9)	闰4月 幕府发布节约令。 8月 佐渡发生农民起义。	
1839 (天保10)	5月 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 被捕(蕃社狱)。	
1840 (天保11)	4月 长州藩村田清风开始改 革藩政。 9月 限制江户的钱庄在六百 人以内。	7月 中英鸦片战争 开始。
1841 (天保12)	5月 天保改革开始。 7月 幕府官书《天保集成》完 成。 12月 禁止“株仲間”(行会)。	6月 平英团事件。
1842 (天保13)	6月 准许高岛秋帆教授炮 术。 7月 缓和击退外船令(天保 供给煤水令)。 9月 禁止大名以下专卖土 产。 —— 对戏剧、音乐等严加限 制。	7月 伦敦宪章运 动。 8月 南京条约签 字, 鸦片战争 结束。
1843 (天保14)	9月 幕府将江户、大阪方圆 十里划为直辖地。	9月 雅典爆发革 命。
1844 (弘化元)	7月 荷兰使节科布斯(H.H. F. Coops) 来长崎劝告 日本开放海禁。	5月 法国和摩洛哥 战争。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45 (弘化 2)	幕府派步兵驻函馆、国后等十二处，并修筑炮台。 6月 幕府拒绝荷兰开放海禁的劝告。	
1846 (弘化 3)	闰 5月 美国使节彼得尔 (Jhon Beddle) 来浦贺要求建立邦交。 英、法、丹麦船只频繁前来。	5月 英国废除谷物法。
1847 (弘化 4)	2月 强化相模、安房、上总国沿岸警备。	
1848 (嘉永元)	3月 外国船连续出沒于对马及北海。 11月 幕府命令警备江户湾的四藩，贮存铜制空炮。	2月 巴黎二月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 3月 德国三月革命。 6月 法国工人六月起义。
1849 (嘉永 2)	1月 闰 4月起外国船得开入那霸、长崎、浦贺各港。 5月 江川太郎左卫门建议兵制三方策。 12月 令各藩强化海防。	5月 德国发生帝国宪法战争。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50 (嘉永 3)	4月 朝廷令七社七寺作消除外患的祈祷。	6月 太平天国革命开始。
	9月 严禁未经许可翻译荷兰书籍。	
	10月 佐贺藩建成反射炉。	
1851 (嘉永 4)	3月 为救济江户市民恢复十组批发庄。	8月 洪秀全等建立太平天国。
	7月 会津藩在江户的三田官邸举行洋枪队演习。	12月 路易·拿破仑政变。
	8月 萨摩藩在鹿儿岛建立冶炼所。	
1852 (嘉永 5)	6月 俄船开进下田港。	
	7月 大阪町奉行传令降低米价。	11月 德国科伦审判共产党案。
	10月 长崎奉行厉行管制走私, 严禁私贩输入品。	
1853 (嘉永 6)	6月 培理 (Perry) 率舰队开进浦贺港。	2月 太平军占领南京。
	7月 俄国使节波将金 (Putiatin) 率舰队开抵长崎。	—— 克里米亚战争 (—1856)。
	9月 幕府撤销建造大舰船禁令。	
1854 (安政元)	1月 培理再率舰队来日。	2月 美国共和党成立。
	3月 日美友好条约签字 (神奈川条约)。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55 (安政 2)	8月 日英友好条约签字。	
	12月 日俄友好条约签字。	
	1月 幕府置北海道为直辖地。	
	6月 幕府令各大名实行洋式练兵。	—— 俄国农民骚动扩大。
	10月 江戸大地震，藤田东湖死。	
1856 (安政 3)	日法友好条约签字。	
	12月 日荷友好条约签字。	
	2月 洋学所改名“蕃书研究所”。	10月 亚罗号事件。
1857 (安政 4)	4月 创办讲武所。	
	—— 开始排印荷兰书籍。	
	5月 下田条约签字。	5月 印度民族起义。
	7月 幕府在长崎设立制炮所。	6月 英军进攻德里。莫卧儿帝国灭亡。
1858 (安政 5)	10月 松平庆永等推荐庆喜为将军继承人。	
	3月 朝廷拒绝批准条约。	
	4月 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任大老。	
	6—9月 与美、葡、俄、英、法签订通商条约（安政草约）。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59 (安政6)	9月 井伊大老镇压尊攘派 (安政大狱)。	
	1月 设立海军操练所。	6月 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 出版。
	6月 开放神奈川、长崎、函馆 三港为商埠。	
1860 (万延元)	10月 桥本左内、吉田松阴等 处刑。	10月 美国约翰·布 劳恩起义。
	1月 遣美使节新见正兴等起 程。	7月 伦敦工会委员 会成立。
	3月 井伊大老被刺(樱田门 事变)。	
	11月 颁布堂岛米市管理令。	
	12月 美人翻译休斯金被暗 杀。	
1861 (文久元)	3月 俄舰波萨得尼克号占领 对马岛。通知各国延期 七年开港开市。	3月 俄国下令解放 农奴。
	5月 袭击英国公使馆。	4月 美国南北战争 爆发。
	10月 江川英敏建议创建农兵 制。	
	1862 (文久2)	1月 老中安藤信行遭袭击 (坂下门事变)。
	2月 皇妹和宫降嫁将军家茂 (公武联合政策)。	
	7月 幕府通令各藩可以自由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63 (文久3)	购置舰船。	
	8月 萨摩藩士杀害外人(生麦事件)。	
	9月 朝廷决议攘夷。	
	5月 长州藩炮击美、法、荷军舰。	1月 波兰革命。
	6月 长州藩组成奇兵队。	
	7月 萨、英战争爆发。	
1864 (元治元)	8月 三条实美等尊攘急进派七公卿被公武联合派所逐出, 西下长州(八月十八日的政变)。 天诛组起兵。	
	10月 生野起兵。	
	3月 水户藩士藤田小四郎等的天狗党在筑波山起兵。	6月 太平天国失败。
	6月 池田屋事件。	
	7月 蛤门事变。	
	8月 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炮轰长州藩炮台。 第一次征讨长州。	9月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
1865 (庆应元)	1月 高山晋作等在马关起兵。	4月 南军投降, 南北战争结束。
	4月 幕府再组织征长军。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66 (庆应2)	<p>长州改革派实行军制大改革。</p> <p>10月 朝廷批准开放长崎、横滨、函馆三港为商埠，封闭兵庫港。</p> <p>1月 萨长订立联盟条约。</p> <p>2月 幕府允许外人侨居神奈川、长崎、函馆三港并自由贸易。</p> <p>5月 幕府和英、美、法、荷订立修改进出口税条约。</p> <p>6月 幕府向长州藩宣战，长州藩军队击败幕府军。</p>	<p>6月 普奥战争。</p> <p>8月 美国全国工人联盟成立，通过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p>
1867 (庆应3)	<p>1月 德川昭武等遣欧使节起程。</p> <p>4月 坂本龙马组成海援队。</p> <p>5月 鹿儿岛建立的第一个新式机器纺织厂竣工。</p> <p>9月 萨、长、艺订立讨幕攻守同盟。</p> <p>10月 颁布讨幕诏书。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p> <p>12月 颁布王政复古诏书。 设立总裁、议定、参与等三种官职。</p>	<p>9月 马克思《资本论》出版。</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68 (明治元)	1月 鸟羽、伏见战役。 颁布征讨德川大号令， 戊辰战争开始。	6月 英国全国工会 会议成立。
	3月 颁布五条誓文。	—— 巴枯宁国际社 会民主同盟成 立。
	4月 江户开城投降。	
	闰4月 颁布政体书。	
	5月 上野战争，彰义队被击 败。	
	9月 改元明治。 奥羽越同盟，会津开城 投降。	
1869 (明治2)	2月 设立造币局。 准许发行报纸。	5月 美国建成第一 条横断大陆的 铁路。
	5月 公布出版条例，严禁批 判政治。 克复五棱郭，函馆战争 结束。	8月 德国社会民主 工党成立。
	迁都东京。	11月 苏伊士运河通 航。
	6月 奉还版籍。 华士族平民制的开端 (废除封建身分制度)。	12月 美国劳动骑士 团成立。
	12月 堺纺织厂投入生产。 —— 各地“救世”骚动，农民 暴动频发。	
1870 (明治3)	1月 颁布大教诏书。	7月 普法战争（一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71 (明治 4)	加藤弘之《真政大意》出版。	1871)。
	2月 旧奇兵队暴动。	9月 法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
	6月 设立国营前桥水力动力制丝所。	10月 意大利完成统一。
	8月 山县有朋等着手改革军制。	
	10月 设立工部省。	
	11月 公布征兵条例。	
	12月 奉还世祿。 公布新律纲领。 信州松代爆发农民起义。	
	1月 东京、大阪间开始通邮。	1月 德意志帝国建立，威廉一世即帝位。
	4月 创设镇台。 《横滨每日新闻》创刊。	
	7月 废藩置县。	3月 巴黎公社(—5月)。
8月 废除秽多、非人称号。		
9月 准许自由种植水旱田作物。	—— 俄国“到民间去”运动高涨。	
10月 派遣岩仓、木户、大久保等赴欧美考察。取消教门登记簿。		
1872 (明治 5)	2月 撤销土地买卖禁令。 福泽谕吉《劝学篇》出	6月 英国制定工会法。 9月 国际工人协会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版。 3月 取消亲兵,设立近卫军。 撤销神祇省,设立文部省(教部省)。 6月 开办富冈缫丝工厂。 8月 颁布学制。 公布国立银行条例。 9月 横滨、新桥间铁路通车。 12月 采用阳历(定12月3日为明治6年元旦)。	第五次大会(海牙)。 —— 三帝同盟(德奥俄)。 —— 第一国际马克思派开除无政府主义派。

第二时期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73 (明治6)	1月 颁布征兵令。 2月 福泽谕吉、西周等建立明六社。 6月 征韩派起。 制定日本矿业法。 7月 公布地税改革条例。 10月 征韩派失败,参议西乡、板垣等辞职。 11月 设立内务省。 —— 各地发生反对征兵令的暴动。	6月 西班牙宣布建立共和国。 7月 德国制定金本位法。 —— 欧美各国发生经济危机,欧洲开始出现卡特尔。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74 (明治7)	1月 岩仓具视被刺(喰违坂事件)。 设立警视厅。 板垣、副岛等组成爱国公党,建议设立民选议院。	5月 北美社会民主党成立。 10月 签订万国邮政联盟条约。 —— 英国制定工厂法。
	2月 佐贺暴动。	
	3月 <明六杂志>创刊(——1875)。	
	4月 板垣、片冈健吉等在土佐组织立志社。侵略台湾。	
	6月 创立北海道屯田兵制度。 收公地、公有林为国有。	
	1875 (明治8)	1月 大久保、木户、板垣等集会于大阪(大阪会议)。 板垣再次出任参议。 加藤弘之<国体新论>出版。
2月 爱国公党改组为爱国社。		5月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成立(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
4月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出版。		
5月 日俄签订交换千岛、库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76 (明治9)	页岛条约。	—— 英国经济萧条时代(—1895)。	
	6月 第一次召开地方长官会议。		
	公布新闻条例、谗谤律。		
	9月 朝鲜江华岛事件。		
	11月 新岛襄创立同志社。		
	2月 签订日韩“友好”条约。		7月 第一国际解散。
	3月 公布禁止佩刀令。		美国劳工党成立(1877年改名美国社会主义工党)。
	7月 设立三井物产公司。		10月 法国第一次全国工人大会在巴黎开会。
	8月 颁布金祿公债券发行条例。		
	9月 设立大阪堂岛米谷交易所。		
	10月 神风连暴动,萩、秋月暴动。		
	11月 茨城县真壁郡农民要求减轻租税的起义。		
12月 三重、爱知、岐阜、堺等四县一万六千农民反对修改地稅大起义。			
1877 (明治10)	1月 地稅减轻二分五厘。	4月 俄土战争(—1878)。	
	2月 西乡隆盛叛,西南战争爆发。	英国合并脱兰斯瓦尔共和国。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出版。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78 (明治11)	4月 创办东京大学。	
	6月 立志社代表片冈健吉等 建议召开国会。	
	8月 林有造等颠覆政府计划 被揭发(高知狱)。第一 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开 会。	
	9月 西南战争结束。	
	—— 卢梭著服部德译《民约 论》出版。	
	4月 板垣退助恢复爱国社。	4月 英国兰开夏纺 织工人十二万 人罢工。
	5月 大久保利通被暗杀(纪 尾井坂事变)。	
	6月 设立东京股票交易所。	10月 德国公布反社 会主义者的法 令。
	7月 高岛煤矿工人反对降低 工资斗争。	
	8月 近卫军两千余人暴动， 五十三人被处死刑(竹 桥骚动)。	
	11月 寺岛宗则外相开始修改 条约谈判。	
12月 设立参谋本部。		
1879 (明治12)	1月 《大阪朝日新闻》创 刊。	7月 德国公布保护 关税法。
	4月 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80 (明治13)	8月 设立府县会议。 植木枝盛《民权自由论》出版。	8月 法人雷塞普组织巴拿马运河公司。
	9月 建立千住制绒所。	10月 英国迫使阿富汗为属国。
	10月 东京、大阪建立炮兵工厂。	—— 爱迪生发明电灯。
	—— 由法国人阿苏纳德起草民法。	
	3月 爱国社第三次大会，改名“国会期成同盟”。 指定村田枪为军用枪。	4月 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
	4月 公布集会条例。 二府二十二县八万七千人的代表一一四人集会于东京，片冈、河野等提出召开国会的请愿书。	12月 英布战争（—1881）。
	10月 尤尼特利安派基督教杂志《六合杂志》创刊。 群馬县八十二个村三万人为反对征用公地而暴动。	
11月 公布出卖国营工厂概则		
1881 (明治14)	2月 创立玄洋社。	2月 巴拿马运河动工。
	3月 公布宪兵条例。 西园寺公望等创刊《东	3月 俄帝亚历山大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82 (明治15)	<p>洋自由新闻》。</p> <p>5月 全国酒店在大阪召开会议。通过反对提高造酒税决议案。</p>	<p>二世被暗杀。</p> <p>5月 法国迫使突尼斯为保护国。</p>
	<p>7月 开拓使将公产转让私人事件。</p>	<p>—— 俄国提高进口税，对德关税战开始。</p>
	<p>10月 松方正义开始整理货币，推行紧缩通货政策。参议大隈重信被排挤(明治14年的政变)。</p> <p>下诏定明治23年召开国会。</p> <p>板垣退助等组成自由党。</p>	<p>—— 美国南太平洋铁路通车。</p>
	<p>1月 颁布军人敕谕。开始与各国开修改条约预备会议。</p>	<p>1月 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托拉斯成立。</p>
	<p>2月 植木枝盛起草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案。</p>	<p>5月 德奥意三国结成同盟。</p>
	<p>3月 伊藤博文等赴欧考察宪法。</p> <p>立宪改进党成立(总理大隈重信)。</p> <p>立宪帝政党成立(党魁福地源一郎)。</p>	<p>7月 英国的爱尔兰镇压法生效。</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83 (明治16)	5月 樽井藤吉等组成东洋社会党。 板垣退助在岐阜遇刺负伤。 井上馨着手修改条约。	
	6月 制定日本银行条例。	
	7月 汉城事变(壬午兵变), 日本出兵。	
	10月 大日本纺织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	
	11月 福岛事件, 福岛县农民反对三岛施政的起义。	
	12月 奥宫健之等的车界党成立, 旋被禁止。	
	1月 马场辰猪《天赋人权论》出版。	3月 马克思逝世。
	3月 高田事件, 自由党员赤井景韶等二十六人以阴谋内乱罪被捕。	8月 法国获得对越南的保护权。
	4月 修改新闻条例。	9月 美国北太平洋铁路全线通车。
	6月 修改出版条例。	—— 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组成劳动解放社。
7月 鹿鸣馆竣工。		
1884 (明治17)	3月 改革地稅条例(地租全	11月 英国费边协会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85 (明治18)	部属地主，地稅不因丰收或歉收而有所增减)。	12月 成立。
	5月 群马事件。	德国吞并新几内亚北部和俾斯麦群岛。
	9月 加波山事件。	英国第三次改革选举法，矿山、农业劳动者取得选举权。
	10月 自由党解散。 秩父事件。	
	12月 驻韩日本公使政变阴谋失败(甲申事变)。 大隈重信等退出改进党。 名古屋事件。 饭田事件。	
	—— 公司银行连续出现破产者，农业危机严重。	
	3月 砚友社成立。	10月 德国占领马沙尔群岛。
	4月 中日签订天津条约。 开始调查租佃惯例。	12月 印度国民会议派结成。
	8月 坪内逍遙《小说精华》出版。	—— 南非脱兰斯瓦尔发现金矿。
	9月 制定违警罪即决条例。 创办日本邮船公司。	
	11月 大阪事件，大井宪太郎等的渡韩计划被揭发。	
	12月 废太政官制，建立内閣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86 (明治19)	制。 伊藤博文(第一次)内阁成立。	
	1月 废镇台, 建立六个师团。	5月 全美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总罢工。
	3月 公布帝国大学令。	美国秣市惨案。
	5月 第一次修改条约会议。	
	6月 甲府雨宫缫丝厂女工百余人罢工。	
	7月 静冈事件。	11月 法国全国工会联合会成立。
	8月 戏剧改良会成立。	
	10月 诺曼顿号事件。	12月 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AFL)
	12月 矢岛揖子等组织妇女矫风会。	
	1887 (明治20)	2月 德富苏峰创办《国民之友》杂志。
4月 鹿鸣馆举行化装舞会, 引起舆论不满。		10月 法国并吞交趾支那。
6月 二叶亭四迷著《浮云》出版。		—— 英国新工联主义运动兴起。
7月 通知各国无限期延期修改条约会议。		—— 俄国废除人头税。
9月 井上外相辞职。		
12月 二府十八县志士向元老院提出三大建议。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88 (明治21)	<p>保安条例公布施行，反政府派五百七十人被驱逐。</p>	
	<p>4月 后藤象二郎在福岛召开“大同团结”，悬亲会。三宅雪岭、杉浦重刚等创办《日本人》，公布市、町、村制度。</p>	<p>10月 苏伊士运河协定成立（运河航行自由和中立）。</p>
	<p>5月 枢密院宪法制定会议开会。</p>	<p>11月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成立。</p>
	<p>6月 高岛煤矿虐待事件在《日本人》报道下，引起舆论的不满。</p>	
	<p>10月 在野党在大阪新生楼召开大同团结悬亲会。</p>	
1889 (明治22)	<p>2月 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p>	<p>7月 各国社会主义者在巴黎集会，建立第二国际。</p>
	<p>4月 反对修改条约的呼声高涨。 河野等组织政治结社“大同俱乐部”，大井等组织非政治结社“大同协和会”。</p>	
	<p>6月 石川岛造船所、海军兵工厂等先进工人组成同盟进工组。</p>	<p>8月 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参加者十五万人。</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90 (明治23)	9月 天满纺织厂女工三百名 罢工。 朝鲜发布防谷令，禁止 谷物输出。		
	12月 山县有朋(第一次)内阁 成立。		
	1月 富山县发生米粮暴动， 漫延全国。	5月 第一届国际五 一节。	
	2月 德富苏峰创办《国民新 闻》。	德国废除反社 会主义者法 令。	
	4月 三重县川口村成立佃农 同盟，名彻交社。	7月 美国余尔曼制 定反托拉斯 法。	
	5月 板垣组成爱国公党。		
	6月 福岛县若松发生米粮暴 动，漫延至东北、北陆 地方。 佐渡相川町发生米粮暴 动，派军队镇压。 纺织联合会第一次缩短 作业时间。	12月 德国社会主义 工党改名德国 社会民主党。	
	7月 选举第一届众议院议 员。		
	公布集会和政社法。		
	9月 立宪自由党成立。		
10月 颁布教育敕谕。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91 (明治24)	<p>酒井雄三郎等组成社会 问题研究会。</p> <p>—— 第一届帝国议会开会。 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p> <p>1月 内村鉴三不敬案。</p> <p>5月 松方正义(第一次)内阁 成立。</p> <p>俄国皇太子遇刺(天津 事件)。</p> <p>8月 佐久间贞一组成印刷工 人的工会,拥有会员二 百余名。</p> <p>12月 田中正造向议会提出足 尾矿毒事件质问书。</p>	<p>8月 第二国际第二 次大会(布鲁 塞尔)通过反 战决议。</p> <p>10月 德国社会民主 党大会,接受 欧法特纲领。</p>
1892 (明治25)	<p>2月 第二届大选,品川内相 干涉选举,出现四百人 左右的死伤者,民党胜 利。</p> <p>3月 久米邦武因《神道乃祭 天的旧习》一文,遭笔 祸。</p> <p>5月 足尾矿毒受害民代表进 京请愿。</p> <p>8月 伊藤(第二次)内阁成立。</p>	<p>3月 意大利工党成 立。</p> <p>波兰社会党成 立。</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93 (明治26)	<p>9月 下瀬发明火药。 甲府缫丝厂女工反对降低工资罢工。</p> <p>11月 黑岩泪香创办《万朝报》。大井宪太郎组成东洋自由党。</p> <p>1月 《文学界》创刊。</p> <p>4月 公布出版法。</p> <p>9月 富冈缫丝厂出售给三井公司。</p> <p>10月 大日本协会成立，主张强硬外交。</p> <p>11月 建立芝浦制造厂。</p>	<p>1月 英国哈蒂等组成独立工党。</p> <p>2月 德国来因——韦斯特发伦煤炭辛迪加成立。</p> <p>8月 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p>
1894 (明治27)	<p>1月 大阪天满纺织工人同盟罢工。</p> <p>5月 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兵在仁川登陆。</p> <p>7月 修正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字。 丰岛洋面之战。</p> <p>8月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p> <p>9月 广岛设立大本营。</p> <p>12月 获得汉仁（汉城——仁</p>	<p>3月 金玉均被刺。 列宁发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p> <p>10月 法国德来福士事件。</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95 (明治28)	川)、汉釜(汉城——釜山)两条铁路修筑权。	11月 法国租借中国广州湾。
	4月 签订马关条约。俄、德、法三国干涉，退还辽东半岛。	12月 俄国国外社会主义同盟成立。
	5月 台湾掀起独立运动，发表独立共和国宣言。	8月 恩格斯逝世。
	8月 刘永福领导下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高涨，在台湾实行军政。	9月 法国劳工总同盟成立。CGT
	12月 中村太八郎、木下尚江等在信州松本附近展开普选运动。	—— 列宁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896 (明治29)	3月 改进党、革新党、同志会等合并成立进步党。公布造船奖励法、航海奖励法。	7月 第二国际第四次大会(伦敦)决议开除无政府主义者。
	4月 公布农工银行法、劝业银行法。日本社会政策学会创立。	8月 俄国获得中东铁路修筑权。
	6月 山县、罗巴诺夫协定成	—— 爱尔兰社会共和党成立。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97 (明治30)	立, 日俄签订关于朝鲜 协议书。	
	7月 三重纺织厂工人要求提 高工资, 举行三次罢工。	
	9月 松隈内阁成立 (首相松 方正义, 外相大隈)。	
	2月 建立八幡制铁所。	2月 希土战争。
	3月 足尾矿毒受害农民八百 余人向农商务省请愿。	6月 美国德布斯等 创立美国社会 民主党。
	4月 中村太八郎、樽井藤吉 等组成社会问题研究 会。	德国西门子康 采恩成立。
	城常太郎、高野房太郎、 泽田半之助等组成职工 义友会。	10月 俄国、波兰、立 陶宛犹太社会 民主主义总同 盟成立。
	5月 足尾矿毒受害民暴动, 派宪兵镇压。	12月 英国机械工人 举行三十周间 的罢工。
	7月 片山、高野、泽田等组成 工会促进会。信州松本 等地散发普选运动传 单。	
	10月 实行金本位制。	
12月 工会促进会会员一千一 百八十四名组成铁工工 会。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898 (明治31)	1月	伊藤(第三次)内阁成立。	3月	德国租借胶州湾, 俄国租借旅大。
	2月	日本铁路公司司机、火夫要求改善待遇、反对解雇举行同盟罢工。		列宁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4月	日铁矫正会成立。		
	6月	自由、进步两党合并组成宪政党。	4月	美西战争(—12月)。
		隈板(宪政党)内阁成立(首相大隈、内相板垣)。	6月	阿基纳度宣布菲律宾共和国独立。
	10月	村井、安部、片山、幸德等组成社会主义研究会。	8月	美国合并夏威夷。
1899 (明治32)		宪政党分裂, 宪政本党成立。	9月	英、法法绍达事件起。
	11月	山县(第二次)内阁成立。		
	4月	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内地杂居后之日本》出版。	5月	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开会。
	5月	确立军部大臣现役大中将制度。	9月	美国国务卿海氏倡议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8月	大井等的大日本工人协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p>会、租佃条例促进同盟会成立。</p> <p>7月 修改条约生效（允许外人杂居内地、收回治外法权）。</p> <p>10月 片山潜等组成普通选举促进同盟会。</p>	10月 南非战争（—1902）。

第三时期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00 (明治33)	<p>1月 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p> <p>2月 足尾矿毒受害民五千人进京请愿，中途与警察队冲突。</p> <p>3月 公布产业公会法。 公布治安警察法。 公布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改革法（扩大选举范围）。</p> <p>4月 <明星>创刊。</p> <p>9月 立宪政友会成立（总裁伊藤博文）。</p> <p>10月 伊藤（第四次）内阁成</p>	<p>5月 义和团运动，各国出兵。</p> <p>8月 联军占领北京。</p> <p>9月 英国吞并南非共和国。</p> <p>11月 中俄签订密约。</p> <p>1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火星>创刊。</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01 (明治34)	立。	
	1月 内田良平组成黑龙会。	2月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
	2月 八幡制铁所开工。	
	4月 二六新报社主办的劳动者恳亲会通过要求制定工厂法、普选等议决案。	8月 美国钢铁公司六万二千人罢工。
	5月 片山、幸德等组成日本社会民主党，当日被解散。	9月 签订辛丑条约。
	公布台湾土地征用条例。	12月 俄国切尔诺夫等组成社会革命党。
	幸德秋水《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出版。	
	6月 桂太郎(第一次)内阁成立。	
	11月 伊藤博文向沙皇提出日俄协商方案。	
	12月 田中正造为足尾矿毒问题向天皇面诉。 田川大吉郎等组成普选同盟。	
1902 (明治35)	1月 日英签订攻守同盟条约。	2月 西班牙巴塞罗那八万人大罢工。
	2月 花井卓藏、河野广中等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03 (明治36)	第一次提出普选方案，被否决，以后至1910年止每年提出。	3月 列宁《怎么办》出版。
	4月 日本兴业银行成立。	11月 法意达成协议。
	9月 万朝报社人士组成理想团。	
	12月 教科书疑狱事件。	
	—— 宫崎民藏组成土地复权同志会。	
	4月 公布国定教科书制度。	7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第二次大会，讨论党纲时，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对立。
	6月 帝大七博士发表对俄强硬外交意见书（七博士事件）。	
	7月 头山满等组成“对外强硬同志会”（8月改名“对俄同志会”）。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精华》出版。	11月 美国永久租借巴拿马运河建设地带。
	8月 儿玉花外《社会主义诗集》出版。	英国工党成立。
	10月 社会主义协会在神田青年会馆举办第一次反战讲演会。 反战论者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堺利彦等退出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04 (明治37)	<p>万朝报社。</p> <p>11月 幸德、堺等建立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周刊。设立吴海军工厂。</p>	<p>3月 法国饶勒斯创办《人道报》。</p> <p>11月 巴库石油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举行罢工。</p>
	<p>2月 日本海军突袭仁川，旅顺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p>	
	<p>3月 《平民新闻》发表《与俄国社会党书》。 《平民新闻》发表《呜呼增税》一文，受处分。</p>	
	<p>8月 片山潜出席第二国际第六次大会（阿姆斯特丹），会上通过反战决议。</p>	
	<p>9月 辽阳大会战。 爱国妇女会创立。</p>	
	<p>11月 旅顺攻击战。 《平民新闻》译载《共产党宣言》，被禁止发行。社会主义者协会被解散。</p>	
1905 (明治38)	<p>1月 《平民新闻》停刊（64号）。</p>	<p>1月 俄国“流血星期日”（俄国第一次革命爆</p>
	<p>3月 日军占领沈阳。</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5月 平民社举办五一茶话会。 日本海海战。 8月 第二次日英同盟成立。 9月 签订日俄和约。 日比谷反对媾和国民大会。 烧毁东京全城警察机构事件。 10月 平民社解散。 关于共同经营南满铁路成立桂·哈里曼协定。 11月 签订日韩保护条约。 12月 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	发)。 4月 法国统一社会党成立。 6月 俄国战舰波将金号水兵起义。 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同盟(IWW)成立。 8月 孙文等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 10月 第一届俄国国会开会。 彼得堡各工厂选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召开第一次会议。 12月 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蔓延各地。
1906 (明治39)	1月 西园寺公望(第一次)内阁成立。 2月 文艺协会成立(11月举行第一次公演)。	2月 英国工党成立。 3月 法国煤矿工人四万五千人罢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07 (明治40)	<p>西川光次郎、堺利彦等组成日本社会党。</p> <p>3月 东京市民反对电车票涨价大会,发生暴动,派军队镇压。</p> <p>《社会主义研究》创刊。</p> <p>公布铁路国有法。</p>	<p>工。</p> <p>11月 俄国成立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法。</p>
	<p>6月 颁布敕令设立南满铁路公司。</p>	
	<p>1月 福田英子创办《世界妇女》。</p>	<p>3月 美国通过限制日本移民法。</p>
	<p>日刊《平民新闻》创刊。</p>	<p>8月 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通过反战决议案。</p>
	<p>2月 足尾铜矿工人暴动,派高崎连队镇压,逮捕三百余人。</p> <p>日本社会党第二次大会,发生议会政策派与直接行动派的对立。</p> <p>日本社会党按治安警察法被解散。</p>	
	<p>4月 朝鲜皇帝派密使赴海牙国际会议求援。</p>	
	<p>7月 强迫朝鲜皇帝退位。</p>	
1908 (明治41)	<p>2月 日美成立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协定。</p>	<p>4月 英国爱斯葵士自由党内阁成立。</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09 (明治42)	6月 赤旗事件，西川、大杉、堺等被捕。	7月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7月 桂(第二次)内阁成立。	10月 奥国合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8月 公布东洋拓殖公司法。	
	10月 《兰》创刊。 颁布戊申诏书。	
	11月 高平、鲁地缔结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协约。	
	6月 宇都宫连队集体逃走事件。	11月 印度立法会议，公布莫来——明多革新方案。
	9月 对朝鲜以全罗道为中心的民族运动实行大镇压。	
1910 (明治43)	10月 伊藤统监在哈尔滨车站遇刺。	
	11月 自由剧场创立，第一次公演“保尔克曼”。	
	3月 立宪国民党成立。	1月 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建议满铁中立化。
	4月 《白桦》创刊。	
	5月 幸德事件大搜捕。 对台湾少数民族开始军事镇压。	5月 南非联邦成立。
8月 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设立总督府（总督寺内正	10月 葡萄牙共和国成立。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11 (明治44)	9月 大杉荣、堺等创立“卖文社”。	11月 对华四国(英、美、德、法)借款团成立。
	10月 帝国复员军人会成立。	
	11月 全国农事会解散, 帝国农会建立。	
	1月 幸德等十二人处死。	6月 中国反对铁路国有运动激烈化。第二次摩洛哥事件。
	3月 公布工厂法。 确立关税自主权。	9月 的黎波里(意、土)战争。
	4月 公布朝鲜土地征用令。 东京、大阪设置特别高等警察。	10月 辛亥革命。
	6月 西园寺(第二次)内阁成立。	12月 南京建立临时政府, 宣布共和, 孙文就任临时总统。
	9月 平冢雷鸟等组成青鞞社, 创办《青鞞》。	
	12月 东京市电职工六千人在片山潜领导下举行罢工。	
	1912 (明治45)	4月 吴海军工厂三万人罢工, 派宪兵队镇压。
7月 明治天皇死, 改元大正(7月30日)。		3月 袁世凯就任临时总统。
8月 铃木文治等创立友爱会, 发行机关报《友爱新		5月 布尔什维克创办《真理报》。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13 (大正 2)	9月 大杉荣、荒畑寒村等创刊《近代思想》。	10月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3)。
	11月 内阁会议否决增设两个师团方案。	11月 第二国际巴塞尔大会, 通过反战决议案。
	12月 上原陆相上奏单独辞职。	
	西园寺内阁全体辞职, 桂(第三次)内阁成立。	
	1月 拥护宪政联合会, 全国各地护宪运动高涨。	6月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2月 东京市民数万人包围议会, 袭击国民等各报社和各警察署。	7月 中国反袁第二次革命。
	桂内阁全体辞职(大正政变)。	8月 孙文、黄兴等流亡日本。
	山本权兵卫(第一次)内阁成立。	10月 袁世凯就任总统。
	6月 废止军部大臣现役制。	
	10月 取得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权。	
12月 立宪同志会成立(总裁加藤高明), 《马克思主义》创刊。		
1914 (大正 3)	1月 日本海军受贿事件暴露	7月 奥对塞宣战。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15 (大正 4)	(西门子事件)。	8月 德奥同盟国与 俄法英协约国 相互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
	3月 山本内閣全体辞职。	巴拿马运河通 航。
	4月 清浦奎吾组閣失败(鯉 香内閣),大隈(第二次) 内閣成立。	1月 德国飞行船开 始空袭英国。
	8月 日本对德宣战,进攻青 岛。	5月 中国接受二十 一条要求。 意对奥匈宣 战。
	1月 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 求。	9月 中国《新青年》 创刊。
	3月 大浦内相干涉选举。	12月 袁世凯改制, 各地反袁斗争 起。
	7月 浦贺船坞七千工人罢 工。	1月 德国斯巴达克 团成立。
	8月 友爱会机关报《劳动新 闻》(月刊)创刊。	2月 凡尔登战役 (—6月)。
1916 (大正 5)	9月 堺、高畠素之等的《新社 会》(《丝瓜花》改名)创 刊。	4月 爱尔兰起义。
	6月 加藤、原、犬养三党魁会 谈。	7月 索姆河战役。
	9月 实施工厂法。 河上肇在《大阪朝日新 闻》发表《贫穷的故事》。 山川、荒畑等创办《青 服》。	12月 英国第一次劳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17 (大正 6)	10月 寺内内阁成立。 宪政会成立 (总裁加藤高明)。	合·乔治内阁成立。印度国民会议派和全印回教徒联盟要求自治。
	11月 欧文印刷工会信友会成立。	2月 德国开始无限制潜艇战。
	1月 西原借款开始。	3月 俄国二月革命, 成立临时政府。
	7月 制铁业奖励法。	4月 美国对德宣战。
	11月 石井蓝辛协定成立 (在中国机会均等, 承认日本的特殊地位)。 发表二十五个师团、八八舰队方案。 —— 民众艺术说盛行。	7月 俄国克伦斯基内阁成立。 11月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

第四时期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18 (大正 7)	2月 浦贺船坞五千五百名工人罢工。	1月 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条和平宣言。
	4月 日美英陆战队在海参威登陆。	2月 俄、德签订单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19 (大正8)	7月 《红鸟》创刊。 出兵西伯利亚宣言，日 美共同行动宣言。	独和约。 (布列斯特— 立托夫斯克条 约)。
	8月 富山县发生米粮暴动， 波及全国。 山口县宇部、福冈县峰 地煤矿发生暴动，派军 队镇压。	11月 德国革命爆 发，帝政被推 翻。 第一次世界大 战结束。
	9月 寺内内阁因米粮暴动全 体辞职，原敬内阁成立。	12月 英国实行普 选。
	12月 吉野作造等组成黎明 会。 新人会、建设者同盟等 成立。	妇女参政权。
	1月 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 创刊。	3月 第三国际(共 产国际)建立。 甘地领导的不 合作运动开 始。
	3月 朝鲜三·一独立斗争。	5月 中国五四运 动。
	4月 堺、山川等《社会主义研 究》创刊。	6月 凡尔赛和约签 字。
	5月 新人赛璐珞工会成立。	
	7月 《东京日日》、《朝日》、 《读卖》罢工，停刊四天。	
	9月 川崎造船所一万六千人 罢工，获得八小时工作 制。友爱会七周年大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0 (大正9)	12月 会,改名“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 协调会成立。	8月 德国公布威玛宪法。 12月 英公布治理印度法。
	1月 全国普选促进联合会成立。	1月 国际联盟成立。
	2月 八幡制铁所两万数千人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	4月 土耳其国民党临时政府在安卡拉成立。
	3月 东京七万五千人要求普选示威游行。战后经济危机爆发。	7月 直皖战争发生。
	4月 平冢明子等组成新妇女协会。	
	5月 日本第一次五一节在上野公园举行。 有十五个团体五千人参加。	
	8月 内务省设立社会局。	
	11月 尾崎、犬养等组成普选同盟会。	
	12月 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	
	1921 (大正10)	3月 奈良县柳原成立水平社。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2 (大正11)	4月 山川菊荣等的赤澜会成立。	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5月 社会主义同盟第二次大会, 无政府主义派与布尔什维派对立明显化, 被解散。	11月 华盛顿举行军缩会议。
	7月 神户三菱造船公司、川崎造船公司工人罢工(三万八千人), 宣布管理工厂, 派军队镇压。	
	10月 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十周年大会, 改名“日本劳动总同盟”。 《播种人》创刊。	
	11月 原敬被刺死。 高桥是清内阁成立。	
	12月 决定废除日英同盟。	1月 远东民族大会(莫斯科)。
	1月 争取妇女参政权同盟成立。	2月 签订关于中国的九国条约。
	3月 全国水平社成立。 政府向议会提出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工会法案、租佃纠纷调停法案。	10月 意大利法西斯党进军罗马, 莫索里尼组阁。
	4月 日本农民协会成立。	12月 爱尔兰自由国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3 (大正12)	6月 不干涉俄国同盟会成立。	建立。
	加藤友三郎内阁成立。	
	7月 日本共产党成立。	
	8月 山川均发表《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	
	10月 西伯利亚日本干涉军撤退完了。	
	11月 大日本赤化防止团成立。	
	1月 反对三苛法运动高涨，决定不提出。	1月 法比军开始占领鲁尔。
	6月 第一次检举日本共产党(六月事件)。	5月 英国第一次鲍尔温内阁成立。
	9月 关东大震灾，震灾地实行戒严令，发生震灾经济危机。	11月 德国希特勒领导慕尼黑暴动。
	山本权兵卫(第二次)内阁成立。 河合义虎、平泽计七等被杀(龟户事件)。 大杉荣夫妇等被甘粕兵大尉虐杀(甘粕事件)。	1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1月 颁布关于振奋国民精神的诏书。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4 (大正13)	12月 难波大助狙击皇太子 (虎门事件)。 1月 清浦奎吾内阁成立。 掀起打倒超然内阁的第二次护宪运动。 政友会分裂, 政友本党成立。 护宪同盟成立。 4月 安部矶雄等组成费边协会。 5月 平沼等组成国本社。 6月 小山内熏创立筑地小剧场。 加藤护宪三派内阁成立。 政治研究会成立, 促进无产政党准备运动。 <播种人>改名, <文艺战线>创刊。 7月 公布租佃纠纷调停法。 12月 争取妇女参政权促进同盟会成立。	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通过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决议案。 列宁逝世。 英国第一次麦克唐纳工党内阁成立。 4月 关于德国赔款决定采用道威斯方案。 10月 外蒙古独立。
1925 (大正14)	1月 日苏恢复邦交。 2月 东京三十五个团体三千人举行反对苛法示威游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6 (大正15)	行，全国反对运动高涨。	3月 孙中山逝世。
	3月 通过普通选举法(5月公布)。	4月 德国兴登堡当选为总统。
	通过治安维持法(4月公布)。 学校实行军事教育。	5月 中国五卅惨案， 上海发生反帝大罢工。
	5月 总同盟分裂，日本工会评议会成立。	12月 签订罗加诺条约。
	8月 加藤宪政会单独内阁成立。	
	9月 <无产者新闻>创刊。	
	12月 农民劳动党成立，即日被禁止。 日本无产者文艺联盟成立。	
	1月 京大学联事件，第一个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被起诉。	5月 英国煤矿工人总罢工。
	共同印刷工人两千三百人罢工。	7月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黑色联盟成立，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联合。	9月 德国加入国联。
	3月 劳动农民党成立。	12月 武汉政府成立。
	4月 公布劳资纠纷调停法。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7 (昭和2)	滨松日本乐器工厂一千三百八十人举行罢工。	
	5月 新潟县木崎村纠纷激烈化,因临时禁止入内,与警察队冲突,小学生四百名实行罢课。	
	12月 日本共产党重建大会,在山形县五色温泉召开。 社会民众党成立。 日本劳农党成立。	
	3月 爆发金融危机。	3月 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南京。
	4月 救济台湾银行紧急敕令方案被枢密院否决,若槻内阁全体辞职。 田中义一内阁成立。 根据紧急敕令,实行停止三周间提存。	4月 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
	5月 第一次出兵山东。	6月 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
	不干涉中国运动全国同盟第一次会议。	8月 美国政府判处萨柯和范齐蒂死刑。
	6月 立宪民政党成立(总裁滨口雄幸)。 召开东方会议,第二次东方会议(8月)。	12月 广州起义。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8 (昭和 3)	7月 通过一九二七年纲领 (关于日本的纲领)。	
	9月 野田酱油厂三千四百人 实行长期罢工。	
	2月 根据普选法举行第一次 大选, 无产政党有八名 当选为众议员。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赤旗》创刊。	6月 张作霖被炸 死。 国民革命军进 入北京。
	3月 三·一五事件, 一千六 百余人被搜捕, 九百人 被起诉。 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 成立, 创刊《战旗》。	8月 凯洛格公约签 字。
	4月 劳农党、无产青年同盟、 评议会等三团体被解 散。 第二次出兵山东。	10月 国民党政府组 织法公布。蒋 介石就任主 席。
	5月 日军虐杀中国人(济南 事件)。 修改治安维持法(定最 高刑为死刑)。 设立日本商工会议所。	
	7月 新设特别高等警察科。	
	8月 全国反战同盟成立。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29 (昭和4)	12月 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成立。	
	1月 堺真柄等组成无产妇女同盟。 劳农大众党成立。	3月 美国胡佛当选为总统。 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大会(柏林)。
	2月 日本无产者作家同盟成立。	
	4月 四·一六事件,共产党员全体被搜捕,八百二十五人被起诉。	4月 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7月 禁止妇女和儿童深夜作业。 滨口雄幸内阁成立。 井上藏相声明撤销黄金出口禁令,引起股票暴跌。	6月 签订杨格方案。 英国麦克唐纳(第二次)内阁成立。
	8月 连续发生铁路受贿事件、卖勋事件、釜山粮食交易所事件等贪污案。	10月 纽约股票暴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
	9月 《无产者新闻》停刊(238号),《第二无产者新闻》创刊。	
	10月 政府发表官吏减薪方案,因推事、检察官等的反对而撤回。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0 (昭和 5)	1月 解除禁运黄金出口法令生效。	1月 伦敦开海军裁军会议(—4月)。
	3月 股票大跌价, 危机深刻化。	
	4月 钟纺三十六个工厂三万五千人罢工。	西班牙的独裁者里维拉辞职。
	因签订伦敦裁军条约而发生干犯统帅权问题的争端。	
	5月 <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创刊。	7月 长沙苏维埃成立。
	6月 商工省设立临时产业合理局。	11月 英印第一次圆桌会议。
	7月 无产党中三派合并, 组成全国大众党。	
	9月 陆军青年将校组成“樱会”。	
	10月 台湾雾社原住民起义。	
	12月 滨口雄幸遇刺。	
1931 (昭和 6)	1月 井上日召等组成血盟团。	4月 西班牙建立共和制。
	3月 三月事件(未遂)。	7月 美国胡佛宣布限制提存。
	4月 公布重要产业统制法(8月实施)。	
	若槻(第二次)内阁成	10月 英国麦克唐纳联合内阁成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2 (昭和7)	立。	立。
	橘孝三郎组成爱乡塾。 日本共产党发表政治纲领草案。	
	6月 内田良平等组成大日本生产党。	
	7月 全国劳农大众党成立。 万宝山事件。	
	9月 九一八事变。	
	10月 十月事件(未遂)。 日本无产者文化联盟成立。	
	11月 三井财阀收买美金引起风波。	
	12月 犬养毅内阁成立(最后一次政党内阁)。 再度禁止黄金出口。	
	1月 上海事变。 安冈正笃等组成国维会。 社会民众党通过三反纲领决议案。	2月 日内瓦开裁军会议(—7月)。
	2月 井上准之助被刺死(血盟团事件)。	6月 召开洛桑赔偿会议。
	3月 建立“满洲国”。	7月 渥太华英帝国经济会议。 德国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3 (昭和8)	5月 犬养首相等被杀(五·一五事件)。 斋藤实(举国一致)内阁成立。 发表一九三二年纲领(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	8月 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世界反战大会。 11月 苏法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7月 社会大众党成立。	
	8月 各地发生米粮暴动。	
	9月 日满议定书签字。	
	10月 唯物论研究会成立。 外务省发表李顿报告书。	
	12月 安达谦藏组成国民同盟。	
	2月 关东军侵入热河。 小林多喜二被捕遭杀害。	1月 德国希特勒内阁成立。
	3月 日本退出国联。 公布米谷统制法。	3月 美国罗斯福当选为总统。
	3月 中日订立停战协定。	5月 美国“新政”开始。
	5月 京大泷川事件。 塘沽协定签字。	10月 德国退出国联。
6月 佐野学、锅山贞亲声明脱党，以后脱党者陆续	11月 美国承认苏联。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4 (昭和9)	出现。	
	7月 神兵队事件被揭发。 三木清、长谷川如是闲 等组成学艺自由同盟。	
	9月 关东军发表满洲产业统 制方针。	
	11月 内政会议，决定振奋农 民精神等五项政策。	
	4月 参加无产者文化联盟的 十团体声明解散。 帝人疑狱事件被揭发， 斋藤内阁全体辞职。 三菱建立重工业。 发表侵华的天羽声明。	3月 美国国会通过 菲律宾独立法 案。
	6月 文部省设立思想局。	8月 德国希特勒就 任总统。
	7月 冈田启介内阁成立。	9月 苏联加入国 联。
	9月 新协剧团成立。	10月 中国红军开始 长征。
	10月 陆军省颁布《国防的意 义及其强化方针》小册 子。	
	11月 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 (全评)成立。 陆军青年将校阴谋政变 计划暴露(士官学校事 件)。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5 (昭和10)	12月 宣布废弃华盛顿军缩条约。	
	2月 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遭到攻击。	3月 德国宣布重新武装。
	3月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解散。	6月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决议案。
	5月 矶部、村中等提出“关于整军意见书”。	
	6月 察哈尔事件，何梅协定。	10月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7月 皇道派真崎教育总监革职。	11月 中国国民党政府开始改革币制。
	8月 相泽中校刺死永田军务局长。	
	12月 满铁设立开发华北的兴中公司。	
	—— 倾销政策发生困难。	
	1936 (昭和11)	1月 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广田外相发表对华三原则的声明。		3月 德国进军莱茵非武装区。
2月 二·二六事件，皇道派青年将校的政变。		5月 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亚。
3月 广田弘毅内阁成立。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5月 全国禁止举行第十七次五一节。 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 中野正刚等组成东方会。 6月 公布不稳文书管理法，即日施行。 9月 禁止陆军工厂工人加入工会和集体行动。 11月 日德“防共协定”签字。公布思想犯保护观察法。	6月 法国人民阵线(勃鲁姆)内阁成立。 7月 西班牙佛朗哥军发动叛乱。 12月 中国西安事变。

第五时期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7 (昭和12)	2月 林銑十郎内阁成立。 3月 日本无产党成立。 4月 大选中政府党惨败，社会大众党三十七人当选，日本无产党一人当选。 5月 “满洲国”公布重要产业	4月 治理印度法生效。 实施印度统治法。 5月 英国张伯伦保守党内阁成立。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8 (昭和13)	统制法。	9月 国共合作。
	6月 第一次近卫文磨内阁成立。	12月 意大利退出国联。
	7月 中日战争爆发。	
	9月 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	
	10月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大会宣布在事变期间消灭罢工。	
	11月 日德意“防共协定”签字。设置大本营。	
	12月 日军占领南京，南京大屠杀。 第一次人民阵线事件，逮捕与日本无产党、全评、劳农派有关人员。政府下令解散全评和日本无产党。	
	1月 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3月 德国合并奥国。
	2月 第二次人民阵线事件，劳农派被逮捕。	9月 英、德、法慕尼黑会议。
	4月 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国家管理电力法。	10月 法国人民阵线瓦解。
6月 发表物资总动员计划的	12月 汪精卫离开重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39 (昭和14)	基本原则。	庆,发表艳电。
	7月 张鼓峰事件。 产业报国联盟成立。	
	10月 禁止河合荣治郎著《法西斯主义批判》等书发行,其后河合被东大命令停职。	
	11月 近卫首相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1月 平沼骐一郎内阁成立。	3月 德国并吞捷克。
	5月 诺门坎事件,日军大败。	
	7月 公布国民征用令。 日英东京会谈决裂。 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	8月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 阿部信行内阁成立。	9月 德军侵入波兰。
	9月 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日苏订立停战协定。	英法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0月 公布物价等统制令(九·一八价格停止令)。	11月 苏芬开战。
	11月 野村外相和格鲁驻日大使举行日美第一次会谈。	
	12月 公布地租统制令。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40 (昭和15)	<p>1月 米内光政内阁成立。</p> <p>3月 津田左右吉因著《神代史研究》等而招笔祸。</p> <p>5月 公布米粮义务交售制。</p> <p>7月 七·七禁止令（限制制造、贩卖奢侈品等条例）生效。</p> <p>社会大众党解散，政友会各派解散。</p> <p>近卫（第二次）内阁成立。</p> <p>8月 民政党解散。</p> <p>9月 侵入法属北越。</p> <p>内相训令建立部落会、町内会、市町村常会等组织。</p> <p>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签订。</p> <p>10月 创立大政翼赞会。</p> <p>逮捕索尔凯、尾崎秀实等人。</p> <p>11月 创立大日本产业报国会。</p>	<p>4月 德军占领丹麦，侵入挪威。</p> <p>5月 德军侵入比、荷。</p> <p>英国丘吉尔组阁。</p> <p>6月 法国无条件投降。</p> <p>7月 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p>
1941 (昭和16)	<p>12月 设立内阁情报局。</p> <p>4月 日苏签订中立条约。</p>	<p>3月 美国国会通过</p>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42 (昭和17)	日美法谈判开始。	租借法案。
	5月 公布国防保安法。	6月 苏德开战。
	7月 近卫(第三次)内阁成立。 侵入法属越南。	7月 美、英冻结日本资产。
	8月 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 开始谈判。	美苏互助条约 签订。
	10月 东条内阁成立。	8月 发表《大西洋 宪章》。
	11月 来栖大使为日美谈判赴 美。	
	12月 进攻珍珠港,对美英荷 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1月 日军占领马尼拉。	
	2月 大日本妇女会成立。 日军占领新加坡。	8月 美军登陆瓜达 康纳尔岛。
	4月 美机空袭东京、名古屋、 神户等地。	丘吉尔访苏, 达成建立第二 战场协议。
	5月 翼赞政治会成立。 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	11月 盟军在北非登 陆。
6月 中途岛海战。 日军占领阿图岛。		
11月 成立大东亚省。		
1943 (昭和18)	1月 指令制铁工厂由国家管 理。	1月 卡萨布兰加会 谈。
3月 大日本言论报国会成 立。	2月 斯大林格勒的 德军投降。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44 (昭和19)	6月 决定第一次增产食粮紧急对策纲要。	5月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8月 实施朝鲜、台湾人参加海军特别志愿兵令。	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巴杜格里奥内阁成立。
	11月 召开大东亚会议。 马金、泰拉瓦岛日军全被歼灭。	9月 美英军在南意登陆。
	12月 学生兵入伍。 降低兵役年龄一年，定为十九岁。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10月 苏美英外相举行莫斯科会议。
		11月 开罗会议。 德黑兰会议。
	1月 <中央公论>、<改造> 编辑被检举(横滨事件)。	6月 美英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2月 在朝鲜实行征兵制。	7月 布里敦森林会议。
	3月 实行决战非常措施。 强化女子挺身队。	顿巴敦橡树园会议。
	5月 开展全民奋起运动。	巴黎德军投降。
	7月 小矶、米内内阁成立。 塞班岛日军全部被歼。	
	8月 设立战争最高指导会议。	
	9月 满十八岁以上者编入军	

年 号	日 本	外 国
1945 (昭和20)	<p>队。 关岛、突尼安岛的日军全部被歼。</p>	
	11月 美机 B29 第一次空袭东京。	
	3月 琉黄岛日军全部被歼。 美空军对东京大轰炸。 大日本政治会成立。 美军在冲绳本岛登陆。	2月 雅尔塔会议。 3月 阿拉伯联盟成立。 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
	4月 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 苏联通知不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	4月 罗斯福死，杜鲁门继任总统。
	5月 战争最高指导会议秘密商定和平方针。	
	7月 为配合国内战场化制定运输紧急对策。	5月 德国无条件投降。
	8月 美军在广岛投原子弹。 苏联对日宣战。 户坂润死于狱中。 美军在长崎投掷原子弹。	7月 波茨坦会议，波茨坦公告。 8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颁布结束战争的诏书。 东久迩内阁成立。	
	9月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